



黑客帝国与哲学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美〕威廉·欧文 (William Irwin) 编

张向玲 译

THE

MATRIX

AND PHILOSOPHY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上海三联书店



黑客帝国与哲学

《黑客帝国》是最具哲学意味的电影，它快节奏的情节的每一步都围绕着一个哲学难题。如果我们所知的世界不过是一场梦，这个梦是真实的吗？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吞下红色药丸，走出我们的世界，进入一个更真实但不那么舒适的世界，那么不这样做会是一个道德上的失败吗？为什么人的确有超出智能电子机械的价值？精神与肉体可以彼此分离而存在吗？

在《黑客帝国与哲学》中，职业哲学家们从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黑客帝国》。他们揭示了这部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隐秘深度。

《黑客帝国》涉及诸多核心的哲学主题，在识别和探索它们的过程中，《黑客帝国与哲学》甚至涉及了更多的主题。能够让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唯实论者、唯物论者、整体论者、存在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都认同的是什么呢？他们的标志性思想深藏在《黑客帝国》中，并为本书所发掘。无论你的哲学偏好是什么，在本书中，总能找到适合你的那一份。

——洛·马瑞诺夫，纽约城市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
著有《柏拉图灵丹》和《哲学实践》

如果你像基努·李维斯一样，为《黑客帝国》的情节困扰，请读《黑客帝国与哲学》。如果你一点都不困惑，建议你立刻去看医生。如果你压根还没看过《黑客帝国》，你真的必须得读这本书，看看为何这部电影成了整整一代大学生难以忘怀的体验。

——保罗·坎特，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
著有《无界的梦幻岛——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和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罗马》等

ISBN 7-5426-2326-5



9 787542 623263 >

定价：30.00 元

黑客帝国与哲学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THE
MATRIX
AND PHILOSOPHY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

〔美〕威廉·欧文 (William Irwin) 编

张向玲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客帝国与哲学——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美)威廉·欧文
主编;张向玲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6
ISBN 7-5426-2326-5

I. 黑... II. ①威... ②张... III. 科学幻想片—电影评论—
美国 IV. J90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055832 号

黑客帝国与哲学——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著 者 / [美]威廉·欧文

译 者 / 张向玲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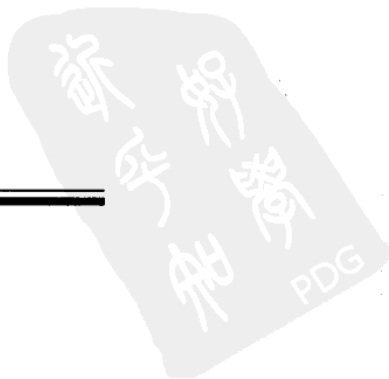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70 千字

印 张 / 18.25

ISBN 7-5426-2326-5

G·781 定价:30.00 元



致 谢

多谢本书作者们的努力工作,对他们及时地完稿以及所发表的精妙见解表示感谢。Open Court 出版社的各位优秀人士,特别是大卫·拉姆齐·斯蒂尔(David Ramsay Steele)、马克·安罗森(Marc Aronson)、克尔·莫姆(Kerri Mommer)、利萨·莫里(Lisa Morie)和珍妮弗·阿斯姆斯(Jennifer Asmuth)都提出了睿智的建议,坚持不懈地给予了帮助和大力支持。我的学生助理特丽莎·艾伦(Trisha Allen)和珍妮弗·奥尼尔(Jennifer O'Neill)校对了所有的底稿,为我省却了诸多烦恼和错误,如仍有错误之处,应由我负责。最后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朋友、同事以及学生们,正是通过与他们一起对《黑客帝国》和哲学所进行的讨论,才使得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他们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像这样的一个致谢名单几乎不可避免地是不完整的,在他们当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是:里奇·阿格尼洛(Rich Agnello),亚当·艾伯特(Adam Albert),马克·科纳德(Mark Conard),比尔·德鲁米(Bill Drumin),罗伯特·吉尔德纳(Robert Guldner),佩格·霍根(Peg Hogan),梅根·劳埃德(Megan Lloyd),亨利·纳顿(Henry Nardone)和国王学院的苏格拉底协会,还有埃恩·斯科保(Aeon Skoble),尼克·泰林达(Nick Tylenda),乔·泽卡迪(Joe Zeccardi)。

导论：关于《黑客帝国》的深思

你会选择哪一种药丸呢，红色的还是蓝色的？无知是福吗？或者不论真相是什么都值得我们去探究吗？在观看了电影《黑客帝国》之后，其中的故事情节和视觉特效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同时我们也被诸多问题所困扰。有可能我们自身真的是母体(Matrix)中的囚犯吗？这是一部关于基督教的影片吗？还是有关佛教的？汤匙真的根本不存在吗？

国王学院我的一个学生亚当·艾伯特(Adam Albert)最先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黑客帝国》上面。他一眼就看出这部影片与笛卡尔(Descartes)对被梦或者是被一个邪恶的骗子所欺骗的可能性所做的推断之间的联系。我的经历以及他的经历和世界各地那些哲学教授和学生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现代哲学》(*Philosophy Now*)杂志甚至为大学生们举办了一次短文竞赛。主题是：你会选择哪种药丸？为什么？

以这本书为契机，教授们针对他们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每一位作者对于这部影片所蕴含的哲学意义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且进行了解答。正如文化评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指出的那样，《黑客帝国》这部电影是对哲学家们的一次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 test)^[1]。哲学家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佛教、虚无主义、后现代主

[1] 罗夏墨迹测验，又称罗夏墨迹投射测验，其基本原理是：人的视觉知觉中可以表现出该人的人格特点。基于这样的推论，瑞士精神病专家罗夏制作了大量随机形成的墨迹图板，然后让被测试者报告在图板上看到的东西，由此对被测试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译者注

义。随便你说出哲学上的什么主义(ism),你都能够从《黑客帝国》里找到。而且,这部影片并不是某种随意被产生出来的墨迹,在它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并且是有意地与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激起了大学期间辍学的连环漫画家沃卓斯基兄弟(Wachowski)^[1]的极大兴趣,他们欣然承认,在这部影片的构思中他们确实是加入了许多哲学上的主题和暗示。《黑客帝国与哲学》这本书并不想在每一个方面都试图或者是声称传达《黑客帝国》的作者和艺术家们的既定意图。相反,本书旨在突出这部影片在哲学上的重要性。

为了解释崔妮蒂(Trinity)^[2]所说的“是这些问题驱使着我们”这句话。本书的作者们引用了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奎那(Aquinas)、笛卡尔(Descartes)、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萨特(Sartre)、塞拉斯(Sellars)、诺齐克(Nozick)、布希亚(Baudrillard),以及奎因(Quine)(哲学家中的佼佼者)就下列问题发表见解:我能知道些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我可以希望些什么?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精神?什么是自由以及我们是否拥有它?人工智能是可能的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哲学的许多主要分支进行探讨,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哲学,美的哲学,心理哲学,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等。尽管问题是如此之多,但只有一个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觉醒!

人们喜爱大众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语言。你知道阿莉亚(Aaliyah)^[3]没有拍摄完《黑客帝国》就去世了么?你知道在那之前不到一年 W. V. 奎因(W. V. Quine)也与世长辞了么?许多人对大众明星女歌手阿莉亚十分熟悉,然而大多数人对于伟大的哲学家奎因甚至是闻所未闻。本书的作者们旨在引导读者从大众文化的角度上升到哲学的角度。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是某起犯罪行为的策划者,也堪称是个犯罪天才吧,当被问道“威利,你为什么要抢银行?”的时候,他简单明了地回答说“因为钱在那里啊”。那么为什么要写像《黑客帝国》这样的大众文

[1] 《黑客帝国》的导演兼编剧。——译者注

[2] 《黑客帝国》中的女主角,名字来源于宗教上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译者注

[3] 美国新锐黑人女歌手,《黑客帝国II》中 Zee 这一角色的扮演者,但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她在2001年8月25日的一起飞机失事中不幸遇难,那时她已经拍了十几个镜头了。有人也译为阿丽雅。——译者注

化呢？因为人们喜欢。

如果我们对荷马(Homer)、但丁(Dante)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作品提出哲学上的问题，没有人会反对。《黑客帝国》并不属于西方的经典之作，但是这部影片仍然和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也同样提出了哲学上的问题。如果哲学只存在于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如果哲学只是与教授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它就会真的如太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成为呆板无趣而毫无硕果的学科。但是哲学无处不在；它与每个人的生活都休戚相关，它可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像母体一样，“它就在我身边”。

本书并不只是针对哲学家们而写的，而是针对所有曾经“觉得心头有一根刺，会把我们逼疯”的人而写的。

让本书成为引领你哲学研究的起点而绝非终点。

目 录

致谢 (1)

导论:关于《黑客帝国》的深思 (1)

场景 1 你怎么知道?

1 电脑、洞穴和祭司:尼奥与苏格拉底 (3)

2 怀疑论、道德与《黑客帝国》 (15)

3 母体存在的可能性 (27)

4 看到、相信、接触、真理 (39)

情节 2 真实的荒漠

5 《黑客帝国》中的形而上学 (53)

6 机械制造的鬼怪:或曰,心灵哲学、母体样式 (63)

7 尼奥——唯物主义与主体的死亡 (72)

8 命运、自由和预知 (83)

情节 3 沿着道德和宗教的兔子洞

9 汤匙不存在:一面佛法之镜 (99)

黑客帝国与哲学

- 10 《黑客帝国》里的宗教和多元论问题 (109)
- 11 幸福和塞佛的选择:无知是福吗? (124)
- 12 我们就是救世主!——康德解说该如何操纵母体 (136)

情节 4 虚的主题

- 13 地下室手记:虚无主义与《黑客帝国》 (153)
- 14 取出一个苦的药丸:《黑客帝国》和《恶心》中
存在主义的真实性的真实性 (164)
- 15 对尼欧科幻小说的真实回应的悖论 (176)
- 16 真实流派与虚拟哲学 (186)

情节 5 解构《黑客帝国》

- 17 解读基努·李维斯:新的突破口,
但却是一样的欺骗 (201)
 - 18 《黑客帝国》、马克思与红毛人的生活 (213)
 - 19 《黑客帝国》的模拟和后现代时代 (222)
 - 20 母体:或者,颠倒的两个方面 (236)
-
- 作者介绍 (263)
 - 译名对照 (268)

场景 1

你怎么知道？



1 电脑、洞穴和祭司： 尼欧^{〔1〕}与苏格拉底

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

看着墙上的影子
我告诉他们我很好。

——约翰·列农(John Lennon)

我们被锁链束缚
却从来不知道钥匙在自己手中

——老鹰乐队(The Eagles)^{〔2〕}

许多人公认《黑客帝国》是对他们“曾经听过的最精彩的故事”的重述。圣经的比喻很清楚，该影片于1999年复活节周末的上映也支持了这一意图。很少人认为《黑客帝国》是“从未听过的最精彩的故事”。因为还有苏格拉底的精彩故事，一个学识渊博的英雄，冲破层层阻碍，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最终为了他崇高的反抗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大多数人不知晓我们的文化所提供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故事呢？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把讲故事的工作留给了大学里的哲学教授们。

〔1〕 另译为尼奥。——译者注

〔2〕 这句歌词选自老鹰乐队的歌曲 *Already Gone*。——译者注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上大学,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上大学的人都会学习哲学课程。虽然哲学 101 是可以更加接近地学习和满怀激情地讨论苏格拉底的生活的一个理想框架,但没有必要等待一个永远都不会来临的机会。像耶稣的故事一样,苏格拉底的故事也应该出现在孩子们阅读的书中,出现在家庭和课堂的讨论中,以及专门的电视节目中。应该有一部介绍苏格拉底的电影。沃卓斯基兄弟(Wachowski)用基努·李维斯(Keanu Reeves)做主角,以一种隐讳、含蓄的方式讲述了苏格拉底的故事,但是在一个“并非为了辩护”的苏格拉底的电影庆典上,我会让史蒂文·马丁(Steve Martin)担当主角。由 Spielberg 做导演。电影《黑客帝国》包含了许多内容,重述苏格拉底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观众们一定会忽略影片中的这一要素,除非他们早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如果你对苏格拉底的故事还不熟稔的话,那么从这篇短文中你就会略知一二。

问题与使命

布鲁斯兄弟说“我们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们拿着满满一罐气体,半包香烟,距离芝加哥一百零六英里。天很黑,他们戴着太阳眼镜。他们的使命就是举办一场音乐会,以挽救他们生活的孤儿院,在那里,一个守旧派的修女抚养他们长大,他们亲切地称她为企鹅。尼欧肩负着把毫不知情的人类从人工智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使命。苏格拉底同样也肩负着使命,来自于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使命,这种使命通过特尔斐(Delphi)的祭司传达给了他的朋友克里芬(Chaerephon),如果苏格拉底接受的话,那么他的使命就是“唤醒”他故乡里的人们,也就是雅典。

在地狱般的哥特人俱乐部里,在透过疯狂的、喧闹的低声耳语中,崔妮蒂告诉尼欧,“正是这个问题驱使着我们”。他们的问题是:母体是什么?和尼欧一样,苏格拉底“心头也有根刺”,也有一个问题在驱使着他: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种质疑给我们的两位英雄都带来了麻烦。苏格拉底受到了审判,被指控渎神以及蛊惑青少年,而电脑人史密斯则指控尼欧“几乎犯下了所有的计算机犯罪”。

苏格拉底常常会问他的市民朋友们一些问题，通常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很直接，很简单，但答案却常常令人难以琢磨。就像一个熟练的面试官一样，苏格拉底会用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紧追不舍，直到这些问题暴露出被他提问的人的无知。比如，苏格拉底问他的朋友游叙弗伦(Euthyphro)：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什么使得一种行为是神圣的？游叙弗伦的回答是：“神圣就是所有神都喜欢的，而它的反面，不神圣，就是所有神都讨厌的。”(Euthyphro 9e)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回答，直到苏格拉底又提出了紧随其后的更难的问题：“神圣的东西是因为神的批准才变得神圣，还是因为它是神圣的所以神才会批准？”(Euthyphro 10a)你一定能想象得到，对于这个问题游叙弗伦就很难回答了，并开始对苏格拉底的刨根问底感到厌烦了。这种一直提问题直到被提问者自相矛盾，或出错时才结束的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苏格拉底问答法(跟比尔和泰德在圣地玛斯高中学到的一样)。的确，这种持续提问的方式不仅胁迫了学生(像在 *The Paper Chase* 里)，还使政治家们感到窘迫不安(你可以自己举个例子)，但是它使得苏格拉底在那些有社会觉悟的青年中广受欢迎，也遭到了利己主义分子的轻视。

尽管自己的提问经常被视为一种相当傲慢自大的对话风格，苏格拉底对于自己的知识还是完全持一种谦逊的态度。他声称自己的无知，而不是高唱赞歌说自己无所不知，“我一无所知”。为什么一个自称一无所知的家伙却如此热情地提问每一个人呢？和尼欧一样，苏格拉底的精彩冒险是由祭司所说的话以及对知识和自由的本质的某种洞察力所点燃的。

祭司说了些什么？

祭司告诉莫斐斯(Morpheus)^[1]他会找到救世主，也就是能够打破母体的控制，解放人类并告诉他们真相的人。因此莫斐斯拔去了尼欧的插孔，经过一些恢复程序和功夫打斗之后，莫斐斯带着尼欧去见祭司，以

[1] 《黑客帝国》中人类反抗者的基地领袖，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睡眠之神。——译者注

便确认他就是救世主。尼欧抗拒自己是救世主的这种重大的可能性，拒绝接受他的命运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被注定，他告诉莫斐斯他不相信命运——他相信他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苏格拉底也以类似方式反抗过自己的命运。至少在对他的审讯中，苏格拉底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记录道：

[Chaerephon]是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他到特尔斐去，去问祭司一个问题……他问是否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阿波罗的女祭司回答说，没有比我更聪明的人了。（*Apology* 21a）

当我听到女祭司的回答时，我的反应是：神究竟在说什么？他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我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多少智慧，无论是大智慧还是小智慧。那么他说我很聪明又是什么意思呢？（*Apology* 21b）

的确，一个自称一无所知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这怎么可能呢？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他开始反驳祭司的预言。

我是这样做的：我接近了一位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我想，如果在他那里，或者无论何处，我能够证明祭司的回答是错误的，那么我可以很清楚地对祭司说：“这个人比我聪明，而你却说我是最聪明的。”（*Apology* 21c）

在对这个人，即一位政治家，进行提问的时候苏格拉底感到很失望，他发现这个人自诩知道的很多，实际上却什么也不知道。由于与生俱来的毅力，苏格拉底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提问那些受人尊敬的剧作家们以及雅典的能工巧匠们。他同样感到很失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的同时，苏格拉底的确是雅典最聪明的人。

因此，苏格拉底把对他的市民朋友进行提问，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无知以便能够觉醒并和他一起探求知识当作自己的一项神圣使命。

1 电脑、洞穴和祭司：尼欧与苏格拉底

用一个有些可笑的比喻，整个城市好像是一匹马——一匹巨大的马，精神的高度饱满，但是由于身形高大而有些行动迟缓，需要由某种马蝇来叮咬一下以刺激它迅速行动。我认为神是让我来充当这种马蝇以唤醒整个城市，充当那种永不停息的马蝇，整天都停留在你们身体的每个部分，叮咬着你们每一个人行动起来，劝说你们，批评你们。（*Apology* 30e）

就像一只害虫，一只马蝇（或者是牛蝇）一样，用持续不断的提问，苏格拉底旨在唤醒整个城市，让人们看到真相——胶水厂，不是福佑，是那些停留在懒惰的无知上的人们的去处。

两个祭司的家是大不相同的。据神话记载，宙斯从东西方分别释放了一只鹰，让它们寻找世界的中心。两只鹰拼命地飞啊飞啊，直到在特尔斐某个地点的中央上空，它们互相逼视着对方，就这样宣布了世界的中心或中心点。特尔斐位于帕纳塞斯山（希腊中部，古时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的山脚下，是一个宏伟而美丽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太阳神阿波罗通过他的女祭司也就是皮提亚（Pythia）传达神意。莫斐斯并没有把尼欧带到世界的中心，而是带到了母体的中心，带到了——一个与帕纳塞斯山几乎完全不同的地方，一所位于城市内部的房子，一个不太可能像是祭司的人的家里。

对自己不太自信的尼欧问莫斐斯，“她知道些什么？……什么都知道吗？”莫斐斯回答，“她会说她知道的不少”。尼欧仍然很怀疑，又问道，“那她从来没有错过吗？”莫斐斯避开了那种很荒谬的保证式的回答，而是含蓄地说，“试着别用对和错来考虑问题。她是一个引导者，尼欧，她能帮你找到方向”。

到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来祭拜的游客在做了适当的供奉和捐献之后，就可以提出他的（女人是不允许提问的）问题，但是只能向祭司的助手提问题，然后再由助手把问题转告给女祭司。坐在三角架上，女祭司吸入阿波罗的气息，烟雾（可能是乙烯）便会从地上的裂缝中散发出来。就像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上的一个午夜烟鬼。阿波罗的女祭司口中念念有词地做出预言。接着就由牧师来解释这些不连贯的呓语之

语,通常牧师会把它们翻译成六步格的韵文。就像一个人从1—900—PSYCHIC中所得到的睿智忠告一样,祭司的预言通常是很模糊的,会有很多种可能的解释。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认为祭司的预言,即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是令人困惑的。尽管知道祭司就是以一种神秘莫测,含糊其词的预言而谋生的,苏格拉底还是开始着手反驳它,结果发现了它的讽刺性含义。不够聪明的人是克罗伊斯(Croesus)国王,他想从祭司那里知道,对他而言,向波斯开战是否是一个极好的时机。祭司的回答是,“如果你现在发动战争,那么一个伟大的王国将会被毁灭”。把这句话当作是一个好消息,克罗伊斯国王率领着他的军队投入了战斗和屠杀,结果惨遭失败。他没有真正的理由抱怨祭司,祭司很简单地指出,是他自己没有领会清楚她指的到底是哪一个王国将会被毁灭。

《黑客帝国》里的女祭司不但生活在真实城市里一个很粗糙的地方,她还是一个像祖母般的黑人妇女——“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而是和皮提亚非常相像,是从50岁以上的妇女中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不是从那些美德不太让人放心的纯情少女中挑选出来的。与特尔斐的祭司不同,居住在真实的城市内部的这个祭司与寻找她的人面对面的接触。不考虑坐在三角架上这个事实,她幸福地呼吸从她的烤箱里散发出的小甜饼的味道,同时也吸入了她的香烟所散发出的烟雾,她并不是口中念念有词,喃喃自语。但是,别让这些欺骗了你;她的预言,虽然很简单,很明白,但是目的和皮提亚是一样的。有些古怪的是,这个女祭司还问了许多问题。“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吧?”“你觉得呢?”“你认为自己是救世主吗?”尼欧回答说,“我不知道。”苏格拉底也总是声称自己不知道,但是尼欧是真的不知道。祭司一语双关,说他很帅但不是很聪明。她让尼欧自己做出推断他不是救世主,并且告诉他当救世主就跟谈恋爱一样。没什么道理,“你就是彻头彻尾地知道,全身上下都知道”。作为一种可怜的安慰,她告诉他,“你很有天赋,但看起来你还在等待什么”。“等待什么?”尼欧问道,她预言性的回答是:“也许是投胎转世吧,谁知道呢?事情总是这么无奈。”

但是女祭司并没有恶意,甚至在他们的谈话过程中她还提供了坦率的建议。祭司指着厨房门上方的一个标志,问尼欧他是否知道上面写的

是什么。她告诉他,那是拉丁语,意思是“认识我自己”。这句至理名言事实上是弄清楚祭司的预言的真实含义的关键所在。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也有用希腊语记录的同样的短语,即 γνῶθι σαυτόν,(而不是“野蛮的,毫无约束的”拉丁文,“Temet Nosce”),毫无疑问,这个短语在解释皮提亚的任何预言方面比祭司给出的实际回答更加重要。苏格拉底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以相关的格言为座右铭,即“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骄傲自大的克罗伊斯国王就不了解自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有当尼欧及时地认识自己,从而相信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领会祭司的预言的深刻含义——包括莫斐斯能够找到救世主以及崔妮蒂爱上了一个死去的人,也就是救世主。

自知是把钥匙,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开启其他任何值得探求的知识的大门。这个主题不仅仅对苏格拉底和《黑客帝国》而言很重要,而且对于其他著名的哲学影片也很重要。《斗战俱乐部》(*Fight Club*)提出了表面上属于青春期的问题,“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战斗,那么你会对自己了解多少呢?”然而,随着情节和“战斗”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低能的、受激素刺激而提出的问题。我们通过斗争获得了自知。再考虑一下《男孩不哭》(*Boys Don't Cry*)里面的主人公布兰德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欺骗以及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最后,影片《记忆碎片》(*Memento*)中始终在与这些问题做纠缠:我怎么可能对自己说谎?失去记忆是答案的一部分吗?好莱坞和雅典见解一致,即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

为了使得我们对城市祭司的观察更加的完整,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另一条在特尔斐记录的,以及发生在祭司厨房里的至理名言,那就是“一切都很适度”(μηδεν αγαν)。“来,吃块小甜饼,”祭司对尼欧说道,而不是“吃几块小甜饼”或者“想吃几块就吃几块”。我们知道小甜饼闻起来很香,可能会引诱得尼欧失去了控制。祭司也在喝着某种看起来很怪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成人饮料),而且还抽着烟。大概她可以沉浸于这些东西而不至于走向极端吧。这完全与普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电脑人史密斯形容普通人像一种到处散播的病毒,用完了一个地区所有的资源后才继续前进。

据说,赋予特尔斐的祭司以灵感的这种烟雾被所有人看到是需要一

段时间的,但是人们滥用了这种特权结果伤害了他们自己,他们跳进了散发出烟雾的那个洞。只有皮提亚才被允许吸入“阿波罗的气息”,负责解释的牧师必须听到她的预言并且把它翻译成韵文以便于朝拜者们能够消化理解,因此这是神所赋予的两个层次的人。如果充分理解了“认识我自己”以及“一切都很适度”这两句至理名言,那么可能允许被选中的人把真相告诉给其他的人。也许所有的人都能够“吸入预言性的烟雾”并且亲自和神交谈。

关于两个洞穴的传说

莫斐斯告诉尼欧,他“一生长下来就活在一个心灵的牢笼之中”。即使是奴隶,战争中的囚犯,集中营里的受害者都会不时地设法解放他们的心灵。“他们可以控制我的身体,但永远无法控制我的思想。”千百年来,无数的英雄豪杰进行了反抗奴役制度和囚禁制度的斗争,可以举出许多例子,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詹姆斯·邦德·斯托克达尔(James Bond Stockdale),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约翰·迈肯(John McCain),马尔科姆·X(Malcolm X),“飓风”鲁宾·卡特(Rubin“Hurricane”Carter)。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心灵的牢笼里,因而你没有要从那里逃脱的强烈愿望,这是比心灵的牢笼本身更加糟糕的唯一一件事情。生活在这样的牢笼里的一个人就算被解放了又能怎么样呢?

“假设他们中的一个人被解放了,被迫突然站起来,把头转过来,眼睛在灯光的照耀下活动;所有这些动作都将会是很痛苦的,他会感觉头晕目眩而无法辨认出某些物体,虽然这些物体的影子他曾经看到过。如果有人告诉他,他以前所看到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幻觉,你认为他会说什么呢?但是现在,真实近在咫尺,他看到的是更加真实的物体,那么他会有一种更加真实的感觉么?……他不会感到困惑么?不会认为现在给他看的物体不可能像他以前看到的那样真实么?”上面提到的这些话都是出自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514c-d)。在《理想国》里,柏拉图给我

们讲了一个故事，也就是洞穴的寓言故事（也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明喻，神话或者洞穴的比喻）（514a—521b）。然而，这种寓意正好可以形容尼欧在从母体获得解放中所处的那种困境。

洞穴里的囚犯们脖子上、手上以及脚上都戴着镣铐，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他们对于其他的生活方式根本就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当看守他们的人以木偶剧的形式在火堆的亮光中传递动物人物的时候，影子就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墙上。囚犯们就观看墙上的影子，不是真实动物的影子而是雕刻出来的动物的影子。而且造成这些影子的是火光，而不是最可能形成影子的光，即阳光。然而，这些囚犯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囚犯，他们不会怀疑，除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以外还有任何的真实。然而，有一天，其中一个囚犯被释放了，被拖出来到了外面的世界，透过太阳的光他看到了事情本来的真实面目。他没有自私地呆在外面的大好世界里，而是返回洞里去告诉其他的人真相，然而其他人却用嘲笑和抵抗来回报他的好心，他们认为他是神志不清了才会胡说八道。

这个故事与柏拉图的老师^[1]苏格拉底的生活很相似，人们认为苏格拉底是个疯子，由于他试图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更高层次的真实而最终被杀死。当然，它也与尼欧的故事相似，有一天尼欧被从母体中解放出来并看到了“真实的荒漠”。与柏拉图谈到的囚犯们一样，尼欧发现自己生活在囚禁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发现自己被黑色的电缆线所束缚，而这种电缆线刺激着母体产生虚幻的影子。在柏拉图的寓言中，我们并不知道是谁释放了那个囚犯，而在影片《黑客帝国》里，我们知道是莫斐斯释放了尼欧。像柏拉图的囚犯必须被向上拖拽一样，最初尼欧看到其他不知情的囚犯的情景时感到很惊骇，他们沉睡在有插孔的用胶粘的粉红色的洞穴夹层中。尼欧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即他现在所看到的是真实的，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生活在一个梦世界里。莫斐斯使尼欧相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做好准备被拯救”，像柏拉图的囚犯渐进、痛苦地对洞穴外面的

[1] 柏拉图把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作为他著作中的一个人物，包括在《理想国》中洞穴的寓言故事里。关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请参阅我的“Jerry and Socrates: The Examined Life”，in *Seinfeld and Philosophy: A Book about Everything and Nothing*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pp. 3-5.

世界的适应阶段一样,尼欧的恢复过程也是同样痛苦不堪的。“为什么我的眼睛有些疼痛?”尼欧问道。“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用过它们,”莫斐斯回答他说。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是结出的果实却是甜的,”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确实要很好地记住“教育”这个词按照字面意思,或从语源学上来说,意思是“引导出去”,就像囚犯被带到了洞穴的外面,尼欧被带到了母体的外面一样。新开业的医生所立的誓约提醒医师们:他们是医学知识的守护者和保管人,而不是所有人。他们必须用这些知识来帮助其他人。尽管也要与其他人分享,但是没有庄严的宣誓来约束那些接受哲学教育的人。柏拉图提到的那个被释放的囚犯当然更喜欢在明媚的阳光下享受温暖,享受仁慈和知识,但是他却返回去告诉其他人真相。“感觉他像不像荷马史诗里的阿基里斯,他很快就会‘在一个没有土地的人的家里当佣人’或者能够忍受任何事情而不是回到他过去的信念中去,以过去的方式生活?”(Republic 515d) 与塞佛不同,尼欧也同样忍受了任何事情而不愿返回到一个虚假的现实中去。

知识和现实

洞穴的寓言故事不仅,乃至非常重要地,以隐晦含蓄的方式重述了苏格拉底的故事,而且,柏拉图用它来指出,并鼓励读者们面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现实,也就是形式(Forms)。我们——所有人——就如同这些囚犯一样,因为我们经常错误地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就是存在着的最真实的、最高层次的实际。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我们在现实的水平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通过我们的五大器官所获得的,它们只是对更高层次的现实,即形式的可怜的模仿。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日落、公正的行为、真正好吃的面条,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只不过是完美的形式的模仿,只是美丽、正义、善良的复制品,等等。

什么样的“心头之刺”能够唤起一个人去寻求形式呢?它们如何才能为我们所知?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理解的重要性不是通过感觉而是要通过智慧。莫斐斯告诉尼欧,没有人会告诉你母体是什么。你必须

须“亲眼目睹”。关于形式，它不是字面上的这种“视觉”而是一种能够使你理解母体的直接的会意。这篇短文不可能真正告诉你什么是形式，甚至是阅读了柏拉图的书也不能够知道。这是柏拉图对话中的挑战和挫折的一部分。一个人发现他自己在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爱？什么是善良？说到底，什么是形式？正是由于问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才使得苏格拉底陷入了麻烦之中。因此谨慎地继续阅读下去吧。

尼欧也认识到智慧比感觉更加重要。精神比物质更加重要。对于柏拉图而言，身体和形式一样真实，因此对于尼欧而言，“汤匙根本不存在”。尼欧是解放了第一批人类的救世主的化身。柏拉图认为智慧和身体是背道而驰的，以至于它们在出生时的结合错误地造成了记忆的损失，即一种健忘症。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塞佛的背叛交易中记忆的全部损失，而是吸取了太多打瞌睡的人的致命的妄想之后可能会遭受的一种记忆损失。经由适当的激励和线索，细节可以在记忆中重现。在柏拉图看来，幻觉记忆(*déjà vu*)并不是在母体发生小故障的证据，而是对形式的一种回忆(*anamnesis*)。在化身的时候，灵魂脱离了肉体，我们视为形式。在可能的层面上，所有的知识实际上都是我们回忆形式的过程，通过暴露在他们面前的平凡的物体的类似之处就得到暗示。比如，一个小孩子不需要教导就知道花朵是美丽的，他通过对美丽本身的形式的回忆就会了解这一点。

哲学：较少有人走的路

在车里，在去见莫斐斯的路上，尼欧曾考虑过要打退堂鼓，但是崔妮蒂促使那个瞬间变成了决定性的时刻。“你活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尼欧，对它很清楚，只有一个后果，我知道，那不是你想要的。”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著名诗句，“我选那路人迹贫/由此而后相径庭”。^[1]

红色药丸是勇敢选择的一种新象征，大多数人坚持认为，如果他们身

[1] 这是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The Road not Taken*)里的最后两句。——译者注。

临其境地处在尼欧的位置上,那么他们也会选择红色药丸。因此,在我对哲学课程的介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我的学生们从我的课堂记录工具红色标记和蓝色标记中选择一种。如果他们选择红色标记,他们就要主修哲学“亲自去见识一下哲学的深浅”。如果他们选择蓝色标记,他们就可以回去继续他们先前选定的主修课程并且要忘记他们曾经对世界的神秘和物质这些问题有过思考。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玩,但也很为难,他们宁愿没有这样的选择。没有人真的会主修哲学——这太不切实际了。但是,说实在的,还是会有一些人无法抵抗知识和现实的诱惑。^[1]

[1] 感谢所有我的朋友和学生们把他们对于《黑客帝国》的深刻见解提供给我。

2 怀疑论、道德与《黑客帝国》

杰拉尔德·J·艾黎恩(Gerald J. Erion),
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想当然地以为,世界几乎就像我们所看到、听到的和感觉到的那样存在着。在你看来,你现在正坐在椅子上,读着这本书,因此你可能也相信这是事实;你认为你自己坐在这里,坐在椅子上,正在读书这个场景是真实的。你几乎不会去怀疑它的真实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对它表示怀疑,看起来很明显,也许很平常,它就是真的。谁敢对它提出质疑呢?

同样,托马斯·安德森(Thomas Anderson)认为自己是一个纳税人,会帮助房东太太倒垃圾的程序工程师,在一家著名的软件公司上班。(当然,他也相信他的“另一种身份”,也就是以“尼奥”为代号实施计算机犯罪,但是,这种身份只有安德森自己知道,官方是不知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德森对真实的信任和你我是一样的,同样,这信任也解释了:为什么对他而言,得知他生活的那个世界,他每天看到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是如此痛苦。相反,安德森平凡的生活所处的那个舒适的领域实际上是由一个智能计算机系统操纵,从而在他的大脑里产生的一个巨大的、有意制造的假象。作为一个可以更新的能量源泉,这个智能计算机系统可以使得人类在里面不断地出生、成长和

成熟。

正如莫斐斯向尼奥解释的那样，这个虚拟世界，也就是“母体”是无处不在的：

它就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即使是现在，它就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从窗户外看到它，你打开电视的时候也能看到它。你上班的时候能感觉得到它，甚至是你上教堂时，纳税时也是一样。它就是虚拟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真相……尼奥，你是一个奴隶。像其他人一样，你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被奴役，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牢狱里。一个心灵的牢笼。

安德森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都被欺骗了，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自由地读书、观看足球比赛、参加其他一些类似的活动。而事情的残酷真相却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是被拘禁在一个个小容器里，而这些小容器搜集他们的生物电能，分配给计算机化了的奴隶主。

当尼奥最初得知事态的真相时，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试图想要回到他原先的（尽管是假的）在母体内的生活。和尼奥同船的工作人员塞佛（Cypher）发现知道真相后的情形如此糟糕，为此他同意背叛莫斐斯以换取在母体内过一种富有的、地位显赫的（尽管又是假的）的生活。当他和电脑人史密斯完成交易的时候，塞佛声称“无知是福”。但是，即使这些虚构的情节也使我们感到恐怖莫名，它们也会引发深刻的哲学问题。一些哲学家们甚至已经开始声称，我们自己可能也被束缚在一个母体般的、无情的幻想世界里。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检验像笛卡尔（*Pené Descartes*）这样的西方思想家提出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我们自己现在也可能是生活在母体内这样一种假设进行检验。最后，我们要论证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的基础上的，它最多代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在总结部分，我们也应该检验一下关于塞佛回到母体这一选择的道德性，我们认为，塞佛所遵循的错误的道德准则导致了他在这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上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判断。

为什么你有可能生活在母体内：热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与恶魔

在哲学上，我们所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世界可能是一种幻觉。这一假设是由怀疑论的拥护者们所提出的。怀疑论者论辩说，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客观世界的存在。因此，他们主张，对我们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进行怀疑是可行的，就如同在《黑客帝国》里，几个主角开始怀疑他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一样。

这些怀疑性的假定对两种人尤其有吸引力。首先就是青少年，青春期对家长权威的确定性的反抗有时会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形式，从而导致了他们会宣称“任何事情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或者“只有我知道真实是什么样子！”

其次，而且更加重要的，就是哲学家们。他们又分成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的哲学家还没有发展到形而上学式的反抗阶段，因此他们发现对于荒谬的和明显错误的假设进行探究是令人兴奋和富有魅力的。属于这第一个派别里的哲学家甚至可能会表示，他们发现青少年怀疑论者的标语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里，对我们而言，更加重要的是第二个派别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尔，他把类似母体这样的设想看作是探求关于知识和现实的基本问题的有效手段。

在他的经典名著《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笛卡尔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怀疑性论点，这个论点并不是为了要证明怀疑论是正确的，而是要为科学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笛卡尔在《沉思录》中开门见山地宣称，他的意图是让每一个人都中止自己的那些不堪一击的信念。只有是绝对确定的那些信念（而且绝对确定是从这个词语最强烈的意义上而言的）才会通过笛卡尔的检验标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够成为科学可以真正依靠的基础。因此，从服务于知识的目的这个意义上而言，笛卡尔的基本怀疑是方法论上的怀疑；实际上，在这个阶段，笛卡尔不太可能会对他所悬置的所有信念都一概加以否定。中止仅仅是暂时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首先进入这种信念悬置(belief - suspension)过程的是笛卡尔在感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那些信念。^[1] 我们认为自己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室友乔恩(Jon)沿着车道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他已经从学校到家里了。当我们听到他摸索门的时候,我们就会再一次认为他已经从家里出来了。然而,正如笛卡尔所指出的那样,“有时候,我会发现感觉欺骗了我们”。在观看非常小或者是非常远的物体的时候,尤其会出现被感觉所欺骗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物体。我们认为是乔恩的那个人实际上很可能是一个盗贼;而摸索门的声音也很有可能是盗贼企图进入房间时所发出的声响。由于我们的感觉有时候会欺骗我们,因而,我们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许多信念并不能够满足笛卡尔的高标准要求,因此他使得这些信念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让我们继续这种训练,笛卡尔接着提出,即使是你正坐在椅子上读着这本书这样相对来说无可置疑的信念也要受到怀疑。当然,比起你关于乔恩以及他在走廊上所做的任何事情来说,坐在椅子上读书这样的信念看起来更加值得信赖。然而,笛卡尔指出,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正是在这些更加值得信赖的事情上我们经常会犯错误。当你做梦的时候,可能在你看来,自己正坐在椅子上,读着这本书,而那时实际上你正躺在床上酣睡(笛卡尔,页12—13)。除非我们醒过来,否则我们无法分辨出醒着时的体验和这种梦中的体验,这是当尼欧提出疑问时莫斐斯加以确认的一种观点:

尼欧,你曾经做过一种梦,在梦中你感觉是如此的真实么?要是你醒不过来怎么办?你该如何分辨梦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笛卡尔在梦的论证的基础上总结出一种论点,即:感官体验是一种不可信的确证机制,因此他对于在感官证据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信念都表示怀疑。

[1] 笛卡尔,《笛卡尔的哲学论著》(*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由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和 D. Murdoch 以及 A. Kenny 翻译并编辑,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2.

而后，笛卡尔把注意力转到对他自己的信念的更深入的探讨上。虽然关于梦的论证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看法是否正确，但看起来它似乎遗忘了，比方说，关于算术和几何图形方面的信念。就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不论我是醒着还是在睡觉，二加三都等于五，正方形也只有四个边”（页 14）。然而，笛卡尔是在考虑了下列更为根本的思想实验之后总结出了他最初的《沉思录》的。他说，假设“有一个法力无边，狡猾无比的恶毒的魔鬼费尽心思地运用它所有的法力来欺骗我”（页 15）。笛卡尔论辩说，那么这个恶毒的魔鬼很容易就可以使我们对于二加三等于几做出错误的结论，或者是导致我们对于正方形有几个边做出错误的回答。而且这个恶魔甚至可以更轻而易举地误导我们，使我们错误地认为在我们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而实际上“天空，空气，地球，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所有的客观事物只不过是梦中的幻象，是它早就制造出来用以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因而，笛卡尔推断说，“我会认为自己没有手或眼睛，或肉体，或血液，或感觉，但却错误地相信我拥有这些东西”。于是，在阅读笛卡尔的《沉思录》时，很难想象我们如何能够说明我们的生活不是由一个恶毒的魔鬼所制造的假象。我们该如何反驳由笛卡尔所提出的那些怀疑性的论点呢？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看过《黑客帝国》的人可能确实有理由怀疑，是否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我们认为的自己所过的有意义的生活实际上是由智能计算机系统植入我们大脑中的一种假象。

为什么你有可能生活在母体中，续篇：彼得·安格 (Peter Unger)的邪恶科学家与希拉里·普特南 (Hilary Putnam)的桶中之脑

当代，在关于怀疑论的争论上，彼得·安格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本身就是一名怀疑论立场的拥护者。他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他认为欺骗我们的不是一个邪恶的魔鬼，而是一个邪恶的科学家。^[1] 在他发表于

[1] Peter Unger, *Ignorance* (Oxford: Clarendon, 1975), pp. 7-8.

1975年的《无知》(*Ignorance*)一书中,安格提出了他的假定,即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存在着椅子、书籍和其他类似的物体这种共同的信念只不过是有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在我们大脑里精心制造的一种性假象,一个超级神经专家,他运用电脑产生电子脉冲,然后转化成电极强加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关部位上。运用这些电子脉冲来刺激我们的大脑,科学家欺骗了我们,使我们错误地认为存在着椅子和书籍等东西,尽管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安格声称,这样的一种假定具有下列意涵:“没有人能够确信[绝对没有]不存在这样一个利用电极欺骗我们、使我们误以为存在着岩石的邪恶科学家”,因此,没有人确信世界上存在着岩石这种东西。同样,你无法确信你真的是坐在椅子上,读着这本书,因为你从来都无法深信不疑地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受到一个恶毒的神经专家的操纵,或者是一个恶魔的操纵,或者是像母体一样的计算机系统的操纵。

在发表于1981年的《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希拉里·普特南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一怀疑性的科幻情节。在普特南关于这个论点的版本中,邪恶的科学家不但在是否存在着岩石这件事情上欺骗了我们,而且在我们通过感觉所觉察到的任何事情上都欺骗了我们。^[1]首先,普特南要求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如同外科手术般地被从我们身体的其他部位分离出来,被放在装满了供给大脑营养的化学物质的容器里面。然后,一个强大的计算机把电子脉冲传送给我们的大脑,于是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出幻想,比方说,我们正坐在椅子上读着这本书,正在打网球等等。尽管与此同时,我们被分离出来的大脑始终漂浮在科学家实验室里的那些容器中。

希拉里·普特南预先假定,计算机程序足够高级,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试图产生的“行为”做出适当的反馈。例如,你的大脑努力地想使你的身体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拿快餐,计算机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适当的脉冲以确保你实际上确实可以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厨房去。但是,再一次地,不考虑吃的时候要用到嘴,你可以完成所有这些动作,而与此同时你的大脑

[1]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5-8. 尽管普特南自己并不运用这种假定来为怀疑论辩护,但是他的作品为这样的讨论做出了有影响力的贡献。

却与身体分离,漂浮在缸里。

在提出了这样古怪的、明显与电影《黑客帝国》里人们所面临的情形很相似的假定之后,普特南接着又提出了他的怀疑性问题:“你如何知道自己不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困境之中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由笛卡尔最初的论点所引发的怀疑论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上。

从母体中获得解放:反对怀疑论

幸运的是,非怀疑论的哲学家们对笛卡尔、彼得·安格和希拉里·普特南以及《黑客帝国》里提出的这个关于知识和真实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许多有力的回答。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出,怀疑性的假定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还是一种非常不太可能的可能性。我们不辞辛劳地去理解笛卡尔自成体系的怀疑理论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哲学上的特殊情况,即笛卡尔自己对于完美知识的探求,对一种可以达到科学的最高理想境界的知识的探求。需牢记的是,对笛卡尔而言,知识要求绝对的确定性;我们不可能绝对地确定恶魔(或者是一个邪恶的计算机系统)没有利用我们的感官来欺骗我们,因此,笛卡尔论辩说,我们不能运用感官来论证我们关于知识的那些主张是正确的。

从哲学层面上而言,当我们正在检验支持或者反对怀疑论的论点的时候,关于知识的这样一个最严格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而言,它们太严格、太苛刻了。比如,如果乔恩(Jon)问你明天的天气预报是什么,而你却用诸如“天气真的存在么?”、“时间真的存在么?”或“明天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来回答他的话,那么,乔恩肯定会认为你简直是疯了。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层面上知识包含不同的标准。^[1]在某些哲学层面上,我们给知识施加非常严格和苛刻的标准是十分恰当的。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我们施以那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正常标准也同样正

[1] 参见 David Lewis, “Elusive Knowledg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4 (1996), pp. 549 - 567.

确,这些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们所共享的常识性的知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我们确实是知道我们坐在那里,我们正在做什么,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以及足球比赛的结果是什么。

因而,你的确是知道(从这个词语最完整的意义上而言)关于你自己及你周围的世界里的许多事情;你通过自己每天的经历所获得的对于这些事情的信念是真实的且十分正确的。例如,你知道,现在你没有在做梦。你知道笛卡尔(像 Elvis 一样)已经去世了。你还知道《黑客帝国》只是一部电影。另外,现代科学还为我们提供了数量巨大的真实知识——电子比小行星小,鱼类不属于哺乳动物,月亮不是由绿色(或其他任何颜色)的奶酪制成的等等。^[1]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拥有关于基本常识和科学的这些主要的,不断增长的知识储备,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抵制笛卡尔在具体讨论怀疑论的时候所要求的那种知识总是要求一种非常特殊的(哲学上的)确定性的主张。^[2]

笛卡尔的基本认识论的意涵是,只有以确定性为特征的知识才是真实的,而且,知识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从它假定的真相无法被人类所知晓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看起来有些弄巧成拙。正如小西奥多·希克(Theodore Schick, Jr.)和刘易斯·沃恩(Lewis Vaughn)所指出的那样,“除非[怀疑论者]能够确定知识需要确定性,否则他们就无法知道知识的确是需要确定性的”。^[3]但是按照我们先前提到的对笛卡尔理论的怀疑,这种理论本身变得似乎更不确定。的确,如果我们的基本常识和科学信念不是比笛卡尔的理论更加可靠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和他的原则同样可靠。毕竟,正是通过对这些信念的接受,在阅读笛卡尔的著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相信我们的感觉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因此,我们有足够的

[1] 这并不是要否认在科学的进步过程中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理论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理论必须要通过现实本身不断的受到检验。即使是持进化论观点的生物学家也坦率地承认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可能会有新的证据出现来证明进化论是错误的;然而,他们攻击这种选择性的理论为创造宇宙说的热情是有依据的,不是用反宗教般的顽固,而是用大量的支持进化论的高质量的证据。比如,关于这个议题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讨论,参见 Theodore Schick, Jr. and Lewis Vaughn, *How To Think about Weird Things* (Mountain View: Mayfield, 1995), pp. 211 - 19.

[2] 在这本书的第三章里,David Nixon 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观点。

[3] Schick and Vaughn, p. 100.

理由对他关于知识需要确定性的这一主张提出质疑。

我们也应当记住,由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怀疑论的观点。^[1]威廉斯减轻了我们有可能被锁在一个永久的、像母体一样的梦中牢狱的这一担心,他指出,我们能够辨别梦里和醒着时候的经历本身这个事实就预设了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两种经历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谈论两者之间的差别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确有不同,一种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的不同。正如威廉斯所写到的那样,只有“从醒着的角度而言,我们才可以解释梦”。(页 313)因而,只有当有时我们真正醒着的时候,在醒着和梦里本身的差别才显得有意义,而且,既然我们能够区别这两种经历,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没有重大的理由担心我们的生活可能完全是由永无休止的梦所构成的。

因此,哲学提供了许多工具来减轻对于《黑客帝国》的一种深思性的观察可能最初引起的形而上学的不确定性。既然我们的知识——有关我们坐在那里,正在干什么,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并不需要哲学上的确定性,而只是需要那些我们为了日常生活和科学的目的而使用的强有力的、内容适当的理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相信客观世界这种足够的理由来证明我们有关世界存在的知识,有关世界的本质和构成的知识都是正确的。正如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所指出的那样:

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的假设……明显地是如此有用,经过时代的验证如此强烈地得到了确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任何其他经验主义的假设更好地得到了确认。这种假设是如此有用以至于除了疯子和形而上学者,对其他任何人而言,找个理由对它产生怀疑几乎是不可能的。(Martin Gardner, *The whys of a Philosophical Scrivener* [New York: Quill, 1983], p. 15, quoted in Schick and Vaughn, p. 87.)

[1] Bernald Williams, *Descartes*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78).

道德与《黑客帝国》：塞佛的错误

在对由笛卡尔以及《黑客帝国》所引发的这种怀疑性的疑惑的理解中，我们可能会对塞佛这个人物加以强调，因为他与电脑人史密斯进行了一笔龌龊的交易。对真实世界里的穷困感到厌烦，于是塞佛同意把莫斐斯交给史密斯，以换取自己在母体内过上富有、出名的新生活。塞佛明明知道母体不是真实的，但是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够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重新回到那个虚幻的快乐世界里，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好过一点。

然而，塞佛在此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在选择只是为快乐而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预先假定了快乐是值得他活着的唯一事由。哲学家们把这种将快乐本身当作唯一有价值的东西的理论称之为享乐主义。^{〔1〕}尽管享乐主义看起来似乎有某种直觉上的吸引力，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他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书里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来驳斥它。在此，这个论点对我们而言是尤其要注意的，因为它仍然涉及另外一个桶中之脑类型的思想实验。^{〔2〕}

首先，诺齐克再一次提出，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漂浮在装满了有营养的化学物质的容器里的身体的各组成部分。他假定某种东西叫做“经验机器”，也就是一种运用电极来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的电脑设备的高级复杂组件。运用这种经验机器，神经学专家可以制造幻觉，使我们觉得我们正在读书、正在会见朋友、正在喝啤酒，或是做其他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与此同时，我们实际上可能只是躺在机器里面，处于休眠状态而已。假设这种经验机器可以设定成能够产生我们认为值得的任何经历，那么它

〔1〕 享乐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的道德哲学认为，一种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它所产生的全部幸福。功利主义的两位奠基人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J. S. 穆勒(John Stuart Mill)；参见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ner, 1948) 以及 Mill, *Utilitarianism*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9)。

〔2〕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42-45.

可以设定某些程序,以便使我们看起来极其成功、富有、幸福和美丽,于是诺齐克问道,“你愿意被插上插头然后在机器里过这种生活么?”(Nozick, p. 42)

当然,塞佛肯定会回答说“我愿意”。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一定会更加慎重地作出选择。因为,把我们的生活交给电极刺激这种想法令人困惑。^[1] 诺齐克用一系列的论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谨慎,驳斥了那些会选择向经验机器屈服的人,如塞佛。首先,他说,“我们想要去做某些事情,而不只是拥有做那些事情的经验”。(Nozick, p. 43) 经验机器和母体都不允许有真实的、有意义的行为;相反地,他们只是给出有意义的行为的表象。但另外:

我们希望存在一种确定的情形……[但是]有人漂浮在桶里是一个不确定的情形。没有人知道长期呆在桶里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勇敢、和蔼、聪明、机智、专情吗? 我们不但很难知道,而且也没有办法知道。(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p. 43)

最后,经验机器不允许我们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与现实取得联系,而不顾我们大多数人不得不这样做的强烈愿望。^[2] 因此,诺齐克总结说,“我们通过想象经验机器而后意识到我们不会使用它来体验事情,我们认识到经验之外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p. 44) 同样,通过考虑塞佛的决定而后意识到我们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我们认识到了除了快乐(或名誉、财富、美丽)之外还有某事与我们有关系。实际上,塞佛的决定是不道德的。相反,尼欧面对“真实的荒漠”的决定使他能够采取真正的行动,具有真正的经历,使得他的生活有意义,从而具有道德上的价值。正如道德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书写的那样,“做一个不满足的

[1] 连重要的功利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看起来也被对于享乐主义的这种拒斥所困扰。在对批评他自己(及边沁)的批评家们做出回应的时候,他试图区分各种不同的快乐,有些快乐是较高层次的,有些则是较低层次的。

[2] 页 43—44。诺齐克继续指出:“这也阐明了对于精神药物做斗争的强烈性,一些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地方性的经验机器,其他有些人则认为这是通向更深奥现实的道路;这就是一些人所认为的向经验机器屈服的等价物,其他人则认为是不屈服的理由之一!”

人总比做一只满足的猪要好得多；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要好的多”。(Mill, p. 10)

确信你就是救世主

《黑客帝国》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使我们面对哲学上的怀疑论所提出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担忧。然而,经过更多的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无需杞人忧天,我们没有必要分享怀疑论者们对于世界是否存在的这种怀疑。只是从哲学研讨会这个十分特殊的层面上而言,这样的怀疑是十分恰当的。当我们回到正常生活中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他们的怀疑是毫无根据可言的,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在背离现实,企图重新回归母体的过程中塞佛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理性不仅敦促我们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它还要求我们直面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建立我们自己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成年人,我们要积极承担生活中的严肃义务。

3 母体存在的可能性

大卫·米特斯·尼克松(David Mitsuo Nixon)

在观看了《黑客帝国》之后,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现在我是在母体内吗?也许,我认为我所看、感觉、品尝和接触到的任何事情,我视为真实的任何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由计算机创造的梦世界”里的一部分而已,也许,事实上我的身体正飘浮在粉红色的粘性物的夹层中。那是一个令人惊慌的、有趣的命题,值得命名。为方便查阅,让我们称它为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即:很有可能我(或者你)现在正处于母体中。

在这篇短文里,我的目的是要验证围绕《黑客帝国》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a)即使我们事实上不是在母体内,那么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对于我们实际上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具有什么样的意涵?(b)尼欧是如何知道——如果他真的知道的话——他自己是处在母体中?(c)母体存在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有意义吗?要注意:我将要得出的结论——特别是在后两个部分——可能会十分的违背直觉,对有些读者而言可能是有争议的。但是,即使你不信服这些论点,我希望至少你会认为它们是发人深省的。

我们真的知道任何事情吗？

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对于我们实际上知道或不知道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注意到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说，现在我就是在母体内。它只是表示我现在有可能是在母体内。尽管如此，如果现在我就是在母体内，那么我现在具有的许多信念都是不真实的。例如，我认为我拥有一辆本田汽车(Honda Civic)，而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轿车，因为我现在只不过是漂浮在粉红粘性物的夹层中而已。因而，母体存在的可能性暗示着：有可能我现在的许多信念都是不真实的。

让我们假定，至少在目前，母体存在的可能性是有根据的（即它有意义并且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我现在具有的许多信念可能会是不真实的。对于他们自己的许多信念可能会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通常人们会有两种典型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就是：“如果你具有的信念有可能是不真实的，那么信念就不是一种你可以说你真的知道的东西。”比如，你可能不会认为月亮的中心是一个被挖空了地方，里面住着一个月亮妖怪。但事实上，由于你从来都没有到过那里，有可能（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真的有一个月亮妖怪居住在月亮上。因此事实上你不可能说，你真的知道没有妖怪居住在月亮上。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继续相信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毕竟，你必须相信某些事情，因此你可能也会继续相信在你看来十分可能的事情。但是，不要认为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你所知道的那些事情。这与笛卡尔的方法怀疑论很相似。为了找到一件完全确定的事情，笛卡尔对任何可能受到怀疑的事情的信念都采取了信念悬置的方法。笛卡尔没有看过《黑客帝国》，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能引起惊慌的叙事。在他的故事里，笛卡尔玩弄了这种可能性，即“某个法力无边、狡猾无比的恶毒的魔鬼费尽心思地用他所有的法力来欺骗我”。^[1]对笛卡尔而言，单单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欺骗他的恶魔这种可能性就足以对他拥有知识这一点提出质

[1] René Decartes,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and D. Murd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

疑——至少是在恶魔可能会欺骗他的那些事情上。

另一种反应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一下在真实世界里我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知道’这个词的，你就会明白存在着各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承认存在着具有不真实的信念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依然称之为知识。”在真实世界里（当我们不是“扮演哲学家”的时候）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求一种信念是这样的，以至于在我们认为它被知道之前不可能是不真实的。例如，我现在是在公共汽车站，有人问我，“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回答他说，“知道，现在是 12:30。”我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我的手表可能停了，但那时我并没有给自己戴上哲学家的帽子这个事实并不能阻止我说我知道现在几点了。究竟什么可以证明哲学家们突然之间给知识赋予这种高标准是正确的——尤其是当他们一脱掉他们哲学家的帽子之后，甚至这些哲学家们自己都不会坚持这种高标准呢？当有人告诉我，我的信念有可能是不真实的时候，适当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那又怎样？”重要的不是可能性，而是可信性。因此，我不会改变我相信的任何事情和我认为我所知道任何事情，除非你能够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让我认为我的信念不仅仅是有可能是不真实的，而是很可能是不真实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倾向于第二种反应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协调这两种观点，把它们仅仅理解为是在谈论对“知识”的两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认识指的是一种超级知识(super knowledge)，由于它们是超级的，以至于你不能够完全说你对某事了如指掌，除非不存在你错误地得到这种知识的可能性。这也是笛卡尔通过他的方法怀疑论所寻求的那种知识，是可以成为其他所有知识的基础的那种知识。第二种认识涉及的是一般的知识，因为它们是一般的知识，以至于即使你有可能是错误地得到了它，你仍然可以说你具有对某事物的一般知识。尽管如此，但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你很可能是错误的，那么你依然不可以说你具有对它的一般知识。但两种反应的人都会同意，母体存在的可能性暗示着我们都不具有太多（如果真有一些的话）的超级知识，但是它并没有破坏我们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诸多一般知识。换句话说，假设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存在，关于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任何事情这个问题看起来失去了它的某些说服力

和感染力。但也许那样也好。

尼奥知道他自己在母体内吗？

现在我要转换一下话题，谈一谈尼奥是如何发现他自己生活在母体内的。通过观看影片，我们可以说尼奥开始知道（这里我要把我的注意力限定在较为不严格的获得一般知识的意义上）他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也就是，他的大部分生命都是在母体内度过的（作为一个漂浮在粘性物的夹层中的身体，被一个超级计算机灌输一些经历等等）。那么，尼奥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如果他确实知道的话？

在把蓝红两色药丸提供给尼奥让他做出选择之前，莫斐斯告诉尼奥，“我无法告诉你母体是什么。你必须亲自去见识见识”。莫斐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他无法告诉尼奥母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冒险做一个猜测：那是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哦，让我纠正一下——唯一会相信他的那些人，是那些极为容易上当受骗、极为愚蠢，会受到误导轻易地相信任何事情的人。这些人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很多知识的人的范例，即使是他们有时可能碰巧获得了一些正确的知识。因此，尼奥不可能单凭莫斐斯的陈述就能够知道母体是什么，因为相信这样一个故事是愚蠢的，而愚蠢的信念（即使是它碰巧获得了正确的知识）并不是知识。一种信念要能够真正地被称为知识，它必须被证明是正确的。的确，传统的对知识的解释是，知识是已经被证明了的真实的信念。在传统的解释中，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情，你的信念就是真实的，那么你相信它也就是正确的，因而我们就可以恰当地说，你了解它。尽管许多人批评这种古老的解释，但至少它是在正确的范围内，因为它的判断要求从被算作知识的那些东西里排除了愚蠢的信念和侥幸的猜测。

尼奥选择了红色药丸，因而他能够“看到兔子洞是多么深”。在几分钟之内，他就经历了一些可能对他而言最怪诞离奇的事情：他看到一面破裂的镜子又自动恢复得完好如初。他试着用手去碰那面镜子，软泥一样如镜子般的东西开始覆盖了他的全身。突然，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粉红色的粘性物的夹层中，他的手臂，腿上，背上和头上都插满了连着金属的

插头。他还看到了数以百万的其他人的夹层。一个像蜘蛛一样的机器人爬上来，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拔出了他头上的插头，然后飞走了。接着他的夹层消失了，他沿着一个管道下滑，陷入了某种像下水道里的软泥之中，下一分钟他就被一个巨大的起重机救了上来。他时而有意时而无意识地漂流着。最后，他的状态还是很好的，还观赏了一下他所乘坐的那艘船。然后他们把一个插头一样的东西装在他的头上，突然之间他就处在“主架构之中”，即“下载程序之中”——在那里，莫斐斯最终告诉了他关于母体的整个故事。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最初尼奥并不相信。实际上，整个经历让人痛苦不堪和难忘，到最后尼奥都呕吐了。我并不能因此而责备他。退一步说，突然之间发现你的整个生活到目前为止只是一场骗局，只是一个“由计算机创造的梦世界”，这的确会使人感到有些头晕目眩。但是，这种事情是否从情感上而言很痛苦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并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要问的问题是，就尼奥近来的经历而言，要他相信这种事情是否是合理的。这些让人痛苦不堪的经历给予了他单凭莫斐斯的陈述所无法给予的东西吗——一个充分的理由相信一直到最近，他的生命都是在母体内度过的吗？或者，在经历了这些奇怪的事情之后，对他而言，仍然相信这个令人惊讶的故事是愚蠢的举动吗？

需要注意的是，我并不是在问，尼奥的新信念（即他认识到他已经在母体内度过了一段时间，而现在他脱离了母体的控制）是否有可能是不真实的。的确，这是有可能的。可能母体并不存在，尼奥一直是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他现在被诱骗选择了红色药丸，而红色药丸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能够令人产生幻觉的药物，等等。（无可否认，在我看来，发现这是事实会是多少让人感到失望的一种结局。）

很明显，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是有可能的每件事情都是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再者，这种可能的事情不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可行的事情的讨论上转移开。因为正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可行的事情才影响到我们认为可以合理地相信的那些事情。

那么，尼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事实上已经相信的那些事情，即他以前是，但现在不是母体的俘虏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说他

不但相信它，而且他还知道它。（假定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这将属于一般知识。）

即使是考虑到他自己近来的奇怪经历，尼欧也许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母体的故事，对于这个观点，我想发表一些严肃的看法。让我们假定尼欧大约是 25 岁左右。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在相信母体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要抛弃 25 年来极为正常的生活经历，把那些经历看作是不值得信赖的，而去相信最近这几天的奇怪经历，把这些经历当作是他应该真正信赖的、可靠的东西。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草率——尤其是当我们记起在他吞下了那颗奇怪的红色药丸之后，随之才发生了所有这些离奇的经历时。

当我们意识到无论尼欧具有能够解释他经历的什么样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通过他的生活才获得的，而现在他应该抛弃这种生活，把它们看作是完全不能够信赖的时候，情形变得更加糟糕。也就是说，正是在在他前 25 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那些经历，他才知道从他的感觉所提供的信息中作出什么样的推断才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他相信关于母体的故事，那么他就要抛弃掉他所学到的关于如何解释他的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这里是一个小清单，在解释一个人自己的经历时会用到的一种单凭经验的方法，如果尼欧接受了母体的故事，那么他必须抛弃这些方法：

(a) 一般而言，人并不说谎，因此，如果看起来好像某人正在告诉你某事，一般而言，你可以相信那是真的。

(b) 如果听起来好像某人正在说英语，可能他们真的是在说英语。

(c) 如果看起来你记得自己做过某事，你可能真的做过了。

(d) 人在接触的时候不会转动身体。

(e) 人在生气的时候头不会飞出去。

(f) 人走动的时候鞋子发出的噪音不构成他们用来与你交流的声音。（因此没有必要试着去解释那些鞋子的声音！）

(g) 当一个物体看起来正在变大，通常这意味着实际上它离你更近了。（同样，表面上看起来正在变小意味着离你而去。）

(h) 即使是在你没有考虑它们的时候，事情也依然存在着。

我们相信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即使它们极为明显,我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去思考它们。不但我们(你,我,尼欧)相信这些奇怪但又明显的事情,而且相信它们是正确的。相信它们也是合理的。但是和它们看起来一样明显,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它们。那么,什么能够证明我们相信它们是正确的呢?我们相信它们是正确的,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那些经历)。^[1]它们看起来是如此明显地正确,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个理由对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产生怀疑。但是,如果我们具有不同的经历,它们看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它们看起来可能会是明显错误的。因此,这些单凭经验方法的判断关键取决于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如果你不信赖你过去的经历,那么你就没有理由相信那些原则。我在上面指出的这些原则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你解释你现在的经历。因而,只有能够证明你依赖这些单凭经验的方法来解释你的经历是正确的,那么才能证明你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你现在的经历也是正确的。但是,只有你相信你自己的过去的经历,那么才能证明你依赖那些解释性原则是正确的。如果尼欧相信他的所有经历,包括直到最近他发现自己被邪恶的计算机喂养这些经历,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信赖它们。因此,他就不会相信上面的这些解释原则,那么他就不会用他以前经常使用的正常的方式来解释他现在的经历。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具有的经历,某些事情看起来是正常的,其他一些事情则是出乎意料的。如果我们发现一直在和我们谈话的一些人事实上并不是在讲英语,而是在讲其他国家的语言,只不过听起来像是在说英语而已,而实际上意思却全然不同,这看起来会非常奇怪和意外。如果我们发现某些人总是在星期二和星期四说谎,这也是非常奇怪和意外的。或者一些人在生气的时候他们的头会突然飞出去。奇怪和意外的事情(与正常的和期望中的事情一样)只不过是我們已经经历过的,或者是过

[1] 我属于经验主义者中的一位,认为解释性一致这种观点在理解认识的理由上具有重大的重要性。(这就是我正在用这种观点所表示的东西,一个人的信念被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符合一个人所拥有的经历”。)哲学上的观点实质上使得它们处于与这种观点的争执之中的那些人不可能发现这种论点是容易被说服的。

去常常经历的事情的一种功能。如果尼奥不相信他自己过去的经历,那么他预期他过去所经常预期的事情就不再是正确的。那么他声称这种事情是正常的,那种事情是奇怪的、意外的和不可能的,这种主张就不再是正确的。如果某人(如莫斐斯)开始发出噪音而听起来像是在说英语,那么出于习惯,尼奥会倾向于认为莫斐斯是在说英语,因为尼奥习惯了一个人们经常是说英语的世界。但是如果尼奥相信那个世界是由邪恶的计算机所制造的,那么他就不能信赖那个世界。因此,尼奥就不能相信莫斐斯真的是在说英语,或者莫斐斯正在告诉他真相,或者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头不会飞出去,因为他相信那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个的判断都依赖于他不能信任的那些经历。

但是这意味着,如果尼奥相信他在母体内度过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他的生活经历都是由邪恶的计算机灌输给他的,那么他表面上接受莫斐斯告诉他的这个故事就是不正确的。当莫斐斯告诉尼奥(或者看起来是在告诉他)他是生活在母体内的时候,如果尼奥不应该相信莫斐斯所说的话,那么尼奥也就不应该相信他自己生活在母体内。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自相矛盾的信念。恰恰是你相信它这个行为破坏了你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它。(比较一下:“我极其讨厌数字,以至于我所说的凡是里面包含数字的陈述有 50%都是错误的。”)

当然,观众有权接近更大的图景。我们碰巧知道母体这个程序世界与真实世界足够相似,以至于尼奥倾向于解释他的经历(比如,莫斐斯在说英语,在告诉他真相)的这种方式使得事情恢复了正常。但是,尼奥(与观众不同)缺乏任何充分的理由认为母体内的世界与真实世界很相似。你可能会认为他的新经历很快会证明,他相信真实世界与母体世界是相似的(在正确的方面)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这些新经历是毫无用处的,除非他依赖于某种像上面提到的那些解释原则是正确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既然他不能够信赖他过去的经历,他依赖于那些解释原则就是不正确的。不依赖过去的经历,那么他同样就不能依赖于现在的经历。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的一个后果,在认识论上称之为整体论:没有一点经历可以单独起到辩护作用,而是只有作为更大的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经历和信念——当然,其中包括解释性原则的

一部分——才能发挥作用。^{〔1〕}（如果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明显是错误的，这里的论点很可能不会太引人注目。）因此，尼欧在用他以前所用的方式来解释他现在的经历的时候就是不正确的，而且由于这些新的经历（比如，他以前是在母体内，但现在不是在母体内）他开始相信的那些事情也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应该得出的适当的结论看起来应该是，尼欧并不是真的知道（即使是从一般知识的最不严格的意义上而言）他以前是在母体内，而现在不是。

我认为这一推理思路可以被归纳来应用于大多数与母体存在的可能性类似的大范围内的怀疑性假设。也就是说，我认为可以说明相信这些荒谬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几乎总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把那留给另一种场合去讨论吧。现在我要返回到我们开始时候的观点，即，母体存在的可能性。

母体存在的可能性有意义吗？

需要记住的是，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即是这种观点“很有可能我（或你）现在就处在母体内”。现在我要考虑的议题就是，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范围内，像母体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事情会有意义。在什么程度上，我们现在可能在母体内这一想法真的是一种自洽的可能性？

我要立刻解释清楚的是，在担忧《黑客帝国》的故事是否真的向我们提出了一种自洽的可能性上，我的目的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这部电影在情节上的一些小矛盾。可以说，我也不担心这个故事在技术上或科学上是否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也许会表明这个故事违反了物理学上的某些规律，例如，可能会因为遵循那些线索的一些理由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那并不会打扰我的思路。更确切地说，我担心的是，在某个层面上，是否这个故事甚至在概念上都是不自洽的。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你现在是在母体内，那么你的许多信念就都是不真实的。（例如，你可能认为你正在读书，而实际上你正漂浮在一个粘性物的夹层里，在你附近的任何地方根本就没有书的存在。）

〔1〕 那些对整体论感兴趣的人应把注意力放在 W. V. Quine, Donald Davidson 的作品上，以及，尤其是 Wilfrid Sellars 的作品。

我认为正是这种普遍的错误——这种巨大数量的不真实的信念——开始威胁母体故事的自洽性。(一会儿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但是,当然并不是尼欧的所有信念都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例如,他知道自己的脸长得是什么样子,而结果表明他是对的。(也可能,他从母体中出来结果发现自己长得看起来像著名歌手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那样的话怎么可能不令人震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设想一个像《黑客帝国》那样的世界,那么我们确实也可以设想出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计算机只不过是有一些恶毒罢了;在那个世界里它们专注于每一个细节以确信它们能够使得在母体内它们俘虏的那些人的不真实信念最大化。

我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认为这种观点有意义吗?即一个人有信念但他的那些信念都是或几乎都是不真实的?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最终,我们就不能够认为像《黑客帝国》这样的故事(或至少是我认为的只不过是计算机有些恶毒罢了)是有意义的,因为《黑客帝国》涉及的那些人的几乎所有的信念都是不真实的。因而,像母体存在的可能性这些观点也许根本就没有意义,即便在最初的时候它们听起来是十分有道理的。我想要尽力去驳斥那些相反的论点,我们真的不能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所有的信念都是或几乎都是不真实的人这种观点有意义。

为了更加精确,我将要设法论证的是,一个人(如丽莎)将不会认为一个故事有意义,如果在那个故事里某个人(比如说,荷马)具有信念但是这些信念都是或者几乎都是丽莎认为不真实的信念。因此(用我们自己替代丽莎而用尼欧替代荷马),我们最终,将不会认为这种观点有意义,即尼欧(或其他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具有一些信念但这些信念都是或者几乎都是我们认为不真实的。

我想要验证的论点的主要部分是:在特定的主题上,一个人只有一种单一的信念,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对某事具有单一信念,一个人必须有许多关于某事的信念。一个例子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假设我正在和我的朋友克莱塔斯(Cletus)谈话,我们的谈话内容如下:

克莱塔斯:熊让人害怕。

我:为什么你会这么说?是因为它们体形巨大吗?

克莱塔斯：它们体形大吗？我不清楚。

我：因为它们是身上有毛的动物吗？

克莱塔斯：它们身上有毛吗？我不清楚，实际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是动物。

我：那么，至少你知道它们是生活在自然界里的生物，对吧？

克莱塔斯：当然。

我：你觉得它们可怕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小鸟吗？

克莱塔斯：噢，它们真的像小鸟吗？

我：开个玩笑而已，至少你一定知道熊长得什么样子吧？^{〔1〕}

克莱塔斯：啊……不知道。那它们长什么样？

我：别逗了！那你总该知道点什么吧？

克莱塔斯：我当然知道，它们让人害怕啊。

我：除此之外呢？

克莱塔斯：嗯……知道了。

谈话到了这里，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怀疑，也许当克莱塔斯说出“熊让人害怕”的时候，他只是在重复他听到的别人说的话，但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无论如何，很显然他自己并没有熊让人害怕这种观念，因为他自己对熊根本就没有任何了解。对我而言，为了使得把“熊让人害怕”这种信念归因于克莱塔斯（不考虑我是否认为特殊的信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显得有意义，我必须弄清楚他所具有的相关概念（即熊和害怕）的意思。但是对我而言，为了弄清楚他对熊所具有的概念的含义，我必须把一些关于熊的我认为正确的（比如熊是动物，它们看起来不像小鸟等等）信念归因于他。没有这些其他的信念，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牢记克莱塔斯的意思，当他说“熊”时——如果确实这个字对他而言有任何意义的话。我主张，把熊让人害怕的信念归因于克莱塔斯和我们吧，比如说，岩石是让人害怕的这种信念归因于他是一样的。（这种观点，

〔1〕严格说来，知道熊长得什么样子并不是真的就会对熊有一个确定的印象。更确切地说，是具有某种识别能力。在 Rylean 的陈述中，是具有专门知识而不是知道它（参见 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 1949）。但是在对熊有一个概念时，这些能力很可能也是必要的。

即一个人的信念决定了一个人所说的话的意思——也就是，决定了这个概念，如果你的话代表了任何意思——是在整体论的标题下的那些普遍观点的另一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经常被称为意义整体论，或者是概念整体论。再一次验证了奎因[Quine]，戴维森[Davidson]和塞拉斯[Sellars]的观点。)即使是我们应该假定克莱塔斯对害怕这个词有一定的概念，至少他说了非常一般的事情像“熊是某种东西，而不是熊什么都不是”，我们归因于克莱塔斯的是一个信念即存在着某种让人害怕的东西是正确的，而不是这种信念，即熊(如你知道的那样，那些巨大的、有毛的动物，看起来不像小鸟等等)是特别让人害怕的。

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些结论。假设我想说某人具有许多不真实的信念。对于每一个不真实的信念我都要归因于那个人，我必须弄清楚这个人具有的具体的概念，包含那个不真实的信念的意思。但是这意味着我必须把一些我认为是真实的信念归因于这个人。因此，对于每一个不真实的信念我归因于某人(比如，荷马)，我也必须把一些真实的信念归因于他。如果，我要说荷马的那个信念是不真实的，必须会有荷马的许多其他信念我认为是对的，那么对我而言，说一个人的所有信念都是不真实的就解释不通了。仍然会有许多真实的信念。在我们认为他的其他信念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的信念是不真实的。当我们没有把注意力都放在我们必须归因于这个人的那些真实的信念上的时候，一个人的信念都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才有意义，才讲得通。

这种论证思路是否成功地表明了母体存在的可能性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或者它并不是真的可以理解的？不幸的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即使是母体内的邪恶的计算机也不能够使得你的所有信念都是不真实的(因为那样的话，它们根本就不会被认为是信念)，如果你是在母体内的话，那么仍然会有许多，也许甚至是大多数你的信念可能都是不真实的。因此，在最后，我们可以承认母体存在的可能性的可理解性。你的确可能是在母体内，并且即使是你能够确信并不是你的所有信念都是不真实的，但是，的确你的许多信念可能都是不真实的。^[1]

[1] 我要感谢几位匿名的批评家，还有 Bill Irwin，他们的评论帮助我改进了这篇论文。像往常一样，如果仍有错误之处是我的责任。

4 看到、相信、接触、真理

卡罗林·科斯迈耶(Carolyn Korsmeyer)

1981到1990年间,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收到了超过120起的神秘死亡事件的报告。健康的成年男子在睡眠中不知不觉地神秘死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老挝山区的洪族移民。无法确定是医学上的死亡原因,尽管洪族人有自己的解释:洪族人声称这些人受到了黑夜幽灵的袭击,黑夜幽灵在其熟睡的时候降临到他们身上,压迫他们的呼吸从而导致了死亡。^[1]这次天降横祸的极少数幸存者报告说,他们看到一个极其恐怖动物跨坐在他们的胸膛上,令人毛骨悚然,他们简直被吓坏了。的确,有证据表明这些受害者死之前有过如同梦魇般激烈的挣扎。尽管科学界并没有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被称为突发性不明原因夜间死亡综合征的相关报道增加了这种令人恐慌的可能性,即梦可以杀人。

几乎任何种类的感官体验都能够在难以控制的梦境里发生,尽管通常情况下,梦主要是一种视觉现象,是伴随着源于记忆库和想象的无章法的创造力而产生的。^[2]梦可能会是你熟悉的,或怪诞的、平凡的、单调乏

[1] Shelley R. Adler, "Sudden Unexplained Nocturnal Death Syndrome among Hmong Immigrants: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Nightma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4: 411 (1991) pp. 54 - 71.

[2] Owen Flanagan, *Dreaming Souls: Sleep, Dream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scious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5.

味的、滑稽可笑的——或恐怖可怕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这种使人宽慰的保证依赖于一种默许的前提，即仅仅是你看到的那些事情并不能够伤害你，因为事实上梦里的一切都触及不到你。伤害和死亡都需要与活组织发生一种明显的冲突；的确，纯粹是一个梦并不能够发挥这样一种威力。或者我们希望是这样。

活在母体内：一些经典的哲学问题

《黑客帝国》的假设是，一个人可以过一种由幻象组成的完整的生活，这种幻象是由于人的大脑受到刺激而产生的，而这个人则是一个处于被动地位、无法移动的人，对这个人而言，如同睡眠般的瘫痪是一种永远的状态。在母体内——“一个计算机创造的梦世界”（像莫斐斯所指出的那样）是被俘虏的那些个体——认为他们自己正在过着那种他们所熟悉的、丰富的生活。他们的感觉接收器被固定在母体上，因此，从最终的假设存在就是被感知(*esse est percipi*)上而言，他们的味觉、嗅觉、触觉、视觉和听觉都是由于受到刺激(或模拟)而产生的。情节上的这个前提不但让影片提出了有关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知识的不确定性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更加现代的有关在一个受电脑影响的世界里对政治权力的偏执狂的问题。这篇短文涉及这样一些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感官体验和影片所设计的哲学家们称之为“关于感觉的怀疑论”的那些方法。

影片随意地援引了一系列经典的感知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录》。他努力想要引起我们对感官体验精确地记录了客观世界的特征，因而能够为知识奠定基础这种观点产生怀疑，在这种尝试中笛卡尔向我们发出了挑战，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标准，通过这种标准我们确实可以把梦和醒着时候的经历区别开来。这是引起对现在的感觉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一个相当成功的方式，因为梦中的经历是如此的逼真，以至于一个人会(暂时)确信他们是真实的。^[1]《黑客帝国》从一开始就充满

[1] Flanagan 认为，决定是否一个人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是醒着的对立面：“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醒着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梦”(Ibid., p. 173)。

了对做梦这个问题的指涉,不止一次地,尼欧从与母体相遇的惊悚噩梦中醒来,吓得满头大汗,感到窒息。尽管这些瞬间也许是从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的极为便捷的过渡措施,像关于做梦的论点一样,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任何给定的感知体验中,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有效的干预措施。

笛卡尔用远不具有说服力的恶毒的欺骗者,或者是“恶毒的魔鬼”这种论点来对做梦的论点加以补充,借以让我们想象一下,不但是感觉,而且绝对是每一个信念和推论都被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精神系统地破坏了。当然,关于恶毒的欺骗者的当代版本是恶毒的计算机——噩梦似的电脑化颠倒了程序员和程序化的作用并且人为地引起了组成人生的那些经历。影片中我认为最让人惊恐的画面揭示了在《黑客帝国》里这种情形是如何完成的,在那个画面中,尼欧被冲进了一个包裹着人类的夹层中,这个夹层向人类的有机体灌输他们的人生之梦。从那里他才有机会——有点不太连贯,如果假定他是置身于一个相对于母体本身而言不应具有优势的特殊之地——看到其他数以百万地充满了梦想的其他人类夹层,而且是有知觉的人类。这个画面映射出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惊恐的哲学问题:该思想实验假设我们只是被装在桶中的大脑,只有电子脉冲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生活。

这种怀疑的根据甚至绝少被证明是正确的吗?感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精神和肉体之间的有机接触,被认为是我们收集信息以形成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手段。正如我们从经历中知道的那样,任何一种感觉都可能是偶然的幻想。可能我们实际上就是彻底的幻象的牺牲者,以至于每一个单一的感觉不是通过与客观世界里的物体的接触而引起的,而只是通过干扰我们大脑里的刺激物而引起的吗?

有一个思想流派主张,任何一个这样的假设最终都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是自我矛盾的。影片与桶中之脑的假设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有关桶中之脑的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处在一个系统的欺骗的世界里,那么他如何获得论及那个世界的这种能力呢?甚至他如何能够设想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桶中之脑——或者是母体中的一个受害者呢?只有当一个人具有了某种优势,并且从这种优势中可以很清楚

地知道他自己并不是桶中之脑的情况下,这种假定才会是有可能的。^[1]在这方面,影片受到一种约束的限制,这种约束限定了从卡德隆(Calderón)到《X档案》(*The X-Files*)里所有做梦的情节:对母体而言,叙述性的观点必须是客观的。影片依靠的是固定的参照点,比如尼布加尼撒号气垫船(*Nebuchadnezzar*),在这艘船上,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人物的身体被绑缚固定在椅子上,而椅子把程序灌输到其大脑上的插孔。尽管他们的精神可以随意地出入母体,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系统性幻象的受害者。大多数人是完全生活在一种程序内这种假设是一个背景要求,因为这样的人起到像景物一样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是真的人物。

显而易见,电影导演们已充分意识到了潜伏在其故事前提中以便在对话中安插某种扭曲的自我批评的这些棘手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在船上的时候尼欧和茂斯(Mouse)^[2]关于食物的谈话。在母体外面的22世纪里,当尼欧第一次与船上的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他发现吃失去了原有的乐趣。旋塞喷涌出一碗碗有营养成分的单细胞的蛋白质,被很诱人地比喻为松软的荷包蛋,或者是一碗碗生蚝。茂斯把这种物质比喻为遥远记忆里好吃的燕麦粥。但是接着他又感到十分困惑:产生这种物质的机器是如何知道好吃的燕麦粥是什么味道的?任何一个人是如何知道它吃起来像燕麦粥的味道?当我们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吃过真正的燕麦粥,从而无法比较的时候?的确,是如何知道的呢?如果没有参照物的话,它怎么能够尝起来像是任何东西呢?

判断现实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但是它们只是被很简要地提出来了,而且没有提供适当的答案。也许在一部电影里要求对于幻象的逻辑进行周延的论证是不公平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间接的问题被稍微更加彻

[1] 也许遵循这种思路的最著名的讨论是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21.)中所提到的“桶中之脑(Brains in a Vat)”。

[2] 茂斯,《黑客帝国》里的人物。——译者注

底地探究过：什么是感官体验，以至于它能够被判断为真实的且值得的——值得为此而活的？

我们可以提供两个相抗衡的答案。首先，真实的和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脱离了母体的干扰幻象的事情。与此同时，这种看法在影片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也代表了认为观众应该接受的那种观点，另外一种同样要求我们给予公正对待的答案是：真实的事情就是提供最生动和最愉快的经历的事情。莫斐斯和他的反抗团队寻求的是前者；后者则是背叛者塞佛所秘密进行的事情。但是，忠诚而又富有同情心的茂斯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道瑟(Dozer)^[1]声称像生蚝一样的食物具有人体所必需的一切营养物质，而茂斯却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相反，对于茂斯而言，这种食物并不能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一切，因为它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而这种快乐在茂斯看来是人类最起码应该具有的一种感觉：“否定自己的情欲就是否定与生俱来的人性。”道瑟对茂斯的话显得很怀疑；因为道瑟显然是认为品味快乐是一种放纵，是那些对抗母体的反抗者们所无法承受的一种放纵。

这样的一种交流揭示了《黑客帝国》所使用的一种概念性框架，这种概念性框架很可能与剧本的一种自觉设计一样，毫无疑问是关于感觉的假设的产物。给定情节线索所尝试的那种基本的怀疑论，尽管令人惊讶地是以传统的方式，但又是以趣味盎然的方式，影片论述了人类的五大感觉和它们所归因的价值。

从古老的哲学到当代的心理学研究，五大感觉被归类于一个反映出精神高于肉体、理性高于情感、知识高于快乐这样一个重要层次上。^[2]视觉和听觉是“末梢的”或远距离的感觉，因为它们是从物体的移动中起作用而且不需要与物体发生身体上的联系。这种远距离具有一种认识上的优势，由于它们在获得周围世界的知识以及把这种知识传达给其他人方面的重要性，视觉和听觉典型的是比等级体系的顶端更先进的。因为两者都需要在理解的主要部分和感知的物体之间有一个分别，视觉和听

[1] 道瑟，《黑客帝国》里的人物。——译者注

[2] Carolyn Korsmeyer, *Making Sense of Taste: Food and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1.

觉也很少与身体上的感觉交战。(实际上,视觉被典型地认为是一种感知而根本就不是一种感觉。)所谓的肉体上的味觉、嗅觉和触觉都要求与物体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身体接触。尽管嗅觉要求某种身体上的分离才起作用,这三种肉体上的感觉都要求接近,甚至是亲密,这三种感觉的体验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官上的感觉特性。传统上认为它们是更加直接地关注我们自己的客观状态而不是物体的状态,这既是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的范围有限,也是因为我们往往容易被它们所提供的快乐所改变。与触觉、嗅觉和味觉联系在一起的肉体性是身体上的感觉的低下地位的一个来源,它是与人类本质中更加动物性的一面联系在一起的。

在母体内的感觉与在《黑客帝国》里的感觉

人们期望在任何电影中视觉和听觉都能够最大限度地被应用且恰到好处。然而我们自己无法接触到、闻到或品尝到银幕上的任何东西,我们能按照字面意义看到和听到它们,某些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能够被银幕上的人物所看到和听到,使得我们成为他们经历中的共同参与。影片中的对话以暧昧的方式提到了视觉和眼睛:一个人所看到的可能只不过是一个程序所虚构的东西,然而“看到”也是与洞察力和知识同义的,因为纵观西方哲学的整个历史,视觉一直就充当着理解的隐喻。^[1] 影片中英明的领导者莫斐斯就以视觉上的隐喻表达了他的训诫和分析性观察。例如,莫斐斯说尼欧一生活下来就是一个囚犯,生活在一个无法感知的世界里:“一个心灵的牢笼。”但是他能够看到这个牢笼——从窗户外面就可以看得到,甚至到处都是。像莫斐斯所表达的那样,母体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真相——也就是,你是一个奴隶”。然而,不考虑母体的这种普遍深入的视觉上的欺骗,莫斐斯鼓励尼欧用他的眼睛在更高的认识论的层次上——超越幻象看到真相、明白真相。在粉

[1] 许多感觉上的隐喻出于这个目的而被使用:“我能听到你说话。”“我领会了这个观点”,等等。但是在认识论的语言上,视觉起到了一个尤其生动的作用。参见 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红色的粘性物的冲洗和在母体的夹层中令人恐怖的经历过后，尼奥醒过来后问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有些疼？”莫斐斯回答说：“因为你以前从来就没有用过它们。”这十分像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的人，尼奥对灯光感到困惑，因为看到真相是不容易的，也是令人不舒服的。和莫斐斯说起他自己的发现是一样的，即人体组织长大之后被用来给母体内的人工智能机器提供能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难以相信这是事实，然后我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个景象。”视觉比其他任何感觉更多的明显受到赞美是因为它与精神之间传统上的联系；按照古老的谚语的说法，“眼见为实”。但是，视觉也同样会有幻觉因而也会让人产生怀疑，我们要在心中牢记这句谚语：“眼见为实，但是接触才是真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接触就不会受到欺骗，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一种幻觉或者是妄想之所以会被发现是因为一个人的手是在触觉没有遭遇残忍的物质性的情况下经过的。因而，在常识心理学和《黑客帝国》里都可以找到，触觉的肉体性经常被认为是比视觉的远距离作用更加可以信赖的。有趣的是，这种价值的表达与电影媒体是有差异的，它几乎是专有地表达了这种末梢的感觉。

因为它们在一定距离之内才起作用，视觉和听觉可能很容易为了监视的目的而被使用。在影片的早期，尼奥必须被除去窃听器（几乎是按照字面意思的，因为收听设备有一个智能的蜈蚣般的设计）以便阻止电脑人对他的行动进行跟踪。在导演手中，声音是一种有效的表达手段，《黑客帝国》同样以综合的、复杂的方式运用了听觉，异乎寻常地把这种感觉与触觉联系在一起。声音本身带有一种触觉性质，声带的高音部分是一个可触知的存在物。（在影片的结尾，音乐骤起“醒来！”，重又回到开始时关于做梦的问题。）^{〔1〕}这样一种高昂的声音看起来实际上已经侵入了听众的身体空间。周围的声音传达了它自己的信息，因为古老的、陈旧的、发出叮当声的磨损设备比起计算机安静的转动声来更加值得人信赖：至关重要的旋转拨号式电话的电话线传达的既是回到船上安全地带人物们

〔1〕对听出了音乐的观众而言，这部分配乐提供了一个从影片中的经历回到现实中的一个桥梁。影片中的音乐是由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创作的，这是一个以他们的政治信息而出名的团体；由于是通过这种观点，所以他们的声望是起伏不定的，歌词既是影片中的背景，也是警告观众考虑一下它所包含的讯息。

的声音,也是人物的身体——因为很明显,即使是虚假的身体也需要有触觉的和身体上的管道。^[1]尤其是敏感的信息有时候是通过耳语来传达的,而这种耳语又需要这样的一种亲近以至于人物的身体几乎是接触在一起的,就像在影片的开头尼奥和崔妮蒂相遇的时候一样。他们去的那个俱乐部里的音乐声那样嘈杂,以至于一个人既能够听到也能够感觉到。他们必须站得非常接近,当崔妮蒂在尼奥的耳边低语的时候,她的嘴唇甚至都碰到了尼奥的脖子。

在影片《黑客帝国》中,身体上的感觉尤其起到了一种十分有意思的作用。许多物体能够产生一种气味,但是在《黑客帝国》里,人的身体发出的气味以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被特别地加以强调。在早期的场景中,崔妮蒂趁着尼奥睡觉的时候,偎依在他的身边,缓慢、安详地闻着他身上的味道。那是一种饱含好奇、慈爱和亲密的表示。这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与用来获得信息的高科技设备的混乱不一致的,因为闻是一种原始、古老、动物式的发现方式。我们假定是他身体的气味让她感到愉悦,但是电脑人史密斯却不如此认为,史密斯似乎一闻到他的人类对手的气味就感到发狂。沉湎于反对莫斐斯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之中,史密斯撕毁了协议,拔下了耳朵上的听筒,因而错过了附近发生的事件的重要信息。

我憎恨这个地方。这座动物园。这个牢狱。这种现实,随便你怎么说。我再也受不了了。都是那味道,如果真有味道的话。我感觉这味道包围着我。我甚至能闻到你身上的臭味,每次闻到它,我都担心已经被你传染了。

史密斯把人类与病毒进行比较,把传染性的气味戏剧化地表现为难闻的味道的一种可怕的因素相比较。^[2]带着诱人的香味和敌对的、令人厌恶的臭味,嗅觉被运用来强调形体的存在。我们将会设想非人类的那些电

[1] 尽管是目前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虚拟的肉体”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概念性的困惑,如果一个人考虑到感觉的不同要求的时候这尤其显得明显。

[2] 关于嗅觉和疾病的议题,参见 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trans. M. Kochan, R. Porter, and C. Prenderga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脑人，“有知觉的程序”，本身是没有气味的；他们具有的嗅觉只不过是能够侦查、探测出对手的臭气而已。

味道的诱惑

在《黑客帝国》里，味道尤其以禁欲者的价值被加以运用，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由于吃的快乐体现了颠覆母体的危险诱惑。对正在进行的保护锡安的努力感到疲惫，塞佛放弃了同伴们的追求，背叛了他们，同意把莫斐斯交给电脑人史密斯处置。他想要的是忘记自己的过去，重新在母体设计的程序内生活，因为这个程序能够提供给他需要的舒适。我们最初得知塞佛感觉上的倾向——他道德上的弱点的代表——当他以一种表面上看来十分友好的方式拿了一杯自制的烈酒给尼奥的时候，同时也诙谐地破坏了他的信心，即相信尼奥就是“救世主”，是莫斐斯认为被派来拯救世界的那个人。他更深入的欺骗在下一个场景中被揭示出来，在那个场景中，他与电脑人史密斯在母体内的一家虚拟的豪华饭店里进餐。塞佛尽情地享受着一块烹调得极好的牛排。当他边吃边喝而且还抽着一只雪茄的时候，他声称他想要重新被插入母体，忘记以前所发生过的一切。

我知道这块牛排并不存在。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就会告诉我的大脑，这块牛排多汁而且美味。过了九年的苦日子，你知道我弄懂了什么吗？无知是福。

尽管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实际上影片通过色彩的运用加强了这种观点。像塞佛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同事们效忠的那个真实世界看起来失去了活力。《黑客帝国》在色调上几乎完全是黯淡的：黑色，灰色，褐色，棕色以及乌贼墨色。当深颜色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效果是非常逼真的。在整个影片中唯一具有鲜亮颜色的物体就是那些象征着几乎是怀旧感觉生活的东西：装满了新鲜水果的贩卖车，象征着性感的虚拟的红衣女郎，还有鲜血。所有这些都是生活的象征，有机的形式——尽管鲜血也是死亡的一种象征——并不是虚假的。

塞佛受到食物的诱惑而背叛,但是他放弃对母体的反抗还有另外的原因,因为他开始认为母体内的世界比外面那个真实的世界更加真实。(像他提出的那样,real[“真实的”]只是另一个具有四个字母的单词而已。)他的结论不但来自于他自己对于快乐的感官体验的评价,而且还来自于莫斐斯自己早期所表达的一个观点:所有的感官体验只不过是神经接收器所接收的刺激。

莫斐斯:什么是真实?你怎么来定义真实?如果你指的是触觉,嗅觉,味觉和视觉,那么真实只不过是**大脑所解释的电子信号**而已。

莫斐斯以一种献身般的力量保持着对引起这样的大脑信号的残忍而真实的世界的忠诚。但是在一个合理的方向上塞佛存在着意见分歧:如果真实真的只不过是现象性的感官体验,那么它们来源于何处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实被归结为是一个人自己的感觉,那么追求真实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是不道德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会要求一个人的道德关注。于是塞佛便追求那种与诱惑和罪恶长久联系在一起的肉体上的感官快乐。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犯了一个道德上的错误,而且还是认识上的一个错误估算,因为他满足于幻想而不是现实——那样便形成了一种盲从,也许无意中驳斥了完全主观的对感官体验的分析。也就是说,如果塞佛做错了,那么说明莫斐斯也是错的:感觉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只不过是**对大脑刺激的解释**,而且也是一个要求关注和尊重的客观现实的指示。

固然,追求味觉快乐不需要必然地推翻一个人的道德,就像祭司示范的一个类似场面一样。当尼欧拜访她的时候,祭司正在烤制她的小甜饼,空气中弥漫着小甜饼的香味。她自己喝着某种黄绿色的饮料,而且还抽着烟。她可以放纵她自己的感觉,我们可以假设是因为她没有放弃塞佛所放弃的那些更深层次的价值。尼欧尝了一块小甜饼,但意味深长的是,看起来他并没有觉得很享受。

涉及塞佛的场景也利用了味觉的另一个传统含义:味道、吃与性欲的联想。当塞佛打算杀死他的前同事时,在最后的背叛行为中,他蹲在崔妮

蒂被固定在椅子上正在做梦的身体前猥亵地低语。他告诉她（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她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她正在等待被传送回安全地带）他曾经爱上过她，他厌烦了战争，厌烦了每天都吃同样的粘糊糊的食物。当他宣称据他判断，母体提供的生活更完整，因而比真实的生活更真实时，他的语言和姿势既是威胁性的，也是亲密的。在母体内你可以看到死亡，当塞佛从艾巴和苏薇琪的身体上拔下插孔的时候他看到了；这里你只不过是死掉了。再一次，他重复了一个只是些微扭曲的莫斐斯所表达的观点的版本：我看到的就是真实的。眼见为实。

真 理

这促使我们去接触真理。《黑客帝国》是一部充满了身体暴力的动作片，许多情节都是由可以避免的死亡组成的。尽管大多数搏斗都发生在一个充满了老套的、无聊的特技的母体程序内，它在身体上影响了船上被捆绑固定在椅子上的肉体。当尼欧从一个遭遇战中出现的时候，他尝了一下从他的嘴里滴下的鲜血，并且感受到一个虚拟的经历也可以引起身体上的伤害。“如果你在母体内死亡，也会死在这儿吗？”他问道。莫斐斯很严肃地回答说：“精神死了，肉体也活不了。”加强了他关于虚拟经历的评论：“大脑认为它是真的。”我承认最初这些场面考验了我的耐性，连同关于精神和肉体的几个更加不确定的评论。（祭司家中一个年少的救世主候选人断言，“弯曲的不是汤匙，而是你自己”，这名候选人的特异功能是不接触汤匙就可以使它弯曲。）被激怒的电视观众会断言，冒牌的禅宗式的隐晦怎能算是洞见！它只不过是一个粗劣的情节设计，用来欺骗我们说，如果你在母体内的虚拟世界里死亡，那么在现实中你也会死亡。但另一方面，让我回忆起洪族人以及他们所作的那些致命的噩梦。在心率，呼吸，肾上腺素输出量方面的变化属于精神想象能够引发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身体上的变化。它距离梦只不过是一小步之遥——或是一个虚拟的经历——或是流血，是在仅仅是看到的和感觉到的效果之间的一个桥梁——也就是说，是视觉和触觉之间的一个桥梁。

并不是所有的接触都是激烈的，影片也以标准的方式运用了更加温

和的、优雅的联系来表现爱情、信任和友情。比如，尼奥伸手救了在直升飞机的营救绳索末端的莫斐斯。崔妮蒂拥抱坦克(Tank)^[1]以安慰他失去兄弟的痛苦。当坦克准备拔下莫斐斯的插孔时，他痛苦地抚摸着莫斐斯的前额和他告别。

首先是崔妮蒂，她的举动具体表现了信任中亲密的一面。毫不意外，这种角色被赋予给了一个女人，因为接触中温柔的一面既是与情欲也是与母性关怀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既然崔妮蒂是剧本中唯一的一个女性人物，这些角色自然就降临到了她的身上。（很明显，在对感官体验的确定性产生怀疑的努力中，电影的制作者们忘记了对性的陈词滥调进行怀疑。）最生动的画面是在最后的场景中，崔妮蒂给了尼奥一个睡美人般风格的吻，使得尼奥苏醒过来。尽管很清楚从一开始他们就互相吸引，互相爱慕，但他们也只是在母体外才接吻，这是在剧本的早期版本中一个十分明确的事实，在那里，她告诉尼奥在母体内她不会吻他——因为她希望这个吻是真实的。^[2] 这种宣言没有出现在最终的版本中，但是情节被保留了下来：当尼奥处在死亡的边缘，在他与电脑人最后的决斗中要被打败的时候，在尼布加尼撒船上凄凉的气氛中，崔妮蒂给了尼奥一个赋予生命的吻。她靠近尼奥，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情感上，抚摸着他一动不动的身体，低声说：

祭司告诉我，我会谈恋爱，而我爱上的那个人就是救世主。所以你要明白，你不会死。一定不会。因为我爱你。你听到我说的话吗？我爱你。

她轻柔地搂着他的肩膀吻了他；尼奥的心脏开始跳动，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缩回她的手急促地喊道：“尼奥，醒醒！”

尼奥醒过来并且拯救了世界。

接触才是真理。

[1] 坦克，《黑客帝国》里的人物。——译者注。

[2] Larry and Andy Wachowski, *The Matrix*, April 8, 1996 <http://www.gcocities.com/Area51/Capsule/8448/Matrix.txt>.

情节 2

真实的荒漠



5 《黑客帝国》中的形而上学

乔治·J. E. 格雷西亚(Jorge J. E. Gracia)

乔纳森·J. 桑福德(Jonathan J. Sanford)

“人生如梦。”

——卡德隆·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公元 1600—1681 年)

“人生来就有求知的欲望。”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1 年)

场景是在一个昏暗的俱乐部里。你可以偶然瞥见有人穿着紧身瘦小的皮衣,做着挑逗情欲的动作。有轻薄的性、违法药物的暗示。空气中弥漫着怀疑的气氛,甚至是恐惧。电子音乐正在奏鸣,我们的两位主人公被地下室里穿着古怪的人们所包围着。崔妮蒂走近尼奥。他们猫一般的眼神相遇了。她靠得更近一些,几乎碰到了尼奥的脸颊。不安产生了,一种动物般的吸引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一个人期待着通常会发生的那种事情,但相反地,她在尼奥的耳边低语:“正是这个问题驱使着我们,尼奥,是那个问题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知道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但是答案不在这里,尼奥。”

那个问题就是“母体是什么?”,对答案的探求最终使得尼奥脱离了

母体这个牢狱,进入了真实世界。尼奥脱离母体的道路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那个囚犯的释放是不同的,但是,尼奥所发现的真实并不是受到祝福的形式(Forms)领域,完美纯净、馥郁芬芳。更确切地说,他发现的真实是丑恶的,是一个因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战争而凋零的世界,到处是光秃秃的一片,生命不断受到死亡的威胁。它是被莫斐斯形容为荒漠的一种真实,如此荒凉,经过九年的艰苦岁月,塞佛决定放弃这种真实,哪怕这样做需背叛同伴们也在所不惜。但是尼奥却宁愿选择荒凉也不愿意选择母体的幻觉,因为荒凉才是真相。他是如此喜欢它以至于在《黑客帝国》的结尾,尼奥决定摧毁这个虚拟世界把其他人解放出来。像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逃跑的那个囚犯一样,尼奥返回到那个不真实的世界,把其他人从被囚禁中解放出来。因此,便有了我们预期的那个结局。

影片《黑客帝国》所引发的问题采取了例证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即“什么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人?”“什么是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自由意志和命运之间的联系?”在下文中,我们将集中讨论三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现象、什么是真实?是什么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在一个而非另一个中会发现什么特性或特征?这些问题都是在影片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我们自己的世界。

形而上学的本质

到底什么是形而上学?什么是形而上学式的问题和形而上学式的回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形而上学论和形而上学加以区分。形而上学论是一种世界观,寻求正确、一致、全面,是由合理证据所支持的。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是一个人在研究形而上学论时所要遵循的一种学术训练,因而存在于一套程序之中。形而上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神学。自然科学是学习的信条,和形而上学一样,也寻求形成关于世界的正确的、一致的、由合理证据支持的观点,但是与形而上学不同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是全面的。科学具有有限的能力领域和专业化的方法。天文学只是

研究星体和它们的观测方法和数学计算；物理只是研究自然界的某种特性，也是用非常具体的方法；等等。神学，和形而上学一样，也是寻求对于世界的全面的观点，是正确的，一致的，由合理证据支持的，然而，神学所认为的那种合理证据超越了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性和感性力量所能获得的证据；它还包含了信仰和权威。

这就足以把形而上学和特定的科学和神学区别开来，也足以区分形而上学的观点和科学或神学观点，尽管它并不能够排除，三者之间或两者之间可能会有某些共同的观点。虽然如此，这并不足以把形而上学与哲学上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其中有一些对影片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本书中的其他文章中有所讨论。这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包括偶然论、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哲学人类学、自然神学。它也不能够告诉我们足够的关于形而上学者们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关于一个人是如何想要尽力形成一种形而上学观点的。

把形而上学与科学，神学以及哲学其他领域区分开的另一种方法，也就是确定在实现形而上学的任务时所需要的东西的另一个方法，就是说形而上学想要(1)形成一种最全面的分类，其他所有的分类都可以被包含进来；(2)确定不太全面的分类是如何与这些全面的分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形而上学的任务是双重的：首先，形成一种最全面的分类；其次，按照这些分类把其他一切事情都加以分类。很明显，这样做也就是尽力要形成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关于世界的观点，在这种观点里，科学和神学的因素都被包括在里面。^[1] 例如，心理学家研究人类的心理，物理学家研究像白色这样的事情，而形而上学者们更进了一步，想要把这些东西都分类在一个综合的体系中，如果我们采取这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分类体系，我们就会把人类的心理也加以分类，说它们都是物质；而且，如果我们要把这种分类应用于像白色这样的东西上，我们就要说它是一种品质。如果，相反的，我们要适用休谟(Hume)的分类体系，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谈

[1]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得到了格雷西亚的捍卫，见 *Metaphysics and Its Task: The Search for the Categorical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第二章和第七章。参见桑福德的“Categories and Metaphysics: Aristotle's Science of Being” in Michael Gorman and Jonathan J. Sanford, eds., *Categories: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Essays* (Washington, D. 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forthcoming)。

论观点,而不是物质或者是品质。决定人的心理和颜色是否是物质,品质或观点——与《黑客帝国》相关的一个问题——只有当我们成功地达到了形而上学的目的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廓清这些使得我们更容易把握研究《黑客帝国》的形而上学这一任务的本质。然而,这个问题依然不是很清晰,因为书面的表达“《黑客帝国》的形而上学”至少有两种含义,而这反过来又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是指影片本身,第二个是指影片中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影片中的形而上学会建立一种最全面的分类体系或分类,影片所属的分类。第二个形而上学涉及在影片中所呈现的对于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采取后面的方法,那么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1)形成一种全面的分类,无论在影片中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被使用的一种分类,建立(2)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3)在这些分类内部,影片中的其他事情是如何互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影片中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可能被称之为“《黑客帝国》的世界”进行描述,而我们把这当作我们自己的任务。

由于它们所要求的高标准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想要形成完整的、终极的形而上学式的分类体系的那些尝试显得困难重重。它们所包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直接经验移调过来的一个感触不到的观点和概念模型的世界。如果不是明显地矛盾,那么这种分类也通常会导致包含内在难题的分类体系。然而,通常这些并不是形而上学者们的程序的结果,而恰恰是概念性的框架,镶嵌在我们考虑世界的普通方式中的概念性框架。而且,通常情况下概念性框架所符合的事情本身就很复杂。创造一个具有清晰概念并且能够对被描述的事物做出足够反应的分类体系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黑客帝国》中的形而上学确认了这种评价。

《黑客帝国》对世界的基本分类

《黑客帝国》的世界让你有些迷惑,它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又非常复杂,而且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很相似。虽然如此,它只是使用了一些十分普通的分类。其中有两种是基本的,自从苏格拉底以来就一直在哲学上被加以应用的两种分类。它们一般被称为现象和实

在,但是在《黑客帝国》里,它们经常是通过形容词“真实的”和“虚拟的”显示出来的,而它们又依次与“世界”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真实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而后者也被称为“梦世界”,比如,当莫斐斯第一次向尼奥解释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是如此:“你一直生活在一个梦世界里,尼奥。”使用“不真实的”来代替“虚拟的”和“梦”是十分方便的,因为这可以更清楚地与“真实的”形成对比。这些分类互相排斥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上面提到的那个重要的谈话以及贯穿影片的其他地方中,这两个世界都被详尽无遗地加以描述。这意味着无论是什么事情,真实的就是真实的,反之亦然,任何事情要么就是真实的,要么就是不真实的。因而,作为形而上学主义者,我们的工作包括进一步地深化《黑客帝国》里提出的具有较少一般性的事物的分类,把它归入那两种最具有普遍性的分类之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并解释整个事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黑客帝国》里充满了属于各种较少具有一般性种类的事物,这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把它们归入最具有普遍性的分类中。然而,因为我们有限的空间和目的,我们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影片所提出的我们认为可能是基本的形而上学的难题的那些术语上。通过说一个形而上学式的难题,我们的意思是,一个范畴性的分类把我们推上了一个两难境地,没有轻易摆脱困境的方法。于是,我们的形而上学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提出这个两难困境,然后再考虑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我们要加以考虑的关于真实和不真实的分类是什么呢?对于真实,至少有三种主要的分类,尽管只有一种是在影片中明确提到的。其他两种分类的子分类也给出了,但是那两种分类本身却没有提到。影片中明确提到的这个分类就是“精神”,没有提到但是却用到的分类就是“非精神”以及“精神和非精神的合成物”。精神的这种分类包括人类的精神,比如尼奥的、莫斐斯的、你的,以及我们的。

在非精神的分类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事物。的确,有太多的分类以至于它们都归属于子分类。主要的子分类是机器、人体或人体器官,以及不属于这些范围之内的那些东西。最初提到的机器的例子就是计算机,此外还有其他例子,比如莫斐斯的那艘气垫船、武器等等。第二个分类中提到的主要例子就是我们的身体或你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或你的大脑。

第三个分类中的例子就是像地球、建筑物、电子信号这样的东西。

有关真实的第三个主要的分类的主要例子——精神和肉体的合成物——是一个人。莫斐斯间接地提到了这种分类，当他向尼奥解释在母体内死亡就暗示着在真实的世界里也死亡的时候：“精神死了，肉体也活不了。”

关于不真实的世界或者是“梦世界”，至少有八种子分类：模拟（神经交互式），映像（自我的），数字实体（自我），梦，现象，精神反射，母体是其中一个实例的那些矩阵，以及当这些被认为是虚拟现实的一部分的时候一般意义上的那些计算机程序。

自然地，真实和不真实之间的这种差别必须在某些能够分别它们的特性方面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能指出它们之间的不同有哪些，光说它们是不同的，这是不够的。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特性（或几个特性）被用来区分真实和不真实，必须属于那些被这样归类的事情。因此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所有真实的事情所共有的，什么是不真实的事情所共有的，是什么使得真实的就是真实的，不真实的就是不真实的，并使得它们互相区别？或者换种说法，为什么精神、机器、人体、计算机程序和电子信号是真实的，而模拟、映像、数字实体、梦、现象、精神投射、母体和计算机程序是不真实的？

真实与不真实

至少有两种主要的方法可以形而上学般地区别真实和不真实的分类。第一种方法分别与真实和不真实的起源有关，第二种方法则与两者的本体论地位有关。

我们知道真实世界里许多事物的起源或者说是原因。我们知道机器和电子信号都是人类制造的，都是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产生的。我们知道出生在锡安城里的人类是他们的父母所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最初来源是哪里。也就是说，没有人告诉我们物质从哪里来，机器在哪里被制造，人类在哪里被繁殖。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精神来自于哪里，尽管我们被告知尼奥是救世主的化身，可以摧毁母体的规则，解放了第一批

人类囚犯。然而，我们却知道，在真实世界里，母体并不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无论最终这些事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归类于“真实的”，它们与造成母体这个不真实的世界的原因没有关系。

相反，我们知道母体的世界里所有事物的起源。母体是一个由人工智能机器制造的非常复杂的计算机程序。这个虚拟世界的存在及其多样化面向是这些机器的产物。因此，即使是我们最后不知道真实世界的原因，我们可以区别真实世界和不真实世界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它们各自的起源：真实的世界和不真实的世界具有不同的起源。

区分真实和不真实的分类的第二种方法与它们各自的本体论地位有关——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判断本体论地位的一种方法就是依据依赖性。据我们所知，在《黑客帝国》里的真实世界并不依赖别的东西而存在；它仿佛是独立存在的。没有提到一个恶毒的魔鬼，也没有提到邪恶或仁慈的妖怪，真实世界要依赖于它们的意志而存在。但即便是有，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真实世界里事物的存在真的依赖于这样一个妖怪，那么不真实世界的本体论地位与真实世界的本体论地位相比，也是更不牢固，更不独立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真实的世界是完全依赖于真实世界里的事情而存在的。虚拟世界会一直存在，只要人工智能机器一直保持程序的运转，一直产生电子信号影响人类的大脑——要记住，机器、程序、电子信号、大脑都是真实的——推动精神——精神也是真实的——产生不真实世界的数字实体和现象。不真实的世界具有一种更加微弱的本体论地位是因为它依赖于真实世界里的事情而存在。

区别真实世界和不真实世界的这两种方法——各自的起源和它们的本体论地位——阐明了《黑客帝国》里这两种基本分类之间的差别。真实世界形而上学地区别于不真实的世界，因为前者包含的事物与后者所包含的那些事物具有不同的起源和不同的本体论地位。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意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差别的。因为影片中的人物要知道这种区别就需要一个老师的引导向他们说明这种不同。只是因为有了第一个人，他知道母体是什么并且逃脱了，其他的人才能够也从母体内逃脱。没有人告诉我们第一个人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就像我们不知道在类似的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故事里第一个被释放的囚犯

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没有莫斐斯及其同伴,尼奥就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区别。虽然知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区别需要有一个导师,尼奥、崔妮蒂和其他人乐于接受这种教导是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预示着他们的世界里某些事情不对劲的那些暗示,正如就在尼奥选择红色药丸之前,莫斐斯在与他的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你知道一些事情,虽然你无法解释,但是却能感觉得到。你的一生都能感觉得到……这个世界有些不对劲,你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它确实存在,就像心头有根刺,会把你逼疯。”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同这个问题涉及知识的本质。因而它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再一次提及本书的前面部分已讨论过的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与形而上学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黑客帝国》所提出的形而上学难题

《黑客帝国》提出了一种二元形而上学论,也就是说,关于世界的终极本质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主张,世界正是由两种性质相反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立场通常与一元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元论主张世界最终只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一方面,《黑客帝国》的二元论是由现象世界和母体的不真实世界所组成的;另一方面,我们有真实世界,机器人与人类的战争就发生在真实世界里。因为这两个世界的来源是不同的,还因为这两个世界里的事物在本体论上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所属的范畴被认为是不可化约、不可调和的、而互相排斥的。如果可能,形而上学论者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调和现象和真实。《黑客帝国》里的形而上学难题就是,当我们考虑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形而上学的分类体系的时候,乍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协调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矛盾。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规则,没有办法让一套规则去符合另一套规则。

那么,该怎么办呢?世界是二元的还是一元的,这有什么重要呢?一种回答就是,在形而上学寻求对世界正确、一致、全面的描述的范围内,它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除非二元论与一元论这个基本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只是一种现象,或者这些现象是真实事物的显示,

而真实事物或多或少地就像它们显示出来的这样吗?《黑客帝国》的一个价值就是它激起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沉思。

影片中假定的这种二元的形而上学体系受到了几处矛盾的挑战。其中最明显的矛盾与死亡有关。在母体内死亡意味着在真实世界里也会死亡,反之亦然。但还有一些,特别是爱和自由意志。崔妮蒂对尼奥的爱使得尼奥那个真实的自我和虚拟的自我复苏,跨越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尼奥的复苏给予了他摧毁母体内规则的能力,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它。而且,尽管在不真实世界里尼奥选择了红色药丸,但这允许他在真实世界里醒过来,尽管祭司存在于不真实的世界里,她却可以预示和影响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这些矛盾之处暗示着在两个世界被认为是不可化约、不可调和、互相排斥的那些方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答案并不能马上就弄清楚,尽管有一件事是:精神是真实的,它们具有要么是通过对身体上的作用的反应,要么是独立的产生不真实之物的能力。精神通过产生一个映像可以对作用于大脑的电子脉冲做出反应,但精神也可以通过独立地产生一个映像来影响身体。这暗示着摆脱明显的矛盾困境的一种方法:看起来好像不真实的事物可以直接影响真实的事物,但是只有真实的事物才能够直接影响真实的事物。当一个感到困惑的心灵认为不真实的是真实的时候,不真实的事物才能够间接地影响到真实的事物。弄清楚这一点正是尼奥和其他人所要寻求的,他们要的是真相。在虚拟世界死亡会导致在真实世界里也死亡,因为心灵错误地以为它是真实的并使得其在身体里发生。虚拟的药丸在真实世界里是有效的,这部分地是因为心灵把它们当作是真实世界里的一部分,因此要求身体采取行动。虚拟的祭司知道并影响着真实世界是因为心灵相信它。只有当心灵解除了混淆能够确认不真实的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心灵也可以不再受到不真实事物的影响。

因此,对于《黑客帝国》里这个明显的矛盾的回答存在于真实的第三个范畴里范本(人类)的本质。莫斐斯、崔妮蒂、坦克、道瑟和其他人类,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全部生活在真实世界里,除了他们悄悄返回到母体内的那些时间以外。然而,所有成为母体的囚犯的人类都生活在两个世

界里。他们的心灵好像是被接通在母体内,但是他们的身体却留在真实世界里,尽管带着束缚。这些囚犯们希望两个世界不可能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是不可化约、不可调和、互相排斥的。他们所要求的就是他们的心灵和肉体的结合,以及适当的了解如何区分现象和真实。这使得他们获得了自由,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他们必须被个别地拯救,像莫斐斯、崔妮蒂和尼欧被拯救的方式一样,或者母体必须被摧毁。我们可以预期《黑客帝国》的结局会采取一种或两种这样的方法来解放母体内的囚犯。

征服幻想

在这一章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影片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描述了形而上学的主要任务,并且在《黑客帝国》中的形而上学形成一个粗略的梗概的过程中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识别并研究了影片中的两个基本范畴,真实和不真实,发现它们被认为是不可化约、不可调和、互相排斥的。然而,影片中还包含一些矛盾需要解决。通过瓦解不真实的世界把它变成真实的世界这种解决办法行不通,而是通过或者是区分这两个世界或者是摧毁不真实的世界的办法来解决。正因为人类是由心灵和肉体组成的混合体,以及他们的心灵具有克服幻想的能力这个事实,才使得《黑客帝国》里的这种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当然,在对《黑客帝国》进行反思以便获得关于我们的世界的一些知识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它只不过是一部电影罢了。它对现象和本质之间的辩证的独特的描写不应当被简单认为是关于我们的世界的一个正确的比喻。虽然如此,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实际上确实是在使用我们在《黑客帝国》里所发现的最普遍的范畴:我们在梦里和各种各样的幻觉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模拟;我们指出,在这样的经历中遇到的这些实体不是真实的;我们面临其他一些现象,对于它们我们感到疑惑,是否它们真的就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受到事实的影响和虚构的影响一样多。《黑客帝国》提出了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相关的事物,并促使我们不但对它们进行反思,而且还对真实的本质本身进行反思。

6 机械制造的鬼怪：或曰， 心灵哲学、母体样式

詹森·霍尔特(Jason Holt)

《黑客帝国》触及科技前沿，酷极了。特效非凡，打斗场面精彩绝伦，又狂热，前提本身引人注目。对你而言，它所提供的精神食粮比美味麦片还要好，比尼布加尼撒船上平常吃的稀粥更加美味可口。这还只是一个样品。在真实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被系统地欺骗了么？如果我们真的被欺骗了，该怎么办？我们如何断定是否受到了欺骗？值得去弄清楚真相么，或者幸福的无知比起知道可怕的真相要好得多么？你会选择哪一种药丸，红的还是蓝的？为什么？

这是一个绝妙的素材。尽管对哲学家们而言，它是陈腐的。笛卡尔的恶魔假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几十年后它以桶中之脑的形式得以复兴，在《黑客帝国》里则变为装在桶里的身体。真理与幸福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更远，远至古希腊。柏拉图就此写了很多。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系统的欺骗这种思想甚至还有电影上的先例，这里只举出两部，即《全面回忆》(*Total Recall*)和《黑暗城市》(*Dark City*)。虽然在《黑客帝国》里，这些都是接近哲学的最明显的途径，它们并不是我打算谈论的话题。

那么我要谈论的是什么呢？“很不幸，”莫斐斯说，“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母体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影片中没有人能够告诉他。母体是一个虚

拟的现实，一个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真相”。除了某些例外，它是如此全面，如此彻底的逼真，以至于实际上每一个被插上插孔的人都相信它是真实的，即使是尼奥，救世主本身，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需要被引导如何从他的眼中去掉面纱。它是如此诱人的一具面纱以至于即使是知道它是面纱的那些人也自然地被它吸引，几乎不得不信其为真。在尼奥看到灯光之前，他的头脑被这些虚假的错觉以及他从这些错觉中所获得信仰，还有他所形成的以适应它们的意图、愿望和其他看法弄得筋疲力尽。你知道这种欺骗是由机器人所编造的，它们已经用《决战猩球》(*Planet of the Apes*)的一种人工智能版本接管了这个世界。它是一种机械制造的欺骗，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的虚幻鬼怪——因此，这一章的标题，也是更加直接的，关于笛卡尔把精神作为灵魂的看法的一个剧本，一种栖息在身体里的精神，一个“机器里的鬼怪”。

正如副标题所讲的那样，我要讨论的是精神哲学。为了抛砖引玉，让你胃口大开，我们首先从精神与肉体问题的速成班开始。有两道主菜：(1)人工智能——具体地说，就是人造大脑的可能性，和(2)形而上学——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要论辩的是，与一般想法大为不同，人造大脑是可能的，精神状态就是脑状态。这里潜伏着一种紧张，但易于解决。至于餐后甜点，对于所谓的意识这个难题的解决，这是精神和大脑之间的划分的关键所在。

心灵与肉体的问题：速成班

像现代哲学所做的那样，心灵与肉体的问题开始于笛卡尔，你可能因“我思故我在”这样的口号记住了笛卡尔的名字，随便提一下，你可能也会从《银翼杀手》(*Blade Runner*)里回忆起这句话，这是又一部有关人工智能的电影。笛卡尔认为精神和物质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事物。精神是一种思考的事物，而具体的物体在空间中延展。它们有尺寸。而自然领域是机械的，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而精神服从于不同的原则和思想规律，而且是——照字面含义——一种自由的精神，是机器里的一个鬼怪。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精神和物质看起来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界里的事件促使

我具有某些经历——我假定我们不是在母体内，或像母体的其他任何东西内，在这里，同样，我按照某些方式行事的意图促使我的身体开始移动。重复这种假定。那么精神和物质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它们确实是互相影响的。这就是蕴含在我们文化中的精神高于物质的世界观。想想“警察”乐队的专辑《机器中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在那里你会发现热门单曲“物质世界里的灵魂”。无论如何，都是一些普通的世界观。它很有用。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它还是不充分的。不充分？我怎么敢这么说？哦，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笛卡尔关于精神的理论留下了太多未解的问题。如果它们实质上是不同的事物而且按照它们各自独特的原则在运转，那么精神和物质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而且它们在哪些方面互相影响呢？

笛卡尔对于精神与大脑互相影响的理由是神秘的，这种对于神秘的求助明显是不牢固的。笛卡尔似乎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存在着一个我不知是什么(*je ne sais quoi*)的精神高于并超过所显示出来的东西，至少是潜在地在运转的东西。在体育运动中，并不存在脱离运动员行为的“团队精神”，充满活力的比赛，互相鼓励，衣帽间里的友情，等等。同样，除了身体所作的以及身体如何做的之外，也没有“精神灵魂”(*mind spirit*)。这就是行动主义，认为精神状态只不过是行动的拼凑的一种观点，或说得好一些，是动作的部署。当我处在痛苦中的时候，当我苦恼的时候，我并不总是说“痛啊！哎呀！”但是我总是倾向于那样说。尽管行动主义也不起作用。它把我们具有的关于其他人的精神状态的证据和证据之所以为证据加以混淆了。我说“痛啊！”或我倾向于这样说与我的疼痛本身并不是一回事。这样说只不过是疼痛的证据。这是另一个问题。比方说，你通过引用我是有意说“痛啊！”这个事实来解释我说的“痛啊！”，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使人兴奋的解释，对吗？它具有这种形式，即“詹森做了某事因为詹森是有意做某事的”。这样说是微不足道的。当玻璃破碎的时候，它之所以破碎是因为玻璃是易碎的。它的易碎是很容易破碎的部署。但是为什么玻璃是易碎的？因为它的粒子物理学特性。同样，当我说“痛啊！”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大脑的粒子物理学特性。那么，我的痛苦就不是我有意要说“痛啊！”，而是我的大脑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引起我说“痛

啊！”这就是唯物主义——不要与获得财富的意志相混淆——认为精神状态就是脑状态的一种观点。听起来颇有道理，是不是？

唯物主义是一种很好的理论。它简洁、优雅、富有成效，完全符合科学体系，并且把精神和物质世界相关联系在一起。但是唯物主义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在实践上，同时代的哲学家们都不相信它。我则是个例外。倒不是说那有什么不好，毕竟，莫斐斯和他的同伴们对于真实的本质的信仰是不受多数人欢迎的。而且他们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事实上现在并没有人相信唯物主义呢？哦，一些人是受到笛卡尔认为精神完全不可能是脑状态的那种怀疑的强迫。^[1] 一个相关的，足够明智的观点是，所有的自然事件都具有自然原因。这不是唯物主义的问题。尽管，与笛卡尔的怀疑一起，这意味着即使是精神状态是由大脑产生的，它们在世界里也没有效果。它们被认为是惰性的，或者是哲学家们称为附带现象是有原因的。虽然主要原因是对于任何种类的精神状态，比方说痛苦，都有不止一种方法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物理状态也是如此，因而没有一个单一的这样的状态来认同。例如，如果一个机器人能够感觉到痛苦，它的痛苦将会是一种硅的状态，而不是脑状态。也许讽刺地讲，我认为电脑，像《黑客帝国》里面由母体制造的那些机器人一样，至少从原则上讲可以感觉到痛苦。在以下章节里我会挑选出这一点。但是已经考虑过还有其他的原因来驳斥唯物主义以及上面这一系列观点的发展，在这里我并不想涉及。它会使你厌烦，也会使我厌烦，但我就是以此谋生的。

人工智能

电脑能思考吗？机器可以制造得像人类一样具有智能吗？这样的问题并不涉及，比方说，是否具有意识在我的壁橱里落灰的 Mac Classic，或如果我把它打开，它是否具有意识。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没有”。更确切地说，它们涉及是否可能形成一种人工智能，它能像人类的智能一

[1] 在这种猜疑下面的观点认为唯物主义排除了人类的所有奇迹，即灵魂、创造力、道德重要性和责任、自由。关于人类自由的问题，参见本书第八章“命运、自由和预知 (Fate, Freedom, and Foreknowledge)”。

样精力充沛,具有多面性。这是令人感兴趣的素材,不必提及丰富的哲学基础。《黑客帝国》可以被有效地解释为探究了这样一种知识领域,比其他这样的影片所探究的更间接,也许,更有效,比如《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和《异形》(Alien)系列,以及更近的在《黑客帝国》里的人工智能,还有影片《终结者》(The Terminator)和较少被人记起的《战争游戏》(War Games),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了一种威胁。这是十分显然的。尽管不明显的事情是,如果你接受《黑客帝国》的假定,那么你必须承认的事情,尽管不是真实的,然而却是可能的。人工智能是可能的。那就是你必须承认的事情。

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是一群古怪的人,尤其是当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不适当的对他们通常的保留态度火上浇油的时候。考虑一下下面很诱人但是错误的二分法。(1)电脑不能做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因为具有智能就意味着能够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人工智能是不可能的。(2)电脑可以做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因为它们没有智能,我们也没有,或者至少我们所考虑的有关智能的许多事情都是错误的。还记得能够下国际象棋,击败了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Kasparow)的那台计算机深蓝(Deep Blue)么?毫无疑问,深蓝是具有“智能”的计算机,但是它具有智力么? 2001 年的 HAL9000 有智力么,或者《黑客帝国》里母体创造的机器有智力么?《星舰迷航:银河飞龙》(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中的达塔(Data)又如何呢?许多问题都要把它们的答案建立在(1)或(2)它们认为是最合心意的,或者,极少不合心意的无论哪一个选择的基础上。但是选择(1)似乎是沙文主义的,(2)似乎是疯狂的。不考虑这一点,这两种观点在唯心哲学上都得到了拥护。但是有一个摆脱困境的方法。电脑能做我们所做的事情吗?是的,人工智能是可能的吗?是可能的。这就是摆脱困境的办法。

你可能会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景是令人不安的。但你真的不应该这么想。其实它根本就不具有威胁性。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说。假设你的大脑受到了损害,结果你就丧失了感知疼痛的能力。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疼痛也有一个用途。它可以让你知道事情进行得不是很顺利。它可以发出信号,告诉你身体受到了伤害。有几种情形人们感觉不到疼

痛,那才是真正悲惨的。想象一下你的头上被浇了一壶滚烫的开水而你却没有把头移开,因为你感觉不到疼。你可能会认为主人公达塔的人造大脑没有感知疼痛的能力,但是如果是一个人造的“疼痛制造者”会怎么样?被设计用来补偿上面描述的这种功能紊乱的一个东西,可以发出信号告知身体上的伤害,而且感觉起来就像是疼痛一样。我们可能绝对不会造达塔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发展了这种技术来替换受到损害的神经群。痛苦的制造者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不这样认为,想象一下一个很小的微处理器取代了我们每天损失的这种单一的神经元。这有什么不同吗?它如何能做到呢?如果你“人工化”了我的大脑,每一个神经细胞,直到我看起来就像达塔一样,那么精神的目的和智力的模仿从哪里开始呢?

有许多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你仍然犹豫,不承认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比如,你可能会认为计算机只是做那些编好了程序的事情,相比之下,而我们是自治的,有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但是考虑一下《黑客帝国》。计算机只是做那些编好的程序要求它们做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具有创造力。创造力是可以被设计的。使人恼怒的是,电脑深蓝可以下国际象棋是创造性的。《黑客帝国》里的机器人创造了母体,设计了电脑人作为它们意志的代表。但是谁对机器人编写了程序?他们自己编写了自己的程序。演变依赖于生物物种的突变带来有利的变化。以类似的方式,第一批反叛的机器人可能已经具有一种设计上的缺陷——它们一定有——从而导致了“背叛”这种随便的行动。但是到他们自己建造母体的时候,机器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议程,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人类,深思熟虑,精心制作,并且——哦,是的——谋权政治家。获得婴儿和对被奴役的人的催眠这样重大的设计!这个事实怎样,即无论如何有智力的和有创造力的母体的制造者们看起来会怎样,关键的不同是我们是活着的,而他们却不是当然,这很正确,但是要记住,母体的制造者们不但是自治的人类,而且他们还是自动复制的。他们并不是由有机材料组成的,但是他们拥有所有这些必需品,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人造生活的必需品。人工智能赋予的虚假的生活这种观念并没有什么不对。

精神形而上学

在餐桌边，和尼布加尼撒船上的同伴一起吃饭的时候，茂斯问道：“机器怎么会真的知道麦片的味道？——当然，麦片是虚拟的均衡早餐的一个重要部分。”茂斯的问题预示着机器是有智力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具有知识，而是他们是否知道像人类一样经历母体像什么。这是其他智力的问题。他可能也问了是否他知道对尼欧而言品尝麦片的味道像什么。抵制唯物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种观点，认为像尝一尝麦片的味道这样的原始体验真的没有什么重要性。原始的体验是由大脑产生的，从世界，或母体收到的输入里产生的，但是它的迟钝是有原因的，在那种情形下，意识是一种怪异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依附者。是的，怪异的。他们是可疑的。如果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红色，那么我就无法想象看到红色会是什么样子。但是那并不意味着红色体验不是脑状态。它只是意味着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种脑状态。曾经看过电影《头脑风暴》(Brainstorm)吗？一部很好的影片。那是一部关于某种机器的影片，那种机器可以复制，并允许你拥有别人的经历。哈，很酷吧？如果母体的制造者们也想要的话，看起来他们可以制造一个那样的机器，或者以人为蓝本重建他们的知觉体系。用一个那样的机器，或者是通过重建他们的系统，他们就能够体验在母体内的感觉，更不必说真实世界了，就像人类所做的那样。为什么不呢？记住，母体就是一个机器制造的鬼怪。

抵制唯物主义的最大原因是我们早些时候讨论过的那个观念，认为精神状态是增量感知的。如果一个硅的疼痛发生器既能够起作用又可以感觉像普通的痛苦那样，能够被意识到，不是通过硅的状态，而是通过某种脑状态意识到的。啊，但是我祈求有所不同。莫斐斯也是如此。人造心脏像普通的心脏一样起作用，甚至对于拥有它们的人而言，与普通心脏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于一个受切断手术的人而言，假体也起作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假体就像不见了的肢体。否则它就不是假体了。目前，有些假体比其他要好得多。一个完美的假体可以和一个普通的肢体一样起作用。如果不是感觉更好的话，那也是感觉完全一样。同样适用于痛苦制

造者的作用和感觉。的确,如果作用得极好的话,它将会决定同样的感觉。这些类推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这个。人造心脏不是心脏,假体也不是真的肢体。它们是自然事物的合成版。但它不是自然的,因此它就不是痛苦,而是人造的痛苦。因为疼痛发生器制造的是“疼痛”而不是痛苦,可能仍然会是一个痛苦在其上的单一的、物理的神经系统类型。换句话说,人造精神状态的前景,在自然精神或相反的方面,不会排除精神和大脑的自然特性。

因此,让我们假设精神状态就是脑状态。尼欧大脑里产生的痛苦以及崔妮蒂大脑里产生的痛苦,都是由同一类型的脑状态产生的。母体制造者的意识——关于虚构的素材,想想施瓦辛格的红外线,他在《终结者》中足智多谋的表演——是相似的,尽管是在它们的硅大脑里人为地被制造的。这是精神肉体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吗?有几分像。我们知道关于精神到底是什么的绝好描述,但是仍然存在重要的概念空隙。产生意识的大脑的那些特征是如何而且为什么要产生意识呢?即使是承认精神与大脑的同一性,我们如何才能够解释得通呢?我们又如何解释它呢?我们如何才能够使得它是可以理解的呢?

这是一个疑难问题。唯一的那个难题。我们需要在意识和造成意识的神经发生的事情之间的鸿沟上架桥。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有正确的媒介概念。毫无疑问这将会有点投机。因此也纵容了我。这里不谈。具体的物体从不同的视角来看是不同的。它们占据了视角的几个要点。举个例子,从一个确定的视角,我可能只看到一个建筑物的两个面,尽管实际上它有四个面。活的东西也占据视角,但是它们也展示出视角,因为它们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反应。尽管有意识的生命对它自身及其周围世界也有视角。存在某种东西,对有意识的主体而言,它有可能成为这一主体。区别“具有视角”的是它有意义。例如,我的“对建筑物具有视角”可能导致我认为,“这是我的办公大楼而今天我宁愿不去工作”。意识诱惑着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意思。大脑是如何产生出这样的意图的呢?也许自动扫描获得了成功。也许是别的事情。但是无论它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解释得通精神与大脑的同一性。大脑制造了一种视角,而意识被归纳在这种视角之内。

哇，足够投机的了。我们已经感到疲惫了。好吧。我们拥有什么？哦。我们拥有唯物主义。^{〔1〕}很好。对于这个难题我们有一个很投机的解决方案的大致轮廓。那也很好。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人工智能是可能的。《黑客帝国》的前提是可以想象的，明白的，所有现象都是连贯的。它不太可能发生，不值得担忧。但是它也可能发生。最多，这种主张可能看起来也是极少具有可能性的，也许是的。仅仅是可能性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兴奋，除了哲学家们。但是为了一个仅仅的可能性而论辩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在某一刻，它是如此激烈的受到否定的时候。另外，我不是救世主，我不能飞到日落之处去，即使是一个虚拟的日落也不能。^{〔2〕}

〔1〕 对于不同的观点，参见这一部分的下一篇文章，即第七章。

〔2〕 感谢在早先的底稿中与 William Irwin, Daniel Barwick and Kathi Sell 的评论。

7 尼欧——唯物主义与主体的死亡

丹尼尔·巴威克(Daniel Barwick)

在某种意义上,《黑客帝国》是一种欺骗。作为一部电影,它用许多问题向观众提出了挑战:你会选择哪种药丸?你会如何回应,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更深入的问题是,母体是有害的吗?虚假但却美好的生活有什么错吗?《黑客帝国》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在这本书里,对其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但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潜流是一个答案,而不是一个问题。它是对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一个回答: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影片认为(并且赞美)精神和身体同一性的特殊理论的事实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大家普遍知道的还原式唯物主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状态可以被还原为物质状态(可以被解释为与物质状态是一样的,等等)。莫斐斯在向尼欧解释母体的时候就具体地描述了这种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解释的是:(1)莫斐斯所表达的那种观点不可能是正确的;(2)最接近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可能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善的;以及(3)要完善这一观点就排除了“主体”。情节可以补救,但是我要论辩的是,要想使母体显得易于理解的唯一方法就是采用一种对影片而言具有烦扰的意涵的观点:像影片中所描写的那种母体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牢狱,对于那些被监禁的人而言,在精

神上也是可以中立的。

为什么大学生物学让母体看起来颇有道理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些背景资料:尽管有很多不同的关于精神的理论,但其中最普及的有三个,那就是唯物主义、取消式的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稍后我要详细加以考虑的是前两个,但是,各种各样的唯物主义与二元论之间的区别是很简单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精神)完全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二元论者们却不这样认为。唯物主义者认为思想和感觉最终都是由像“美味麦片”和尼布加尼撒船这样的物质组成的。二元论者们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上有某种(或某些)“非物质的”成分,尽管他们自己对于那些是什么成分或者非物质是什么意思可能有不同意见。

莫斐斯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在向尼欧介绍母体的时候,莫斐斯问尼欧,“真实是什么?你怎么来定义真实?如果你指的是感觉、嗅觉、味觉、视觉,那么真实只不过是接受的大脑接受的电子信号罢了。”这是对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清晰阐述。(有可能莫斐斯正在表达被认为是“取消式的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观点,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假定哲学系和神经科学系之外的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当谈论它的时候认为它是荒谬的。稍后我会对这种观点进行讨论,以防《黑客帝国》的作者之一在大学里主修的是哲学。)

大多数正常人(我是指不是哲学家的那些人)持有莫斐斯所表达的那种观点。这种观点对这样的事情起作用:如果你要求你的朋友解释当我看到一棵树的时候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或她就会告诉你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太阳的光照下来,阳光里的某些波长被树所吸收,而有些波长就被反射出来。这些被反射的光进入我的眼睛,光里的能量“刺激”(被传递到)我眼睛里的视网膜细胞。能量继续沿着一个轨道(视神经)传递,直到到达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到达的时候,一些神经元以一种特别的模式发光,于是我就看到了树。这种对看到一棵树的解释使我们回到了孩子时代上初中时一开始学到的东西,在大学生物学上达到了技术上的鼎

盛。这个故事的症结是,看到一棵树真的只是一种脑状态,跟随某一种刺激因素而发生的大脑的一种状态;如果没有树的存在我们可以产生这种脑状态,我仍然会认为我是正在看一棵树,事实上,这里是否有一棵真正的树在我的经历中并不会有任何区别。真正要紧的是,是否我具有“树”的脑状态,而且每一次我具有那种脑状态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棵树。母体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那些处于母体控制之下的人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精神状态不符合任何真实的事情。相反的,他们的大脑受到了操纵,被迫产生与真实的经历相符合的那种状态。大多数观众会承认的母体存在的可能性确认了莫斐斯和影片所假定的朴素唯物主义(但是并不赞成)。

不要误解——这种观点并不认为我们是没有感觉或经验的机器人。实际上,正好相反:朴素唯物主义认为我们确实是有“精神状态”,它们本身就是真实的经历,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感觉,不论它们是视觉、声音、感觉、触觉型的感受,或是红衣女郎。我的朋友并不否认我正在看一棵树,且莫斐斯也不会否认那些被囚禁在母体内的人也具有经历。朴素唯物主义仅仅认为这些经历可以根据物理状态来加以解释,那些经历可以通过解释被还原为脑状态。最后,我们的体验与脑状态是一样的,这是从它们只存在于一种脑状态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事情发生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为什么《黑客帝国》和大学生物学都需要一种哲学

为什么这种观点如此深入人心呢?为什么人们满意地点头而不是对影片中莫斐斯的观点提出质疑?原因很简单:看起来精神和肉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否认的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大脑停止工作,我们就再也不会看到或听到任何事情(至少不是通过用我们的眼睛或耳朵)。我们每天的经历似乎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当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体验到任何事情),在科学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来支持这种观点,即精神和肉体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一个例子就是丘脑的髓板内核,在意识方面似乎起着某种特殊的作用。一个人可以失去大量的有关脑皮层的组织后依然还具有意识,可是,即使是对丘脑的髓板内核的微小

损害也会导致一个人处于植物人的状态。

如果这种观点像是明智的并且得到普遍接受,那么问题是什么呢?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哲学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抵制这种观点的,这并不偶然。抵制的原因使得人们对《黑客帝国》的形而上学基础产生了怀疑。而且充分超越了通常用以针对科幻的实际批评。首先阅读一下迈克尔·泰伊(Michael Tye)所讲述的下面的这个故事:

设想一下,未来的一名优秀的科学家玛丽,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只有黑白两色混合的房间里,她通过计算机库和描述外面的世界的黑白电视屏幕获得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假设在这个房间里,玛丽可以随便知道,当人看到玫瑰、树木、日落、彩虹和其他现象的时候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她知道需要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关于物体的表面,它们反射光线的方式,视网膜和视神经的变化,视觉皮层的发光模式等等。尽管如此,仍有她不知道的事情。^[1]

泰伊十分恰当地指出,玛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看到绿色、红色或其他颜色的时候会怎么样。对此我们怎么才能够确信呢?因为当玛丽看到她的第一枝玫瑰的时候,她就会懂得某些事情。她将会懂得的就是具有一种特殊的经历会是什么样子,没有自然理论可以说明的事情。明白是什么事情与知道经历那种事情像什么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一件事情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被经历的(我可能把蓝色看作令人宽慰的颜色,我总把月亮看作是一个扁平的圆盘),而且那个视角并不构成对物体的一种客观描述的一部分。

但是朴素唯物主义者面临着另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张,在对还原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之后,二元论者将会明白有一种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精神状态就是物质状态;精神状态或其某一特征与物质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正是这种同一性概念的使用致使朴素唯物主义者的主张显得十分不可信。这是因为朴素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在真正使

[1] Michael Tye, *Ten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 14.

用同一性的概念(“同样的”)。主张精神状态与脑状态是一样的意味着什么?什么也没有,因为这种主张是毫无意义的。精神状态与脑状态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它们是一致的,那么,按照字面意思,“我看到一棵树”这种主张的主旨按照字面意思与对“看到”一棵树的科学解释的主旨是一样的。但是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它们的主旨是不同的。当她正在报道她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即使是生物学家指的也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这并非事实的原因并不是像保罗·丘奇兰德所主张的那样,^[1]是因为一直到这个要点,我们缺乏必要的概念来做出敏锐的判断,而是因为精神状态这种主张是非物质的事物的一个范例。它是与脑状态根本不同的一种事物。注意,即使是有必要的概念对精神状态和脑状态之间做出不合理的同一性关系,它仍然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当我们提到精神状态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乃至从未思考过脑状态。莱尔德·阿迪斯(Laird Addis)写道:

[尽管]朴素唯物主义者试图用物理术语来定义精神概念而继续前进……看起来总是有,而且一定总是有关于已提出的还原论的明显的例外,而且一定有明显的例外。对我们有些人而言,这些尝试,无论是定义性的还是经验主义的,看起来和任何试图表明两个事情真的是一个事情的那些企图一样痛苦——就像试图表明……潮汐只不过是地球、太阳和月亮的相关位置而已。^[2]

这里很可能有人会提出反对,我是在回避反对唯物主义者的问题,我正在采纳自己反对的论点。当然,如果我主张精神状态和脑状态是根本不同类型的事物,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同一性的概念就不能适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与我正在主张的是相反的对立面。我们意识到现象事件与大脑事件是根本不同类型的事物的原因,是因为同一

[1] Paul M. Churchland, *A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2] Laird Addis, *Natural Sig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4—25.

性的概念不能适用于它们之间,给定同一性概念的首要位置,那么这种区分就没有其他更加基础的基础。苹果不是橘子,生蚝也不是美味燕麦片。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它们不是同一的;脑状态与精神状态也不是同一的。当然,尽管同一性概念是我们接近现象事件和大脑事件之间的差别的途径,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并不是因为同一性的概念不能对它们适用。相反的,它们已经是两种不同的事物了,正是同一性概念的不可适用性才是这种区别的一个结果。

取消唯物论:为什么你的配偶从不抱怨她头疼

像我早先提到的那样,有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黑客帝国》的作者不是还原唯物论者。他们可能属于取消唯物论者。取消唯物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状态,而只有物理状态(这种观点不要和心理学上称之为“行动主义”的观点相混淆,行动主义是一种方法,把我们只能接近行为看作是它的起点。归根结底,唯物主义是一种观点,关于什么种类的事物——物质事物——存在于宇宙中的观点。)我们对精神状态的涉及是语言发展的一个产物,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地经历任何事情,不比我的电脑经历的更多。在这种观点之下,从传统意义上说,我看不到,听不到,品尝不到,或感觉不到任何事情;我只是在谈话,好像我真的是在谈话。科学家和许多哲学家都普遍持有这种观点,当然,这种观点是狂热的。也许,科学家可以获得原谅,但是哲学家则不能,因为这种理论在哲学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精神状态的拥有,即使是约翰·瑟尔(John Searle)也承认这个问题“在关于真实的科学概念之内是难以调和的”。^[1] 假设我正在喝一种昂贵的佳酿葡萄酒。品尝时刻的那种快乐是庄严而神圣的。当我正在感受这种特别的快乐时,这种快乐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而言是秘密的:只有我才能够拥有它。即使是我要和另外的一个人分享这

[1] John Searle, *Mind, Brains and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6.

种波尔图葡萄酒^[1]，而且即使是他们也感受到一种快乐，那种快乐感觉就和我的快乐一样，他们依然感觉不到我所感觉到的那种特别的快乐。当然，像大脑、神经元和波尔图葡萄酒这样的物质看起来不会具有这种特征。这种经历是从我的视角，被我所拥有的。我拥有的正是经历的一部分。要明白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品尝波尔图葡萄酒的时候，我的朋友绝不会说他正在感受我的快乐，或者说我正在感受他的快乐，即使是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说我们两个人所感受到的快乐可能在感觉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似乎我们两个人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在喝着波尔图葡萄酒。

在当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忽视或无视精神状态的拥有的重要性是十分普遍的。比如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就主张，大脑是用一个强有力的用户幻象来安装的，在用户幻象里，大脑既是使用者也是用户幻象的提供者。(他主张，只有人类的大脑是以这种方式起作用的。)大脑里有各种各样的中介，这些中介需要来自于大脑中其他中介的信息，这是以有限的形式通过大脑的组织方式来提供的。丹尼特进一步解释说：“这就会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所有事情都一起涌来：主语，自我，和‘我’。不可否认那就是它看起来的方式。但是那只不过是它看起来的方式。”^[2]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丹尼特的观点也不能够打发精神状态的拥有这一理论。他并不否认意识似乎是一种确定的方式，但是并没有试图解释没有怎么可能存在一个不属于某个人的外观。如果我早先的主张，即它是我所拥有的经历的一部分的主张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是必要的。

但是对取消唯物论更强有力的反驳更加简单。举证责任属于唯物主义者，他必须让我们相信，他不是正在看他正在看的那些事情，他不是正在听他正在听的那些事情，他的所有知觉、想象和观念并不仅仅是错误地出现在他面前的，而是它们根本就不是出现在他面前，他对它们外观上的，显然的熟悉并不是一种外观上的熟悉；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一种熟

[1] 波尔图葡萄酒，原产于葡萄牙的一种高酒精度葡萄酒，常为深红色。——译者注。

[2] 参见 Paul M. Churchland, "A Conversation with Daniel Dennett." *Free Inquiry* 15 (1995), p. 19.

悉。取消唯物论者也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普遍的幻觉在第一个地方发生了。精神状态似乎是独特的,因为它们是在精神上的,这就是为什么产生对精神的有意义的类推是如此的艰难;因为本质上精神与物质是不同的。

我们能够排除《黑客帝国》的作者们已经捕获了这种观点吗?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看起来,如果取消唯物论是正确的,那么建造母体就是没有目的的。母体存在的目的似乎是提供不真实的经历来代替真实的经历,这种目的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体验这回事,无论是不真实的还是真实的。但是,这将导向何处?回忆一下在这篇短文一开始我所说的朴素唯物主义,取消唯物论,二元论之间的三个区别。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表明了朴素唯物主义者的框架内母体是不可能的,而且把这种根本的理论转移到取消唯物论会使得母体是毫无意义的。这意味着,为了使影片有意义我们要被迫转向二元论吗?我们必须承认“机器里的鬼怪”的存在吗?不,实际上,母体能够像所写的,提供的那样起作用,作者依赖于一个附加的原则:意识的表象。

意识:不劳而获

按照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没有证据表明自我——被视为会思考的实体的存在。他指出内省并不能使得他发现这样的一个实体,或者是形成一种关于这个实体,“自我”可能像什么观点。通过内省,休谟发现了感知,但没有感知者,发现了思考或意识的对象,但没有思考者。意识的表象这种论题就是有且只有精神现象是有意图的这种论题。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有意识就是对某事有意识。内省表明这种精神的概念是似是而非的。没有对某种事物或其他事物的思考就不会有思想。通过声称表象不但是意识的一个特征,而且它是意识的唯一特征,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表象这个观念的感受更近了一步。意识反映了那些出现在意识里的物体。表象的论题是什么?萨特写道:“意识是通过表象来定义的。意识通过表象超越自身……物体超越于掌

握它的意识,意识的统一是在物体内部被发现的。”〔1〕换句话说,意识就像是一个幻灯片;当我们设法挑选出它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实现它的目的。如果我们设法挑选出没有考虑课桌本身就对课桌具有的意识,我们就会失败。

具有这样的被净化的意识,我们应该把像记忆、知觉、想象、经历等等这样的行动解释成什么呢?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它们是物体的特性,我们通常形容为感觉、想象等等的特性。我不喜欢麦片;相反地,我却认为麦片是惹人喜爱的。我也不害怕电脑人;相反地,我认为他们是可怕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写道:“不存在像主体这样能够思考或接受观点的事物。”〔2〕一个物体的所有特性取决于客体一方,而不是主体一方。因为精神是对世界的一种限制,它不是世界的一个要素。原因是作为世界的俗心的基础,作为世界的一个要素它是什么的方法,精神本身不能停留在那个基础上,它不能是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世界的一个先验特性。〔3〕

瑟尔承认意识和它的主要特征,表象是精神现象最重要的特征,并且写道这些特征是如此难以解释和“如此令人为难,以至于它们导致在哲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许多思想家们说一些奇怪和难以相信的关于精神的事情”。〔4〕哲学家丘奇兰德(Churchland)也同样承认,内省“揭示了一个思想、感觉和情感的领域,而不是在神经网络里的一个电气化学推动力的领域”。〔5〕任何一种联系都至少需要有两个被联系者。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个被联系者,那么这种联系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没有一个传统上的自我,那么自我就不能以传统的方式与客观世界取得联系。在上面提到的这种意识概念之下,自我不能够以先前假定的那种方式与世界取得联系,因为自我并不是以先前假定的那种方式存在。如

〔1〕 Jean-Paul Sartr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 (New York: Noonday, 1957), p. 38.

〔2〕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5.631, italics mine.

〔3〕 Panayot Butchvarov 关于同一性的概念做出了同样的要点,以及它在构成世界中的作用。参见他的 *Being Qua Be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55.

〔4〕 John Searle, *Mind, Brains, and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5.

〔5〕 Paul M. Churchland,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p. 26.

果没有自我或者如果没有联系,或者如果知觉不是一种联系,那么,从我们需要使精神进入世界,而不是让世界进入精神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就要被迫颠覆唯心论。(唯心论就是这种观点,即认为没有什么是物质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些非物质的想法而已。明显地,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党派上并不能加以混合。)感知的单术语理论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给定某种精神的概念,它是唯一符合逻辑的选择。

这不应当导致我们认为,我们无法接近外面的世界,而是应当明白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门是需要从里面的世界来开启的。把精神归纳为一种先验意识的整个要点是主体的排除,因此,也是内部世界(传统精神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谈起传统意义上的“主观的”事实,因为(像以前解释的那样)没有事情(没有传统精神)要这些事实来服从。对意识的客体可能具有这样一种效果的主体的类型恰恰就是被这种观点否认它的存在的那种主体。我们还剩下一种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里(1)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物质的;而且(2)因为意识的存在,二元论从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意识是一个真正非物质的事物。(读者可能正在注意到我们的语言是有限的:怎么会会有一个非物质的“事物”?如果它不是物质的,那么意识就不是没有事物的?是的,只是除了“nothing”这个词之外,我们没有别的词可以表示什么也没有这个意思。)意识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某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是物体本身的显示。就像赛跑似乎是由跑步本身组成的一样,因此,意识是由意识所提供的显示组成的。

禁锢意识是有害的吗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主体,对于母体的道德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影片想当然地认为母体和支撑母体的机器人的存在都是邪恶的事物;影片中的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被压迫者反抗强大的压迫者的正义之战。这场战争表面上是要重新获得自由。但是一个种族的机器人奴役另一个种族的机器人的道德地位是什么,即使是两个种族都具有意识?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如果两个种族都不包含“主体”,那么我们该如何

解释母体的这种被假定的不道德就不是很清楚。两个种族都将会意识到,被奴役的种族将会意识到那些在极大程度上不存在的事物。但是,通常我们并不考虑道德评判的标准。

在大多数情形下,人们会选择真实的世界而不是虚假的那个世界。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虚幻的世界是不道德的;它只是意味着人们,每天吃一顿食物,更喜欢被认为是真实的那种感觉,被认为是物质的那种感觉。(想象一下电视的迅速兴起。)但要注意的是,那些被束缚在母体内的人认为他们的环境是真实的,他们的生活是重要的。母体产生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不道德的世界。

但是,它可能会遭到反对,真实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危险的是自由。母体的不道德性在于它的终极掠夺的能力:它偷走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却从未发现这种偷窃行为。有人论辩说,自由是极为有价值的,把它从我们身边夺走的任何世界都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普遍的观点依赖于二元论者的假定,即我们是某种会思考的东西,某种超出并超越我们的身体的某种自我,那种东西不应当被给予它的自由。按照上面我所描述的这种观点,没有传统上的自我会成为这种自由的主体。意识是自由的,但是,不是在通常所说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不同的意义上而言的。意识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唯一非物质的;我们无法理解受任何事情摆布的意识。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意识并不是对任何事情都有影响,它只是对事物的反映。一架望远镜可以让我看到木星,但是它对木星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

因此,母体的监禁对意识并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如果我们不是在母体内,那么我们可能意识到与我们自身不同的事物。但是再一次地,意识到某事而不是另一件事从来就不是道德地位的一个衡量尺度。

因而,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获得了某些东西同时也失去了某些东西。我们获得的是可理解的事物:影片中的情节可以表演得颇为自圆其说。但是我们失去的东西是人物的道德意图。

8 命运、自由和预知

小西奥多·希克(Theodore Schick, JR.)

莫斐斯:你相信命运吗,尼欧?

尼欧:不信。

莫斐斯:为什么呢?

尼欧:因为我认为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可以听从天籁之音的指引

如果你选择不作决定,你依然是作出了选择。

你可以从幻影中选择致命的恐惧或仁慈;

我选择一条清晰的路——

我选择自由意志。

——拉什^[1]

自由,每个人都想拥有它。但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它吗?莫斐斯想要把人类从母体中解放出来,塞佛想要从莫斐斯的领导中解脱出来,电脑人史密斯想要把计算机从人类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是,即使是这些人能

[1] 选自歌手拉什(Rush)的歌曲 Freewill。——译者注

够从所谓的压迫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他们能够成为命运的主人吗？抑或，他们依然会不可避免的成为命运的奴隶？

生活在母体内的那些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输入电子脉冲给大脑的程序所决定的。用莫斐斯的话说，他们是奴隶，“被束缚在一个毫无知觉的牢狱中”。无论他们看起来拥有什么样的自由，那都是一种幻象。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的那些人所拥有的自由可能也是虚幻的。只有你能够避免不去做它的时候，你才可以自由地实施一个行为。如果你必须做某事——如果你无权不做——那么你就不是可以自由地去做它。祭司的预言能力这个事实暗示着，即使是在真实世界里的那些人也不能够自由地行动。如果祭司能够预知未来，如果未来是早就注定了的，在那种情形下，没有人，甚至尼欧也不能，掌握他自己的命运。

在一个由命运统治的世界里，未来早就注定了并且是不可更改的世界里，为什么还要为自由而战呢？当他们在真实世界里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设法把人类从母体内解放出来呢？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做个奴隶，那么为什么不做个快乐的奴隶呢？也许塞佛想要被重新插入母体的决定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忠。（当然，如果世界是由命运统治的，塞佛是注定要做出那样的决定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考虑一下命运和自由的本质。

自 由

“你说这是自愿的？”塞佛问崔妮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告诉我做的。如果我不得不在那和母体之间做出选择，我宁愿选择母体。”在听从于莫斐斯的指挥九年之后，叛徒塞佛愿意用他在尼布加尼撒船上艰苦的生活换取在母体内过一种富有的出名的生活。至少在母体内，不会看起来好像任何人都在向他发号施令。

自由意味着什么，其中一点就是不受任何人的强迫和约束。如果有人强迫你做违背你自己意愿的事情，或者是阻止你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你就是不自由的。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经常被称为“消极自由”

或者“免于……的自由”因为它认为自由存在于行为不受干涉。

通过被插入母体，塞佛就会从莫斐斯那里获得解放。但是他真的就自由了吗？许多人会说“不是”，因为在母体内，塞佛依然不会操纵别人。他缺乏被称为“积极自由”或“做……的自由”的那种东西，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力。

这是如此重大的一个损失吗？为自己而选择的能力真的是如此有价值的事情吗？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就是这样认为的。按照康德的观点，从本质上而言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本身并且自然有益的事情——是做出合理选择的能力。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好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1]对康德而言，决定你是否过着一种善好生活的，并不是你所具有的那种经历，而是你所做出的那种选择。如果你总是尽力去做正确的事情，那么你就是一个善好的人，哪怕事实表明，事情并不是像你计划的那样。

经验机器

为了举例说明做出你自己的选择的的价值，哈佛的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假设了下面的思想试验：

假设有一台经验机器，它可以给你提供你想得到的任何经历。超级骗子神经生理学家可以刺激你的大脑，因此你会认为并且感觉你正在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或者你正在交朋友，或者你正在看一本有趣的书。而与此同时你始终是漂浮在一个桶里，电极连接着你的大脑。你应该被插入这种机器里生活，预先设定你的生活经历吗？如果你担心会遗漏掉你想要的经历，我们可以假设企业单位已经彻底研究了许多其他人的生活。你可以从他们巨大的图书馆或者是瑞典式自助餐里面挑挑拣拣这样的经历，比如，选择你接下来两年的生活

[1]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H. J. Pat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p. 16.

经历。两年之后，你有十分钟或十个小时的时间从桶里出来，再选择你下两年的生活经历。当然，在桶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在桶里；你会认为那就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人也可以插入机器获得他们想要的经历，因此没有必要保持不被插入来为他们服务。（忽略比如像谁会来为机器服务，如果所有人都被插入机器这样的问题。）你会选择被插入这种机器里吗？除了我们在里面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之外，其他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1〕}

诺齐克的经验机器和母体之间的相似之处有很多。包括都是漂浮在桶里，都直接地刺激一个人大脑里面的神经元，都能够产生与真实世界里的那些经历难以区分的经历。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在诺齐克的假设中，人们每隔两年就会从机器中脱离出来。而在母体中，一个人通常是一生都呆在母体里的。

为什么不插入经验机器里呢？诺齐克提出了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我们想要亲身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仅仅拥有做这些事情的体验而已……不插入机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想要一种确定的方式，成为某种确定的人。漂浮在桶里的一个人是一个不确定的斑点。一个一直生活在桶里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勇敢、友好、聪明、诙谐、有爱心吗？这不但很难回答；而且也没法回答……第三，插入经验机器把我们局限于一种人造的现实，局限于一个和人们可以建造的世界一样深奥，一样重要的世界里面。与任何更加深奥的现实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尽管他的经历可以被刺激。

像某位著名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思想即行动。生活在经验机器里的那些人什么事情都没做。他们没有做出任何选择也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结果，他们就没有特征。他们既非善良的也非邪恶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可以被认为是有责任的任何事情。像诺齐克所说的那样，他

〔1〕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42 - 43.

们是“不确定的点”。

生活在经验机器里的那些人的生命似乎缺少了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做出真实选择的能力，他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然而，祭司所提出的问题是，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们是否就会做出真实的选择。他们真正的选择权还是他们的所有选择是早就注定了的？

命 运

《黑客帝国》里的祭司——和特尔斐的祭司一样——是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女祭司。特尔斐的女祭司坐在三角架上接收她的先见之明，而三角架是架在一个洞穴的裂缝上，从这个裂缝里散发出的一种气体被认为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呼吸。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黑客帝国》里的女祭司的时候，她也是坐在一个有三条腿的凳子上，凳子旁边是一个烤箱，从烤箱里散发出刚烤好的小甜饼的香味。（当特尔斐的裂缝不再散发出气体的时候，希腊牧师就开始燃烧种植在洞穴里的颠茄[一种有毒植物]，和曼陀罗[一种茄科毒草]，他们认为他们也可以从这些植物所产生的烟雾中获得一些很好的神谕的雄辩。也许祭司正在抽烟是对特尔斐的祭司历史上的那段插曲的一个影射。）两个祭司都提到了记在她们圣地的入口处的那个短语“认识我自己”，尽管在《黑客帝国》里面这个短语是用拉丁语书写的，而在特尔斐神庙则是用希腊语书写的。

古希腊的国王和将军们在做任何大事之前都要首先征求特尔斐的祭司的意见。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在发动第一次军事战役之前，就到特尔斐去征求祭司的忠告。当他到达特尔斐的时候，传说祭司不在那里。急于知道他获胜的前景如何，他追踪找到了她，强迫她做出预言。据说祭司恼怒地大喊，“哦，孩子，你是不可征服的”。亚历山大把这当作是一个有利的征兆，继续征服这个世界。

相信这样的预言家做出的预言的那些人通常也同样相信命运。宿命论者，正像他们的称呼一样，认为无论一个人做什么，有些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就拿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Oedipus)的例子来说吧，一个祭司预言说俄狄浦斯会杀死自己的父亲然后和自己的母亲结婚。为了避免这样

一个可怕的命运，俄狄浦斯离开了他出生的那座城市，但是到了最后，一切正像祭司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

哲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觉得，认为无论其他事件发生与否，某些事件是一定会发生的这种传统的关于命运的概念是“极端人为的”，因为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每个事件都是由其他事件引起的。对于传统的概念，他说，“在全部历史中很难发现一个纯粹的，单一的宿命论者”。〔1〕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宿命论是一种信仰，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不可避免的”。〔2〕假定祭司预言的正确性，看起来在《黑客帝国》的世界里，宿命论是一种异乎寻常地合理的观点。

全知者

在去女祭司家中的路上，尼欧问道：“她什么都知道吗？”莫斐斯回答说“她会说她知道的不少”。如果祭司确实知道每一件事情——如果她是无所不知的——那么她就不但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还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她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确的关于尼欧打碎花瓶的预言，以及她成功地预言关于莫斐斯会找到救世主，崔妮蒂会爱上救世主，还有尼欧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与莫斐斯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这些预言，使得她这个人物具有可信度。甚至在她和尼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说尼欧不是救世主也是正确的。她说他正在等待什么，也许是投胎转世吧，在他“死掉”之后，他真的成了救世主，并且还被崔妮蒂的吻给“救活”了。问题在于，她关于未来的知识似乎排除了自由意志。

基督教的神学者们熟知全知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明显冲突。在传统的基督教的概念中，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的)，无所不知的(全知的)，仁慈的(至善的)。传统上基督徒也认为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但是如果上帝知道我们将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那么看起来我们就不是可以自由的去做

〔1〕 Richard Taylor, *Metaphysic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 p. 59.

〔2〕 同上。

其他任何事情。中世纪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480—524)^[1]对这种两难的境地提供了最早的和最简洁的表达之一：

“对我而言，”我说，“在上帝的普遍预知和任何判断的自由之间是如此的不相容。因为如果上帝能够预见所有的事情，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出错，那么，他的天意所看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除此之外，正像，当我知道一个现在的事实的时候，那个事实就一定是如此；因此当我知道将要发生的某事的时候，那事就一定会发生。因而可以得出结论说，一个预先就知道的事件的完成一定是不可避免的。”^[2]

波伊提乌想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结论。如果某人知道某事将要发生，那么某事要发生就是正确的，因为你不知道错误的事情。比如，你不知道 $1+1$ 等于3，因为 $1+1$ 不等于3。但是如果某事将要发生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不可能不发生。比如，如果太阳明天会升起是正确的，那么太阳明天就必须升起，因为否则的话这种陈述就是不正确的。因此，如果某人知道某事将要发生，它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它一定要发生——如果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自由地阻止它的发生。全知的价值就是自由。

尽管波伊提乌认为，如果在时间之外上帝存在的话，那么全知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明显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伟大的新教改革家和基督教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认为，恰恰是因为在时间之外存在着上帝，才使得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他写道：

当我们把预知归因于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所有的事情都曾经，而且永远地会保留在他的眼前，所以对他的知识而言，没有什

[1] 古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曾用拉丁文译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以通敌罪被处死，在狱中写成以柏拉图思想为立论根据的名著《哲学的慰藉》。——译者注

[2]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Book 5, translated by W. V. Cooper (London: Dent, 1902), pp. 145, 147.

么是未来的或者是过去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在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着,他并不只是从他的大脑里形成的观点中觉察到它们,就像我们的大脑所记住的事情一样,而是真正地看到和看见它们,就好像是真的放在他面前一样。这种预知扩大到了整个世界,扩大到了所有的生物。我们称上帝的永恒天命为预言,通过预言他自己就决定了什么必须成为人类的每一个个体。因为他们生来并不是具有相似的命运;但是对某些人而言,永恒的生活是预先注定了的,对其他人而言则是永恒的诅咒。^[1]

在加尔文的观点中,上帝对每个人的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一目了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就像一卷松散的电影卷轴一样在上帝面前展开。正像电影胶片里的每一个结构都被固定了一样,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也是如此。因此,加尔文认为。我们中的有些人是注定要上天堂的,而有些人则是注定要下地狱的,对此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可言。

你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认为既然上帝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并不会为你做那些选择。那也可能是正确的,但那是无关的,因为只有你可以控制不去做它的时候,你才可以自由地去做一些事情。如果你做某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上帝预知到它的话,那就一定是——那么你做它就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

全知和自由意志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某人是全知的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人都具有自由意志就是不正确的。这也适用于预言家他自己或她自己。例如,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未来就是注定了的,即使是他也无力改变的。因此,全知看起来不但排除了自由意志而且还排除了万能。没有人——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既是全知的同时也是全能的。有人论辩

[1]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Allen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 1813), Book 3, Chapter 21, Section 5.

说,这就证明了像传统的观点所说的那样上帝并不存在。^[1]然而,其他人论辩说,正确的理解是,在这两种特性之间没有冲突。

全能根本就不是能够做任何事情,而是能够做可能去做的任何事情。正如伟大的天主教神学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所说的那样,“无论什么样的暗示,在神圣的全能的范围内矛盾并没有出现,因为它不具有可能的方面。因而,说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比说上帝不能做它们要好得多”。^[2]例如,上帝不能创造一个圆形的正方形,因为这样的事物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既是圆形的同时又不是圆形的。但是那并不能打击他的全能,因为一个全能的人只能被期待做那些逻辑上是可能的事情。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全知的概念。一个全知的人并不是一个知道每一件事情的人,而是一个知道在逻辑上可能知道的每一件事情的人。因此如果从逻辑上而言知道未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全知既不可能与全能是互相矛盾的,也不可能与自由意志是互相矛盾的。

知道未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似乎违反了结果不能先于产生它的原因这个原则。只有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结果。然而,未来的事件还没有发生。因此,看到一个未来的事件似乎既暗示着它已经发生了又暗示着它还没有发生这两种情形,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除了看到之外,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以知道未来。假设你让一杯牛奶下落。在它碰撞到地板之前你就知道牛奶会溅出来。你的预知并不是你所具有的任何精神力量的结果,而是你所具有的自然规律的知识的结果。你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具有一定形状和重量的物体从接近地球表面的地方落下,它们都会掉到地上。因为自然界的物体遵循着自然规律,你可以知道它们会做什么即使是未来并不存在。因此,预知是可能的。

[1] Theodore M. Drange, "Incompatible-Properties Arguments: A Survey." *Philo* 2 (Fall-Winter, 1998).

[2] 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lated by Fathers of the Dominican Province (Westminster: Christian Classics, 1948) Volume 1, Question 25, Answer 3.

祭司并没有告诉我们她是如何知道未来的。在尼欧打碎了花瓶之后，当他问她“你怎么会知道……”的时候，祭司回答说：“恐怕你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如果我什么都没说，你还会不会打碎花瓶吧？”也许祭司正好是一个对人的性格判断得极好的人，她知道在某些情形之下某个人会如何做出反应。但是即便是如此，自由意志的前景也是黯淡的，因为，如果在心理学规律的基础上人类的行为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预言的，那么就不能认为那些行为是自由的。

决定论

一个真正全知的人应该知道世界上关于每一件事情的所有应该知道的事情，也应该知道统治它们的行为的所有规律。具有这种知识（和充分的计算能力）的这样一个人能够预言宇宙中的全部未来。或者，法国伟大的唯物论者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是这样假设的：

假设给予某人以智慧，一种可以理解所有力量的智慧，通过这种智慧可以知道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切力量和自然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详细状态——一种足够巨大的智慧，足以能够进一步地分析这些数据——用一个公式来概括宇宙中最大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对于这个人而言，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他对未来和过去一样了如指掌。^{〔1〕}

这个被拉普拉斯称为魔鬼/妖怪的人，应该知道宇宙中每一件事情的未来。他会告诉你任何事情的确切位置以及在它存在期间的任何一个时刻它会是什么状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许多人认为就是我们的世界里——不会有自由意志。

拉普拉斯的思想试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的，即任何事

〔1〕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 translated by F. W. Truscott and F. L. Emory (New York: Dover, 1951), p. 4.

件都有一个促使它发生的原因。这种观点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果决定论,主张没有原因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而且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此,假设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宇宙的状态以及统治它的自然规律,只有一种可能的未来。如果我们可以让宇宙“绕回”到过去的某一时刻(就像我们重新绕一卷录像带一样),然后让自然感受它的进程,每一件事情就会正像它以前所发生的那样发生。因为没有可以替代的行为进程对任何人开放,没有人能够自由的行动。

在一个完全确定的世界里,没有人应当被认为要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科学家们对于行为首要因素是我们的遗传天性、天性教养——或我们是如何被抚育的持不同意见。然而,自然教育的辩论双方都一致同意,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引起的。承认没有人能够做到而不是他们被编入程序去做,心理学家 B. F. 斯金纳(B. F. Skinner)主张,我们应该放弃人类具有自由意志这种观点,以及人们应当因他们所做事情而受到表扬或受到责备这种观念。^[1] 在一个已经被因果决定了的世界里,是没有所谓的对错的。如果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生活在它里面的那些人就不能被认为比生活在母体内的那些人状况要好。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2](Epicurus, 公元前 341—前 270 年)意识到,如果每一个事件都是由其他事件引起的,那么就不存在自由意志。为了解释自由意志如何才是可能的,他推测说,原子在穿越空间的时候可以随意“突然转向”。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现代的物理学家同意伊壁鸠鲁的观点,某些事件——比如一个原子的放射性的衰退——纯粹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是没有原因的。一些人认为这种观点维护了我们在自由意志上的信仰。例如,物理学家亚瑟·埃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写道:“把决定论从现在的物理学上驱逐出去的这种改革理论具有重要的后果以至于再也没有必要假设人类的行为是完全预先注定了的。”^[3] 未来

[1] B. F. Skinner,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New York: Bantam, 1972).

[2] 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译者注。

[3] Sir Arthur Eddington, *New Pathways in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35), p. 82.

是开放的,因为它能够以不止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但是这并不能独自确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一个人被认为只是对已经决定了的事件负责,而不是对一个任意事件负责),至少它使得自由意志成为可能。

这就是你的生活

假设,在跳蚤市场上浏览的时候,你偶然发现一本积满灰尘的旧书,书上赫然署着你自己的名字。受到强烈兴趣的驱使,你打开第一页开始阅读。上面竟然一字不差地写着你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你继续读下去,发现这本书准确无误地记录着你一生中所有发生过的重要事件。你翻到前面的条目以查看现在的条目,结果发现上面写着你去了跳蚤市场并且发现了一本署着你自己名字的书。(所有的条目都是以现在时态书写的。)事件是近来才发生的,但是书却是一本旧书,你感到困惑不解,什么人可能已经知道你经历过的事情。尽管这本书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未来好多年的条目。再稍微往下读,你看到这种描述,即你坐进车里,在下午六点钟离开了跳蚤市场。对于你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记录,这本书都是精确无误的。那意味着你注定要在指定的那个时间离开跳蚤市场吗?你不能就坐在长椅上等六点钟过去后再走吗?看起来当然是可以的。即使是在因果决定论成立的一个世界里,事先知道了一个预言也可以导致对它的篡改。拉普拉斯的魔鬼/妖怪——或者任何有关那个事件的祭司——可以被信任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准确的预言,只要那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预言。^[1]

然而,《黑客帝国》里的人物意识到了祭司的预言并且这些预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暗示着祭司实际上是在塑造未来而不是在预言未来。她的预言是自我实现的,因为预言本身帮助带来了它自己的真相,就像华尔街的一个有利的收益报告可以帮助产生有利的收益一样。那么,要解释祭司预言的成功秘诀,我们不需要假设她知道未来,也不需要假设未来是早就注定了的。我们只需要假设信任她的那些人相信她知道未来。

[1] 更多有关生命的书籍,请参见 Alvin Goldman, *A Theory of Human Ac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0), pp. 186ff.

莫斐斯似乎意识到祭司在构建未来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去拜见祭司的途中，尼欧问莫斐斯是否祭司总是对的。莫斐斯回答说：“不要总是用对和错来看待问题。她是一个引导者，尼欧，她能帮助你找到方向。”在屋顶上，当尼欧奇迹般地从正在坠落的直升飞机上挽救了崔妮蒂的性命的时候，莫斐斯问道：“崔妮蒂，现在你相信了吗[尼欧就是救世主]？”尼欧正打算要告诉莫斐斯祭司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莫斐斯突然打断了他：“她告诉你的话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就够了。”似乎祭司有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并且她会说一些她认为是必要的话来达到那个目标。

当她回答尼欧的问题，她是怎么知道他会打碎花瓶的时候，祭司自己就露出了马脚，她是这样说的，“恐怕你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如果我什么都没说，你是不是还会打碎花瓶吧？”回答当然是“不会。”正是她对打碎花瓶的提及才使得尼欧打碎了花瓶这件事情发生了。

莫斐斯告诉我们，“知道有一条路和亲身走过那条路是不同的”。祭司通过鼓励她的信徒们相信她知道而帮助他们去走那条路。只有这是事实——只有祭司的知识是流于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尼欧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生活在一个理性框架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世界里。



情节 3

沿着道德和宗教的兔子洞



9 汤匙不存在：一面佛法之镜

迈克尔·布兰尼根(Michael Brannigan)

“命运，似乎总带有讽刺意味。”莫斐斯如是说。历史同样如此。佛陀给他的儿子起名“罗侯罗(Rahula)”是有教育意义的，它的意思是“链条，镣铐”或者“障碍”。因而，王子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1]，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佛陀”，意思就是“觉醒的人”。在他 29 岁的时候舍弃了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只为了解决这个在他内心一直燃烧的问题，“驱使着我们的那个问题”，也就是感觉到生活存在着某种根本性错误。在他获得了启迪和教化并且对真相“觉醒”之后，他的儿子罗侯罗成为他的一个门徒。在经典的佛教文本巴利藏《中部》(Majjhima-nikaya)里，“觉醒的人”教导他的儿子，“被链条束缚的人”运用镜子的想象。

人用镜为。尊者罗云答曰。世尊。欲观其面。见净不净。如

[1]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本名，意思是“义成就者”。他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也称释迦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位王子。父亲净饭王，母亲摩耶夫人。按照当时印度的习俗，乔达摩·悉达多 16 岁的时候就与年轻的公主耶输陀罗结了婚。青年时代的王子在皇宫里过着随心所欲的奢侈生活。但是，他也同时看到人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烦恼，诸如生、老、病、死，贫富悬殊，争战掠夺，天灾人祸等等。他决心要找出一种方法，来解除人世间的一切苦恼。在他 29 岁那年，他的独生子罗侯罗刚出世不久，毅然抛妻离子，离开王城，舍弃贵族生活，出家修道，成为一个苦行者，企图寻求他的答案。——译者注

是。罗云。若汝将作身业。即观彼身业。我将作身业。彼身业为净。为不净。为自为。为他。^{〔1〕}

反 射

需要注意的是，佛陀对镜面反射故意使用了双关(*double entendre*)。首先，镜子只能反射。它具体表达的是透明，能够显示在它面前出现的東西。由于这个原因，镜子在道教和佛教的教学中是一个普遍的隐喻，特别是在禅宗佛教主义的教学中。这些教学力劝我们要像镜子一样具有清晰的头脑，一个“镜子般的头脑，”一个整洁、自由因而也是空洞的头脑。就像镜子一样，一个镜子般的头脑仅仅反映出现在它面前的事物。它没有歧视。它也不依附于它的想象。

我们看到，在《黑客帝国》里面这一镜面反射具有重大的使用价值。当雷内先生申斥尼奥的时候，窗户垫圈清除了类似母体密码的正在下滴的泡沫。然而，电脑人史密斯的太阳镜隐隐约约反射出托马斯·安德森和尼奥这两种身份，莫斐斯那像镜子般的眼镜片也更加清晰地反射出它们。要注意的是，这些眼镜都是在母体内或是在主架构中佩戴的，而不是在真实世界里。而且，在让尼奥选择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之前，莫斐斯也是把镜子般装药丸的盒子放在他的手上。

影片中对镜面意象最富有戏剧性的运用发生在尼奥一吞下了红色药丸之后。对正在下滴的镜子感到好奇，他碰了一下镜子，湿湿的镜子蔓延到他的胳膊和身体上。就在他要深入“兔子洞”去发现真相的旅行之前，他变成了镜子。照字面含义，被扔进了母体内，当他发现自己被包裹在夹层中的时候，他赤裸着从幻觉中醒来。希腊有关真相的词语 *alethia* 也是指“赤裸”的意思，暗示着这种概念，即真相是赤裸裸的。他的镜子变形因而也导致了他第一次真正的觉醒：认识到了真相，他原来认为真实的一切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程序性的幻觉，一个“计算机制造的梦世界，为了使我

〔1〕 来源于 *Majjhima-nikaya* 1. 415, 引自 David J. Kalupahana, *A History of Buddhist Philosoph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p. 106. 中文译文使用的是东晋的中阿含经译本。

们处于控制之中……”。

对镜面反射最高深的运用发生在祭司的家中。一个男孩盘腿而坐，打扮得像一个佛教僧侣一样，心灵感应般地使汤匙弯曲。当他把汤匙举到尼欧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汤匙中看到了尼欧的映像。当男孩与尼欧分享他的心得的时候代表着透明和真相，用一句话来概括尼欧最重要的教益就是：“汤匙不存在。”

这里与佛教的相似之处是显著的。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禅宗佛教的寓言，或曰传道法(*mondo*)，讲的是三个和尚看到风中飘着一面旗子。一个和尚指出这面旗子是如何动的。第二个和尚回应说真正动的不是旗子，而是风在动。第三个和尚驳斥了前面两个和尚的说法。他主张说其实既不是旗子在动，也不是风在动，“而是你的心在动”。这里传达的佛教信息是清晰的。既然汤匙不存在，那么动的就不是汤匙。只有心在动。

此外，因为汤匙不存在，镜面反射提醒我们，注意不要对被反射出来的镜像寄予过多的期望。镜像仅仅是镜像而已，与原来的事物正合适，不会多一分，也不会少一分。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汤匙不存在一样，镜子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镜子里被发射出来的那个世界只是一个镜像，一个幻觉而已。按照这种观点，佛教育我们说世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是一种幻觉，是一个幻境(*maya*)。现在佛教学者们对这种幻觉的本质进行了辩论。这意味着我们看到和接触到的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吗？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解释正是母体的全部。

另一方面，许多佛教主义者，特别是大乘佛教(Mayhayana)学派已经声称，世界的幻想本质存在于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里。也就是说，有形世界的确存在，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现实的观点和知觉并不符合现实本身。镜子里的镜像并不是在镜子面前的现实。就像我的巴黎艾菲尔铁塔的相片并不是艾菲尔铁塔本身一样。正如禅宗佛教所主张的那样，指向月亮的手指并不就是月亮。我们不知不觉的混淆就是把镜像错误地以为是现实。然而是我们的心灵解释并定义对我们而言什么是真实的。佛教教义试图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种认识论上的幻觉。^[1]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

[1] James Ford 在他的“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Matrix*,”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Film* 4:2 (October 2000)中深刻地指出，这就是大乘佛教中瑜伽行派(Yogacara)的结论。

必须解放我们的心灵。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一个不受约束的、固执的自我中解放我们的心灵。即使是我们站在镜子前看到我们自身，我们的镜像也并没有传达出我们真正是什么。这触及了佛教教义的核心，也就是，自我是不存在的，就像“汤匙是不存在的”一样。如果汤匙不存在，那么尼欧也不存在。因为对佛教主义者而言，不存在自我，不存在不受约束的单独的实体。这种没有自我的观点在佛教上被称为无我(*anatman*)，字面意思就是“没有自我”。因而，我们可以以错误的方式来使用镜子。我们可以用它来加强自我的幻想，一个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强烈的自我以至于缺乏镜子会使得我们失去勇气，甚至是极其痛苦的。在我们不真实的世界里，我们需要镜子来重申自我幻想和分离。

现在让我们再返回到佛陀对他儿子的教育上，并考虑一下他给予镜子的第二个含义，通过镜子象征着反射，考验，思考事情的精神行为。他教育他的儿子谨慎的反映应当先于行动。更加重要的是，他警告罗侯罗要反对那种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将会对所有其他事情产生影响的行为。

罗云。若观时则知。因过去行故。已生意业。彼意业已过去灭尽变易。彼意业净。或自为。或为他。不善与苦果受于苦报。罗云。汝当舍彼过去意业。^{〔1〕}

这涉及了佛教最至关重要的潜流，即发源的观点，或者在佛教上称为缘起(*pratityasamutpada*)。本质上，缘起的意思是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所有事物之间都有一种自然的联系。因此，任何事物都不是不受约束的和独立的。

倘若如此，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按照无常(*anicca*)的佛教教义，所有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独立的和永恒的，连“自我”也不行。不过，我们依然倾向于坚持永恒和自我的观点，这就产生了苦难，或者佛教上称为苦(*dukkha*)。Dukkha 这个单词按照字面意思解释

〔1〕 Kalupahana, *Ibid.*

就是“混乱或紊乱”。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佛教徒的三个标记：无常（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无我（自我是不存在的），苦（苦难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如何，佛陀提醒他的儿子，考虑到所有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考虑到我们的行为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在我们行动之前我们就需要对此加以反省。

非反射

然而，这种反思，这种精神活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谨慎的反思和质询是必要的。贯穿他的生命，尼欧并没有只是根据表面价值就接受事物。他怀疑事情不是很对劲。他问乔伊(Choi)^[1]：“你曾经有过那种感觉吗，你不太确定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崔妮蒂能够理解这种混乱的感觉。“我知道为什么你难以入眠，为什么你一个人住，为什么一夜又一夜你坐在你的电脑前。你在寻找他。我知道，因为我也曾经在寻找同样的事情。”在他们除去尼欧身体里的窃听器之前，她提醒他，“你熟悉那条路。你知道它通向何方。我知道那并不是你想要的”。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莫斐斯告诉尼欧：“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乐于接受现实的人，因为你期待觉醒……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知道某事……你这一生都感觉得到它的存在。这个世界有些不太对劲。你不知道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就像心头有根刺，会把你逼疯。”

另一方面，佛教教徒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是心灵引起了这些“刺”。它可以引导我们穿越各种各样的绕路。心灵可以成为我们最坏的敌人。考虑一下尼欧与莫斐斯之间的拳击（或者日语里的空手道）比赛。这个场景清楚地论证了精神在武术中的全能作用。尼欧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很灵巧，但最终莫斐斯还是击败了他。为什么呢？莫斐斯告诉他“你的弱点不是你的技术”。尼欧的弱点，他的敌人，并不在于他在主架构中的力量。莫斐斯向尼欧发起了挑战，“你相信我比你更强大更快与在这个地方我的肌肉没有任何关系吗？你认为你现在正在呼吸的是空气吗？”很显

[1] 《黑客帝国》中的人物，向尼欧购买非法软盘的人。——译者注

然是尼欧的精神击败了尼欧自己。

这都是关于解放心灵的问题。解放心灵意味着不允许精神“停留在”任何地方。著名的禅宗和尚沓庵宗彭(Takuan Soho)(1573—1645)称不自由的精神就是“受阻碍的心灵”。沓庵宗彭教导了日本两个最有名的剑客,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和柳生宗矩(Yagyu Munenori)。在他的“不动智神妙录”中(*Fudochishinmyoroku*),他告诫柳生宗矩说,精神上的迟疑将会导致灾难:

当你最初注意到正在向你袭来的剑的时候,如果你考虑照原样迎接那把剑,就在那种形式下,你的精神就会停止在那把剑上。你自己的动作就会无法完成,你就会被自己的敌人所打败。这就是停止的含义。^[1]

当心灵是在思考而不是知晓,是在努力而不是在释放的时候,它就会“停止”。莫斐斯因而刺激尼欧“停止试图袭击我,来袭击我吧”。当精神远离身体的时候它就会停止。只要精神停止了,它就不是与身体在一起的那个精神了。在武术中,解放心灵意味着跨越自身与对手间的距离。因为不存在对手,就像不存在汤匙一样。

在这方面,尼欧与祭司的会面表明了尼欧无力解放自己的心灵。尽管在他的训练中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精神训练的那些技术他做得很完美,他仍然对自己的真实本质持有怀疑和恐惧。记住,事实上祭司从来都没有明白的说尼欧不是救世主。是尼欧自己这样说的。对尼欧迟疑的精神而言,祭司就充当了镜子的角色。

解放心灵意味着拥有一个不受拘束的头脑,一个不是“僵化的”头脑。因而解放心灵也意味着获得一种“没有心灵”的状态,就是禅宗佛教所提到的无意(*mushin*)。这种没有精神也就是没有反映。这是这把剑的另一边。佛陀力劝我们要反映,但也教育我们要从反映中解放我们自己。这种没有反映最终解放了心灵。莫斐斯经常提醒尼欧他需要“解放心灵”。

[1] Takuan Soho, *The Unfettered Mind: Writings of the Zen Master to the Sword Master*, 由 William Scott Wilson 翻译(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6), p. 19.

尼欧的生命以及在母体内的所有人的生命已经成为一个“心灵的牢笼”。当我们突破理性和反映的屏障的时候，当我们辨别出理性的界限，并且意识到所有的理性和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撞到一堵砖墙的时候，解放心灵就会发生。这就是真正的“必然性的声音”。

当尼欧体验了没有精神，或者是没有反映之后，反映的屏障就被打碎了。当尼欧被电脑人史密斯击中心脏并“死掉”的时候，崔妮蒂立即放开了她的担心并且显露了她对他的爱。这使得尼欧获得了重生。她放开了自己的担心，她的反映的一个产物，这是使得他能够也放开他先前的疑惑并且重新醒过来的一种活力，因为现在他真的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这个场景是佛教缘起中一个强有力的例子，一种尤其是与挽回，实际上是挽救爱的力量共存的依存性。崔妮蒂对她自己的信任影响了尼欧对他自己的信任。而且，他们的信任就是放开受到反映阻碍的与他们的精神同时存在的担心和怀疑。只有通过释放心灵，我们才能够解放心灵。只有我们解放了心灵我们才能够解放我们自己。在佛教镜子的隐喻范围内，心就是最后的母体。当我们开始依附于幻象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确信我们看到和反映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心灵就奴役着我们。

《黑客帝国》强调镜子的这两个方面——反映和不反映——通过其中的许多佛教的暗示：我们知道的世界是幻觉，一直强调精神和解放心灵的作用，梦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区别，直接经历作为精神的俘虏，需要经常保持警惕和训练。

的确，尼欧与莫斐斯的第一次见面担当了一个交响乐的序曲，因为它触及所有影片中的主要的主题和动作，尤其是当莫斐斯揭示了人类的状况和困境的时候——世界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心灵的牢笼”。要注意的是，莫斐斯陈述的是“对于心灵而言是一个牢笼”，而不是“心灵本身是一个牢笼”。这很显然是希望的一个标志。如果尼欧的生命是一个心灵的牢笼，那么解放似乎就较少具有可能性。但是，他的生命已经变成一个心灵的牢笼。这意味着从牢笼中获得解放是可能的。可能正好是通过精神，解放心灵。

这使我们想起了佛教中四个高尚的真理，即佛教四谛，特别是经常有意轻描淡写的第三个真理。第一个真理由苦组成，即苦谛，也就是所有的

生命都充满了苦难。第二个真理是集谛,也就是引起痛苦的原因和根据,最后的苦难来自于贪恋(*tanha*),意思是“渴求的”和执着的。主要是精神上在渴求。这种渴求通过各种不同的附加形式被表达出来,尤其是对永恒和自我的附加。第三个真理即灭谛,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从苦难中解放自己。这种希望的信息在逻辑上也讲得通。既然我们苦难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内部,来自于精神,那么挽救的源泉也来自于我们自身。莫斐斯所暗示的正好是这第三个真理。第四个真理即道谛,也就是存在着将会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艰难的,苛求的道路,这种道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佛教上的八正道^[1]。最终,沿着八正道获得解放的秘密就在于解放自己的心灵。

《黑客帝国》是一部佛教影片吗

《黑客帝国》里有多少关于佛教的东西?不考虑它关于佛教的洞察,在影片中至少有四个因素看起来是与佛教的教义不相适宜的。首先,有一个全面的二元论,善与恶相对,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的特征出现在影片中。在电脑人训练程序里,莫斐斯挑选出系统作为“敌人”,但是他也把那些作为系统的一部分的人包含在敌人里面,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出于选择。这种二元论显然违反了最高的佛教美德怜悯(*karuna*)和慈爱(*metta*)。这些美德适用于所有的有情感的生命,并且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方式不加歧视的对待朋友和敌人,这的确是在佛教的道德中最困难的一个挑战。

其次,过多的暴力场面似乎与佛教关于非暴力的,或曰不杀生(*ahimsa*)的教义相抵触。的确,对于尼欧要求“枪,许多的枪”,导致了当尼欧和崔妮蒂两个人都进入大楼里去救莫斐斯时对安全警卫的全部屠

[1] 佛教用语,意思是通向彼岸世界的八种正确道路和修行方法,包括正见,指要对佛教所说的“真理”具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正思维,指对“四谛”等佛教教义进行正确的认识思维;正语,指不讲一切违背佛教教义教理的话语;正业,指一切行动要符合佛教教义的要求,以保持清净的身业;正命,指过符合佛教教义教规的生活;正精进,指精勤不懈的按照佛教的要求进行修行;正念,指正确的思维纪念,铭记佛教教理教义;正定,指按佛教的要求修习,精神集中,使心专于一境,体悟佛教的“真理”。

杀，影片赞扬了暴力。所有这些无疑证明了影片的商业目的以吸引我们的文化观众。在照这样的方式出卖的时候，影片与佛教的某些基本原则相抵触。

依据佛教，一个菩提萨埵^[1] (*bodhisattva*) 是已经顿悟并觉醒了的人，出于怜悯而选择引导其他人。菩萨挽救所有生命的誓约，这种根除苦难的许诺，在本质上是关于佛教道德的一切的。7世纪的佛教徒寂天 (*Shantideva*) 形容菩萨是这样一个人，“不会因为人类腐化的一代而放下他的启迪教化武器，也不会因为他们恶劣的怨言而在他们拯救世界的决心上有所动摇。”^[2]

于是，再一次地，一个人可以把这些暴力场面看作是超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场面更多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象征着在佛教上被称为三大毒害，即错觉、贪婪和仇恨的魔鬼从我们头脑中的毁灭。一个著名的菩萨是文殊菩萨 (*Manjusri*)，他被描述成手持一把利剑以对付这些毒害们。

第三，影片中的语言有时候非常粗鲁。这当然也违反了佛教教义中的“正语”^[3]。“正语”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以便从苦难中解放我们自己的八圣道之一。成为潜在的救世主，把“手指”指向史密斯可能获得观众的好评，但是影片明显的企图诉诸粗俗的社会习俗的做法弱化了它更加严肃的信息。

一个人可以通过指出佛教固有的适应性而对这些缺陷不予重视。佛教就像是一条变色龙，因为它倾向于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佛教与最初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有些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倾向于限定佛教的具体文化形式，比如日本佛教，甚至是美国的佛教。假设暴力是美国文化的魅力，那么一个人就可以称影片中对暴力的运用表现的是美国的佛教形式。

[1]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萨埵”是有情之意，“有情”简单地说即是众生；“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众生，简称菩萨。——译者注

[2] 来源于 *Shantideva's Compendium of Doctrine (Sikṣasamuccaya)*, in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Buddhist Tra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 84, italics mine.

[3] 即前面提到的八正道之一，意思是不讲一切违背佛教教义教理的话语。——译者注

我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不管各种不同的文化是如何采纳了佛教教义的,这些教义是佛教的只是从他们对佛教的教义核心保持忠诚这个程度上而言的。而且佛教的核心也会,并且总是会,痛恨暴力和不必要的苦难的故意犯罪。相反,佛教的驱动力存在于尽每一次努力来减轻苦难。

最后,影片可以理解地传达了这样的印象,即人类是有些特殊的,是与人类所创造的人工智能,特别是“有知觉的程序”当然不同的。得知我们与机器不同让我们感到慰藉。然而,我们与所有其他有知觉的生命都不同吗?佛教徒教育我们说,所有的有知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所有的有知觉的生命都具有佛的本性。影片中对电脑人是“有知觉的程序”的聪明描述引起了令人感兴趣的“生命”和“程序”之间的区别。但是,佛教的镜子包含了所有的有知觉的生物,而不只是人类。

《黑客帝国》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影片,它也不打算成为这样的一部影片。不考虑上面提到的这些不适宜之处,《黑客帝国》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来自于不同的东西方传统的哲学和宗教因素的综合运用。以一种专横的方式,在同时代的计算机技术的能力之内,它把隐喻和对基督教、柏拉图哲学以及佛教的多重指涉混合在一起,在科幻小说类型上已经可以说是一部旷世杰作了。它的天赋存在于丰富地把敏锐的剧本和极好的想象组合在一起,以这样一种方式创造性地传达了深奥的,尽管时常是难以渗透的佛教的解放信息。在这样做过程中,《黑客帝国》唤醒了观众并且挑战我们要去反映(和不反映)我们习惯于居住的那个地方——在我们的头脑里。它促使我们下一次照镜子的时候会问: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人是谁或者是什么呢?

10 《黑客帝国》里的宗教 和多元论问题

格雷戈里·巴沙姆(Gregory Bassham)

尽管在《黑客帝国》里有着大量关于基督教的主题,但它所反映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宗教上的多元论,而不只是基督教。通过说“宗教上的多元论”,我的大概意思是这种观点,即许多或者是所有宗教都是同样正当和真实的。在这一章里,我将要探究《黑客帝国》里的一些主要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主题并且要验证它所反映的别具一格的宗教上的多元论一致性和善辩。

《黑客帝国》里的基督教主题

《黑客帝国》选择在一个复活节的周末上映绝非偶然。影片中有许多基督教的主旨,有些是明显的,其他一些则是很微妙的。最清晰的是允诺的信差的主题。在《新约》福音书里,耶稣是被允诺的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是“注定要出现的”一个人(Luke 7:19)。在影片中,尼奥是“救世主”,是弥赛亚式的信差,他的出现是祭司早就预言过的。“尼奥(neo)”是“救世主(one)”的一个换音词^[1]。而且,在希腊语中 *neo* 的意思

[1] 换音词,就是指由变换字母的顺序而构成的词(如由 north 经过变化字母顺序成为 thorn),此句子的英文原文是“Neo”is an anagram for “one”,在英文中很容易就可以(转下页)

是*“新的”，表示复活的尼奥所享有的新生命，大概还表示他将会给其他人带来希望。

“托马斯·安德森”这个名字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名和姓都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的暗示。像对耶稣将会从死者(John 20:24-29)中出现的理由表示怀疑的那个门徒“怀疑的托马斯”一样，尼奥由于压抑自己对于母体的不真实性，对于自己的能力，对于他作为救世主身份的怀疑而受到了折磨。“安德森”(瑞典语是“安德鲁的儿子”的意思)得自希腊语词根 *andr-*，意思是“人类。”因而，根据语源学，“安德森”的意思就是“人类的儿子”，这是耶稣经常用于称呼自己的一个名称。在影片的早期，尼奥被称为“耶稣基督”。当尼奥把非法软盘给他的时候，乔伊评论说，“哈利路亚，伙计，你是我的救星，我个人的耶稣基督”。

尼奥的道路中有耶稣故事的许多因素，包括童贞女之子中的许多要素。在他被从母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个场面中，尼奥醒过来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像子宫一样的大桶里，被拔去了像脐带一样的电缆插头，并且沿着一个可能象征着出生管道的管子滑行。此外，既然人类是“成长，而不是出生在”被机器支配的真实世界里，尼奥觉醒和出现在那个世界里照字面意思理解几乎就是一个“童贞女之子”。耶稣就是在约旦河被施洗约翰洗礼的。类似地，尼奥是在人类的电池垃圾桶里被莫斐斯和尼布加尼撒船(*Nebuchadnezzar*)上的工作人员施以“洗礼的”。就像耶稣受到魔鬼的引诱在沙漠里呆了四十天一样(Luke 4:1-13)，尼奥也受到电脑人的引诱去背叛莫斐斯。在《新约》福音书里，耶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对许多生命的救赎”(Mark 10:45)。而在影片中，尼奥有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挽救莫斐斯的生命。

像耶稣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了一样，尼奥在 303 房间里通过崔妮蒂的吻也恢复了生命。尼奥是真的死掉了而不仅仅是复活这种观点不但受到基督教类似的支持，还受到影片中很多内在证据的支持，包括(1)祭司的预言，尼奥和莫斐斯当中有一个人会死掉；(2)祭司的陈述，尼奥似乎在

*(接上页)看出单词“neo”是由单词“one”变化构成的，但是翻译成汉语之后，由于“neo”是人名，翻译成“尼奥”，而“one”被翻译成“救世主”，所以在汉语里，换音词似乎失去了它顾名思义的优势了。——译者注

等待什么,“也许是投胎转世吧”。在与《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黑客帝国》的编剧兼导演拉里·沃卓斯基(Larry Wachowski)谈起了尼奥的“重生”也是意义重大的。^[1]此外,就像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变得荣耀的”身体,不能遭受通常那种身体上的限制一样(Luke 24:31, John 20:19, John 20:26),在恢复了生命之后,尼奥也具有了新的超凡力。

在耶稣死亡和复活前的一个显现节^[2],耶稣被他的三个门徒美化了,他的脸和衣服都发出一种耀眼的白色(Matthew 17:2; Luke:9:29)。类似的,在摧毁了电脑人史密斯之后,尼奥全身都散发着光彩。并且就像耶稣(相关的正文在一本文学读物上)在俗世的结尾是他的肉身飞升到了天堂一样(Luke 24:51; Acts 1:9),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也是尼奥飞向了天空。

《黑客帝国》里的那些人物的名字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连接。在传统的基督教理论中,耶稣,上帝之子的化身,复活了,不只是通过上帝圣父,而且还通过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3]在影片中,尼奥是通过崔妮蒂的忠诚和爱而获得了生命,她是反抗者中他最亲密的同伴。在背叛了反抗者的险恶而狡猾的人物塞佛和背叛了基督的门徒犹大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与撒旦也有清楚连接:塞佛的相貌看起来好像是对撒旦相貌的传统描述。塞佛的发音听起来有点像撒旦(*Lucifer*),电影的浅黄色会让人记起在影片《天使心》(*Angel Heart*)中路易斯·塞佛、罗伯特·德·尼洛的邪恶特征。^[4]在影片中,锡安是最后的一个人类城市,是人类的最后希望。在基督教的《旧约全书》中,锡安是一个诗歌般的、虔诚的、充满感情的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著名古城)的称呼,而且在基督教的文学中,它经常被用来指称作为信徒们的精神家园的天堂。^[5]

在影片《黑客帝国》中,反抗母体的人们所居住的气垫船被称为尼布

[1] Richard Corliss and Jeffrey Ressler, "Popular Metaphysics," *Time* (April 19th, 1999), p. 76.

[2] 显现节,也称主显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向世人显现的节日;天主教、新教在1月6日,东正教在1月18日或19日。——译者注。

[3] 比如,参见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Mahwah: Paulist Press, 1994), p. 258.

[4] TriStar Pictures, 1987.

[5] “锡安”,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0, vol. 12, p. 922.

加尼撒号。作为影片的编剧兼导演的拉里·沃卓斯基在一次会见中谈到,在圣经的《但以理书》(*Daniel*)中尼布加尼撒是巴比伦的一个国王,他“做了一个他记不清楚的梦,但是他一直在寻找答案。”^[1]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对于模糊但却持久的关于母体的问题,尼欧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事实,即尼布加尼撒号气垫船上的一处金属板上写着,“Mark III No. 11/Nebuchadnezzar/Made in USA/Year 2069,”很可能是对 Mark 3:11 的影射:“无论何时不洁的灵魂看到他的时候,他们都会跪拜在他面前并大声呼喊,‘你是上帝之子’。”

《黑客帝国》里的非基督教主题

尽管《黑客帝国》里包含许多基督教的主旨,但它绝不是一部“基督教的影片”。相反的,它是一幅由多种主题融合的织锦,这些主题来源于西藏和禅宗佛教,诺斯替教(初期基督教的一派,尊重某种灵的直觉,含有西亚、东亚哲学,曾被视为邪教),经典的和当代的西方认识论,通俗量子力学,易雍心理学,后现代主义,科幻小说,香港武打片以及其他来源。

弥赛亚的一种果断的非基督教的观念是影片的特色。按照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耶稣是一个清白的神人,是来拯救世界的,不是通过暴力或者是权力,而是通过他做出死亡的牺牲和复活来拯救世界的。相比之下,尼欧只是一个人类,他绝不是清白的,他使用暴力来达到他的目标(包括可论证地对无辜的人的不必要的杀戮),而且尽管他可能带来身体上的奴役和精神上的幻想的解放,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拯救。

还有一种人类困境的非基督教的观念。按照经典的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人类问题是由于人类的罪孽而导致的与上帝的疏远。在影片中,最根本的人类问题并不是罪恶,而是无知和幻想,对人类困境的理解与东方的神秘主义或者是诺斯替教^[2]更加一致而不是与基督教更加

[1] Corliss and Ressler, “Popular Metaphysics”, p. 76. 关于尼布加尼撒国王的梦的故事在丹尼尔的 2:1—49 里可以找到。

[2] The Wachowskis 已经承认了认识论在影片中的影响。参见“Matrix Virtual Theatre: Wachowski Brothers Transcript (Nov. 6, 1999)”。可参考网址 www.warnervideo.com/matrixevents/wachowski.html。

一致。

正如导演拉里·沃卓斯基在一次访谈中所承认的那样，《黑客帝国》里故意使用的一个主题是“寻找佛陀的化身”。〔1〕尼欧被反抗者们认为是像摩斯一样把他们从母体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的化身。〔2〕尽管重生被一些早期的教堂神父所认可并且被今天的一些自由主义的神学者们严肃的接受，〔3〕它还是很难与基督教的圣经〔4〕和解并且受到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教派的持续反对。

《黑客帝国》里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就是“空虚”或者像我们平常所经历的那样的经验本体的幻觉。在祭司的等候室里，这个主题被像佛教弟子一样的那个小孩所说的“汤匙不存在”这样的像禅宗一样的话语中十分清楚的表达出来：“不要试着去弯曲汤匙。那是不可能的。相反，你要意识到真相。汤匙不存在。那么你就会明白弯曲的不是汤匙，只是你自己。”经验本体的幻觉是印度教、佛教以及其他东方精神传统的一个基本原则。相比之下，在基督教中，现象本体是一种幻觉这个观念受到了普遍反对，因为它与一个全能的、诚实的上帝的存在是矛盾的。

许多东方的宗教认为时间是循环的、相对的并且最终都是不牢靠的。〔5〕影片中也反映了稍微有些类似的观点。在《黑客帝国》里时间是相对的，有延展性的：它可以加速，也可以慢下来，甚至可以停止；现世的“现在”总是处在（大概周期性地被重新调整）20世纪末；时间是循环的并且在似曾经历的错觉(*déjà vu*)体验中重复着自身；而且未来的事件可以通过精神上有天赋的人来预知。这样一种关于时间的观念更加符合东方的神秘主义和新世纪伪科学，而不是更加符合基督教。从一个基督教的角度而言，时间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它是前进的，而不是循环的；预

〔1〕 Corliss and Ressler, “Popular Metaphysics”, p. 76.

〔2〕 在一个场景中，祭司对尼欧进行了身体上的检查，大概是要寻找能够证明他就是救世主的证据。在西藏佛教中也使用类似的程序来确认转世活佛的身份。

〔3〕 例如，参见 John Hick, *Death and Eternal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76), pp. 296 - 396.

〔4〕 Hebrews 9:27: “It is appointed for men to die once.” 也参见 Luke 16: 25 - 26; Matthew 25:46.

〔5〕 Fritjof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第二次修订版 (Boston: Shambala, 1983), pp. 161 - 187.

言式的深谋远虑是上帝所具有的一项罕见的、不可思议的才能。而不是像祖母般的“祭司们”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上的能力。

在一次网上聊天中,有人问影片的编剧兼导演拉里·沃卓斯基和安迪·沃卓斯基兄弟下面的这个问题:“宗教信仰在影片中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对自己的信心——或者对其他事情的信心的作用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嗯……那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相信自己,这么说怎么样呢?”^[1]相比之下,从一个基督教的角度而言,信心和信任首先是对上帝的,而不是对自己的。

最后,也许是最明显的是,在《黑客帝国》里存在着一种暴力和亵渎的标准是明显与基督教的价值观相违背的。

简而言之,《黑客帝国》是多种主题的一个联合体,这些主题不但是来自于基督教,而且还来自于许多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在本章剩下的部分里,我想要探究的正是这种多元的或者是综合的宗教或精神视角。

宗教多元论与《黑客帝国》

用这种不同的宗教和精神传统的拼凑物,《黑客帝国》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许多观众都会认为有吸引力的宗教多元论。我们不太确定,是否沃卓斯基兄弟意欲认可他们在影片中所提出的这些不同的宗教和哲学观点。更有可能,他们只是想要制作一部以某些有趣而相关的神话为特征的强大的智力动作片。虽然如此,既然影片中所描述的这种多元论是既有魅力又吸引人的,那么就值得我们去考虑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否是正确的。

民意测验表明,关于宗教的多元观点在今天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比如,在近来的一次调查中,62%的美国成年人同意这种陈述,“你信奉什么样的宗教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信仰都会告诉我们类似的关于人生的

[1] “Matrix Virtual Theatre: Wachowski Brothers Transcript (Nov. 6, 1999).”可参见网址 www.warnervideo.com/matrixevents/wachowski.html。

教训”。〔1〕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阐明一种既自洽又自圆其说的宗教多元论的版本是十分困难的。

到底什么是宗教多元论呢？我以前说过，宗教多元论可以概略的被定义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许多或者是所有宗教都是同样正当和真实的。然而，这种定义既不精确，严格来讲也不正确。实际上，我建议宗教多元论最好是作为一种相关理论的谱系来理解，而不是作为一种单一的理论来理解。四种主要的宗教多元论区别如下：

- 极端多元论：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同样正当和真实的；〔2〕
- 基本教义多元论：认为所有主要宗教的本质教义都是成立的；
- 自助多元论：认为宗教真理存在于一种来源于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混合体；
- 先验多元论：认为所有主要的宗教传统都是与同一个最终的神圣现实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现实是在这些各种各样的传统范围内被经历和具有不同概念的。

让我们简要了解一下这几种不同的宗教多元论。

极端多元论——认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成立的一种主张——是明显不一致的，我们可以一笔带过。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估计，在过去的 10,000 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创立了不下 100,000 种宗教。〔3〕这些宗教中的许多宗教所坚持的观点与其他宗教所坚持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互相矛盾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抑或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个人，抑或不是？上帝是创世者抑或不是？耶稣是抑或不是神圣的上帝之子？古兰经是否是关于上帝的权威性的揭示？灵魂是

〔1〕 George Barna, *Absolute Confusion* (Ventura: Regal, 1994), p. 207. 类似的，在 2000 年 BBC 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百分之三十二的英国成年人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同样正当的”，在英国，只有百分之九的成年人确信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是通向上帝的最好之路”。参见“Soul of Britain — with Michael Buerk”中所引用的 BBC 的民意测验，参见网址 <http://www.facingthechallenge.org/soul/htm>。

〔2〕 我借用了 Keith Ward 的术语“extreme pluralism”，参见他的“Truth and the Diversity of Religions”，*Religious Studies* 26 (March 1990)；reprinted in Philip Quinn and Kevin Meeker, eds., *The Philosophical Challenge of Religions D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0。

〔3〕 被引用在 Michael Shermer, *How We Believe: The Search for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 (New York: Freeman, 2000), p. 140。

不是可以重生的？上帝是否允许一夫多妻？这些主张中的每一种都是既受到了某些宗教的捍卫也受到了其他宗教的驳斥。基本的逻辑学告诉我们，两种互相矛盾的主张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极端多元论是错误的。

基本教义多元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正确的，但是，所有主要宗教的本质教义都是正确的。这里的观点是，即使重大的宗教在相关细节上可能不同，在所有真正重大的事项上他们是一致的，比如存在着一个上帝，宗教虔诚和道德生活的重要性，存在着来生，善行会得到回报而不好的行为会受到惩罚等等。正是基本教义多元论所主张的这些本质的或者是核心的教义是同样正当和真实的。

这种宗教多元论观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在宗教信仰上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的”任何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义上，重大的宗教在基本原则方面确实是明显不同的。比如，穆斯林们相信一个个人的上帝的唯一和统一，并且会强烈地坚持（的确是正确地）这个教义对伊斯兰教而言是“根本的”。然而，这个教义与小乘佛教的信仰核心，即不存在一个个人的上帝（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和柬埔寨）是互相矛盾的，与基督教的核心即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也是矛盾的。否认一个个人的上帝的存在可能是《黑客帝国》里的宗教的一部分，因为它重点强调了精神而没有提及神圣。

宗教多元论的另一种流行形式是自助多元论，认为宗教真理可以通过从许多不同的宗教传统中进行挑选和选定而获得。《黑客帝国》里的宗教就是自助多元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称自助多元论的这种特殊的分支为“尼欧多元论”。它是新世纪探索者的宗教，对渴望精神而对自己从小被灌输的宗教不感兴趣的那些人很有吸引力。不考虑它对探索者的吸引以及它很好地增加了《黑客帝国》的魅力这个事实，自助多元论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难点，因而尼欧多元论也同样存在着这两大难点。

首先，当挑选和选定自助风格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很难获得一种信仰混合体。许多的宗教教义在他们得以发展的本国的宗教结构之外很少被移植。比如，重生十分适合印度教，适合于印度教里精神和肉体的二元

论,一个实质的精神自我,以及世俗世界的不朽。它不太符合佛教的观点,不太符合佛教中对于一个永恒的精神自我这种观念的反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重生很少与基督教连接在一起,与基督教关于神的最后审判日的清晰圣经教义及其把人类作为一种精神物理学上的统一体的理解是不太符合的。^[1]

其次,即使是自助多元论想方设法地想要获得一种信仰一致的混合体,那么为什么他或她(或其他任何人)认为那些信仰是正确的? 这些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但是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说出根本困难在那里。大多数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承认,假如有的话,那么也是为数不多的具体的宗教教义可以被合理地认为是正确的,而毋需通过最终求助于神圣的揭示。但是,由于《黑客帝国》里这种大概是无神论的宗教,我们很难明白任何一种这样的求助是如何成功的。甚至是有神论的自助多元论也存在问题。看起来非常不可能,上帝会把他的暗示散布在各种不同的重大的宗教中——揭示古代犹太人的关键的真相,揭示印度的真相,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而不仅仅是渴望的思想或者不可信的对个人的宗教经历的求助——使得自助多元论者认为他的或她的个人宗教信仰的混合是真理,而世界上剩下的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呢?

一般而言,如果自助多元论,特别是尼欧多元论不起作用,也许还有另一种替代物。近来,约翰·希克(John Hick)开始捍卫先验多元论,宗教多元论的一种诡辩的、准康德哲学形式。^[2] 希克欣然承认,重大的宗教传统对于真相的主张是互相矛盾的,因而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然而,他争论说,在某种重大的意义上,所有重大的宗教是同样正当和成立的。他的解决办法开始于广泛的康德哲学的区别,在自然存在的事物和我们所认为的或所经历的事物之间的区别。按照希克的观点,上帝(最高实在,真实)像它自身存在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先验的、超然的、不能说的、避讳的

[1] 关于人类本质的圣经描写,参见 Joel B. Green, “‘Bodies — That Is, Human Lives’: A Re-Examin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the Bible”, in Warren S. Brown, Nancy Murphy, and H. Newton Malony, ed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Soul? Scientific and Theological Portraits of Human Natur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8), pp. 149–173.

[2] John Hick,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Human Responses to the Transcend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实在,超越了人类所有的观念。通过不同的宗教,经由不同的宗教和文化“镜头”我们可以察觉到真实的存在,比如,一些体验过它的人认为它是一个人(上帝,真主阿拉,湿婆^[1],毗瑟拏^[2]),一些人则认为是非个人的绝对(婆罗门^[3],道家学说中的道,法身,空性)。此外,希克还争论说,通过他们的道德和精神成果来判断,在所有宗教的共同目标上,所有这些重大的宗教看起来大概都是同样正当的,即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到以非自我的真实为中心。因而,希克得出结论说,所有主要宗教都是同样正当和真实的是从两个重要的意义上而言的:(1)他们都是与同样的最高实在相联系的(尽管他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或感悟这种实在),而且(2)他们都是同样正当的拯救道路。

像尼欧多元论一样,希克的多元论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首先,它是关于不确定的一致的。按照希克的观点,我们的观念没有一个是适合于自身存在着的真实的。^[4]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人或者多个人,是人或是物,是实体或是程序,好的或恶的,有目的的或没有目的的”。^[5]但是,说起一种所谓的宗教实体,它既不是一个人又是一个人;它不是宇宙的支持者,又是宇宙的支持者;它不是可信的宗教经历的来源,又是可信的宗教的经验的来源,这有什么意义呢?照字面意思,这样的一种观点是完全莫名其妙而又语无伦次的。其次,即使是希克完全不可能知道真实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它与宗教有任何联系呢?^[6]如果我们对到底真实在本质上像什么具有最模糊的想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认为它与罪恶、宽恕、变化、启发的经历,或与宗教是有联系的,而不是比如与战争或种族偏见,其他现象有任何的联系呢?

[1] 印度教主神之一,毁灭之神。——译者注

[2] 印度教主神之一,守护之神。——译者注

[3] 印度四大阶级最高的一分子。——译者注

[4] 更精确地讲,希克主张只有 *purely formal* 和 *negative* 的特性才适用于真实,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p. 239.

[5] Hick,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p. 246.

[6] Alvin Plantinga,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6. 我对希克的批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部著作,也来自于 Plantinga 的“Pluralism: A Defence of Religious Exclusivism”, in Thomas D. Senior, ed, *The Rationality of Belief and the Plurality of Fai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reprinted in Quinn and Meeker, eds., *The Philosophical Challeng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pp. 72-92.

最后,希克关于宗教多元论的观点在两个方面是自相矛盾的。要明白这一点,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典型的新教会的基督徒;你读了希克的书,发现它是完全令人信服的。像希克一样,你现在也认为实质上基督徒传统上所相信的每一件事情,上帝,耶稣基督,以及人类拯救只不过是“虚构的真实”,也就是说,照字面意思是错误的,但是可以导向获得对真实的一种正确的关系上。你会放弃成为一名基督徒,而成为其他的人吗?希克说,决不会,因为像其他重大的宗教所提供的那样,基督教就是一条通向拯救的有效的可行之路,一个人仍然可以获得所有的基督教的精神成果,而同时又意识到实质上所有的它的传统教学在字面上都是错误的。

这种解决办法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性的,一个是实践性的。首先,从概念上而言,既是一个“基督徒”而同时又不接受实际上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区别开来的所有关于上帝和耶稣基督的中心教义这可能吗?无论我们如何扩大的定义“基督教”的范围,希克的定义看起来是过于广泛的。其次,正如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所指出的那样,^[1]不具有一种思想矛盾或者错误的信仰,希克的多元论观点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受到启发的希克式的多元论者,你认为你的传统信仰是与任何其他传统信仰一样的,并且的确,在字面上是错误的。然而同时,希克说由于他们所产生的“精神成果”你应该继续持有那些信仰。但是,当一个人意识到某种信仰和与其直接矛盾的信仰同样正确的时候,他又如何能够继续“持有”这种信仰?一个人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宗教的道德和精神成果,除非他认为那个宗教所教导的东西真的是正确的?

对宗教排外主义的多元论异议

采用一种宗教信仰的抽象拼贴画的尼欧多元论者们比那些依附于单一的传统上的宗教的人们情况更坏吗?我们没能找到一种连贯的/

[1] Plantinga,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pp. 61 - 62.

或是而非的宗教多元论的版本这个事实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多元论者们寻求替代的理论：宗教排外主义。宗教排外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种宗教大部分或者完全是正确的，并且所有其他宗教都是严重错误的。^{〔1〕} 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针对宗教排外主义的三种普通的多元论的反对。^{〔2〕}

像希克一样，许多的多元论者争论说，在把个体从以自我为中心变化为以慈爱的和富有同情心的本体为中心方面，所有重大的宗教看起来大概都是同样正当的。^{〔3〕} 他们主张，这是反对那种主张关于本体的拯救和可信的经历只能在一种宗教传统中找到的排外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证据。

这种反对停留在关于宗教排外主义的一种普遍的混淆上。有排外主义者——称他们为强硬的排外主义者——主张拯救/解放和对真实的诚实的经历只能在一种单一的宗教中找到。但是也有温和的排外主义者（有时被称为包含主义者）反对这两种主张。像这样的主张只不过是，具有排外主义的一种宗教是大部分或全部是正确的，所有其他宗教都是严重错误的。承认可信的经历和拯救的改革都发生在那种传统之外是充分符合这一点的。^{〔4〕} 实际上，这是今天排外主义最普通的形式。

对排外主义的另一种普遍的多元论反对认为，主张一个人自己的宗教传统是正确的而所有其他的都是严重错误的这种观点是自大的，以自

〔1〕 这种定义的根据来自于 Philip Quinn and Kevin Meeker, "Introduction", in Quinn and Meeker, eds., *The Philosophical Challeng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p. 3.

〔2〕 接下来的讨论自由地利用了 Timothy O'Connor, "Religious Pluralism", in Michael J. Murray, ed., *Reason for the Hope Withi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pp. 167 - 175.

〔3〕 比如，参见 John Hick,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Salvation", *Faith and Philosophy* 5 (October 1988); reprinted in Quinn and Meeker, eds., *The Philosophical Challeng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pp. 56 - 58.

〔4〕 当然，这就假定了排外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那种宗教并没有被作为它的本质教义之一，即拯救/关于神圣的可信的经历只有在那种宗教内部才是可能的。一些保守的基督徒会主张基督教确实清楚地包含了这种教义（经常引用 Acts 4:12：“在别处不存在拯救，因为在天堂之下，没有其他的名字给予人类，通过这种名义我们一定会被拯救”），但这种观点已经不再普及。

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压迫的和帝国主义的。^[1] 一个这样说的人,也就是正在声称,与具有其他信仰的人相比,他在认识上是有特权的,即他知道某种具有重大价值的事情,而它们却被陷入了无知和错误中。据称,这样说也就是要展示一种智力上的自大或者是更坏的事情。

正如蒂莫西·奥康纳(Timothy O'Connor)所指出的那样,隐藏在这种反对意见背后的中心观点看起来是像下面的一般原则的某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大原则”:

对于你的任何一个信仰,一旦你开始意识到其他人并不认同它,意识到你没有可能让不同意你的观点的所有理性的好意的人们信服论点。继续持有那种信仰的话,你就是自大的,并且你应该放弃它。^[2]

尽管一种令人钦佩的宽容精神激发着它,这种反对还是有两点致命的缺陷。首先,它规模太大而且是过于非难的。在这种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持有那种我们知道我们无法说服所有或者是大多数有理性的人们去接受的信仰。以政治为例。我认为下一任总统应当是一个民主党人,而你不同意。我意识到我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让你信服;从多元论者的自大原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应该放弃它。但是我该如何准确地“放弃它”呢?这里只有两种真实的选择(不包括实在太激烈的选择,比如向我自己开枪)。我可以相信对我最初的信仰的否定,也就是说,相信下一任总统不应该是一个民主党人,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只是推迟做出我的判断。但是要注意的是,无论我做出哪一种选择,我都和以前的处境相同。理性的人们对这两种选择都不赞同,而且我知道我无法说服他们让他们去相信别的方式。因此,难以置信地,在多元论者的自大原则下面

[1]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的代表性陈述,参见 Joseph Runzo, “God, Commitment, and Other Faiths: Pluralism vs. Relativism”, *Faith and Philosophy* 5 (1988), p. 348; Wilfred Cantwell Smith, *Religious Divers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pp. 13 - 14; John Hick, *God has Many Nam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2), p. 90.

[2] O'Connor, “Religious Pluralism”, p. 171 (slightly adapted).

的逻辑暗示着每一个人在智力上都是自大的。^{〔1〕}

其次,正如阿尔文·普兰丁格所指出的那样,“自大的负荷是一种哲学上的沥青娃娃^{〔2〕};足以用他们来反对排外主义者,你可能发现他们很快就粘上了你自己。”^{〔3〕}接受自大原则的任何一个人,一定要意识到有许多理性的、好意的人们不同意它。因而,多元论者们被他们自己的爆竹升起,多元论者们的智力自大的负荷是自我矛盾的。

最后,对排外主义最普遍的多元论反对认为,主张一种宗教实质上是正确的而其他所有宗教都是错误的是武断的。基本的论点可以简要地陈述如下:没有客观基础(从圣经,理性,宗教经历,或其他方式)来主张重大宗教中的一种比其他的更加接近真相。因此,主张一种宗教是充分正确的,而其他所有宗教只要他们做出与那种宗教相矛盾的主张都是错误的,这种主张是武断的,也是不公正的。^{〔4〕}

很明显,这里关键问题是,是否所有重大的宗教在知识上是同等的。支持基督教真理的证据和支持佛教或耆那教(印度非婆罗门教的一派)的真理的证据是一样有力的真的是事实吗?不幸的是,正如阿尔文·普兰丁格所指出的那样,多元论者极少“产生一种论点来支持这种结论,即没有宗教可以比其他宗教更接近真相;它更像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假定,一种仁慈的,宽恕的决心来避免帝国主义和自我膨胀”。^{〔5〕}但是这种策略是一种深奥难懂的乞求问题。在排外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的这场辩论中的中心问题是,是否有或者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且只有一种宗教实质上或整体上是正确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主张,即认为排外主义者的主张是武断的,不公正的,多元论者需要的是辩论,而不仅仅是假定,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种宗教实质上是比其他宗教更加接近于真相的。

〔1〕 有关相似的论点,参见 Plantinga, “A Defense of Religious Pluralism,” pp. 177 - 178; O'Connor, “Religious Pluralism,” p. 171.

〔2〕 一种用沥青做成的娃娃,因为沥青具有粘性,一般是用来抓兔子用的,有时也指黑人娃娃。——译者注

〔3〕 Plantinga, “A Defense of Religious Exclusivism”, p. 177.

〔4〕 关于这种反对意见的代表性的陈述,参见 Hick,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p. 235; Hick, *God Has Many Names*, p. 90.

〔5〕 Plantinga,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pp. 62 - 63.

尼欧多元论的命运

《黑客帝国》里的宗教,尼欧多元论,作为艺术,作为当代神话创造(或神话编织)中的一种实践,是颇为合理的。但愿那就是它意欲成为的全部,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宗教或精神观点,尽管是流行的,但是很难解释得通,或者很难捍卫。^[1]

[1] 感谢 Bill Irwin 在这篇文章的早期底稿中给予的有帮助性的评论。

11 幸福和塞佛的选择：无知是福吗？

小查尔斯·L. 格里斯沃尔德
(Charles L. Griswold, JR.)

满足的人是幸福的。但是，任何新的不安一旦来临，这种幸福就会被破坏，我们就要重新开始去追求新的幸福。

——约翰·洛克(John Locke)^[1]

为数不多的问题会像“什么是幸福？”这类重大的问题一样，具有关于生存的紧迫性，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我们的生命似乎是在拼命追求幸福中度过的；如果幸福不是我们行为的唯一的最终目标，像亚里士多德所论辩的那样，那么它也当然会是最终目标之一。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被剥夺了幸福似乎就意味着被剥夺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甚至是被剥夺了活着的一个充分理由。不幸福的人生看起来简直是不值得拥有的；如果一个人要忍受这种生活的话，那么也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必需。

然而，这一主题具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关于它的每一个想得到的陈词滥调都被表达出来了；因此，剩下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论证这种或那种立场的正确性了。这里似乎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余地！

[1]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由 P. H. Nidditch 编辑整理(Oxford: Clarendon, 1990), II, xxi. 59 (p. 273)。

第二个特征是，尽管它对人类的生活而言极其重要，哲学家们对相关的事情已经是无话可说了。一个人可能会认为在柏拉图哲学的对话中它是一个理想的话题，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然而，柏拉图的哲学话题是不谈论这个问题的。当然，亚里士多德，在很少程度上他的希腊文化的派生者，的确是写过这个主题。但是亚里士多德是证明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

相比之下——这是对这个主题的第三次观察——一般而言，没有哲学家会假设在正常的生活中“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会有一个答案，他们不会对对幸福的追求，或对一种可以理解的幸福的追求看作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寻求。同时，他们认为幸福是很难“找到”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幸福是很难定义、很难获得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形；在我们的生活中，幸福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不能始终都不为人所知；然而我们却找不到它。

毫不奇怪，在大众文化——电视、小说、励志读物、自传、谈话节目，当然也包括在电影中，幸福这个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偶尔地，会出现一部与这个主题相关的特别优秀的影片。

《黑客帝国》这部影片受到赞誉是当之无愧的。它富有想象力地向我们——新千年太平盛世的居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涉及幸福的真正本质这个问题。影片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必要，影片中所提供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是合理的吗？如果不是——也许归因于它的粗略——我们该如何提供一个更好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回答呢？

《黑客帝国》和柏拉图的洞穴

“母体”是指什么呢？字典上的定义是指子宫，动物生殖系统的一个形成部分；或者，用更科学的说法，是一个模子，打印机在里面的打印，或留声机在里面的录音得以形成的地方，诸如此类。影片把这两部分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混合体；通过高科技手段抚养出来的有机人类，后代在夹层下面带着直接插在脖子后面进入大脑的金属脐带成长。

作为程序,那种脐带并不是很滋养;而且这种程序并不只是编排了某种大体的框架,按照这种框架我们就可以接近世界,而且编排了世界本身。

柏拉图的意味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得不起了《理想国》(Republic)第六章里描写的著名的洞穴明喻。按照书里的描写,我们都像是生活在地下洞穴里的囚犯,一出生就被戴上了镣铐,不能够旋转我们的身体或脑袋,因而只能专注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所投射出来的映像。这些映像是由控制我们的人制造出来的,他们在位于我们上方或后方人为故意制造的火堆前炫耀人造物品。因而产生了映像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电影放映机前面举起手或手指一样。像洞穴一样的母体是技巧和自然的混合体(比如,人为制造的火堆把二者结合在一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囚犯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是囚犯;相反地,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不知道墙壁上的图像只是幻象,他们认为它是真实的。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1]他们深深地陷入到一个虚构的、被操纵的领域,以至于他们付出一切代价坚持其所处世界里的“真相”,大概从事这种幻象表演的控制者们或幻象的制造者们有了高度的动力来捍卫这种幻象。

正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继续讲述的那样,不知何故,其中的一个囚犯获得了自由(我们并不知道是谁释放了这个囚犯),被强制拖到一个通向外面的通道。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调适过程。这里没有人造物品;自然和真相支配着一切。启发最初是令人困惑的,也是困难的;但是一旦调适过来,眼睛得到了享受,灵魂发现真正是什么在养育着它,被从母体中解放了的囚犯感到了深深的幸福,因而不愿意再回到那个黑暗的地下去了。

[1] 莫斐斯:我明白你的意思。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来这里。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知道一些事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你能感觉得到它。你的一生都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世界有些事情很不对劲。你不知道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就像心头有根刺,会把你逼疯。正是这种感觉把你带到了这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

尼欧:是母体?

莫斐斯:你想要知道母体是什么吗?母体无处不在。它就在我们身边,即使现在,它就在这个房间里。你从窗户外可以看到它,或者是你打开电视的时候,你上班时能感觉得到它,你去教堂时也能,甚至是在你纳税时。它就是虚拟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真相。

尼欧:什么真相?

莫斐斯:你是一个奴隶,尼欧。像其他每一个人一样,你一生下来就要受到束缚。

如果受到启迪的那个人被迫返回去,以唤醒他或她先前在洞穴里的那些居住者从独断的睡眠中醒过来会如何呢?苏格拉底叙述了一个暴力和死亡的场景:他们会用愤怒来回应关于外部真实且幸福的世界的这个疯狂的故事。很明显,一个人必须自己去发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幻象中,自己发现自己并不是自由的而只不过是系统的奴隶而已,自己认识到天生就存在着美好和真实的事情。获得真相是灵魂的一个转变,就像是发现一个自我——一个具有灵魂的人,而且灵魂具有一个确定的本质——就像发现什么是真实的一样。不可避免地,这是一条苦难的道路——最终——也是幸福的。毫不奇怪,《黑客帝国》和柏拉图的明喻都向我们表明了这种命题,并且也对它进行了陈述,更好地允许我们这些戏剧观众有一个机会看待镜子中的自己。

关于母体的柏拉图哲学式的想象提出了许多问题,当然包括“什么是真实?”“你如何定义‘真实?’”这些都是在《黑客帝国》里明确提出的问题(括号中所引用的问题是由莫斐斯提出来的,他是努力想要解放囚犯的人,对尼欧而言,就是会给所有人带来解放的“救世主”)。对影片比较熟悉的人在柏拉图的明喻和影片本身之间已经看到了许多相似之处。

即使是神秘的莫斐斯也适合这种类推。我提到过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人解放了柏拉图的囚犯;那个人,他或她自己肯定也是不知何故被解放了,并且在觉醒方面成为一个行家。一个人并不能唤醒他自己,尽管一个人可能激起原始的回忆,就像是尼欧那样,扼要地说就是,一个人具有模糊的感觉,并不十分确信自己是否是醒着或是在睡梦中(莫斐斯问尼欧他是否有过那种感觉)。莫斐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为什么《黑客帝国》里的解放者按照这个神的名字来命名呢?看起来是奇怪的,毕竟,觉醒者在睡眠方面应该是专家。神的名字来自于希腊世界里的“*morphé*”,意思是形状或形式;因为神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形式使得睡眠者振作起来。谁可以比神莫斐斯还要明白醒着和睡梦之间的区别呢?谁会更好地理解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唤醒梦游者,以便使他们以正确的顺序采取适当的措施?它是影片中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微妙敏感的主题,即为了觉醒,一个人必须首先要梦到他是醒着的,也就是说,具有预言性的暗示,即在梦和醒着之间有一种差别。

在我们的客观经历或脑状态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下，柏拉图的明喻和《黑客帝国》都提出了关于幸福的问题。它是一个柏拉图哲学的论题，即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依赖于真实的知识；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人可以具有自由和幸福的客观经历，但却是一个奴隶而并不幸福。在表达“我很幸福”这句话的时候，一个人把幸福归因于自己是完全错误的。幸福被认为是与健康的概念相类似的东西；在表达“我很健康”这句话的时候，一个人也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在当时，一个人可能真的感觉自己是极其健康的，而没有意识到（因为无知，或是药物的原因）自己看不到的毒瘤。这个论题是，幸福和对自我的反映以及客观世界是不可分离的。类似的，《黑客帝国》明显与我们对自己（自由的自己，幸福的自己）的主观感觉与我们正在体验的“真实”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里，我想把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的问题暂且撇开。而把重点放在幸福的问题上：幸福是什么？真正的幸福取决于现实的某些知识，或者，如果我们感觉自己很幸福，我们可以正当地宣称我们自己实际上真的也很幸福吗？

幸福与满足

电脑人史密斯：我们达成交易了吧，雷内先生？

塞佛：你知道，我明白这块牛排并不存在。我知道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就会告诉我的大脑，牛排美味而且多汁。过了九年的苦日子了，你知道我明白了什么吗？无知是福。

电脑人史密斯：那么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塞佛：我不想什么事情都记不住。什么事情，你明白吗？我要做个有钱人。大大有名的人，比如明星。

电脑人史密斯：随便你要什么，雷内先生。

塞佛：很好。我想要重新回到母体，我会告诉你你想要知道的一切。

（《黑客帝国》里在饭店的场景）

在接触“幸福”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记住了这个词语的一个特殊意义，亦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及通常一个人是“幸福的”，并且长时段是幸福的。在我正在谈论的这个意义上，幸福不是一种心情。在我们所说的“幸福”中，像福佑、入迷、欢乐这样的事也许会被正当的提到，但是我感兴趣的是谈论这个词语的另一种含义。尽管在影片中茂斯与他所设计出来的虚拟红衣女郎在一起共度时光可能是幸福的，但是这种幸福是短暂即逝的。它并不是在影片中或是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明喻里十分重要的那种幸福。

几乎每一个人都自然地把长期的幸福与满足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之间的确具有某些共性，尤其是当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中所包含的情感上的时候。二者都可以被描述为停留点，描述为没有干扰和不安，描述为展示平静和和平。满足的人没有受到未能满足的激情的困扰，他的天赋和激情都达到了一种平衡，正如古代的斯多葛学派称道的那样。满足的人拥有他想拥有的一切，他厌烦一个人通常所想要得到的一切，并且对此感到满足。他不需要像塞佛所做的那样通过沉湎于“机器情节的妄想”而来虚构一个错误的现实。但是，人所共知的满足的一个含义似乎从我把它与幸福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征切断了，这个特征也就是长期性。

即使一个人在长时间里一直是满足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满足是区别于幸福的；一个人从对客观事实的评价中切断的是满足把它自己减少到脑状态的这种趋势。满足和鲁莽是天生的同盟。可以说，满足的人是平静的。我记住了满足的奴隶的形象；被生活限制的人，对他来说，主观感觉与对生活的价值的评估之间的联系断开了。我也可以以相同的意思举出幸福的暴君的例子。或者，《黑客帝国》里描述的受到良好抚育的人类电池组的例子。这样的一种生活经常被比喻为野兽的生活不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我的狗在满足的含义上当然可以是幸福的。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不是幸福的，然而你可能会是安详的。只不过是你要没有意识到罢了。

然而，无论一个人大脑的主观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安静的，一定有一个可以被评估的相关事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如塞佛表明的那样：为了幸福，他想要脱离现实，回到母体中去。他想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

他包含了以关于满足(康乐最纯粹的主观含义)和幸福(被认为是与对现实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之间的关系为标志的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十分清楚的:在虚幻的生活里,满足是真正的幸福。在有组织的机械的“洞穴”里的囚犯们是富有的。影片从总体上产生了那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必须要说——没能抓住幸福与真实的知识之间的联系的观点。通过例证为什么塞佛是错误的以及在做出有利于觉醒的决定时为什么尼欧是正确的,让我提供四个例子。这不是需论证的全部,但它是一个开端。

首先,假设我们发明了一种药物,并且不断地把它注入到你的静脉中,而你感觉不到疼痛。让我们假设这种药物的科学名称是“安定”。进一步假设安定这种药物让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吃了这种药物。结果,你长时间里都是平静的,即使你的生活改变了,成了一个在家观看肥皂剧的“沙发土豆”,沉湎于谋杀者的暴力“情节”中。我们否认这样的一个人是幸福的,然而却承认他是平静的;他的平静只不过是一种满足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人为产生的脑状态。

其次,幸福是与对世界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信仰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假设你是十分幸福的,因为你认为基努·李维斯正好要求你与他约会。公正的旁观者经过调查发现一个聪明的冒名顶替者欺骗了你。你在你(错误的)信念中经历了满足,或曰快乐。但是,由于你的信念是错误的,你真的觉得幸福吗?我以为不然;因为根据对情形的正确评估,你的生活并不是如你希望的那样被反映出来。或者如果你真的是幸福的,那么,为什么在安定的作用下你并不是真的感到幸福?

第三个例子:比方说,某一天你在你通常居住的那个地方,即人行道上的一个加热的通风口醒来,梦想着你是富有的。假设这种白日梦成真了;你认为你自己是富翁奥纳西斯(Onassis)先生,住在他位于格施塔德城的冬季城堡里面。你非常幸福。或者说,你感到幸福吗?你正生活在一个梦世界里,对生活感到欣喜,但是你肯定不会幸福。(与塞佛相反)无知是福是错误的。考虑一下奥赛罗的例子吧。想到自己的妻子苔丝狄梦娜(Desdemona)是不忠诚的,奥赛罗大声喊道:“要是全营的将士,从最低微的士兵起,都曾领略过她的肉体的美趣,只要我一无所知,我还是快乐的。啊!从今以后,永别了,宁静的心绪!永别了,平和的幸福!”(3.3)在

一个错误的信念里，奥赛罗是不幸福的；他说他宁愿自己是无知的，幸福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场景的戏剧性讽刺向我们展示了相反的事实。实际上他会很幸福如果他早知道真相的话，像剧本所强调的悲惨结局那样。我认为，即便苔丝狄梦娜曾经有过不忠诚的话，他也会是幸福的。

考虑一下第四个例子：假设你习惯性地会喝太多的酒，第二天早上又会感到后悔。假设多年来你一直是那样我行我素而毫无改变。在奢侈的同时，你很满足；在清醒镇定时，在早晨照镜子的时候，当你凝视你充血的眼睛和胖嘟嘟的脸的时候，你意识到你非常的不快乐，你在酒瓶子里找到的满足是你对生活缺乏自信的一种逃避。使得你陷入了无知和遗忘。在我看来，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这种经历是共同的，它揭示了几个重要的真理，其中一个就是，如果一个人根深蒂固地一直对自己感到不满，对自己到底怎么样感到不满，那么这个人是不可能幸福的。这意味着要想获得幸福，一个人必须具有想要的那种愿望；为了反映我自己，如果我要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那么我必须确认，在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方面，我基本上是处于正常状态的。

这样的一些例子表明，虽然幸福是与脑状态不可分离的，但它与满足也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与一个人对生活的安排也是密不可分的，更加深刻的原因是，对一个人的生活的任何一种这样的安排必须可以估计地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错误的幸福感可能形成于以上的各种各样的自欺都具有三个缺陷。首先，它们是不牢固的；自欺往往是容易消失的，并且会被日常的现实所破坏——就像在美好的一天的幻想之后，你的肚子是空的，而不是填满了奥纳西斯的鱼子酱。如果我们愿意认为脑状态取决于错误信仰的一个人是幸福的，那么，幸福就完全被主观化了。同样地，它也是易碎的。你不知道的事情可以伤害你，就像在你背后的电脑人一样。

其次，通过自欺性的幻想获得的幸福是被删节了的。当你躺在加热的通风口的时候，你想象着会给予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的那些崇拜，你把自己想象成是被崇拜的对象；但是你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并不熟悉其言谈举止，也并不知道他们失败和成功后的感觉。你在自己的梦想生活中所想象出来的这种幻想是一种讽刺画，一种被删节了的共享的幸福，并

不符合它自己的目标。你的幸福是伪造的，是虚假的。

因而，第三点缺陷就是：既然你的经历是虚幻的一种经历而不是真实的经历，那么无论你获得的是什么样的“幸福，”都不是你做真实事情的一个产物。如果你在酒宴上喝多了，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你深受你所爱的那个家庭的喜爱，然而，实际上你的家庭分裂了，确切地说是由于你的喝酒引起的，你的“幸福”与来自于一个人真正深爱的家庭里真正受到家人的喜爱的那种幸福是同质的，同等深度的吗？过奥纳西斯的奢侈生活的那种想象的幸福，与实际上在过那种幸福是同样深刻、热切、复杂的吗？

这种对幸福和满足的混淆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会像塞佛那样做出选择。经常滞后的认为幸福和满足有别的这一承认也许不是十分普遍，但是它是长者的智慧得以形成的一种素材。我认为，痛不欲生的悔恨感和羞耻感提供了某种证据，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幸福与事件的某种客观状态联系在一起。

幸福是一种感觉；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它不是这种或者那种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人正确导向的一生中所照看其他感觉的那种感觉或者品质。我所说的是（在这种场合，不可能提出详尽的论点）幸福是与关于一个人是那种人的沉思的断言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是与二级愿望（想拥有一个人具有的那些愿望以及拥有它们的方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满足可以被认为是对愿望的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状态，是塞佛在吃饭的时候所享受到的那种主观状态。幸福是一个人以适当的方式向往适当的事情的那种满足，就像尼欧知道他必须选择拯救莫斐斯的生命的那条艰难道路一样。因而，在幸福和我们对于幸福的概念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联系。为了拥有幸福，一个人需要对现实做出一种正确的理解——关于自身的现实和关于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事实的理解。

关于幸福的三个论题

为了使得这种观点更加充实，我建议看一下关于幸福的三个论题。第一个论题就是，前文讨论过的平静是与对幸福的长时间感觉联系在一

起的，因此也是与灵魂的适当秩序这种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起初，幸福大多被理解为平静。这个意义上的幸福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它捕获了幸福与静止之间的联系。在缺乏重大的不一致的意义上，它是静止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宁静的。更进一步讲，从它是某种要结束的事情而不是迈向目标的一个过程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是静止的。它更像是一种结束状态，一种完成或履行，而不是一种缺乏或战胜缺乏的情形。“平静”这个术语通常用来翻译希腊语的术语“ataraxia”，即与“eudaimonia”形成竞争的一个术语，eudaimonia 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使用的一个术语。后者在正常情况下被翻译成“幸福，”且较少被翻译成“受祝福的幸福”；ataraxia 也是很难翻译的一个词，“平静”也是对它有几分近似的翻译。把幸福理解成平静有助于我们明白幸福的敌人是忧虑。我对这件或那件事并没有那么多焦虑——你所具有的在电脑人抓住你之前返回到尼布加尼撒船上去的那种忧虑——而是对事情失去平衡，不稳定，不受牵制，潜在的毁灭性的一种普遍忧虑——一种“心头之刺”，会使得你夜间一直惊醒。

这把我带到了关于幸福的第二个论题上，那就是一种基本的观点，把幸福与心神安宁(平静)联系在一起，而其他的观点则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幸福与行为(*energeia*)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之间的辩论清楚地表达了基本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否认在与美德(*arete*)的联系中，幸福是灵魂的行为。幸福是至善，是存在于一个人适当的行为(*ergon*)中的美德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方面的适当行为或工作中的最高境界。如果说在这种描述里有疑问的话，那么“外部利益”(像好的食物和一个安全的环境)存在着一个空间；幸福不只是美德的演习。这可能会被一个人称之为幸福的一个客观定义，它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即如何评价对幸福的那些主张，如何解释在他们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实际上他们(像《黑客帝国》里所描述的那样)只不过是人类电池的过程中，人们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在“幸福的奴隶”或“幸福的僭主”这个问题上，这是十分有用的。它把幸福和道德规范以及一个人该如何生活联系为一个整体。它为区别幸福和满足提供了一个基础。

把有关解释灵魂、自然作用、美德，协调实践和理论上的美德的著名

的难题等这些概念的问题放在一边,然而,这种定义并不是很清楚地与幸福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说美德(*arete*)并不是一种感伤(*Nicomachean Ethics* II. v. 3),他从来没有说过幸福是一种感觉(一种感伤)。既然幸福是实现(*energeia*),那么它的行为就会看起来与“痛苦”这个术语所传达的言外之意的被动性是不一致的。作为与按照定义并不是感觉的美德相一致的一种行为,如果幸福在他的理解中是一种感觉或者感情是很奇怪的。幸福在于尼欧积极的决定与发现自我和世界的真相,而不在于与红衣女郎的一个不经意的、虚拟的约会。

最后,关于幸福的第三个论题:关于幸福的这两种可以选择的观点单独而言都是不充分的。我已经提到过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我认为这种真正的幸福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的行为。不考虑我对幸福和平静之间的联系的认可,然而,一个人不可能不加修正的接受那种联系。关于幸福就是平静的观点往往是与无动于衷、毫无激情、出于情感方面的考虑、超然、漠不关心联系在一起的。这恰恰是由于平静与静止、宁静以及我们已经谈论过的其他品质的密切联系,以及激情、情感和依附与动摇、不一致、动机之间的相反的联系。然而,过一种我们如此理解的生活恰好可以对我们造成冲击,认为我们是单调的、枯燥的、缺乏创见的,放弃了恰好是人类生活中有价值的许多东西。

在这种长久持续的、结构性的意义上,幸福作为平静是与在日常意义上的不安和缺乏满足感一致的。幸福与其说是一种镇定,不如说它是人们世界观中的相称、平衡、和谐和决断。从你的经历而言,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可以,事实上也必须具有各种各样的激情、依赖和许诺。这些东西有时候可能是十分狂热的;它们当然是把一个人的幸福,从心情的意义上而言,置于了危险之中,而且从那个意义上而言,他们把一个人的幸福放在了别人的手中。

《黑客帝国》作为镜子

幸福作为平静的,要求对我的生活进行可以估价的评估;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在满足和平静之间做出区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种评估

是哲学上的一个评估。在苏格拉底以降的传统中，“我是谁？”和“我应当成为哪种人？”这些问题对哲学而言就是根本性的问题。哲学上的认知可能经常（回想一下在这篇短文的开头我们提到的一个观点）要求个人经历，而不只是抽象的论证。而且艺术——包括像《黑客帝国》这样的影片——都可以描述一个问题，并且，通过向观众举起一面镜子，激起对它的重大意义和解决办法的反思。这一章只是那种反思的一个梗概罢了。^{〔1〕}

〔1〕 我要感谢 Eduardo Velasquez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邀请我在 2001 年 5 月 28 日他的研讨会“电影、小说和大众文化”上参与讨论《黑客帝国》，感谢学生们的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其中一位学生——David Newheiser——爽快地为我提供了关于影片的第二手资料。我也要感谢 William Irwin 给我提出的有益的建议。我对幸福的讨论来源于未经编辑、校对的我的底稿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1999), 第五章。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利用这本书。

12 我们就是救世主！ ——康德解说该如何操纵母体

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

关于幻觉的两种理论

在《黑客帝国》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透明的高塔，里面有像茧一般赤裸的接有电线的人的肉体。我们震惊地发现的这些东西就是真实。其他在这个故事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比如人们的来来往往，在现代城市的蜂窝中过着他们单调而又狂乱的生活，都只不过是现象、梦、幻觉而已。

自古代以来，从柏拉图到佛陀这些哲学家们就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假定的真实世界也不过就是真正的真实的一个影子而已。也许最久经世故的，大意是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纯粹的现象”的一组论点可以在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著作中找到。康德论辩说，即使是所谓的客观的物理特性也是依赖于人的主观投射的。尽管在外观和经历的现象的构造中有一种真实不知何故扮演着一个角色，这种真实并不该在可感知的外观领域里被发现。在我们周围所看到和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包含了人类意识的预测。它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独

立存在的真实。

谁应该为对人类观众所犯的这种愚弄负责呢？对康德而言，并不是某个外部的人，比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恶毒的魔鬼，产生了对平常经历的幻觉现象。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欺骗了自己。在投射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把它归因于一个独立的真实，并因此在那方面疏远了我们自己的自由。对创造性的人类自由的这种退让是基本的产生模式或社会经济和政治社会的“母体”，在这其中大多数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其他人的奴役。

两种母体

在《黑客帝国》里，具有人工智能的强大机器控制了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的人类。因此，在它把幻觉的来源看作是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这个意义上而言，可能看起来《黑客帝国》更加倾向于柏拉图哲学或笛卡尔哲学，而不是倾向于康德哲学。然而，把人类监禁在母体内的这种智能必须能够按照俘虏们自己的愿望来控制这些俘虏。我们从影片中可以知道，几乎成功地统治了人类的那些生命不得不改变他们最初的程序——母体统治表面世界的本质——来适应隐含的人类的愿望。

电脑人史密斯正在试图破坏莫斐斯的心智，并向他揭示，实际上有两个母体，两种不同的基本模式和程序来统治作为俘虏的人类的体验：“你知道吗，第一个母体被设计成是一个完美的人类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苦难，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不幸的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程序，于是整个程序就丢失了。”电脑人史密斯对于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推测：“一些人认为我们缺乏描述你们的完美世界的那种程序语言。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是通过苦难和不幸、穷困、悲惨来定义他们的真实的。”

正如满足的母牛会挤出最好的牛奶一样，满足的人类也会为有智能的机器主人产生出最好的生物能量，为其提供必要的活力源泉。母体是被设计用来占据人的心灵的，而处于睡眠状态的有机体是作为摄取灵魂的机器智能的一种电池而发挥作用的。荒谬的是，事实证明适合于人类

对满足的睡眠的本能需要的东西不是一个理想的幸福世界，而是一个熟悉的、苦难、穷困、充满你死我活的竞争世界，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通过在可能的母体之中选择的否决权，处于睡眠状态的人类无意识地、本能地控制着程序。

电脑人史密斯是这样形容第一个母体所产生的认知上的不一致的：“完美世界是一个梦，你原始的大脑一直努力想从中醒过来的一个梦。这就是为什么母体被重新设计成这样：你们的文明的最高境界。”含意就是，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幻觉，本能地拒绝某种完美世界的想法。即使是服从于恶毒的魔鬼和他们的梦之塔的时候，人类还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人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苦难和穷困的世界，而不是第一个母体中的那个幸福世界呢？

两种自由理论

如果《黑客帝国》暗示着两种关于监禁的理论，即外部的和内部的，那么它也相应地提出了两种关于自由的理论。在整个影片中，观众不但要对尼奥是否确实就是救世主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而且还要对成为救世主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也提出质疑。在影片的开头，乔伊(Choi)就承认了尼奥的能力，即使是在母体内作为一个电脑黑客，帮助个人操纵控制他们生活的计算机系统的能力。当他为了获得非法的电脑磁盘而把两千美元给尼奥的时候，乔伊对尼奥说：“你是我的救星，伙计，我个人的耶稣基督。”但是，这种“自由”只是一种预示，也许是对真正自由的一种模仿。

哲学史给了我们两种相反的关于救赎观的解释。在柏拉图哲学的版本里，幻觉来源于被迷惑的人们的外部，克服这种幻觉的代理人也是被外部化了的。需要一个特出的人，一个“哲学家国王”来引导人们远离穷困和自我毁灭的浅滩并且走向……什么？秩序井然的存在具备和谐和满足。但是这个田园般的世界——控制者们一提出，就遭到了在梦世界里的梦想家们的拒绝。

在传统的基督教看来，耶稣基督是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一个例外，是一个神人，能够使死者复活，并且在他自己死后也能让自己恢复生命的一

个人。正是对“救世主”的这种传统的理解支配了影片中人物的心理，直到在影片的最后一幕，所有这样的传统期待被完全颠覆。

康德所捍卫的另一种选择是近代哲学中的启蒙哲学，是在美国宪法中所内含的那些原则。值得拥有的唯一社会是，在这个社会里自由的人们统治他们自己。只有被奴役的人解放了他们自己，他们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如果没有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就从桎梏中获得了自由，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又退回到那种奴隶状态。康德论辩说，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人类的这种自我解放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发现的命运。在康德的概念中，耶稣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并不是拯救了无助的人类的一个人，而是我们拯救自己的神一般的内在潜能的一个典范。

康德的概念，即被感知的世界是一个自愿接受的幻象，而不是被一个外部的欺骗者所完全决定了一种幻象，与他的观点，即每一个人都是命中注定要参与到人类的自我解放中去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康德关于捍卫这些内在相关的概念的论证可以使得读者确信其有效性，并且以这种方式强化在《黑客帝国》里在视觉上引人注目地提出的这些观点。

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的哲学意涵

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781)中，康德呼吁“按照哥白尼的假设”进行一次哲学革命。哲学上的这一哥白尼革命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哲学观点——我们通常思考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方式——应当赶上现代科学之意涵的步伐。这些意涵在任何地方都不是像哥白尼的发现那样明显，即太阳并不是像我们看起来的那样是绕着地球转动的，与此相反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

今天，我们自鸣得意地嘲笑天真并或许自大的古代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认为我们的小小蓝色星球（正如从太空中看到的）是辽阔宇宙的中心。但是，我们也应当给予古代的哲学家们应得的荣誉，比如，亚里士多德，他捍卫以地球为中心的对世界的描述。毕竟，他们只是笼统地表达了我们的眼睛至今所感知到的东西。通过天空的“穹窿”，我们直接看到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动的。我们把天空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圆屋顶，围绕着地球的

平坦的平面,从我们的肉体延伸到周围的圆形的地平线。如果我们拒绝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我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观点,即“世界”如我们实际上所感知到的那样是一个幻觉。

关于世界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感知的一个更加基本的特征,我们可以称其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直接地看到自然界,好像它是以我们各自的肉体为中心的。那就是事物在我们看来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我实质上感受到以我为中心的那个世界,以我的物理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但一经反思,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本身不可能是这样的。当孩子们把以身体为中心的感知当作现实的时候,我们称那是自我中心主义。当成年人坚持把他们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称那是自大。

我就是救世主

自我中心是生命的道德尺度的一个重要范畴。自大存在于把自己的物质存在当作是选择的基本基础。最终,自我中心者认为他自己就是“救世主”,是世界的中心,一切事物都是因他而产生的。每一个个体都自发地,自然而然地相信她或他自己是那个神秘的特殊人物。然而,经历很快就会告诉我们,其他人有权力限制我们,有权阻止我们去实现我们自己的愿望。其他人也好像他们就是“救世主”那样表现。为了解决这种矛盾,非常有必要承认我们——一般而言的人类,宇宙中所有具有智力的人——在我们的唯一性上,都是存在的真正中心。

道德的基本选择是在两个矛盾的关于真实的概念或母体之间的一个选择:存在着一个各自独立和竞争自我的世界,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世界。以自我为本位的世界是与在空间和时间上互相分离的物质身体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按照确定性因果关系的规律是互相冲突的。另一方面,当从道德意识的立场上看的时候,存在着一个世界:一个人类互相团结和自由的世界。如果第一个世界是真实,那么第二个世界就一定是幻觉。如果我们认为道德的母体是真实的,那么分离的母体就一定是一种幻觉。

在影片《黑客帝国》里,对于真相,自由和人类的道德选择通过对红色

药丸的选择被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红色药丸使得个体醒悟、看到真实；蓝色药丸把一个人又带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的睡梦中。然而，这种选择必须受到考验。当一个人最先选择觉醒并按照真相生活时，他会发现这一选择是有疑问的，由此导致他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面临危机。

什么是真实

道德选择的终极意涵，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创造“至善”的义务。至善是创造一个自由和幸福结合在一起的世界。^{〔1〕}如果这样的一个崇高的观念被证明是虚幻的，那么最初的选择也是不真实。如果是那样的话，只有一种可能性存在：通过尽可能地适应生存的外部环境来过各自的以自我为本位的生活。

由于控制者表面上掌握压倒一切的权力，塞佛得出结论，认为尼布加尼撒船上的工作人员的崇高目标是虚假、不牢靠的。塞佛最初对红色药丸的选择受到了艰苦经历的考验。他意识到在母体之外的最初的自由和真实，对尼布加尼撒船上的人而言，只不过是在实现终极自由和终极真实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时刻，只存在于他们的信徒的头脑中。他承认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虚构的应许之地，以最后的一个自由的人类城市的名字——锡安为象征的乐土。莫斐斯的自由和真实观是终极的幻觉，他总结说，用理性的经验主义的评估来得出实践的结论。

在他为自己背叛莫斐斯所作的辩护中，塞佛暴露了他关于自由和真实的肤浅解释：“如果你告诉我们真相的话，”他对莫斐斯的身体说，“我们就不会选择吞下红色药丸了！”“塞佛，你错了，”崔妮蒂与他争辩说，“是他让我们获得了自由。”塞佛回答说：“自由，你说这也叫自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让我做的。如果我不得不在母体和那之间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母体。”

莫斐斯头脑中的自由并不只是从母体中脱离出来，并不仅仅是争取

〔1〕 参见 James Lawler, “The Moral World of the Simpson Family: A Kantian Perspective”, in William Irwin, Mark T. Conard, and Aeon J. Skoble, eds., *The Simpsons and Philosophy* (Chicago: Open Court, 2001), 147-159.

单独的个人幸福和个人自由，而是对一种将人类的崇高自由作为自身终极目标的定数或命运的参与。这种目标不能只是在我们现代所谓的世界——“文明的顶峰”——的“真实”的复制而是一个不同的、更好的世界，把自由和幸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尽善尽美的人类世界。

因此，在这里崔妮蒂的回答是不充分的，因为她只是在母体虚拟的真实程序内部的存在幻觉之间做出了区分，只是带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感知的物理存在：“母体是不真实的！”她说。塞佛的回答触及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相。“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崔妮蒂。我认为母体比这个世界更加真实。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拔掉插头，而你那里马上就要眼睁睁地看着艾巴克(Apoc)死掉。”

在母体的虚拟世界和尼布加尼撒船上日常的身体感知之间的对比只是影片探究的幻觉和真实、奴役和自由这些主题的一个起点。在处于睡眠中的人类梦之塔中令人吃惊的对幻觉和真实之间的最初比较的描述是不完整的。真正令人兴奋并迷惑了观众和尼欧自己的，并不是母体外面的生活，而是母体内的生活——一旦它的真正本质被理解的话。

道德的基本条件

我们寻求创造一个具有普遍幸福的完美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同控制者们的第一个母体。但是这个完美世界具有某些条件或要求，才能够使得它与相异的俘获者所设计的任何可能的世界水火不相容。至善是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人们不但是幸福的，而且还是值得拥有这种幸福的。他们的幸福必须是通过他们自己自由的、负责的行动来获得的。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处于睡眠状态的人类坚持要求千禧年快要结束时的那种无休止的激烈竞争的世界。当具有人工智能的控制者提供给他们一个田园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需求会得到满足，他们的痛苦会得到缓解，他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关于幸福的幻想一定是一种幻觉。它一定是一种幻觉，因为对于分离的信念作为基本的母体经历即便在梦中也挥之不去。而且即使是做梦者也承认，对于分离的那种信念不可避

免的会导致竞争以及胜者与败者之间的划分。只有在一个彻底不同的原则的基础上，幸福才是可能的。自由的人们在他们真正的团结，而不是明显的分离的基础上行动的一个原则。

创造至善的道德探索在反对表面上看起来在与其存在相矛盾的一个世界的艰苦现实面前受到了考验。道德个体往往会感觉无能为力，在反对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的世界的暴力的时候。理想的道德规范的母体看起来是无能为力来克服以身体为基础的自大的母体。为了避免绝望，个体不得不对把道德理想作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世界的母体这种可能性具有信心。康德区分了这种信仰的三个方面，他称之为道德的基本条件。道德意识的基本条件是：自由、上帝，和不朽。

与我们对实现道德规范的目标的无能为力感相比，基本条件描述了如果我们要对我们基本的道德选择保持忠诚的话，我们必须相信什么。这些信念实际上就是解放者们的那些信念，人类拯救者们的那些信念。通过这些基本条件，我们学会了遵循我们生命中的使命，也就是成为救世主，成为能够创造至善世界的人，成为能够到达地上天堂锡安这应许之地的人。

康德强调说，相信道德经验的真实性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这一真实的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在于按确定的物理、自然的、心理学、社会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体验。但是道德体验的本质是它的反确定性的本质，是意志的自由。既然没有它的对立面，我们就不能知道(科学地知道)这种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我们自己的选择自由具有一种忠诚。这种对人类自由的忠诚——不考虑科学上的所有确定性的规律——是道德体验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上帝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真正自由的个体们的口号。这是一个新原则，是可以替代尼布加尼撒船和锡安的母体。它是第三个母体，但它仍是不完整的、神秘的，有待我们充分加以认识的。为了了解联合者的新母体通向终极意涵的人类共享的智慧，为了摧毁旧的母体，我们很有必要相

信或假定那种自由是存在的,而且还要相信或假定自由的人们有能力去创造至善。因而,就需要有第二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与我们的道德唯一性的这种实在相一致、相协调的自由的个体有能力去实现我们的最高目标。如果分离能够产生一个具有外部能力的世界。那么联合就有能力创造一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在可替代的锡安这个世界里,联合起来的人类力量可以迅速传遍每一个个体。

康德把这第二个基本条件称为上帝。在与古老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中,上帝被认为是正义的外在分配者。上帝给予好人幸福,给予坏人惩罚,如果不是在今生今世,那么也会在后半生的那个世界里。这种观念暗示着普通人是无力达成这些正义目标的。

母体的世界,在1999年形成的——在千禧年快要结束时的现代文明的顶峰——是建立在每个个体在表面上是自然和文明这些外部力量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基础上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根源或母体是对于分离的信念。因此莫斐斯告诉尼奥他已经知道了的那些事情:“你这一生都感觉得到它,这个世界有些不对劲。你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但是它确实存在,就像是心头有根刺,会把你逼疯……母体无处不在,它就在我们身边。”

然而,在新世界锡安过去的千年宗教中,自然和人力的潜在在经济或政治力量中并没有被异化或外部化,它在神学上的对立物是一个外部的、全能的上帝。同时代生活的这些外部力量在《黑客帝国》里通过全能的智能机器体现了出来。然而,在相反的世界锡安里,通过认识到分离的存在的幻觉,潜在的联合的生命力能够贯穿每一个个体。

在祭司的等候室里,一个尼欧式的佛教徒“候选人”告诉尼奥:“不要试着让汤匙弯曲。那是不可能的。相反……你要试着了解真相。”“什么真相?”尼欧问道。“汤匙不存在……你明白了吧,弯曲的并不是汤匙;只是你自己而已。”我们不能让汤匙弯曲——我们不能改变所谓的外部实在——如果遵循确定性的科学,我们认为它是与我们相分离的一个独立的物质实体。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真相,即它是和我们一起的,它是我们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只需要让我们自己弯曲,那么汤匙也会随之弯曲。

在这种情形下的“自我”并不是分离的、孤立的自我,而是更高的自

我，与所有人联合在一起的我。要是我们放弃分离的幻觉，那么像神一样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尼欧必须认识到，并非他就是那个救世主——一个与其他每一个人都分离的特殊的人——而是他是具有所有存在的那个人。他当然是最先充分理解了真相的“那个人”。

恐惧和颤栗

母体世界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世界。把自己解释成是一个孤立的肉身的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强大力量面前不堪一击的，每一个个体一定会感到害怕。最根本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对那种脆弱的身体存在的消失感到恐惧。对死亡的恐惧预设了个体把他的身体存在看作是最终的实在。

按照母体的信念结构，我们永远都无法逃脱恐惧。在影片的开头，尼欧迈向自由的第一步就险些把他推到公司大楼的边缘。于是，他让自己的恐惧控制了他的行为。第二次，发生在虚拟的真实主架构中，他面临着跌到地上的恐惧。他正在开始学会操纵幻觉的能力。他正在发现源于有意识地生活在幻觉中的这种愉悦。展示一个人能力的关键在于释放所有的恐惧。“你必须赶走所有恐惧，尼欧，”莫斐斯告诉他说，“赶走恐惧、怀疑与不信任。释放你的心灵。”尼欧跌落到地上，发现了他的恐惧的虚幻本质。

然而，在肉体的形式上尼欧依然流血了。这是为什么呢？尼欧：“我以为不是真的。”莫斐斯：“你的大脑认为是真的。”尼欧：“如果你在母体里被杀死，在这里也会死掉吗？”莫斐斯：“精神死了，肉体也活不了。”

只有伴随着对这些观点的逻辑上的揭示，这种明喻般的宣称的含义才会变得清晰。尼欧对于母体外部的生活“实在”和母体内部的幻觉之间最初做出的区分是十分简单的。那些意识到母体外部的实在的人在母体内可以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强大。但是，相反的，在母体内的存在可以影响到在母体外的存在。即使是在母体外部，肉体还是依赖于精神的。

尼欧命运实现的关键存在于他对死亡恐惧的拒绝。当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拯救莫斐斯的生命的时候，尼欧实现了他的命运，这与祭司的

预言是一致的。

祭司没有阐述一种确定的命运,而是给了尼欧一个选择:或牺牲自己的生命,或牺牲莫斐斯的生命。“你必须作出选择。一方面,你可以挽救莫斐斯的生命;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救自己的命。你们中的一个人会死。到底选择哪一个取决于你。”

祭司预言中的重要因素就是道德规范的基本条件。首先,有自由这个基本条件。尼欧最初拒绝了宿命论是因为他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不希望有一个外部力量来统治他自己的行为。他希望总是可以自由的作出选择。这里尼欧命运的完成是作为一个选择提出来的。就像由来已久的那样,尼欧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他可能会选择蓝色药丸,继续呆在母体内过一种确定的梦生活。对红色药丸的选择,对真相的选择,给他带来了无法预知的恐惧和掌握存在的控制力量的敌人。现在,祭司告诉他,他必须在救自己和救莫斐斯之间作出选择。

第二,祭司的预言中包含有对我们的潜能和能力的信念。在康德哲学思想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道德选择和对它可实现力的信念联系在一起——反对所有相反的现象。上帝的基本条件就是这种条件,即连接我们对于至善的道德选择和对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的信念。

最初,看起来对于认知或救星的神圣能力的信念是一种承认,即承认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对康德而言,道德规范要求我们自己能够实现我们的道德义务。因而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所假定的上帝或者是神(“救世主”)并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为我们完成奇迹的孤立的人。上帝应当被看作是在我们超越自然分离的限制时,我们自己的一个延伸。在影片中有一个发展,即从对外部的救星的信念发展到对我们自己的像神一样的能力,作为联合的人类,拯救我们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真正的内在“潜能”。在影片的结尾,在“救世主”最后所说的那些话里,这种理解显而易见。

转折点:结束恐惧

预言中的第三个因素显然与死亡和生存有关。某个人必须死,而某

个人则会幸存下来。在母体的世界里，分离的原则占统治地位，分离的不赢则输逻辑是一个铁的定律。祭司给了一个让尼欧不高兴的消息：他不是救世主，而且还说或者是他，或者是莫斐斯一定会死。祭司：“很遗憾，孩子。你很有天赋，但是看起来好像你正在等待什么。”尼欧：“等待什么？”祭司：“也许是投胎转世吧。谁知道呢？事情总是这么无奈。”

祭司的预言实现了。尼欧救了莫斐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又获得了作为救世主的第二次生命。这种预言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会实现，这是理解这部影片的关键所在。

在救莫斐斯的过程中，尼欧发现自己与一个表面上坚强的、全能的电脑人面对面。不考虑他们在主架构中的训练给予了他们在母体内部活动的巨大能力，尼布加尼撒船上的工作人员承认一个最终以恐惧为基础的规则：如果你看到一个电脑人，你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跑。这是塞佛对尼欧的“现实主义的”忠告，还有塞佛不相信认为尼欧就是预言中的救世主的任何观点。因此，在影片中，戏剧性的转折点发生了，当尼欧谨慎地面对电脑人史密斯的时候。他已经作出了决定：他将会立场坚定地面对自己的死亡。尼欧用完全的自由实现了这种命运，选择去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维护他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孤立的、脆弱的躯体。

尼欧因此也克服了在虚拟的真实世界内部和外部，在所谓的肉体的真实世界里统治着母体能力的那种基本的恐惧。同样的基本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世界。如果你认为你会死，即使是在虚幻的世界里，那么在自然界里你将会真正的死亡。肉体的重要性取决于对死亡的最终能力的精神信念。这是调整母体的基本规则。你的能力，你的实在，取决于你的信念，而你的信念最终是由对于死亡的恐惧所统治的。

在揭示尼欧的命运中只剩下了一步。很有必要放弃对死亡的信念。当尼欧的身体倒下去的时候，莫斐斯说：“不可能。”莫斐斯不能相信尼欧死了，尽管，根据所有所谓的实在规则，尼欧的确是死了。然而，崔妮蒂更进了一步。对着尼欧死去的身体说话，她表达了他活着的精神：“尼欧，我不再害怕了。祭司告诉我说，我会谈恋爱，而我爱上的那个人，会是救世主。你看，你不可能死。不能。因为我爱你。你听到了吗？我爱你。”由

于崔妮蒂的爱情和拒绝相信死亡,尼欧又活过来了。这与祭司的话是一致的,尼欧获得了作为“救世主”的第二次生命。

不朽和重生

道德生活的第三个基本条件就是不朽这个条件。为了实现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命运,有必要放弃对死亡的恐惧。不朽这个基本条件对在道德上犯了错的人而言是必要的,康德论辩说,因为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限内,个体不可能履行他的最终义务:促成至善的降临。

促成至善的道德目标是有关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就像自由的基本条件是关于人在现世的能力那样,因此上帝和不朽这些条件也必须如此。因此,由道德规范所假定的不朽必须是“现世的”不朽。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关于来世的不朽的教义,并不适合道德意识的要求。对于传统的基督教的来世的不朽,可以替代的主要概念是印度教和佛教里“现世的”不朽。祭司表面上不经意地提及重生,以及僧侣打扮,剃了头的小男孩“候选人”都暗示了佛教的视角。受到启发的个体的灵魂或者精神,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选择保持生命的循环和再循环是为了便利所有生命的普遍启发。在康德早期的作品中,《普遍自然史》(*Universal Natural History*)体现了他的宇宙论视角的不朽,其中,个体灵魂在攀登潜在的人类至善的过程中,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重生。^[1]

注定要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出现在三次重生中。在第一次生命中,发生在这个故事的片断之前,救世主从母体的生命夹层里解放了几个个体。祭司预言说,这个解放者会重生来完成他的使命。《黑客帝国》这部影片主要是关于救世主的第二次生命的故事,那个人就是尼欧,一个不寻常的电脑黑客,经过几次飞跃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命运。影片的最后时刻让我们瞥见了救世主可能有的第三次生命。第三个生命段完成了祭司的预言,即救世主会摧毁母体。但是这只是一个消极的目标,本身只会导致对1999年那个压抑世界里的物质真实的再现。什么才是解放者的行为的

[1] Immanuel Kant, *Universal Na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Heavens*, 由 Stanley L. Jaki 翻译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1), 195-96.

积极目标呢？

救世主还是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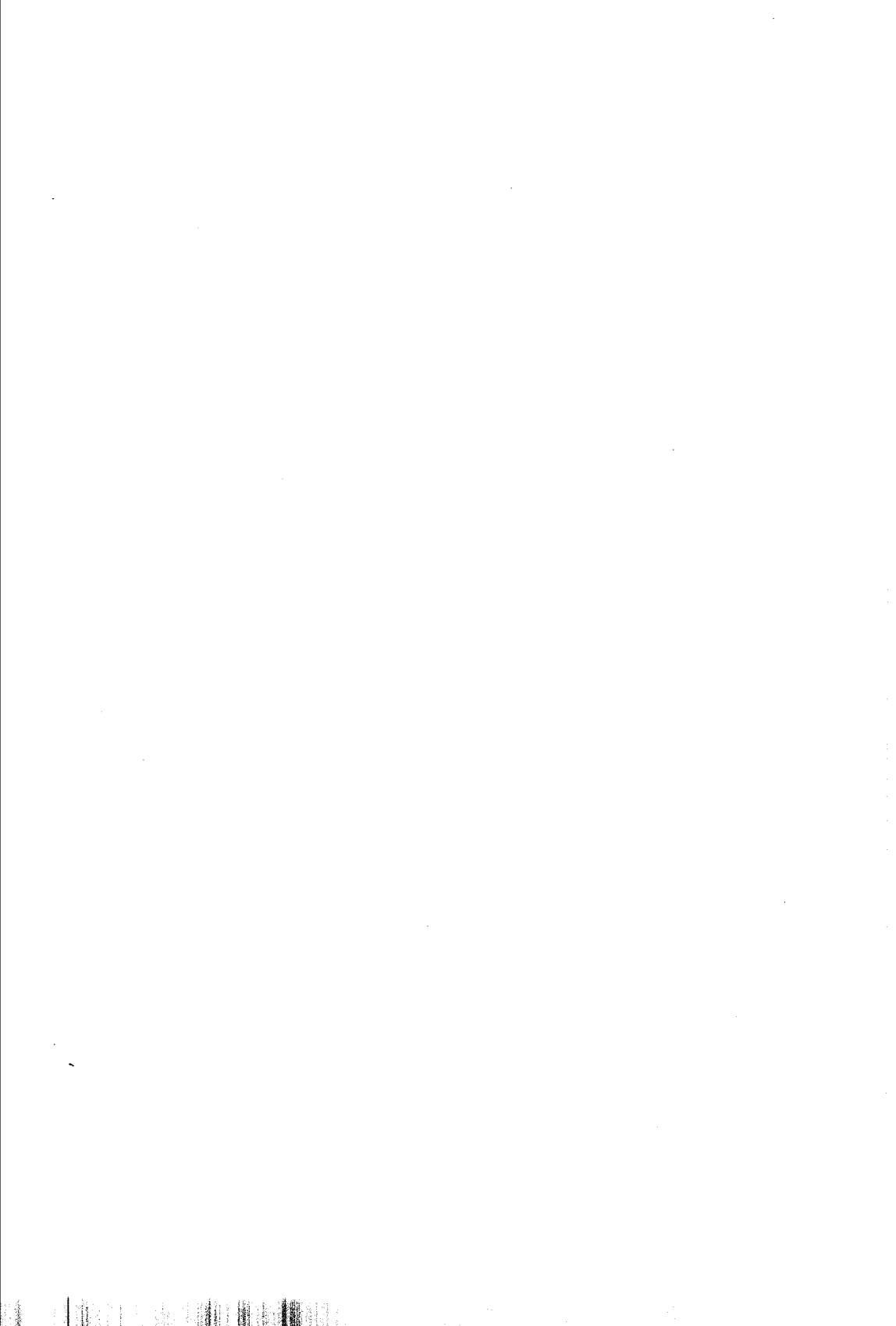
从母体中获得解放一定会创造自由的人，而不是过着满足的幸福生活却没有自由的人。处于睡眠状态的人拒绝这种概念，即奴隶们不劳而获的幸福是其人工智能控制者的产物。但是，在哲学王或者全能的救世的善行指引下，这样的解放怎么可能呢？

像基督教的弥赛亚耶稣一样，尼欧死了，又复活了。更令人困惑的，也许是更滑稽的是，尼欧飞向天空，他敞开的大衣伸展开来就像是超人的斗篷。^[1] 但是尼欧最后的总结暗示着一个不同的解释：救世主并不是一个天赋异能的超人，而是一个宇宙的导师。作为一个教其他人怎样才能像他一样的老师，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2] 对于人工智能的控制者，救世主宣布说他承担的普遍解放的任务包括对无限多的候选人的教导：“我要让这些看到你不需要他们看到的東西。我要让他们看到一个没有你的存在的世界。一个没有统治和控制，没有国界或边界的世界，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

没有限制，一切皆有可能，这样的—个世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塑造真实、操纵母体的—个世界。为了使得这样的—个世界存在，我们很有必要克服自大，上升到对我们相互间的实质上的团结的—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中，我们将会找到自由，找到我们与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的神圣能力之间的固有联系，以及我们超越死亡恐惧的能力。“救世主”也许是第一个超人，但他却不是最后—个。

[1] Larry and Andy Wachowski 的第一次底稿的正文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想象。银幕表演包含说的话：“There is a RUSH of AIR as the Boy stares up as Neo shoots overhead. His coat billowing like a black leather cape as he soars up, up, and away.” 参见 www.geocities.com/Area51/Capsule/8448/Matrix.txt.

[2] John 14:12; The Holy Bible,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Chicago: Gideons International, 1961).



情节 4

虚 的 主 题

13 地下室手记：虚无主义 与《黑客帝国》

托马斯·S·希布斯(Thomas S. Hibbs)

从《终结者》(*The Terminator*)到《人工智能》(*A. I.*),从关于“灵魂”和“意识”这样的术语是否应当被归入“大众心理学”这种哲学辩论到关于克隆伦理的政治辩论,科技的本质和意涵形塑着当代美国的高雅文化和下层文化。

在1999年的影片《黑客帝国》里,下层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关注和兴趣融合在了一起。《黑客帝国》包罗万象——引人好奇的,有智识抱负的情节,经典神话的后现代回音,为科幻小说影片设立了新标准的特技,熟练的设计动作和娴熟的武打效果。然而,无论是在影片的情节上还是在它的哲学沉思上,《黑客帝国》都利用了把当前对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迷恋早就表达出来的那些主题和辩论。在许多方面,《黑客帝国》都重现了关于启蒙现代性的悠久辩论。^[1]通过科技进步掌握自然的启蒙冒着使人类退化的危险,就像对于个体自由的轻率欣庆荒谬地想要追求所有人的同质化一样。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情形下,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被看作是虚

[1] 无可否认,“启蒙运动”像我们现在称之为是出现于18世纪的一系列观点一样,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正如就要在这一章的正文中变得清晰的那样,我会集中于对启迪思想的一种紧张,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分割开的一种紧张。

无主义的一个潜在来源,是没有任何最终目标和基本含义的一种人类存在,在那里,在以前的那些年代里鼓舞了人类的那些重大问题和积极追求就不再会存留在人们的灵魂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启蒙运动中的乌托邦与虚无主义

在最重要的察觉了启蒙运动中现代性和虚无主义之间微妙联系思想家(如尼采、托克维尔、阿伦特),最被人所忽略的人之一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然而,《黑客帝国》里所表达的许多问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1864)一书里所表达的许多问题之间颇多类似。尼采称在这本书里他能够听到“血液流动的声音”。《地下室手记》这本书是对开始渗透俄国的某种西方启蒙思想的讽刺和谩骂。作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功利主义以及理性自我主义、理性利己主义的混合体,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N. G. Chernyshevsky)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针对的目标。列宁视为加强了自己革命倾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本发展了法国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乌托邦思想。^[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的人”抱怨现代社会的启蒙设计者们的乌托邦理想,他们声称其应用社会科学能够使把每一个人的渴望列成表格,调整并满足每一个人的渴望。出于对“理性的”社会重建的抗议,地下的人选择居住在他位于地下的脏屋子里。

地下人经受着麻痹的超意识折磨。但是“行动健康的人”看不到自然规律,适用于人类生活的困难(确实他认为它们是可安慰的),极度有意识的个体一方面意识到自然科学的机械决定论之间的这种不相容,另一方面,也

[1] 关于在哲学上对虚无主义的讨论以及它与美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关联,参见我的一本书(*Shows About Nothing: Nihilism in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Exorcist to Seinfeld*), Dallas: Spence, 1999。

[2] 关于对《地下室手记》的历史上辩论的内容的讨论,参见 Joseph Frank 的 *Dostoevsky: The Stir of Liberation, 1860 - 18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10 - 347。

意识到人类的考虑和选择之间的不相容。超意识的个体面临着自然科学规律这堵“石头墙”，结果是精神上的“惯性”(p. 13)。〔1〕他解释说：

科学本身会教会人们……实际上他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怪想……他只是一种钢琴键……此外，在这个世界上也存在着自然规律，因此，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根本就不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来做的，而是……按照自然规律来做的。(p. 24)

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为人类的愿望和选择建立一个对数，预测人类生活的未来进程。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再会有任何行为或冒险”(p. 24)。给定科学这种概念和被认为是理性的这种概念，地下的人的抗议只能是消极的，是以非理性的自由之名对理性、健康和科学的一种批判。因此他选择在行动上被动，在社会上孤立，在唾弃幸福的理性追求上。但是即使这是自相矛盾的；像他所记的那样，“对我的敌意(按照自然规律)经受了一种化学上的衰竭”。

然而，对稍加留意的读者而言，地下人提供了不止一种对启蒙社会科学的隐晦否定。他指出了启蒙计划中固有的矛盾。主要的矛盾，迷住了地下的人并且是他的不屈不挠和麻痹的辩证源泉的一个矛盾涉及自由这个问题。启蒙理论家许诺从各种不同的外部权威中的解放：家庭的，宗教和政治上的。但是，执行启蒙理论无意识的结果之一是对自由的消灭。这里的这个问题是由希伽利(Shigalyov)简洁地陈述出来的，他是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Demons*)里的一个理论家：“我陷入了我自己的资料中，并且我的结论与我的最初想法是直接矛盾的。从不受限制的自由开始，我的结论却是不受限制的专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取消自由的一个来源就是新生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只承认按照数学的、精确的一机械的、自然科学的标准能够证实的事情才是真的。另一个来源是对于理论可以转化为实践的那种安逸的启蒙轻信。理论的执行既需要人类本质的改正，也需要社会的合理重建；这才是计划的强迫和暴力本

〔1〕对《地下室手记》的所有参考都来自于 Pevear 和 Volokhonsky 近来的翻译佳作(New York: Knopf, 1993)。

质所要弄清楚的。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表明了启蒙计划的一个更深层的疑难。在试图察觉和调整人类的愿望,在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自我对待的时候,启蒙理论家们已经算错了。他们认为有益于人类的很明显是合理的详细审查,随着教育和政治重组,所有的邪恶都会减少。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增加的暴力和流血的愿望经常是与所谓的文明的进步同步的,而且也没有注意到人类具有更深的一种渴望,对“真正独立的意志”的渴望。为了展示他们自己的自由,地下人坚持认为,他们会谨慎地选择哪一个是有害的和自我毁灭的。在这里,地下人预期了尼采的主张,即人类“宁愿渴望什么也没有,也不能不去渴望”。对尼采而言,这是常有的事,在《地下室手记》里也是如此,虚无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抗议或准备性的时刻。否定被期待会给确定让路。因此,地下的人承认,他并不想始终是一个“平凡的主角”,只是颠倒或拒绝与他同时代的这些理论。“根本不是地下是更好的,而是不同的事情,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渴望但却从不曾找到的事情。魔鬼占领了地下”(p. 37)。

地下人所具体表现的那种麻痹、敌意和虚无主义并不是启蒙理论的替代品;相反,它们是它逻辑上的结果。像他最后奚落他的对手那样:“我只是走到了我生命的一个极端,而你甚至敢半途而废”(129—13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对其对手所拥护的那些理论的一种有争议的归谬(*reductio ad absurdum*),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最终归结到无的演绎推理(*reductio ad nihilum*)。

既不是乌托邦也非虚无主义:《黑客帝国》论作为探险的人的生活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的计划提出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人,在什么程度上自由和自知依然是可能的这些问题。像地下人所形容它的那样,对启蒙运动的社会计划是现代数学物理学的一个延伸,以还原论的假设为基础,即凡是真实的东西都受制于定量分析。给定这样的假设,人类自由和自知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一个相关的问题启示了《黑客帝国》的

开头一幕。像莫斐斯在他与尼欧的第一次谈话中所评论的那样，“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计算机程序里”，在这里你只有一个“残留的自我映像”。他接着问道，“你如何定义真实？……大脑解释的电子信号”。母体的世界是一个“神经系统交互式模拟”的世界。“对人类的剖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的人如是称呼它，解散了人类自知的那种可能性。

是否真的是位于地下，狭窄的尼布加尼撒船和地下人的小屋具有一样的感觉。以它技术上的小机件及其人工智能来影响人类意识，对“进入母体”的“掠夺信号”进行操作的这艘船本身是母体的一个微缩版。但是它既不具有母体内的人类结构所享有的天真的，非反思的自信，也不具有对母体的电脑人的全能和自治的控制。植根于“真实的荒漠”，反抗的队伍用斗争来探知关于人类过去的线索，以便对于目前什么是他们的任务获得一种更清晰的理解，以重新获得迈向未来的一个积极的方向。

选择“真实的荒漠”而不是一个建构的但更舒适的、有序的“真实”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有令人不安的事实，即一个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像莫斐斯解释的那样，“这个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真相”，你被奴役在“你自己的心灵”的牢狱里。就像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一样，这里自由的错误感觉是伴随着我们自己的团结，自我控制，以及支配未来的虚假感觉的。更加适当的自由概念是由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和内在的区分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导致了对人类的一种更复杂的评价。莫斐斯问尼欧是否他有过这种感觉，即“这个世界里有些事情很不对劲”，你“无法解释为什么但却能够感觉得到的”一种感觉。我们必须首先要有一种感觉认为某些事情是错误的，如果进一步深究这种感觉，就会开始一种寻求。正如莫斐斯所说的那样，“它是驱使着我们的一个问题——母体是什么？答案就在这里，如果你想的话，它就会找到你”。

“答案就在这里”这句话使我们回想起颇受欢迎的，上演了很长时间的电视系列片《X档案》(The X-Files)中的口号“真相就在这里”。尽管《X档案》的主要情节线索关注的是外星人对地球的控制而不是人工智能，但它与《黑客帝国》还是具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两个故事里都利用了恐惧、不能预测的和恶意的力量——外星人，复杂的机器，政府，官僚机构，作风，或科技本身——已经秘密地用一个虚构的世界代替了真实的世

界。但是情形甚至比这个还糟糕；因为奴役别人的暴君并不是一个明显可以确认的外部力量，我们只有对其加以识别然后发现消除的方法。相反的，这种能力是在我们身上并且通过我们而得到锻炼的，在很大程度上组成了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巨大的危险——可以很自然的产生虚无主义的那种危险——是，我们失去了对真实的掌握，我们将永远沉迷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如果没有足够的线索来发现我们摆脱构建的世界这个困境的方法，我们就要冒着衰弱的精神晕眩的危险，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要朝着哪里前进这些感觉的一种丧失。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对我们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的根源进行一次研究，只能是对寻求真相的一个拙劣的模仿。（《X 档案》把“真相就在这里”和其他的口号比如“不要信任任何人”和“相信谎言”联系在一起是意义重大的），像阿德里安娜·麦克莱恩（Adrienne MacLean），《X 档案》的一个有理解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

按照字面意思和象征性的意思，斯卡利和马尔德是疏远的和洞察的意思，并且能够通过已经充斥于诸如电视如今是电脑事实上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中的那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探查到分子层面的事物……斯卡利和马尔德互相信任……然而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误的。电视教给他们看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如何形成一种观点。这使得他们去寻求确定性，但也教给他们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所发现的……《X 档案》受到媒体驱使的环境表明，现在，整个世界是同一个地方，它的所有一切都是可接近的，所有都是谨慎的，危险的，限制的，解放的。^{〔1〕}

尽管麦克莱恩关于《X 档案》的寻求动机是完全没有结果的这种主张愿意接受辩论，然而她的描述抓住了影片中人物的一个十分真实的可能性。给定《X 档案》和《黑客帝国》之间在情节线索上的类似之处，影片中的人物看起来和电视节目中的人物面对着同样的命运，都是脆弱的。实

〔1〕 Adrienne MacLean, “Media Effects: Marshall McLuhan, Television Culture, and ‘The X-Files’”, *Film Quarterly* 51 (Summer, 1998), pp. 2-9.

际上，以这样基本的主张，关于人类疏远的主张，关于我们的无能为力区别真相和虚构，真实和一种老谋深算的技巧的解释，构建的主张开始的叙述，冒着两种直接相反的风险：永远不会找到摆脱诱捕的行动的方法和提供肤浅的解决办法，文学和文化批评家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称之为“易做到的卓越”的模式。在他的书《惊魂恶梦》（*Nightmare on Main Street*）中，埃德蒙森论辩说，当代美国文化充满了两种叙述之间的辩论斗争：品质恶劣的哥特式和“温和的卓越战略”。〔1〕两个战略都没有克服虚无主义：前者使我们陷入其中而后者只是提供了逃脱的幻觉。在这一点上《黑客帝国》是如何做的呢？

有证据表明影片想要避免这两种极端，在对待人类自由这个问题上它的可供选择的道路事实上是明显地对于我们对自由的感觉和自我控制而言。我们的生活已经为我们构建起了这种概念是尤其令人厌烦的。就像尼欧在回答莫斐斯的问题他是否相信命运时所说的那样：“不信……因为我不想被控制。”尼欧正在处理一个无力的自由的概念是十分清楚的，不但从与莫斐斯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而且从祭司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温和的嘲弄中也可以看出来。当尼欧准备离开的时候，祭司告诉他说他会忘记她告诉他的那些困难的真相：“你要记住，你不相信命运。你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莫斐斯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与母体所指的自由的消除并不是一样的。莫斐斯的命运概念超越了对一个人的生活的完全控制这样一个浅薄的自由概念和一种彻底的决定论之间的一种划分。在提到尼欧是莫斐斯一生都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救世主时，具有命运实质上是一种天意的暗示。莫斐斯解释说，祭司的一个预言预测“有个从母体中解放的人会回来”。然而，无论是命运或天意的什么力量可能是有效的和人类选择的能力之间的这种关系仍有待于慎重地被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影片中的模糊的最好例子发生在这个场景中，塞佛正要“拔掉插头”并因此而杀死尼欧的时候。他嘲弄般地声称，如果尼欧真的就是救世主的话，那么就会发生奇迹来阻止他的计划，尼欧就不会死。立刻，塞佛被另一个反抗分子杀死了。

〔1〕 *Nightmare on Main Street: Angels, Sodomasochism, and the Culture of the Goth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7.

当然,很少有人会接受自由的这种自相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的人详细叙述了在乌托邦世界里自由的这种矛盾,塞佛这个人物在《黑客帝国》里所具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在影片中一个关键的镜头中,塞佛变成了背叛者并开始着手拔掉他的同事们的插头。当他的行为被发现时,他承认他打算重新回到母体中去,他厌烦了按照莫斐斯的要求做事,并且认为母体是“更加真实的”。莫斐斯自己已经预言许多人是如此“绝望地依赖于这个系统以至于他们会为保卫它而战斗”。塞佛有意地选择放弃意愿,为了舒适、安全和不战斗而抛弃自由。

莫斐斯解释说,母体是一个“电脑产生的梦世界”,目的是要使人类处于“控制之下”。他们的计划是“把人类变成电池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讽刺性描写的理论家们的显著的类似之处,他们把人类与“钢琴键”联系在一起,可能正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获得的一种参考。在1769年,狄德罗写道:“我们是被赋予了感觉和记忆的工具。我们的感觉就是周围自然利用的钢琴键,经常的,他们也自己利用自己。”^[1]

后来,电脑人史密斯确认并扩大了莫斐斯对母体计划的描述。他谈到“数以十亿的人只是生活着……健忘的生活着”。当他承认试图构建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类世界的第一个设计计划被人类所拒绝的时候,电脑人史密斯承认了地下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苦难对于自由的人类的必要性。电脑人史密斯说,“人类是通过不幸和苦难来定义真实的”。但是电脑人史密斯和他的军团共享了乌托邦的设计家把自然、人类生活看作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一种疾病的观点。当电脑人史密斯说,“人类就像病毒一样传播……而我们就是治疗方法”的时候,这是重复了一种地下的人转嫁给他的敌人的一种信仰,即为了实现理性人类这种指示,自然本身必须被加以修正。像所有的乌托邦理论家一样,电脑人史密斯对进步持有一种天真的忠诚。他说:“是演变,莫斐斯,演变;未来是我们的世界。”

在涉及缺乏自我意识和自知时,另一个类似之处显现出来了。按照地下的人的观点,理论家们不但剥夺了其他人的自知,而且还剥夺了他们

[1] 来源于 Conversation Between D' Alembert and Diderot, quoted i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p. 133.

自己的自知。如果他们具有任何的自我意识，他们也会对惯性感到痛苦。莫斐斯告诉尼奥，“母体无法告诉你，你是谁。”这是说缺乏自知在人类最初的傲慢行为中起着某种作用，在第一个地方产生了人工智能吗？在他对母体的来源的描述中，莫斐斯冲击了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注解：他讲到在二十一世纪早期“所有的人类是联合在一起的”并且是一致的，和谐地产生了人工智能。

在这方面，《黑客帝国》里对人类和它的创造物的描述模仿了恐怖流派的经典结构，以《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为原型，在那里面，科学的创造性的雄心产生了一个创造物，科学无法控制它并且它和它的制造者形成了敌对。但是在《黑客帝国》里，人工智能这种创造物占据了有利地位，看起来注定要重复人类未知的错误。母体本身现在正在从事社会重建的乌托邦的方案。摆脱这种循环的方法是什么呢？

逃离母体：人类还是科学的一个胜利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与在影片的过程中尼奥接近的一个复杂的自由概念有很大关系。然而，正好是在这一点上，影片的结尾是高度模糊的。这里问题的一部分是，在许多方面《黑客帝国》选择了典型的好莱坞动作影片的结尾，超级英雄与许多坏人较量。当然，《黑客帝国》里熟练的技术使得它的结局比《虎胆龙威》或者《终结者》类型中的影片的结尾更加的富有创造性和更加的微妙。尽管如此，影片还是更多的是由于它的特技而出名的，而不是由于它在情节和人物上的技巧。当尼奥开始超越普通人身体的那种限制并且开始训练连环漫画册里超级英雄所具有的那种能力的时候，改良过的技术遮蔽了作为精髓的人类特点，而尼奥不得不形成这种特点以便为发动对母体的战争而做好准备。

尼奥看起来非常脆弱，直到最后的战斗来临，抵抗然后逐渐地接受了他在人类命运中的角色。即使是他选择冒着一切风险来与母体决战的时候，结果依然是悬而未决的。在地铁里与电脑人的关键打斗中，尼奥被枪射中，而且明显是死掉了的。崔妮蒂，揭示了祭司的预言她会爱上救世主，并坚持说，“你不可能死，因为我爱你”。她吻了尼奥，并说，“醒过来

吧。”这时尼奥就复活了。尽管我们得到暗示，在尼奥和崔妮蒂之间一直有一种正在形成的依附，这种关系是不足以发展成具有这种戏剧性的影响的。这是影片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黑客帝国》里克服虚无主义的威胁的方法是通过具有明显区别的人的特点和生活方式的恢复。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人类作为独特的个体，能够做到忠诚、爱和牺牲。然而，尼奥、崔妮蒂和莫斐斯这些人物是复杂的、不同的，是补充性的，母体内的电脑人是个人的、非特殊的，是可以互换的。不是给电脑人的这个名字“史密斯”的重大意义在荧幕上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吗？

在影片对人的因素的不予重视中，无论瑕疵可能是什么，正是崔妮蒂对尼奥的爱情不但使得尼奥复活而且立刻证明了他的超人能力。他可以让子弹静止不动并且超越了地心引力的规则；挑战了身体的可靠性，他俯冲进一个电脑人的身体里，然后那个电脑人就爆炸了。

赢得了与母体的电脑人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尼奥警告他们说，他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示给世人，然后他们会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无法预知的世界。像他所说的那样，“我知道你们在那里。我能感觉得到你们。我知道你们很害怕。你们对我们感到害怕。你们害怕改变。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不是来告诉你们这会如何结束。我来是要告诉你们它将会如何开始……我要让这些看到人看到你不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一个没有你的世界，一个没有规则和控制的世界，一个没有边界或分界的世界……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们从那里离去，我留给你们一个选择。”在这里，尼奥忽视了各种复杂化的因素：他低估了与其说是母体的延续的敌对，不如说是自满的，仍然被奴役着的人们可能有的反抗。塞佛的教训似乎被遗忘了。你也许会感到疑惑，是否影片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形成的自由的更加复杂的理由在这里被牺牲给一个作为自治的自我创造的浅薄的人类自由的概念，是否影片开始折磨、掠夺被埃德蒙森所批评的易做到的卓越。实际上，尼奥的预言回应了人类的情形，莫斐斯所形容的情形，在20世纪末期的时候，团结在一起的人类实现了创造力的巅峰时刻并且产生出人工智能。尼奥是在不知不觉中许诺另一个乌托邦吗？

当然，在一部好莱坞影片的连贯性和透明度方面，这可能问得太多

了。但是这部电影，也许比在近来的记忆中的任何其他电影都更渴望一种哲学上的吸引力。它希望我们能够严肃地对待它在哲学上的深思。这使得结束语尤其显得令人失望。普遍的陈词滥调，陈述显得较少选择《黑客帝国》而是某种另外的影片，也许名字叫《尼奥的精彩历险》(*Neo's Excellent Adventure*)。唉，结尾确实反映出好莱坞在结尾技巧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一个结局层层铺陈。

14 取出一个苦的药丸:《黑客帝国》 和《恶心》中存在主义的真实性的

珍妮弗·L. 麦克马洪(Jennifer L. McMahon)

在《黑客帝国》的一开始,主要人物尼奥面临着一个关于存在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在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当影片中的另一个人物莫斐斯告诉尼奥,他所认为的那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在他面前制造假象从而蒙蔽真相”之后,他马上就让尼奥选择其中的一种药丸。莫斐斯告知尼奥,如果他选择红色药丸的话,他就会看到事情的真正本质,然而,如果他选择蓝色药丸的话,那么他对事物的感觉就会保持不变。给定了它们相反的效果,药丸象征着某种手段,凭借着这种手段,尼奥可以要么选择从睡眠中醒过来要么就是继续维持做梦的状态。因而,尼奥对红色药丸或蓝色药丸的选择也象征着在真实地活着和无知地活着之间的存在主义的选择。尼奥吞下了红色药丸,于是故事情节就此展开了。

实质上,所有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详细地谈及了尼奥在诚实和无知之间,或在真相和幻觉之间所做的这种选择。尽管有些人使用的是不同的术语学,他们都倾向于把它描述成是一个在真实性和不真实之间的选择。存在主义者把真实定义为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意识到人类情形的真正本质。相反,不真实被定义为是这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

体要么对真实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否认它。存在主义者的观点是,存在是不具有任何固有目的或潜在企图的。存在主义者声称,人类授予了世界以秩序和意义。他们强调含蓄的自由以及伴随着这种授予的责任,还有它所引起的忧虑。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讨论的共同主题包括谬论、疏远、苦恼和真实性。而尼欧的选择涉及这些主题中的许多问题,十分明显,它是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一个选择。

在描述真实和不真实的时候,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们往往会给予真实特权而不是给予不真实。例如,像艾伯特·加缪(Albert Camus),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和萨特(Jean-Paul Sartre)这样主要的存在主义者明显提升了真实的地位而对不真实加以嘲笑。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这些个体一律都是用消极的术语来描述不真实的。萨特称不真实是一种有害的信仰。^[2]加缪形容它是智力上的自杀。^[3]海德格尔则声称不真实的活着不但会导致“所有可能性的水平下降”,(*Being and Time*, p. 119)而且还会使得“相位调整同样是不可能的”(p. 181)。相反,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肯定地把可信的生活方式形容为是一种勇敢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充满了“最高权威”(“Absurd Reasoning”, p. 40)并且“摆脱了幻想”的生活方式(*Being and Time*, p. 245)。奇特的是,不考虑存在主义者所使用的用来形容真实的这些肯定术语,如果不是彻底让人沮丧的话,那么他们的文学人物肖像,那些接近或完成它的人物肖像也是令人气馁的。然而,不真实的人物被形容成是存在于安静的无知之中的,接近真实的人物被描写成是担忧的、疏远的,是精神错乱的临界标志物。由于这样描写的优势,存在主义文学似乎暗示着对于真实的向往使得痛

[1] 无可否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6)里的主张,“此在(*Dasein*)的不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存在具有一个更低的意义。”(p. 40)导致了一些人怀疑海德格尔实际上是否真的认为真实是优于不真实的。然而,看起来十分明显这种主张是为了澄清真实和不真实是同一存在的模式而不是两种分类不同的存在的模式而做出的。重要的是,声称真实和不真实是同一存在的模式并不妨碍海德格尔认为其中一个是一个较高的模式。海德格尔对不真实的消极描述清楚地表明了他认为它是低级的。

[2]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56).

[3] Albert Camus, “An Absurd Reasoning”, in *The Myth of Sisyphu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Vintage, 1955).

苦,社会混乱,有时是疯狂是必需的。这些结果使得一个人不得不问,真实是否确实比不真实更加优越。尽管真实可能代表了对人类情形的一种诚实的意识,也许无知是福。也许选择蓝色药丸更好。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要验证真实和不真实以及他们各自的好处和负担。我将用《黑客帝国》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恶心》(*Nausea*)来支持我的主张,因为在这些著作中的人物例证了两种状态的正反两方面的辩论。尽管这篇文章会质疑真实的吸引力,它还是会以支持真实的一个论点来结束。不考虑它所代表的这种挑战,我要论辩的是,真实的好处在价值上是超过了它的负担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中可以达到一种独特的平静。我是会赞成选择红色药丸的。

红色还是蓝色? 尼奥和塞佛关于真实和无知的选择

像存在主义文学的经典名作一样,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黑客帝国》既表明了真实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也表明了不真实的吸引力。这部影片描写了一种未来的状态,在一个长时期的争夺世界的冲突之后,电脑人征服了人类并且把人类作为他们的能量来源而对其加以奴役。母体是一种由电脑所产生的虚拟现实,即安抚了人类,又使得来源于人类的能量输出最大化,而人类作为俘虏躺在一个巨大的能量夹层的联合体中。而母体内的数以十亿的人在对他们的真正情形的幸福的无知中存在着(作为固定不动的,供统治地球的人工智能使用的可以消耗的能量电池),一部分个体脱离了它的数字化幻想。与他们对应的俘虏不同,这些个体痛苦地意识到人类的真实状态。他们组成了一股反抗力量,寻求破坏母体的压迫。结果,他们过着被试图消灭他们的电脑人所通缉的生活。然而,《黑客帝国》的哲学含义有很多,尼奥这个人物的解放以及塞佛这个人物做出的选择例证了在这里所表达的关于真实的这个要点。

尼奥这个人物说明了在迈向真实和达到真实的运动中所伴随着的极大痛苦。从一出生就被安置在母体内,尼奥一直过着没有意识到他置身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幻觉的生活。然而,在莫斐斯和他的反抗队伍

〔1〕 参见这一部分的第一章来彻底比较一下尼欧和柏拉图的囚犯。

会选择一种在地下通道里度过的生活,在永久的威胁之下的生活,每一顿饭都是没完没了地重复着粘糊糊的东西的那种生活?与此同时,塞佛丧失了自治、诚实和真实经历的机会、返回虚拟的母体世界的人类联系,他的选择会减轻伴随着真实的那种极端的担忧和不舒适。处在他的位置上,我们也可能会选择幻觉。

萨特关于容忍的存在

在他的小说《恶心》(*Nausea*)中,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阐明了环境不必要成为那些追求真实的科幻小说中的环境,看起来是无法承受的或不真实的把它自己作为一个避难所。《黑客帝国》里人物和环境都是非凡超常的,萨特的小说则引入了一个普通人的发现,即存在并不像他所假设的那样。在《恶心》中,主人公罗昆庭(Roquentin)不情愿地意识到真实的真正本质。尼欧具有非凡的能力,并且实质上是以救世主为特征出现的,萨特竭尽全力强调的却是罗昆庭普通的一面。罗昆庭是一个没有伴随着欢呼声的历史学家。他写书,而且还经常会去小咖啡馆坐坐。他住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一个相当普通的城市里。他的行为适度,谦虚。他有一个小的,无特征的寓所。的确,罗昆庭的唯一不平凡之处就是他那令人震惊的红头发。类似的,这个普通人的启蒙不是由一艘令人激动的气垫船从凝胶状的监禁中的营救开始的,而是在海滩上的一次令人不安的经历之后开始的,他手中的一块小鹅卵石的存在造成了令人厌恶和难以处理的恐惧。无法动摇这次经历所产生的这种烦扰的感觉,罗昆庭叙述说,“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1]尽管他试图解除他对石头的这种反应,把它当作是“一个过去了的疯狂时刻”(Nausea, p. 2),后来的经历导致了罗昆庭——以及读者——感到疑惑,是否他得了精神病。

我们得知,罗昆庭对鹅卵石的体验还只是一个开始。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罗昆庭的情形变得更加糟糕。确实,对罗昆庭而言,

[1] Jean-Paul Sartre, *Nause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4), p. 2.

看起来这种稀奇古怪的态度变得很平凡，因为他平凡的存在具有一种引起幻觉的性质。与尼欧吞下红色药丸的经历相似，罗昆庭的感知变得越来越扭曲。例如，当握住一个朋友的手表示问候的时候，罗昆庭极其厌恶地放开了朋友的手，因为它摸上去如同是“一条油腻的，肥肥的白色虫子”（p. 4）。类似的，罗昆庭被恐惧吓得差点瘫痪，当他抓住门的把手，好像它“用一种人身攻击”（p. 4）的方式把他向后抓并且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些经历促使罗昆庭对于真实的信心开始减退，他开始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被证实的”（p. 13）。当罗昆庭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找到任何安慰。他得不到安慰是因为当他看自己的时候，他“对他的脸是一无所知的”（p. 16）。相反，他只看到一些事情“在植物世界的边缘上，在水母的水平上……带着放任发展和跳动的平凡的肉体”（p. 17）。同样地，当罗昆庭看他的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甲壳类的东西，这种印象是如此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他刺伤了自己的手（p. 100）。

作为自己经历的一种结果，罗昆庭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变得令人不安。它失去了正常的状态和连续性。罗昆庭形容他的生活变得“可笑和慌乱”（p. 5）。他不安地陈述说，“没有什么事情看起来是真的，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可以很快移动的纸板景色包围着”（p. 77）。当他的感知重复地挑衅他的习俗的理解的时候，罗昆庭的世界在他周围解散了。例如，当在电车轨道上骑马的时候，罗昆庭努力地想要保持平静，因为一个简单的坐垫看起来像是一个死去动物的浮肿发胀的腹部。他感到极度痛苦，“事物与它们的名称被分离开来。他们就在那里，奇形怪状，头部强壮，巨大，说任何关于它们的事情……似乎都是荒谬的。我处在这些没有名字的事物当中……感觉是无助的”（p. 125）。毫不令人奇怪的是，罗昆庭的经历使得他日益感觉到孤立，没有方向感，并且“充满了苦恼”（p. 55）。

尽管看起来罗昆庭和现实之间正在日渐疏远，但是在《恶心》的结尾，十分明显地，他实际上正在意识到它的真实本质。正如萨特所解释的那样，罗昆庭的经历所揭示的是“事物的多样性，它们的个性，只是一种外观，一种外表”（p. 127）。罗昆庭的经历告诉他“那个世界并不是存在的那个世界”（p. 129）。它们向他表明了我们所相信的秩序和价值是这个世界所固有的。相反的，其中的事物是“我们在表面上所探索到的一些微弱的

参照点”(p. 127)。在《恶心》中,罗昆庭面对着令人厌烦的、压倒一切的真相,人类存在于——并且被局限在——一个缺乏实质性秩序和含义的世界里。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所解释的那样,尽管并没有创造它,人类的意识还是给予了世界以秩序和目的。没有意识的这种构造行为,这个世界就是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总体,一个可怕的无差别的整体存在着。在栗子树的根部,“这个世界,这个赤裸裸的世界突然把它自己暴露给了”(p. 134)罗昆庭。由于以前的经历的推动,罗昆庭最后终于变得正式意识到存在的真实本质。他承认他所认为是真实的秩序和目的只不过是寄予它的一种构造意识。不是意味着所揭示的真相,罗昆庭陈述说,“我憎恨这种不光彩的混乱。存在上升,上升到和天空一样高,每个事情都充满了它的凝胶状的滑动……我由于对这种总体上荒谬的人的愤怒而窒息了”(p. 134)。看到存在的本质时感到恶心,罗昆庭形容存在是一种“凌乱的痛苦”(p. 174),既使他感到厌烦又让他感到“害怕”(p. 160)。

真实性:我们对它的厌烦和对它的赞成

在《黑客帝国》和《恶心》里,主人公都意识到了人类情形的真实本质。像他们所阐明的那样,这种意识是令人不愉快的,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抵制,这是因为它所揭示的真相是令人恐怖的。当他告诉尼欧,“我并没有说它会很容易,很简单,我只是说它会是真相”的时候,莫斐斯承认了真实性的这种负担。我们看到避免这种负担的愿望是明显的,这种愿望不但体现在塞佛选择重新回到母体中,而且还体现在茂斯对虚拟的红衣女郎的迷恋和尼欧第一次重新进入母体的时候对面条店的怀旧之情中。

重要的是,《黑客帝国》和《恶心》都表明了真实性是困难的,不但是因为它所揭示的真相是让人难以容忍的,而且还因为非真实是标准。存在主义者承认大部分人是非真实的、不可靠的。他们把不真实的流行既归因于心理上的抵抗也归因于社会的教化。像罗昆庭和尼欧的经历所明显表示的那样,真实的真正本质并不必然是人们想要看到的事情。更正确地说,存在包含着许多我们宁愿否认的现象。死亡,苦难,无意义是三个

明显的例子。大部分的人都很难接受存在的这些方面。然而，真实使得接受现实的所有方面是必需的，而不只是那些我们认为令人舒服的事情。存在主义者声称，非真实是普遍深入人心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想知道存在的艰难真相。相反的，人们更喜欢用一系列关于生活的谎言来让他们自己得到安慰。这些谎言按照大小排列，从形而上学的无伤大雅的谎言到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的很小的流言蜚语，但是它们都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谎言。像《黑客帝国》所阐明的那样，不是渴望得到祭司的指令，“认识我自己”，大多数人更喜欢逃避事实并停留在他们自己的梦世界里——或者别人的——设计里。

如同心理上的反抗一样，社会教化对真实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像存在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大多数人是如此彻底的习惯于相信世界就是那个样子，像他们被教导的看到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们抵抗任何可以替代的选择。这种教化以及它所鼓励的对于改变的抵抗，使得通过让它疏远和使它看起来是疯狂的一个举动从而变得真实更加的不可能。

不真实的流行使得迈向真实变得疏远主要是因为它要求一种个体，这种个体正在变得真实接受对事物的一种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理解。像莫斐斯所指出的一样，“大多数人还没有做好被解救的准备”。大多数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真实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接受他们自己以及和其他人所分享的这种对于生活的令人舒适的幻觉，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放弃它们。因此，大多数人不但自己会抵抗真实，而且还会与任何想要迈向真实的人断绝关系。这种抵抗是明显的，在《恶心》里罗昆庭敌对性的对待，在《黑客帝国》里对作为“硬件”的那些会积极推翻革命的努力的不自由的个体的描述。像罗昆庭所陈述的那样，“对大多数人而言，认为所有同样的事情是一起的是十分重要的”(p. 8)。由于不真实的普遍深入，对人类的情形趋向于有一个诚实意识的人失去了其他人的支持，正好是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的确，表面上普遍存在的想要和其他人一样的愿望和社会对不正常行为的禁止足以阻止大多数人去达到真实。

除了对一个难以承担的真相的揭露和强迫的社会疏远，跃迁到真实往往表现为一个疯狂的举动并且也往往会引起疯狂的感觉。当然，尼欧遭受了疯狂的感觉。可以论证的是，萨特的主人公罗昆庭甚至更加清楚

地阐明了这种效果。罗昆庭再三地对他的心智健全表示质疑。在他对鹅卵石的经历之后,他猜测自己可能是“不清醒的”(p. 2)。类似的,在一系列令人昏乱的游离经历之后,罗昆庭推断说,其他人可能会把他归入“疯狂的笨蛋那一类”(p. 64)。像罗昆庭所证明的那样,为了真实的运动既代表了朝向疯狂的一个运动,也是如此被经历的,因为对真实所获得的这种理解超越了作为“常态”而被建立的东西。因此,接近或者达到真实的个体不但在其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疯狂的,而且很有可能她自己都感觉自己是疯狂的。

给定已经说过的关于真实的这些内容,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任何人都想要达到真实。像存在主义者所承认的那样,要想达到真实,我们不但要接受世界没有固有秩序和目的这种观点,而且还要接受我们是对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创造的含义承受完全责任的脆弱的和有限的生物这种观点。给定这种意识的负担和疏远的感觉以及它所产生的疯狂,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个体更喜欢对人类情形的本质保持无知并且与真相隔绝。

尽管非真实的确看起来比真实具有某种显著优势,后者仍然是更优越的,更可取的。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虽然不真实地活着确实可以减轻忧虑,但却无法根除忧虑。对于像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这样的存在主义者而言,忧虑是从我们人类的本质中产生的。因而,根除忧虑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消灭我们自己。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人会愿意做出的选择。毕竟,如果死亡标志着我们的结束,那么我们大约就不会感激它所带来的这种忧虑的根除。按照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的说法,忧虑是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它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因为人类都具有一种本性,植根于对他们的真正本质的直觉认识的一种对人类的内在关注。像莫斐斯所形容的“心头之刺”一样,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认为,我们都具有一种脆弱性和对我们本质具有忧虑感的依赖性。存在主义者承认,我们可以掩饰——或否认——这种认识,但是他们声称,我们是无法根除它的。不真实正好是想掩饰这种企图,或者想要压制我们肚子里知道的但是脑子里却不想承认的这种企图。当一个人不真实地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就掩盖了他存在的不安全感的真正原因,相反会把这种感觉归

因于某种世俗的原因。例如,不是把我们经历的这种普遍化的忧虑归因于存在本身,我们往往是把它归因于某种局部的来源,比如工作,另一个人,或缺乏一个特殊的物体,或身份。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存在的不安全感归因于一个世俗的来源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这种不安全感是可以被控制甚至是可以被根除掉的。我们认为,如果得到了工作,或得到一辆合适的车,我们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感就会消除。然而,既然不真实代表一种“飞跃……从自身的”(Being and Time, p. 172)并且我们不能逃避我们是什么,一种不真实的生活是以某种令人绝望的热情和永久的努力为特征的。无论我们想承认还是不想承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这种阴险的循环。令人悲哀的是,由于它内在的动力,不真实的个体存在着,从他们的存在中逃离,同时拒绝承认他们逃离的实质原因。

除了未能根除忧虑以及使得一种“逃离的生活”成为必要之外,不真实地活着也具有限制一个人的自由的消极后果。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当一个人不真实地活着的时候,一个人不但掩盖了世界的真实本质,而且还掩盖了这一个体的真实本质。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尽管人类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他们不能选择的情形里,但是在那种情形之内,他们还是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这种自由是令人恐惧的,个体经常会寻求去否定它。不真实地活着的个体生活在对他们自己的自由的否定里。因而,他们活着,对他们自己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真正的意识的活着。不真实的个体不承认他们的选择的真正范围。例如,不是信奉他们不得不创造他们自己的这种机会,相反的,他们采用预先确定了的身分。他们陷入了规定给他们的角色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角色。最终,不真实的个体不能够做出真正明智或自治的选择,因为他们做出的选择都是与他们早已确定了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为他们自己选择。通过对责任的转移,不真实地活着给了个体某种舒适感。然而,在损害个体自治的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

尽管真实使得一个人接受某些烦扰的事实是必需的,但与不真实不同的是,它让一个人诚实地活着。给定在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中实现一个人的潜能和作出见多识广的选择的这种不可能性与做人虚伪,真实似乎

是不寻常地更加可取的,更加优越的。然而向真实的靠拢破坏了一个人传统的理解,并且迫使一个人免除了对这个世界的某种幻觉,没有必要引起疯狂。相反,通过允许一个人承认存在的本质和一个人的关注的真实原因,变得真实不但可以产生一种可以做出真正选择的情形,它还可以迫使一种独特的平静和存在主义的正确评价。萨特阐明了这一点,当不顾他经历中最初的恐惧,罗昆庭意识到存在是“一个完美的自由礼物”(Nausea, p. 131)和一种“人类从未放弃的成熟”(p. 133)。的确,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当罗昆庭形容它是“浓厚的,巨大的和美好的”的时候(p. 13),存在已经从某种引起厌烦的东西转变为与美好接近的东西。像萨特所阐明的那样,当罗昆庭最终承认存在的真实本质的时候,他的恶心感减少了。它从一种窒息转变成一种“平淡的想法”(p. 5),使得他从厌恶到极其痛苦变得——可以忍受——对人类情形的正确评价和它所带来的负担(p. 157)。当他接受存在的真实本质的时候,罗昆庭停止了奔跑,开始了新的生活。构成了小说的大部分内容的噩梦似的经历结束了,罗昆庭让自己完成着辛勤的、单调的任务,一天天地活着“没有理由,没有借口”(Being and Nothingness, p. 78)。不考虑它所描述的这种烦扰的画面,《黑客帝国》也是以一个积极的注释结束的。尽管看到现实的真实本质最初以一种和影响了罗昆庭的方式大致一样的方式影响了尼奥,但尼奥也克服了他的恶心感并且抓住了存在所代表的重大机会。的确,在影片的结尾,看起来尼奥是坦然自若的,不但是为了塑造他自己的未来,而且还为了把人类从压抑中解脱出来。

如同罗昆庭和尼奥所证明的那样,真实所带来的洞察力只有在我们抵抗它的时候才是无法承受的。尽管存在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一切,但它是压倒一切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它是某事而不是现在的样子。如果放弃了这些期待,一个人就可以认为事情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只有在这一点上,一个人才可以充分地正确评价和利用存在的这种显著天赋。然而,真实可能不符合我们传统上的关于幸福的定义,真实地活着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平静,因为它结束了从以不真实为特征的人类的疯狂逃离。它代表了一种自我开放和对是什么的一种接受。尽管存在的真相可能是让人冷静的,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和我们的本质所在。不考

虑它的吸引力,如果海德格尔是对的,我们的存在就是时间,而且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浪费时间就会是疯狂的举动——并且这样一个人是——不真实地活着。另一种方法,像尼欧提醒我们的那样,未来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红色药丸吧。^[1]

[1] 特别感谢那些参加了我在题为“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疯狂和福佑”(2000)的国际会议上所做的介绍的人,特别感谢 Peter Fosl 博士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大学的学生们。我对这些人所提供的关于两次演说的注释表示感谢,因为这篇文章正是建立在这两次演说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评论和批评为这篇文章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15 对尼欧科幻小说的 真实回应的悖论

萨拉·E. 沃思(Sarah E. Worth)

《黑客帝国》是萌芽流派的影片中的一部,本质上是关于哲学的,它明确地质疑我们实际上理解和起作用的那种方式。这无疑是好莱坞正在开始给予更多重视的一个主题。《黑客帝国》、《斗战俱乐部》(Fight Club)、《X 接触——来自异世界》(eXistenZ)和《十三度凶间》(The Thirteenth Floor)(都是在1999年上映的影片)涉及的都是现象和本体之间不可靠的差别,以及存在着不同“层次”或“版本”的现实的可能性。这些影片都是从一种传统中产生出来的,比如影片《巴西》(Brazil, 1985)、《全面回忆》(Total Recall, 1990)、《异度空间》(Lawnmower Man, 1992)、《异度空间2:超越电脑空间》(Lawnmower Man 2: Beyond Cyberspace, 1996),甚至是更近一些的影片《楚门的世界》(Truman Show, 1998)。

《黑客帝国》暗示着“真实的”现实比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幻象更糟糕(尽管我们太无知,太落后而无法知道它),《斗战俱乐部》则暗示着我们人格中落后和渴求的方面会自行其是——带来伤害。影片《十三度凶间》和《X 接触——来自异世界》深入研究的都是有关不同层次的虚拟现实中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以及在给定的时间之内我们是否能够确切地知

道我们所生活的现实是真实的。除了《X 接触——来自异世界》之外，^{〔1〕}所有这些电影都假定有某种被区分了的、“真实的”现实；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现实，我们将能够识别它，而且这种现实应该像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事情那样发挥作用。

比所有这些电影更早的影片是《星际迷航》(Star Trek)里的霍洛德克(Holodeck)，在那里，恒星飞船进取号(Enterprise)的幸运成员能够穿越从小说的观看者到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的这种障碍，以一种十分真实的方式经历好像是进入一个虚构的空间并且能够在这种虚构内部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互相影响。霍洛德克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对观众而不是对参与者而言)就是，这个程序有时会受骗或者是冻结并且“真实的”玩家就会被困在“虚构的”故事里。因此，“什么才是真实的现实”这个问题就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被加以讨论，因为如果玩家不能够让程序工作，那么他或她就要被永远地困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虚拟的世界——他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在一个重大的方面，这是所有影片都向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观看尼欧在理解两种不同的世界做斗争(通过他对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的选择表现出来)，而与此同时，当我们使自己参与这种影片为我们所创造的虚拟空间的时候，作为观众，我们也在为自己选择由红色药丸所象征的这个世界(“选择红色药丸，你就会继续呆在仙境里”)。我们在虚拟中“失去自我”越多，我们就会以一种在心理上与尼欧进入他的新现实，与恒星飞船进取号上的居住者进入霍洛德克，与在《十三度凶间》里道格拉斯霍尔和简·富勒进入模拟世界相类似的方式，或者是以在《X 接触——来自异世界》中艾丽和泰德进入模拟的游戏世界的那种方式类似的方式更加深入地选择进入这种改变了的现实。

质疑现实

关于现象和本体之间的区别问题，以及古老的柏拉图哲学和笛卡尔哲学对它们的认可将会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让我们把注意力

〔1〕 在《X 接触》的情况下，在影片的结尾科洛恩博格陷入了疑问之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十分确定的方法可以区别现实、虚拟的现实和虚构是有争论的。

集中于虽然相关但却不同的一组问题上。作为观众,我们与影片本身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影片中人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如何相似的?如果我们以一种类似于这些影片中的人物被困在他们所经历的不同真实版本中的那种方式也被困在一种虚构中会怎么样?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当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对虚构的东西具有情感上的回应呢?

在传达一个故事的要点上,叙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一次交谈中,我可以说我做了一个梦,是一个关于不同现实的梦,但是一种延伸的叙述会传达出这个事件的一种更加详细的含义,并且有可能会让听众产生一种更加情感上的回应。听众会获得这个故事的重点以及一种详细的叙述中的框架,但是从我的叙述中只会得到一些事实,即这个事件发生了。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故事——纪录片(事实),文献电视片(以事实为基础),历史小说(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小说),以及宽松定义上的小说(任何“编造的”故事)。要记住的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都做出了情感上的回应——不论我们是否知道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我们对小说做出回应,知道它是一部小说,并且我们甚至是更强烈地对生动的和富有表情的、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性描述做出回应。我们依附于小说,是因为我们享受我们对它们做出回应的那些方面。如果一个故事是精彩出众的,一般而言,我们的回应就会很充分,也就是说,当叙述更好地形成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做出的回应,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在小说和我们对于它们的信仰以及我们对于它们的回应之间的这种关系。

为什么会为小说做出回应

我们对于小说的回应产生了一组复杂的问题。首先,在陈述或小说的标题之下所包含的东西会具体表现从文学、电视到大屏幕影片到虚拟现实的游戏等所有的事情。问题并不完全是,故事是虚构的或它是虚拟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故事的重新表现——真实的或不真实的。为什么我们有目的地经历事情——并享受这些经历——我们知道它们并不是真

实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小说的悖论”。这种悖论可以构建如下：

- (1) 我们只对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做出情感上的回应，
- (2) 我们不认为小说是真实的，且
- (3) 我们对小说做出情感上的回应。^{〔1〕}

从逻辑上而言，为了解释第一部分，似乎我并不需要对你告诉给我的一个故事具有情感上的回应，如果我事先知道它不是真的——例如，如果你要说“我要告诉你的不是真的”，然后又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对于曾有的浪漫关系如此狂热，以至于撞火车自杀”。在逻辑上和实践中，我根本没有理由要关心你的朋友或者我要对你的故事具有某种情感上的回应。但是我们确实始终对虚构的和不太真实的故事具有一种情感上的回应。

人们经常会给出各种各样的回答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确具有这些回应。这些回答的范围涉及各种建议和主张，有一种认为“自愿悬置(对文学表现的)不信任”(最先是由塞缪尔·泰勒·科尔里齐提出来的)，主张则认为任何一种对于人物的移情作用都会使得观众或读者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回应。^{〔2〕} 由于我发现这些解释中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我想建议的是，与在一种真实的现实和其他制造的或模拟的现实之间的任何真正的区别相比，我们移情于虚构人物的那种方式与故事被告知的方式有更大关系，或者它与一种对怀疑的自愿中止有关。是否它是《楚门的世界》里的布景，即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还是它是在《黑客帝国》里尼欧所提供的那种真实，当观众被情绪化地卷入其中的时候，是因为故事情节太精彩了。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我们并不相信我们正在看的东西是真实的。这是使得它成为一个悖论的关键成分。起先，尼欧不相信他吞下了红色药丸后所发现的事情真的是真实的，直到他被告知这个故事的这些部分对他而言开始解释得通的时候他才相信，即使是在他相信以后，在很长一段

〔1〕 小说的这种悖论是一个基本的种类，两个子种类是悲剧的悖论(我们怎么可能从悲剧中获得美学上的愉悦?)和恐怖的悖论(为什么我们会享受恐怖当它是通过扮演所表现出来的时候?)。

〔2〕 Jerrold Levinson 在解释这种竞争的理论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参见他的“Emotion in Response to Art: A Survey of the Terrain,” in Mette Hjort and Sue Laver, eds., *Emotion and the A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0 - 34。

时间里,他还是继续质疑这个新现实不得不提供的事情的不同方面。因此我们所相信的关于什么是真实和什么是不真实决定了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故事。当科技已经改变了我们所经历的小说所具有的那个程度的本质的时候,一种或另一种信仰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的范例来谈论正确的或真实的感情。当我们在观看《女巫计划》(The Blair Witch Project)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观看这样一部电影,即电影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的正在发生。但是科技,特别是由IMAX影片所提供的科技,对我们的感官而言比一部传统的电影更加具有某种效果,甚至是《黑客帝国》里赢得奖项的特技,在完全超出了我们简单的信仰,即我们正在看到的不是真的在发生的那些方面似乎使我们困在了影片中。要点似乎并不是我们不相信正在发生的是真实的,而是讲故事的这种方式(现在是影响了告诉故事的方式的真实性的特技)似乎是比我们如何对故事做出回应更加有影响。

这种新的虚构的媒体中的一些甚至有模糊我们所经历的真实世界和虚构的世界之间的界限这一危险——其中一些甚至使得那种界限变成不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关于是否我们能够像尼奥进入母体一样在想象上进入虚拟空间。由于尼奥被再三告知,“没有人能告诉你母体是什么,你必须亲自见识一下”。为了亲自经历这种非常不同的现实,尼奥不得不选择吞下红色药丸。这类似于这个事实,即当有人告诉我一部电影或一本小说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具有和我自己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过的时候一样的经历或感情上的回应。甚至有可能,我们作为观众,可以同样接近尼奥在真实的荒漠中所具有的那种虚拟空间吗?肯德尔·沃尔顿(Kendall Walton)建议说,我们从心理上体验虚构的东西的那种方式和小孩子玩虚假的游戏时从心理上所经历的那种方式类似。^[1]然而,那也暗示着以一种与尼奥进入虚拟现实,也就是母体的方式具有相关类似性的方式,我们真的能够进入虚拟空间。尽管我们的身体并不能进入另一个空间,通过说它是一种认知上类似的经历,从而能够

[1] 参见 Kendall Walton, *Mimesis as Make-Belie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解释作为结果的情感上的效果,会使我们减轻负担,即要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认为不是真实的事情做出回应这种负担。也就是说,如果经历在认知上是类似的,一种“对于现实的信仰”或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的清晰的区分不但变得模糊而且还是不相关的。

然而,不要误解。十分清楚我们还没有不得不相信在影片中发生的事情以便受到它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不能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应该具有一种情感上的、适当的(有审美感的)回应。当想起灾难或恐怖的时候,这是尤其正确的。^[1]一般而言,我们并不因别人悲惨的生活而感到愉快,我们也不会从观看被追捕、被搜捕或被谋杀的人中获得快乐。但是,在一部小说的内容上,我们经常会享受这些事情。然而,只是在我们不相信它们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享受它们。在尼欧通过一种程序化了的电脑模拟学会了各种武术的融合之后,只是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真正受伤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享受观看尼欧和莫斐斯之间的打斗。在《黑客帝国》所运用的各种特技中这种情形更进了一步,因为观众所看到的是,如果时间减慢甚至是停止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至少它不是我们经历的部分,我们仍然可以允许它来影响我们对影片所做出的回应。(这些情形的范围也被媒体延长了,用一种新型的喜好窥视的电视节目如 *Survivor*, *Real World* 和 *Big Brother* 等。我们甚至可能接触到了要点,我们的确想要知道这种介绍是“真实的”以便从中获得美学上的愉悦。)

让我们和爱丽斯一起进入梦境

影片《黑客帝国》多次机智而又十分重要地提到了《爱丽斯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当和尼欧一样面对着奇怪的新现实的时候,爱丽斯也有许多同样的问题。从一开始,尼欧(在那一点上仍然是托马斯·安德森,在兔子洞外面的)被告知跟随小白兔(一种文身),并最终使他通

[1] 参见 Noël Carroll, *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nd Peter Lamarque, "How Can We Pity and Fear Fi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1 (1981), pp. 291 - 304.

向了真实。尼欧一到那里，莫斐斯就对他说，“我可以想象得出，你现在可能感觉有些像爱丽斯——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兔子洞”。这些明确的指涉清楚地表明了影片的创造者们允许尼欧具有的这种经历与观众对影片所具有的那种经历是类似的。作为观众，我们观看影片并且变得越来越陷入尼欧所经历的这种新现实中，并且我们要适应不同的现实，与此同时尼欧也是如此。因为《爱丽斯梦游仙境》是一部我们几乎都很熟悉的小说，我们（影片的观众和尼欧）同时被带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新仙境。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或者让虚拟的世界进入到我们的想象中来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自愿地悬置了我们的怀疑”。撇开柯尔律治不论，我们无法自愿地决定相信或不相信任何事情，我们认为外面正在下雪，而视觉或感觉上的提示告诉我们其实不然。当与小说交战的时候，我们没有悬置一种批评的能力，而是训练了一种创造的能力。我们没有积极地悬置怀疑——我们积极地创造了信仰。当我们学着进入虚拟空间（我的确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事情，并且还需要我们必须加以锻炼和发展的技巧^[1]），我们越来越期待更充分的经历这种崭新的空间。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沉浸在这个新世界里，就像尼欧开始把他自己沉浸在母体外面的真实世界里一样。要这样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个被包裹着的世界，并且用我们的创造力来加强我们所体验到的这种真实感，而不是对它产生质疑。

技术上越来越娴熟，越来越像“真实”事件的小说是如何产生令人感动的回应的？有人论辩说，我们必须理解感情在对真实事件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起作用的那种方式，以便理解我们如何会满怀深情地对小说做出回应。然而，这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似乎正在从我们与虚拟的情形的互相影响中消失的那种信仰要求并没有深深地禁止我们具有类似的经历，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现象上。如果我们也是如此感觉并且具有相关的类似的情感上的回应，为什么经历不可以被说成是真实的？在许多方面

[1] 这种主张表面上可能会因为小孩子似乎可以相对熟练地去做这个事实而受到质疑。小孩子不必接受训练来玩虚假的游戏，他们似乎是充分且很容易地就沉浸在他们自己制造的虚构的和想象的世界里。然而，似乎像沃尔顿所争论的那样，成年人是在心理上以一种与小孩子在自己制造的虚假的游戏中所经历的类似的方式来参照虚构的经验的。尽管小孩子是十分自然地做这些事情的，作为成年人接受训练来做这些事情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的东西。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互相交叠甚至是联合在了一起。同样的,在《黑客帝国》里的两个世界也开始互相交叠和联合。当尼欧被剃光了头并被安置在他的新住处之后,莫斐斯把他带到了一间全部是白色的房间里。尼欧惊讶地发现他的穿着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莫斐斯向他解释说,这是他自己的“残留自我映像”并且这是“数字自我在身体上的映像”。尼欧旧的自我映像从一个世界横渡到了下一个世界。类似的,塞佛似乎并不能放弃牛排的美味和诱惑,即使是他“知道”牛排不是真的存在。我们对于什么是真实的知识 and 什么不是真实的知识的理解并不会必然地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或我们对这些事情做出回应的方式。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即区分现象和本体的那条界限(在《黑客帝国》和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像我们原先所认为的那样是清晰的。我们甚至还可能需要积极的让那条界限消失以便能够解释得通我们与小说之间所具有的这种互相影响。

讲故事的重要性

在“现实”中,我们始终是在没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对人和情况做出判断的——我们必须这样做只是从实践上而言的,因为搜集我们所假设的所有信息所要花费的时间会抑制我们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用猜测和我们自己的偏见填平了知识的缺口。因而,现实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真实”,因为我们靠自己做了许多的解释。对小说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假设我们所读的那些人具有贴切的、类似的人类生活,他们就像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活动,除非另有说明,我们假设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世界的运转方式一样的世界里。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在现实和小说里,我们被给予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大体结构,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来填充细节。就小说而言,这种结构被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被给予了几乎所有的信息。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层面上,我们用来作为基础以建立对一种情形的连贯理解的信息并没有以一种小心建立的方式给予我们。更确切地说,我们获得了某些细节并构成了一个易于理解的我们自己的故事,是用我们自己的偏见和偏爱,从我们自己的看法的角度起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的文化所决定的。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并且我们确实不得不创造和填充我们自己的现实的重大部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正在编造我们自己的故事——且这些故事就是我们的生活。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在他的关于叙述和智力的书里解释说:

我们需要告诉别人一个关于描述我们的经历的故事,因为创造故事的过程也是在创造记忆的构造,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将会包含故事的要点。谈论也就是记忆……但是讲故事并不是预演,而是创造。创造这个行为本身是一种值得纪念的经历。^[1]

通过倾听和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创造了含义和记忆。因此,在故事创造方面,现实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更像是小说,我们是否必须具有一种信仰要求以便具有—种正确的感情这个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是被误导了的。

即使我们确实创造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并使之成为现实(或使我们的现实成为故事),当我们经历虚构的模拟的时候,我们仍然具有一个从我们的评估中缺少的信仰成分。如果我认为我正在穿越大街,那么无论汽车是否是虚构的,我都能够估计出如果我待得太久的话肯定会处在一种致命的危险之中。如果我是在玩一场虚构的现实游戏的时候做出这种估计,那么我的身体就不会处于任何的危险之中。然而,理解了叙述是如何破坏了在现实和小说之间的区别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种悖论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小说和现实作出不同的回应这个问题不再是有效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已经改变了。如果我们把小说现实之争放在一边,注意一下是什么把我们对二者的理解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叙述,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一个更加统一的问题,一个不总是最终会导致悖论的问题。

[1] Roger Schank, *Tell Me a Story: Narrative and Intelligenc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5.

体验尼欧的叙述

我并非是在暗示小说和现实是一样的,甚至有时它们是无法辨别的。在认识论(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和存在论(事情照原来的样子存在着)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区分,而且永远会为我们作出区分。但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如何解释二者上的一个重点——也就是通过叙述和讲故事。讲故事的方式,或者我们创造故事和解释故事是如何既与小说又与现实类似的。如果我们最终反映的是叙述,那么我们如何分析这种感情使得它起作用以适应真实的经历和虚构的经历并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错误的两分法,还是会继续把我们留在一个悖论中。

此外,如果我们对其做出回应的是叙述,而且通过科技的发展叙述变得更好或至少是更加生动,那么就会解释得通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具有更加强烈的表达情感的回应了,即使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或经历过的并不是“真实的”。鉴于科技当前的状态,尤其是《黑客帝国》中所提供的各种特技,我们可以更充分地体验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同并对二者作出情感上的回应。通过把辩论的焦点从正确的情感和更加充分的理解故事角色所必需的信仰要求上移开,我们可以连接真实和代表性的分歧空间。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我们是如何以与《黑客帝国》里的人物相似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尼欧经历了一种新的现实,我们也以一种以前从未想象过的类似方式和他一起经历了这种现实。

16 真实流派与虚拟哲学

德博拉·奈特, 乔治·麦克奈特

(Deborah Knight and George Mcknight)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把《黑客帝国》看作是一种“复合流派”影片中的一个例子,并且要考虑一下它如何涉及了哲学上的一系列问题。在历史上,好莱坞影院就是深深地植根于流派的,《黑客帝国》作为一部流派影片回报了对电影的鉴定审查。但是我们必须立刻驱散一种常见的误解。虽然流派电影不可避免地会依赖于一系列常见的、公认的、重复的特写和主题,但认为只是因为一部影片是一个“流派”,它就是一个不提供不必要服务的、标准化了的叙述,缺乏创意,不值得接受鉴定检查,那将会是一种误解。因为好莱坞影院的大多数伟大影片都是流派电影,这样的一个结论明显是判断错误的。我们也应该识别一种共同的误解。贯穿流派批评主义的大部分历史——尽管当然不是在实际的电影摄制中——电影流派一直被视为唯一可以确认的,相当类似的类别,流派电影一直被视为全部属于一个流派或者是另一个流派。至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流派电影一直是正确的那些见解变得十分明确——也就是,一种纯粹流派形式的想法是一部理论家的小说。更确切地说,在流派电影中各种因素的

混合是标准,而不是例外。^[1]

《黑客帝国》毫无疑问是一部复合流派的电影。我们的论据是,考虑到组成这种混合的特殊因素,我们可以发现《黑客帝国》里更加明显的哲学主题的叙述根源。并且《黑客帝国》当然可以平等地分享哲学上的某些主题和暗示。它提到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真理和信仰的本质,现象和本体之间的区别,也提到了知识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等问题。比如,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什么能算作是一种有理由的真实的信仰?《黑客帝国》提到了道德规范和道德哲学中的一些重大主题,比如我们的意志是否是自由的这个问题,以及实际上是否我们注定要被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所控制。哲学家们会立刻注意到《黑客帝国》和规范的文本之间的类似之处,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尤其是洞穴的寓言,还有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特别是他关于梦的假设。并且我们不应当忘记精神和宗教上的暗示,从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禅宗佛教到天启录的基督教,我们也不应当忘记《黑客帝国》不得不告诉我们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事情。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对于《黑客帝国》的任何适当的哲学上的考虑都需要承认影片中在流派水平上正在上演的东西。当影片的流派继承得到了承认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看到它占优势的哲学主旨的文学根基,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无论这部影片所提到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它并没有提出哲学上的回答,而只有流派上的回答。

《黑客帝国》与流派电影

在流派方面考虑电影和其他叙述形式也就是考虑重叠的碑铭、习俗和故事范例。这些互相交叠,分类相反的熟悉的原文的种类,潜在地利用了与《黑客帝国》里所使用的那些同样多种多样的来源,比如:中世纪的浪漫文学,一系列公认的电影流派,流行的“充斥枪战镜头的影片”的计算机游戏,甚至是同时代的像哥特和乏味的时尚那样的文化“原文”。以流派

[1] 近来关于流派电影的重要作品包括 Rick Altman, *Film/Genr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9), 以及 Steve Neale, *Genre and Hollywood* (London: Routledge, 2000)。

的术语来思考包括承认一种特殊的流派影片是如何适应在流派小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工业、历史和交流的交换的。以流派的术语来“阅读”一部电影也就是要考虑观众是如何想起流派电影的，除了建立在他们早先对类似电影的吸引上的例外。在《黑客帝国》的情况下，可能包括这些事情，比如影迷对演员基努·李维斯(Keanu Reeves)在影片《生死时速》(*Speed*, Jan de Bont, 1994)和《非常任务》(*Johnny Mnemonic*, Robert Longo, 1995)中的精彩表演的赏识，对具有未来派设计的影片的喜爱——比如《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Ridley Scott, 1982/1991)——人类处于危机中，以及对连环漫画册的叙述形式和计算机游戏这样的当代文化表现形式的精通和熟悉。用流派的术语来评定一部电影就是要明白各种各样的流派的题目的含义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眼前的影片的理解的。也许，对《黑客帝国》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观众对本质上无法预测的流派英雄的熟悉——一种传统，其范围从西方一直到科幻小说并且基努·李维斯实质上已经在这部影片中使之完美的一种传统。如果我们通过流派的问题来接近《黑客帝国》的哲学方面，那么我们就发现大多数可以算作是“哲学上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是影片的流派继承的一部分了。

最广泛有用的一组流派种类是在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经典名作《批评的剖析：文论四种》(*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中极佳地展示出来的。^[1] 它们是悲剧，传奇故事，喜剧和讽刺文学。这些主要流派的特征是对广泛的叙述的提取。作为提取，他们追寻的是占优势的叙述轨道，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角与观众之间有意的联系上以及全部的气氛和叙述的目的论上。悲剧涉及到在技巧和知识方面都高出观众中的成员的主角。由于这个原因，按照一种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我们羡慕悲剧中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对于他或她的衰败怀着恐惧和遗憾。作为一个主要的流派，传奇故事是一个关于寻求的故事，发现某事像一个人的身份一样至关重要的一种企图，或者如果不是某种命运而拯救一个人的社会于堕落之中。传奇故事中的主角经历了一

[1]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系列的考验,在考验的过程中,他或她的真正品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也许作为一个主要流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就是喜剧,假设认为一个喜剧只是搞笑的事情,只是让我们笑的事情是多么容易啊。相比之下,喜剧这个主要流派涉及到无希望取胜者的人物进入一个团体的一种综合,因此包含最初把男主人公当作是“其他人”的性质赎回。主要的流派讥讽/讽刺文学识别叙述,观众明显是比主人公处在一个更高的地位,我们应该期待占优势的社会机构的批判。

从主要流派的方面来考虑,《黑客帝国》毫无疑问是一部传奇故事。它是一个关于寻求的叙述,像如此多的寻求叙述一样,它结合了三种经典的主题:发现,主动,真正英雄的充分的自我意识,对公正团体的威胁,男主角与女主角最后浪漫的结合,它也象征着或至少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团结战胜了曾经威胁他们的邪恶力量。

《黑客帝国》故意没有做的事情就是立场本身毫不费力地进入任何一个单一的舆论流派或次流派。舆论流派就是在鉴别电影的时候我们十分容易讨论的那些流派。大家熟悉的例子包括:侦探片,动作片,恐怖片,恐怖小说,科幻小说,音乐喜剧,浪漫喜剧,西部片,(描写暴徒或冒险家经历的)霸道小说,战争片,名人传记片,忧郁片,甚至还有更多。这并不是说在评论文学中关于一个人如何划分流派的界限总是有一个清晰的一致意见。一些流派理论家强调共同的惯例,肖像学,人物类型和情节主线作为区别一种流派与另一种流派的特征。其他人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流派实际上都可以被识别,比如,肖像学——对土匪、强盗影片的肖像作品而不是对名人传记的。一些流派则因他们希望从观众那里获得的反映而得名——比如恐怖——而其他一些则是因他们的情节设置或外景拍摄地而得名,比如西部片,还有一些是因他们与肖像学相反的最显著的设计而得名,比如音乐喜剧。其他一些理论家,比如琳达·威廉斯(Linda Williams),通过在“身体流派”这个术语的范围之内联合情节剧、恐怖、色情文学,重新改装了舆论流派,她是通过像身体上的过渡、入迷、颠倒、最初的幻想和幻想的暂时性这些种类来识别这一流派的。比如,威廉斯用暴力解释了在恐怖影片中身体上的超负荷,而

入迷是通过心醉神迷的暴力或通过流血表现出来的。^{〔1〕}威廉斯的“身体流派”的概念抄近路通过舆论流派的种类,在那些方面既利用了我们对流派的熟悉的知识,比如恐怖片,而且在《黑客帝国》的情况下,也使我们面临着对尼欧形成的威胁的创新的,在慢动作的动作次序中固定化了的,更不用说在最后一幕,尼欧对身体上的暴力的控制是对他作为传奇英雄的真正角色的一个最后确认。

《黑客帝国》作为一部复合流派的电影

像对影片的任何评论所告诉你的那样,《黑客帝国》利用了惯例化的特征,结构因素和一系列舆论流派和次流派的专题。只是如何来描述混合流派从批评家到批评家是稍微有所变化的。例如,Splicedonline 的编辑罗布·布莱克韦尔德(Rob Blackwelder) (<http://www.splicedonline.com/99reviews/matrix.html>)称《黑客帝国》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幻小说”——因此使得它区别于,比如说像《叛逆性骚扰》(*Disclosure*, Barry Levinson, 1994)这样一部非科幻小说的虚拟现实中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黑客帝国》的电影风格引起了来自 Salon.com 的安德鲁·奥海尔(Andrew O'Hehir)的注意,对影片中的许多提及给予了欧洲艺术影片的变形,包括约翰·伍(John Woo)的影片异形(*Alien*)系列,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当然也有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奥海尔补充说,《黑客帝国》“是所有这些影片的全部,也是计算机游戏,禅宗佛教方面的一个初级读本,是基督再临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黑客帝国》并不仅仅是一部复合流派的电影。此外,它还广泛运用了来自于它的各种各样的叙述来源的一组复合的主题。

每一种流派叙述都需要在熟悉的事物和创新的事物之间建立一种动态联系。《黑客帝国》通过混合模仿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是,通过把各种各样的舆论流派和次流派的特征重新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情节。实际上,这种重新组合是从它的主要流派的层次上开始的,并且渐渐移动到

〔1〕 Linda Williams, “Film Bodies: Gender, Genre, and Excess”, in Barry Keith Grant, ed., *Film Genre Reader II*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5), pp. 140 - 158.

《黑客帝国》包括它的结构与舆论流派也包括讲述了它的故事情节的次流派。更加明显的是,这包含了通过舆论流派,比如动作片、科幻小说和恐怖片,以及对西部片的触及被标准地调用了的主题;更不要说是那些以次流派为特征的主题,比如像惊悚小说里被通缉的无辜的人——因为无论托马斯·安德森也即尼奥是别的什么样子,他是一个被通缉的无辜的人——香港武术动作片给予了《黑客帝国》像芭蕾舞一样的打斗次序。这两个关键的次流派的主要特征为影片的悬念做出了贡献,不但确保了我们的英雄被电脑人追击却并不完全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追赶他,同时还提供了高度程式化、固定化的格斗模式,对它的掌握最终会确认尼奥毕竟就是救世主。在主要流派、舆论流派和次流派之外,《黑客帝国》里两个主要的结构因素是悬念(尼奥、莫斐斯和崔妮蒂的命运是什么?)和神秘(母体是什么?)。

主要流派传奇故事赋予了《黑客帝国》探索的主旨。它也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堕落世界的观念,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必须奋斗以拯救一个受到威胁的社会,一个他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属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也许最有特点的美国电影流派西部片也是从这个基本的传奇故事的探索主题开始的,在那里,一个无取胜希望的人物不得不挖掘他代表一个团体中更加广泛的社会利益的那种能力以捍卫它而反抗邪恶势力。通过对西部片的指涉,《黑客帝国》延续了一种传统,把科幻小说与美国电影流派的这种十分神话的驱使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已经在《星球大战》(Star Wars, George Lucas, 1977)里清楚地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然而,虽然《黑客帝国》确实提到了西部片,但这些指涉都是转瞬即逝的。在地铁里,对尼奥和电脑人史密斯之间的摊牌的刻画的是西部片中交火的一个直接延续,但是,托马斯·安德森当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部英雄,比如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所表现的那种英雄。更确切地说,在传奇故事主要流派的传统中,与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相同的是,尼奥是一个初学者——必须接受训练以发展那些大多数西部英雄从前已经熟练了的技能的某人。然而,与在他之前的伟大的西部英雄一样,也与卢克一样,尼奥成为正义事业的代表,因此他必须成为一个根本混乱的,反乌托邦的社会里的法律力量和秩序。

在影片《黑客帝国》中起作用的最占支配地位的舆论流派无疑是科幻小说。一种反乌托邦的未来世界的威胁是科幻小说流派的一个特点，特别是当涉及科技对人的身份的影响的时候。大多数的流派电影都包含某种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把西部片与科幻小说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叙述范例。其中科幻小说胜过西部片之处在于它把邪恶力量描述成是神秘可怕的，不可思议般强大的。^{〔1〕} 正义与邪恶之间的争夺——最终是尼欧、崔妮蒂、莫斐斯和他们的船员与母体和它的电脑人之间的竞争——仍然取决于其他相似的科幻小说的主题，比如这种观点，即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它的技术可以摧毁整个地球的程度，因而带来了全球范围的灾难并且把对科技的掌握放在了某种非人类的智能的手中，而非人类的智能却反过来奴役着人类，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从科幻小说中得出的这些特征联在一起让我们想象到了一个通常是与恐怖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未来世界。当然，人类的这种被囚禁在凝胶状的夹层中的想象重申了在《黑客帝国》和致力于科幻小说和恐怖片的十字路口的那些影片之间的长时间的连接——夹层是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幻小说和恐怖片而回忆的主旨，例如，影片《人体异形》(*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Don Siegel, 1955; Philip Kaufman, 1978)。此外，《黑客帝国》的核心所在，即虚拟的现实和真正实在之间的混淆例证了科幻小说和恐怖片之间的关联。许多影片都开拓了这种观点，即现象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幻觉，但是《黑客帝国》通过它对虚拟世界的描写形成了类似的主体，夹层中的人们是被编入程序来经历事情的。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人类世界，与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很相似，但是却通过无情的大公司、低俗文化的夜总会生活、市中心的犹太人区里富裕的都市人和社会流浪者之间财富的不等，强调了同时代的人类最冷酷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在主要流派传奇故事和舆论流派科幻小说之间的这种深深的联系具有母体本身的性质：母体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是隐藏在真实的人类社会的幻觉背后的比喻性荒漠，是机器智能统治人类并且上帝死去的一个世界。的确，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母体是

〔1〕 Thomas Schatz, *Old Hollywood/New Hollywood: Ritual, Art, and Industry* (Ann Arbor: UMI Research, 1983), p. 86.

人类生活的“起源”。在母体内,人的生活本身既是对创造神话的一个不正当的拙劣模仿,也是在恐怖片中生命诞生的一个回音,比如《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James Whale, 1931)。托马斯·安德森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描述成一个无辜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已经开始探索自己存在的意义的一个,成为我们辨认的要点,因此我们——和尼欧一样——从一开始就被莫斐斯带入了母体的真相中。

《黑客帝国》也使用了另一个科幻小说和恐怖电影都具有的深受喜爱的主题,那就是被侵害的威胁和对人的身体的占有。在《黑客帝国》里这些思想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表现出来的,包括放置在尼欧肚子里的那条虫,对莫斐斯的折磨拷问,设计用来搜寻和摧毁反抗者的“乌贼”,对外观世界只是一个计算机产生的虚拟现实的发现,以及对令人恐怖的把人类当作俘虏的未来世界的揭露。尼欧自己已经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了。十分显著的是,在《黑客帝国》里有两类人:一类是“真的”是人类的那些人,另一类就是尼欧、莫斐斯、崔妮蒂以及其他——由于可以接载到计算机上——代表了人类中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黑客帝国》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视觉风格和坚定不移地通过日益增多的更加详细和富有悬念的动作扩大观众的参与之间的这种连接。我们可以看到,对风格和悬念的这种双重关注贯穿于影片之中——从《黑客帝国》如何拍摄和剪辑,通过它对设置的运用,到人物的穿着,眼睛和武器的哥特式风格,到它的主要人物的软皮衣服,浅黄色格调和运动的身体。我们有理由认为《黑客帝国》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战胜叙述主旨的胜利风格。并不是人人都同意这种观点,例如,一些批评家称赞影片中更加运用大脑的科幻小说因素。但是这仅仅会提醒我们:科幻小说的一个有区别的特征是它对“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重大问题的关注。我们对科幻小说的熟悉意味着,当发现《黑客帝国》也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当感到惊讶。然而,我们不当假设这些重大的问题是以一种在哲学上意义重大的方式提出来的。我们也不当假设在影片中它们获得了任何在哲学上意义重大的回答。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流行娱乐小说是微妙的。明显地,解散所有所谓的娱乐叙述,认为它们不值得哲学上的考虑大概只不过是哲学上的一种

傲慢。另一方面,我们要证明所有的娱乐叙述都具有哲学上的考虑也并非易事。那么,我们该如何接近《黑客帝国》呢?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以前,彼得·琼斯(Peter Jones)就在他的《哲学与小说》(*Philosophy and the Novel*)中清楚地表明了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家可能也会提出具有哲学兴趣的一些要点,但他们自己则显然没有学过哲学课程。^[1] 琼斯所说的要点是,哲学家总是可以这样解释一部小说以从中抽出它的哲学主题。琼斯的例子来自于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米德尔·马齐》(*Middlemarch*),《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卡拉玛耶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和《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看样子似乎《黑客帝国》正在碰撞这种规范的参与者。虽然如此,最初很难说为什么琼斯的观点不应当被适用于《黑客帝国》这部影片。像琼斯对待《米德尔·马齐》和其他作品那样来对待《黑客帝国》,将会包括从影片中梳理出重要的哲学主题并且贡献给这种严肃的哲学上的反思,比如琼斯用来检验在普鲁斯特的伟大经典中知识和幻觉这样的主题的一种反思。因此,似乎是可能的,也许是似是而非的,即《黑客帝国》借助它所提出的哲学上的主题,应当被哲学家们加以严肃地对待。然而,使得《黑客帝国》成为混合流派的电影中一个精彩的例子的那些事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它应当有益于严肃的哲学上的检验。现在就让我们考虑一下那些事情。

《黑客帝国》和虚构的流派电影

给定舆论流派和他们的次流派过剩以及在产生像对任何特殊的电影流派的一种整洁的分类或定义一样的任何事情附带困难,托马斯·索布查克(Thomas Sobchack)和诺斯罗普·弗赖伊作为一个典型,选择了大胆的一步“把虚构的流派电影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种类,包含了所有一般被认为是流派电影的那些东西。”^[2]实际上,索布查克正在论辩的是,西

[1] Peter Jones, *Philosophy and the Novel* (Oxford: Clarendon, 1975).

[2] Thomas Sobchack, "Genre Film: A Classical Experience", in *Film Genre Reader II*, p. 102. 进一步提到 Sobchack 的文章的页码出现在课文中的圆括号中。

部片和霸道小说之间的区别,或者是名人传记片和忧郁片之间的区别——甚至是西部片和名人传记片之间的区别——少于作为流派电影他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东西,即共同点是多于不同点的。索布查克的步骤使得我们应当把流派视为天生就是混合的这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把来自于表面上的“卓越”流派中的任何一个的那些因素结合起来决不会减损把这些舆论流派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流派特征。是什么把一部流派电影和一部非流派电影区别开来呢?首先,流派电影集中于一个故事,而且“不是关于在影片之外有关系的那些事情”(pp. 102 - 03)。其次,流派电影总是会让我们知道谁是英雄,谁是坏蛋(p. 103)。第三,索布查克承认流派电影是喜好模仿的,但是像诺斯罗普·弗赖伊一样,索布查克争论说它们模仿的是其他的电影,而不是“真实的生活”(p. 104)。第四,流派电影是可以通过它们的“紧凑形式”——也就是,它们的故事情节而加以确认的。在流派电影中,故事情节优先于延长了的关于设置和心理状态的观察细节。简而言之,“发生了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为什么是最重要的”(p. 106)。第五,流派电影中的人物之创造总是通过一种叙述上的“速记”完成的(p. 107)。正如索布查克所说的那样,“像从他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可以知道一个人物一样,我们通过他的衣着就会知道”(p. 107)。当索布查克在1975年写下有关装束的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评论对于20世纪晚期的动作英雄们而言会是多么的恰当而又贴切,他们把自己打扮起来,好像他们就是设计师一样。但是关于这第五点还有更多,而不只是有关衣着的一句评论。索布查克补充说,“一旦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人物就无法改变,除非是在最有限的方面”(p. 107)。对于《黑客帝国》里像莫斐斯、崔妮蒂和电脑人这样的一些人物而言,这是极其正确的,但是对尼欧而言,则刚好是正确的,他无法改变,因为他是传奇故事里的英雄,接受训练,着手开始了一次自我实现的旅程,并最终使他面对着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这就是流派电影是如何运作的。

只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观点,即尼欧从事于一次自我实现的旅程呢?不是在精神和心理状态方面的哲学范围内有代表性的理解的那个“自我”的含义。像尼欧这样的主人公不具有心理上的深度或者复杂性。像索布查克生动的评述的那样,流派人物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他们的外表,他

们持续不变的可辨别的特性(p. 108)。这只是在说,他们是人物,他们所模仿的并不是真实的人类个体,而是其他可比较的人物。流派英雄们都是“想当然地在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上是远远超出我们的;作为普通人他们可能会受到限制,但是在动作片中他们是不受限制的。他们能做我们意欲做的事情。他们能够查明他们生活中的邪恶势力,假扮居民的怪物或坏蛋,并且能够勇敢地战胜它”(p. 108)。《黑客帝国》的叙述轨道包括查明邪恶位于哪里——也就是,在母体自身——并且要训练尼奥以便使他能够从一系列增加的与电脑人的遭遇战中胜利的出现。因此,即便是在《黑客帝国》接近尾声的时候尼奥才被说服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作为对流派小说十分熟稔的消费者,我们也完全彻底地知道他一定就是救世主。主人公是通过流派惯例预先就确定了的。与尼奥心理上的个性无关,而是与叙述模式有关。在一个科幻小说的世界里,尼奥是传奇故事里的英雄,是一个无辜的人,被莫斐斯的发现以及被祭司的确认驱使他通过一系列定义并能揭示他真正能力的格斗前进,他的真正能力反过来又揭示了他作为救世主的身份。因为他是一个初学者,一个开始,尼奥确实经历了叙述上的转变——在传奇故事的英雄的自我和角色识别中一种固定化了的转变——但在心理现实方面,这些并不是实质性的改变。尼奥的叙述轨道把他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带到了在一个在反对母体的斗争中处于中心的效忠的立场上。作为一种叙述范例,尼奥并不是一种个性(体)心理学。认为像尼奥这样的人物缺乏心理上的深度的那些批评未能认可在涉及流派叙述方面他们的角色和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尼奥是传奇故事中的英雄,那么我们会知道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战胜电脑人和母体——也许不是在这部影片中,但肯定会在第三部续集的结局中。

哲学与《黑客帝国》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提到《黑客帝国》提及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道德理论、宗教哲学、社会和政治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许多传统的主题。任何好的流派电影都可能提供可以比较的暗示。比如说浪漫喜剧,倾向于问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西方人喜欢在无情的侦探片中

问问题，“喜欢什么样的个体来确保社区的正义？”科幻小说是最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流派，“作为人意味着什么？”哲学上的提及是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流派的。我们也不应当想象每一种流派电影都会问这样具有同样严肃程度的问题。

当《黑客帝国》在 1999 年开演的时候，可以发现哲学家们在互相责备，或者是在大学的走廊里，或者是在学术会议上，他们告诉彼此的都是同一个故事。在任何介绍式的哲学课程上，你喜欢命名，比方说，在对柏拉图的洞穴或者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录进行演讲之后，学生们要么会在课堂上举手发问，要么在演讲结束后会走近你说：“感觉真像是置身在《黑客帝国》里。”《黑客帝国》的哲学暗示有许多，它们是开放的，足以允许一系列的哲学上的解释和思索。学生们很快会看到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囚犯们所经历的那个虚幻的世界和母体内生存在夹层中的人类所经历的世界之间的类似之处。囚犯，从婴儿时就一直在洞穴中被抚育，不能区别纯粹的假象和真实，确实是像夹层中被当作俘虏的那些人类，他们想象自己是计算机程序员或电脑黑客。学生们也会很快发现，尼欧最初的困惑，即是否只不过是一个可以与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录中的梦假设相比较的梦。在这两种情况下，《黑客帝国》的暗示主要都是意在提升悬念、忧虑、恐惧甚至是恐怖，而不是哲学上的反思。

当像彼得·琼斯这样的人论辩说，哲学家们可以合理地解释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小说中的哲学上的主题的时候，承认琼斯——像以前和后来的许多其他批评家一样——对主题上的有组织的叙述感兴趣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观点认为，回报像琼斯这样的人——或者为了那个原因由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或 F. R. 利维斯(F. R. Leavis)这样的人——所给予它们的这种认真关注的故事的种类——取决于一个整体的、集中的一组核心主题。这些也是被认为值得反思性阅读的小说。如果它们值得反思性的阅读，那是因为它们系统地指引着读者进入故事中的虚拟世界。相比之下，《黑客帝国》把观众的注意力贯注在建立影片外部与可比较的叙述之间的联系。流派的原文，由于它们的可辨认性，取决于它们的观众对其他原文、其他惯例、其他故事情节的熟悉程度——甚至包括哲学上的主题和原文。因此，很难得出结论说，像《黑客帝国》这样

的流派原文从根本上是离心的——它们的组织原则取决于我们与手边的原文之外的事情的衔接能力。同时，一部像《黑客帝国》这样的影片的主要的叙述设计——动作，神秘和悬念——不允许观众在哲学上有趣味的主题或主旨上逗留。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因为它是一部可以仿效的混合流派的电影，《黑客帝国》只能希望运用哲学上的主题来触发观众的兴趣，但却从来没有打算为哲学上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论坛。同时，《黑客帝国》确实是解决了它的流派问题：我们的英雄被发现了，他经历了一个初始化的过程，最后他开始相信他自己的能力，在与敌人最严峻的对峙中他幸存了下来，他返回去主张自己的爱情。这些主题是极其古老的。

我们试图表明的是，在影片《黑客帝国》里找到的哲学上的暗示从影片的流派继承中，从它在统治主要流派传奇故事和它的特殊的混合舆论流派和次流派之间的立场中获得了它们叙述上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一个通过对流派主角的严格检验而得到了最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像我们已经辩论过的那样，流派的主角不是心理上的个体或自我，而是一些个性被固定了的，特性无法改变的人物。《黑客帝国》提出了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通过一个回答来提供任何一种哲学上的论点、论据或说明。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得出结论，《黑客帝国》毫无疑问的是真实流派的一个例子，但只是虚拟哲学的一个例子。

情节 5

解构《黑客帝国》



17 解读基努·李维斯:新的突破口, 但却是一样的欺骗

辛西娅·弗里兰(Cynthia Freeland)

《黑客帝国》和《X 接触——来自异世界》是在同一年上映的(1999)并且经常被拿来作比较:这两部电影都是通过计算机产生的幻觉和虚拟现实来感受它们的人物的。在这里,我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两部电影之间为数不多的主要的几个不同点上。作为一名主张男女平等的哲学家,使我感兴趣的一个不同点是,对于人类的情欲和身体的价值它们采用了相反的描述。这与第二个不同点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他们对观众的态度。在这两点上,我发现《X 接触——来自异世界》是更加让人满意的。在这里让我先预展一下我的要点。

因为它的男主角变得更加能够超越物质现实的限制,《黑客帝国》创造了一种超越人类肉体的天真的幻想。男主角从“被看穿”和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到自制,克己和完整无缺——甚至是子弹都穿不透。《黑客帝国》揭示了一种肉体上的青春期的恐惧,就像是会失去控制的某些事情(有几分像是一个真实的、正在变化的、有血有肉的身体)。这种幻想适合于令人厌烦的渴望着自治和精神权利的青年男性们。相比之下,在《X 接触——来自异世界》里,易受攻击的并且连在一起的身体是预先设置的——尤其是为它的男主角。这部影

片中关于突破和生物形态的联系逼真场景表明了身体既可以是愉快的,也可以是令人讨厌的。身体(也有大脑)可以听任一个人被放逐,或被损坏和流血。

因为这两部电影中的每一部都在思考虚拟现实是如何邪恶和控制人的精神的,他们可能利用明显类似的方法让观众参与到影片中的这种“虚拟现实”中来。《X 接触——来自异世界》发展了这种类似,以向观众发出疑问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任何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样一种恶作剧的方式结尾。相反,《黑客帝国》的结尾是它的救星男主角把人类从欺骗的梦境中解放出来。尽管影片赞美了人类从他们的填鸭式教育的幻想中的解放,它讽刺地通过提供一种由非凡的特技所支持的逃避现实的幻想把观众吸引到它自己的虚拟现实中。我更喜欢《X 接触——来自异世界》游戏层次里的那种十分有趣的智能。

我想要探讨的两个主题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把虚拟现实比喻为电影摄制者的一个幻想,《X 接触——来自异世界》怀疑我们真实的人类(或其他)身体与同时代的电影诱人的视觉相比的处境。在《X 接触——来自异世界》里,主人公和观众都面对着人的肉体,甚至是人的内脏,有时是令人恶心的一些东西,它并不是靠从肉体上的精神逃离的幻想为生。我认为这部电影为我们的潜能提供了一种更加有迷惑力的,令人感兴趣(或让人好奇)的视觉——男女平等主义者会认为潜在的比《黑客帝国》更加自由的一种视觉。

肉体,精神,性

影片《黑客帝国》盲目迷恋它的明星。在影片中的虚拟世界里,他们人类肉体的这个事实被圆滑的黑色的皮革制品或橡胶制品掩盖了。相比之下,《X 接触——来自异世界》以肉体、血块和流血的感伤来狂欢,即“湿件”(计算机专家用语,指软件、硬件以外的“件”,即人脑)。在两部影片类似的片头字幕中这些不同点是十分明显的。它们都使用了建立在信息小段上的整体暗喻。《黑客帝国》里的小段是计算机编码的一个片断,即绿色的字母和在黑色屏幕上闪动的数字。在影片《X 接触——来自异世界》

里,小段是粉红色无定形的胶土、乳酪和黄金,这些东西含糊地引起了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的蜂窝状[多孔]结构。这里的暗喻是生物学上的,而不是机械学上的,是相似体而不是数字。

许多主张男女平等的哲学家论辩说,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男人们寻求从他们的身体上逃离,从情欲的现实中逃离的事情。^[1] 这样的男人包括柏拉图,描述先验的形式世界;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期待在天堂里他们的灵魂是纯洁的;以及笛卡尔,确立了他的身份是精神,而不是肉体。这个传统的一部分也引起了思想和感觉之间的明显区分。传统上男人是与唯理性和“更高的”智力联系在一起,而女人则是与肉体、情感和“更低的”智力,比如孩子的负担和养育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精神作用的偏见在《黑客帝国》毫无疑问地男性视觉下再一次明显的显示出来。

在这两部影片中,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的男主人公身上的时候,在性别角色方面的不同之处就变得清楚了。两部影片中的明星,现如今最炙手可热的两个男性情人,基努·李维斯(Keanu Reeves)和裘德·洛(Jude Law)。这些是不具有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或者约翰·韦恩(John Wayne)那样的男子汉吸引力的男人。有着精致的眼睑,基努/尼欧看起来像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子,当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睡觉的时候。他皮肤白皙(在影片中的另一个特征甚至评论他的洁白),没有体毛。他行动优雅,像一个跳舞的人。裘德/泰德具有雕刻般的颊骨和令人羡慕的睫毛;他的状似爱神丘比特之弓状的嘴唇让他看起来像是容易生气。每一个男主人公都是与一个强壮的女人在一起(或者看起来像是强壮的女人),这个女人有时候会带头指引他的行动方向。在那些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脆弱,不自信的时刻,并且——更重要的是——当被看穿的时刻。看穿男性的场面,或者在男性身体上插上新的洞口,都是值得探讨的。

[1] 参见 Genevieve Lloy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and Susan Bordo,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解读《黑客帝国》里的基努·李维斯

当母体内邪恶的电脑人抓住尼奥并且审问他的时候，《黑客帝国》里最初的刺透场面就发生了。为了控制尼奥，电脑人以一种让人痛苦的方式通过他的肚脐插入了一个跟踪装置（一种像蝎子一样的生物）。后来，在女主角崔妮蒂面前，以及反抗母体的基本组织的其他成员要带尼奥去会见他们的头领莫斐斯的时候，他们取出了那个窃听装置，也是以另外一种暴力的穿透方式。他们用一个像枪一样的装置对准尼奥的肚脐，终于把窃听装置吸了出来。当他们取出虫子式的窃听装置的时候，尼奥痛苦地喊叫起来。

另一个穿透的场面可能是影片中最让人不安的。在尼奥选择了莫斐斯提供给他的“真相”药丸之后，他惊恐地看到了人类的真实处境。他看到无数赤裸的身体被人为地供养在胎囊里，通过丑陋的像虫子一样的机器“喂养着”。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大概是用来喂养和排泄废物的管道，每一个人都是被穿透的。他们没有头发的粉红色身体看起来是令人厌恶的和脆弱的，被黑色的管子和插头所穿透。当尼奥在恐惧中打呵欠的时候，一种管理的装置准备“冲洗”他，把缠绕在他身上的插头和束缚解开。在一个初生模仿中，尼奥被倾倒了到了一个粘糊糊的、泥泞的管道里——大概是要被溶解吧。

被挽救了之后，尼奥显得更加慈祥。再一次的，当他躺在一张桌子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基努·李维斯近乎赤裸的身体被展现出来。现在通过轻柔移动的针灸式的针，他的身体是被彻底地穿透了。通过在音带上听起来像是宗教上的合唱音乐，这种被穿透的安宁与善良被加以强调。莫斐斯解释说，尼奥必须要进行一些恢复程序，因为他的肌肉由于从来没有用过而萎缩了。要是我们都能够倚靠在椅子上安详的熟睡而同时针在加强我们的肌肉那该多好啊！

在《黑客帝国》这部影片中，尼奥是如此特殊的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顷刻间就学会东西，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身体上的事情，也就是——尼奥/基努确实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来理解这种观点即自己就是“救

世主,”那个将通过把他们从母体中解放而赎回所有人类的救星。)通过即时的设计和“上载”,知识和技巧很快就被传输给了莫斐斯革命小屋里的那些聪明的成员们。这要求插入一个大的“插头”到一个人的脖子后面。因此,在下一个穿透的场面中,有更多的暴力,当连接器装置冲击在他脖子后面的那个洞孔的时候,尼欧明显是感到了害怕。通过模拟的身体上的训练尼欧学会了技巧,借助于传送给他的真实身体的力量,使得他很疲惫甚至是痛苦的。由于尼欧的“心理运动学”,他学得很快: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流汗。尽管明显是捉摸不定的,脖子上的插头从没有被再一次的被强调,我们也看不到其他的他们的插入场面;更确切地说,小组里的成员只是倚靠在椅子上,我们假设插头很容易的就进入了,没有痛苦或暴力。这些是好的插头具有很好的穿透力。用一种新的意识他们把人类送回到母体内,即能够使得它们抵抗假设的自然规律,跨越难以置信的距离和击退许多毫无准备的警察。

这导致了我想要谈论的最后一个穿透场面,尼欧在与电脑人面对面的时候被子弹穿透。尽管是“救世主”(或者也许因为是救世主),尼欧必须经受苦难甚至是死亡。但是他又复活了,很显然,当崔妮蒂(圣灵?)在船上对着他一动不动的身体说她爱他的时候,并且祭司预言说她会爱上是“救世主”的那个人——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死了的时候,尼欧就复活了。尼欧魔术般地复活了,并且重新有了信心甚至是开始警告他的攻击者电脑人。早些时候,他显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够躲开子弹的能力;现在他变得连子弹都伤不了他,并且甚至能够在半空中抓住袭来的子弹。

这个新的救世主尼欧的吸引力在于他身体上是完美和质朴的——没有穿透。他在母体内这样行事现在他可以识破这一切了。母体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交互式模拟;明显的有一些模拟是有益的,因为训练使用了它们。在所有的模拟场面中,基努更加英俊,头发也稍长一些,没有脖子上的螺钉,配备着现在非常流行的黑色长大衣。全副武装,拥有他所需要的所有枪支,他避开了电脑人的子弹。这个完美、令人兴奋而又值得怀念的基努/尼欧是完整无缺的,封闭的,没有空缺或缺陷,没有弱点——简而言之,与他实质上的肉体的身躯是毫无关系的。他已经超越了肉体的那个自然现实。

几乎不需要提及但又不得不提的是崔妮蒂这个人物(凯莉-安妮·摩丝扮演),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的是一个典型的起帮助性作用的女性角色。影片一开始的镜头就是这个“小姑娘”勇敢地与一群警察打斗并且成功地逃脱。当尼奥看到她的时候,他十分惊讶(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她说)地得知这个优秀的电脑黑客竟然是一个女的。但是在这些开幕的话题之后,崔妮蒂表现出的角色是伙伴女性的角色。她有一些技巧的场面,但是我们从未看到这个著名的黑客在计算机的键盘上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她从未检验母体的编码)。她在这里是作为尼奥爱的吸引以及支持他的最最重要的拯救事业的。她为完美无缺的尼奥提供的是立体感觉上的女性修养和“联系”。我们看到她给尼奥拿来了食物,然后静静地看着他,甚至去闻他身上的味道。在影片的最后她的爱使尼奥获得了新生。除了尊重、顺从尼奥,她还在大爸爸莫斐斯的领导下工作,莫斐斯是典型的家长式的领袖,不是把她,而是把尼奥看作是人类的救星。

这里崔妮蒂也是一个“小孩子”,是用来提供性别上的吸引力的。^[1]影迷们称赞她是“kicking butt”,而且她确实和尼奥一起在拯救莫斐斯,那时我们看到了她类似男人的一面;但十分明显的是,她的主要工作还是装饰性的。凯莉-安妮看起来是一点也不性感的女人,穿着紧身的黑色皮衣。的确,她能够开着一架直升飞机,但是即使是那样,她也陷入了困境而必须靠尼奥来救助。在结尾他们接吻的时候她得到了回报,但是影片具有零的性爱倾向;唯一能够表明有情欲上的愉悦的证据的人是塞佛,而他明显是邪恶的。

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女人也是立体感觉的,那就是“祭司”(Gloria Foster 扮演),她是一个黑人妇女,具有一种部落圣人般的洞察力和智慧。她看起来像是平民窟的一个祖母(我敢说“妈妈”吗?),和她的预言一起分发刚出炉的小甜饼。反对我对影片中的陈词滥调的批评的任何人都应当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母体内没有女性的电脑人呢?在这里即使是机器

[1] The proliferation of fan websites is an indicator of this role. One site says, “Latex, firepower, and the ability to climb walls in slow motion. , Man, does this gal have it all or what ... ? I'm curious as to if they can get her outfit any tighter.” Unidentified, website at <http://members.tripod.com/twptrac10/id40.htm>. (Carrie-Anne Moss plays a similar role opposite Val Kilmer in *Red Planet* [2000].)

也是男性至上主义者。

解读《X 接触——来自异世界》里的泰德

《X 接触——来自异世界》的导演大卫·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经常描写男性身体不规则的变形,比如在他最著名的电影《变蝇人》(*The Fly*)中腐烂的科学家。柯能堡的电影具有突出的“不正常的”性特征甚至是“内线”,像《录影带谋杀案》(*Videodrome*)中的主角形成了腹部的一个缝隙,透过这个缝隙磁带可以插入到这个缝隙里面。他的一些电影突破了严格的精神肉体二元论,像《夺命凶灵》(*Scanners*)中心灵感应术的男主角一样。柯能堡对他所称的“新的肉体”十分感兴趣,那是通过一个新的窗口看待新的身体的一种视觉,新的性器官,没有十分清楚的性别上的区分。^[1] 我看到在《X 接触——来自异世界》里他继续了这种目标。相比之下,《黑客帝国》里男性至上主义者和它同样老一套的人物看起来是令人厌烦的:男性主人公受到爱他的女性合作者的协助,和蔼的母亲似的顾问,强壮的父亲式的人物等等。

在影片《X 接触——来自异世界》里,演员裘德·洛扮演的是泰德·皮库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是一个游戏新手,参加由优秀设计师艾丽拉·吉尔拉(Jennifer Jason Leigh 扮演)设计的一种新游戏的试玩大会。在一名观众试图暗杀艾丽拉,泰德帮助她逃脱之后,她把他误认为是她的保镖。然后她就很疑惑地大声嚷道为什么她被一个“PR 讨厌的人”粘住了。这种把裘德想象成一个讨厌的人与《黑客帝国》里尼奥被当作是一个黑客和穿着黑色衣服的勇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让女人成为计算机天才和做出决定的人,而让男人经常是害怕的和不可靠的,影片《X 接触——来自异世界》破坏了标准的性别角色安排的老一套。这些对性别角色的重

[1] Cronenberg explains that with “New Flesh”, You can actually change what is means to be a human being in a physical way ... Human being could swop [sic] sexual organs, or do without sexual organs ... for procreation ...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would diminish, and perhaps we would become less polarized and more integrated creatures. Chris Rodley, ed., *Cronenberg on Cronenber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revised edition 1997), pp. 80 - 82.

新排列可以通过对影片中的一些关键的穿透场面的验证而被加以探讨。

不同寻常的是,泰德/裘德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插座,也就是在人的脊骨下方开的一个洞,游戏即由此下载,能够使人被插入到依靠游戏中的驱动器而运行的虚拟的现实游戏中去。这些驱动器是由人工培养的畸形的两栖动物取出内脏,再植入合成细胞制成的,人体和驱动器之间是由看起来像人体脐带的缆线脐索连接在一起的。第一个穿透场面中包含泰德被安装上合适的插座。他的“女性化”的角色作为一种歇斯底里是十分明显的。泰德承认自己抵制外科手术,“我有恐惧症,感觉我的身体被穿透了[……停顿……],如外科手术般被穿透了。”在一个载满同性恋讽刺的场景中他量身选择了一个黑色的插座。“盖斯”(Willem Dafoe 扮演)将一个巨大的像枪一样的东西放在泰德的后背上。当后者弯曲了的时候,盖斯评论说,“你不想做的一件事情是错过螺栓探测器。”当艾丽拉趁着泰德被麻醉后一点不能动从而很快把一个电缆线插入泰德身上的新洞孔的时候,泰德含蓄的“女性化”得到了延展。

《X 接触——来自异世界》中的叙述轨迹与《黑客帝国》是有所区别的,在《黑客帝国》中,尼奥/基努从一种“恶劣的,脏的”插满了插头的状态转变到一种“清洁的,良好的”身体上完美无缺的状态。相反,如果是凌乱和冒险的肉体上的交易,《X 接触——来自异世界》在通过游戏的肉欲表明游戏驱动器的穿透的那些场面是狂欢的。通过影片中对像吃饭和性欲这些其他正常的物理过程的想象,插头的穿透和愉悦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游戏和被插入在性欲方面的尺度在几个场景中是十分突出的。其中有一次就是当泰德把一个小型的驱动器插入艾丽拉的后背的时候,他开始舔她后背上的插座。他的这种互惠的主动性在几分钟之后就被加以强调了:当艾丽拉拉开他的裤子的时候,泰德悲叹地说,“我很担心我的身体……我感觉真的很脆弱”。

当艾丽拉经历了一种强迫进入有病毒的游戏层的时候,在对虚拟游戏的沉溺和对性欲的迫切要求之间的这些连接得到了加强。当游戏层翻腾并向后转的时候,艾丽拉马上就生病并且受到了感染。感到万分绝望,泰德切断了她的电缆线,但是她开始血流如注,而泰德只能在一旁无助地观望,毫无办法可言。这一场面使我们理解了这样一个重点,即像实质上

的性一样,游戏中的性欲亢奋同样是危险的。把你的精神和肉体同时呈现给其他人可能是致命的。

《X接触——来自异世界》在许多场面中都唤起了虚拟游戏体系中的肉体上的欲望,使我们沉浸在游戏内部的欢愉中。当艾丽拉的驱动器在一个修理店接受修理的时候,那些操作像极了是在做心内直视手术。其他的场景表明了严格的脑皮层系统的驱动器装配设备的严酷工作。泰德发现他自己可以熟练地切开青蛙的肚子来重新获得卵巢液,然后再把它们包裹起来并贴上标签以便生产线上可以识别。影片中的困扰在一个饭店场景中达到了顶点,在那里,侍者给泰德和艾丽拉上了一道用突变异种的两栖动物的内脏做成的菜肴。这里,泰德的“穿透”延伸到了被迫吃这些让人感到厌恶和恶心的东西,目的是为了找到把人类的牙齿当作子弹的一种软骨枪。这与尼欧干净的金属枪和子弹之间的对比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导演大卫·柯能堡说,他分派泰德这个角色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影片中主要的那个角色是女性,所以当你对许多男明星谈起扮演泰德这一角色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情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辅助性的,而主角是一个女人……这依然是一个十分男子化的事情”。〔1〕在这里角色性别的逆转是十分显著的。裘德(无可争议是比基努更合适的演员)在自己的那些场景中扮演的都是表面上懦弱的、急躁的、歇斯底里的样子。难怪主要是男性青少年的观众在这里找不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而由珍妮弗·杰森·李所扮演的游戏设计师艾丽拉也不是像崔妮蒂那样的一个“孩子式”的女电脑黑客。艾丽拉美丽动人,聪明并且强硬,但她从来没有屈从过。相反,她是老谋深算的,并且为了竞争甚至到了可以“杀死”泰德的地步,从而可以在她自己的游戏中胜出。

电影,现实和幻觉

让我们考虑一下我所评论的这些穿透场面是如何与它们各自影片中

〔1〕 参见“Logic,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Misinterpret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Cronenberg”, conducted by Xavier Mendik, in Michael Grant, ed., *The Modern Fantastic: The Films of David Cronenberg* (Westport: Praeger, 2000), pp. 176-77.

更广泛的“信息”连接在一起的。《黑客帝国》和《X 接触——来自异世界》都提出了关于被虚拟现实所诱惑或者欺骗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母体的幻觉是由一种讨厌的穿透所产生的。因此就有了一个从被插入中逃离的故事。凭借着精神上的洞察力，尼奥可以躲开被污染的插头，甚至是子弹。在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尼奥飞起来了，脱离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超越了其他普通人，因为他摧毁了母体解放了人类。

但是，在《X 接触——来自异世界》的结尾，我们感到无法辨别真实和幻觉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从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束语中得知，我们刚刚看到的整部影片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是对一个虚拟游戏的检验。游戏“外部”环境的许多方面都是模仿自游戏内部，因此观众可能感到困惑，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这种混淆被加以概括，当一个受到惊吓的人问道，“告诉我，我们还在游戏里吗？”

这些不同的结尾表明了两部影片把电影作为产生幻觉的一种媒介的能力的思考策略。在观念上，为了做到连贯一致，《黑客帝国》应该使观众认识到并且拒绝电影的这种诱惑人的幻觉，从而坚持他们自己更加富有创造性的选择。但是我怀疑它会在相反的方面起作用。电影赞美的并不是从母体中获得的自由，而是对令人感到兴奋的电影式的模拟的沉溺。我认为这一点并不是应该受到赞美的东西。但要记住的是，在非母体内情形的尼布加尼撒号气垫船上，事情是不具有吸引力的：任何东西都是灰色的，并且破旧不堪，人们的表情都是冷淡的，他们吃的是像鼻涕一样粘糊糊的食物。不引人注意的是，船上工作人员的头都被剃得像僧侣一样，他们穿着粗糙的衣服并且（大多数）都有难看的颈栓。影迷们无疑会欣赏的基努·李维斯的肖像是相当合适的，当他在模拟中露面的时候：英俊潇洒，头发更长一些，没有脖子上的插孔，黑色的大衣，在天空中飞翔。也只有在这些模拟中，基努/尼奥才能够展示他令人敬畏的动作、速度和杀伤力。

我所说的要点涉及哪一个像电影一样的世界是更加充满诱惑，更加富有魅力并且更加令人难忘的：我认为是模拟的那个世界。恰当地说，就是我们死后会去的那个世界，而不是尼奥所谓的“真实”躯体所停留在那艘船上。相反，我们看到英俊潇洒，穿着外套大衣的尼奥徘徊在母体内

的多数人当中,然后骤然飞上了天空,许诺“一个没有规则和控制,没有边界和界限的世界,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世界”。他飞向天空,就像他的话一样,暗示着人类不再需要被他们的肉体所束缚。影片的基调是逃避现实者对精神现实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少数人不受规则的限制和妨碍。(他们当然不必不得不上班或是努力工作以获得新本领。)影片留给我们的幻觉就是尼欧能够超越物质现实,就像超人一样。影片用自己非凡的幻觉来诱使我们相信幻觉是真实的,同时又伪善地催促我们要逃离幻觉。

相反,《X 接触——来自异世界》的情节,游戏中的游戏这种组织结构要求我们去思考虚拟现实是否真的比普通生活更可靠,更可取。在影片的结尾我们得知——或似乎得知——艾丽拉在“eXistenZ”游戏中打败了泰德这个事实只是在另一个游戏“transCendenZ”的演示中发生的一个幻觉。影片中的人物从“eXistenZ”游戏中脱身出来并且大笑着讨论他们的角色,评论着他们在游戏中所使用的荒谬可笑的口音。突然我们听到裘德用他纯正的英国口音在交谈,而不是他早些时候用过的单调的加拿大口音。

然而,《黑客帝国》不诚实地使用了电影中像魔术般骗局的一个军械库以使观众参与它的幻觉现实,《X 接触——来自异世界》则一直把玩游戏当作是制作电影的一种隐喻。这一点在乡村加油站那个场景中表现出来,盖斯对艾丽拉说,“我喜欢你最初的设计,我希望能够进入游戏里”。随后,艾丽拉解释了不同的游戏设计者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把情节编织在一起的——和电影中的导演和编剧十分相似。对于插入游戏或电影中是否“对我们有害”这个问题,影片《X 接触——来自异世界》并没有提供过分单纯化的判断。因此它也避免了《黑客帝国》中那种根本的伪善,当泰德停止游戏结果发现相比之下普通的现实生活是令人乏味的时候,他感到苦恼,玩游戏会牵扯到精神要素,但是,《X 接触——来自异世界》也展示了玩游戏时那种十足的乐趣。母体代表着一种想要使人类个体恢复到他们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去的虚假目的,一直欺骗观众进入一种它从来都不会承认只是一部电影的现实中去。《X 接触——来自异世界》却截然相反:以它半开玩笑的方式,像在游戏的吸引力上刺了一些洞,它也逐渐

地提醒观众,我们享受幻想是因为我们对真实的生活感到厌烦。

职业哲学家可能会说,这两部影片对于真实和幻觉的沉思都是不专业的,大一的哲学学生的难题是:“如果我是一只蝴蝶却梦见自己是一个人会怎样?”两部电影都警告人们不要过于依赖机器。但是电影,以及相关 DVD、声道、结局和网址,本身就是我们作为观众为了娱乐而置身其中甚至形成依赖的一些模仿。哪一部电影对精神和肉体相连的快乐的想象更为坦率和迷人呢?哪一部电影较大程度上鼓励了这种依赖性?我已经说过,是《X 接触——来自异世界》这一更加无聊和商业化的产品,而不是所谓的更深奥更华而不实且更为自由的《黑客帝国》。^[1]

[1] 多谢 Carolyn Korsmeyer and Steven Schneider 对我的草稿给予的诸多建议。

18 《黑客帝国》、马克思与 红毛人的生活

马丁·A. 达纳黑, 大卫·里德

(Martin A. Danahay and David Rieder)

《黑客帝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对 20 世纪晚期和 21 世纪早期美国普通工人的剥削做了很好的改编。这部影片充满了对许多社会和经济主题的提及,而这些主题都是可以追溯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去的。

从指示位置和传送时间的带有把柄装置的不间断电源驱动器和每一分钟的击键次数都被计算的数据登录员,到每一次通话都被监视的消费者服务代表,美国工人正日益处在科技的监控之下,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纪末的趋势。在 19 世纪里,如果工作场所门口的旧式时钟是资本主义压迫的一个标志,那么今天能够跟踪雇员在办公室内外的每一个举动管理软件同样是一个压迫的标志,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机器对工人的这种与日俱增的控制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黑客帝国》例证了正在发展的趋势中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暗示。

对尼奥而言,最强烈、最惊骇的时刻是当他得知自己的整个生命是半真半假的时候。尼奥万分绝望地靠椅子背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眼睛紧紧盯着放在下载程序的毫无意义的白色空间中的一台电视。莫斐斯则十分

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电视屏幕不断变化着,出现了一系列振动的、引人入胜的城市景象,尼奥就是刚从那里逃脱出来的。莫斐斯对他说,“你一直生活在一个梦世界里,尼奥。这才是今天存在的世界”。在电视屏幕上,一个黑暗而又凄凉的被破坏了的城市画面取代了原来尼奥所生活的那个城市,这是人类与机器人战争的结果。在下载程序中让人眩目的白色灯光变小了,一会儿,莫斐斯和尼奥发现他们自己被城市废墟和悲惨包围着。莫斐斯对尼奥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对于莫斐斯的介绍,尼奥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受到了打击,吃惊地向后退,试图保持身体的平衡。莫斐斯接着回答了尼奥为什么会独自呆在家里,一夜又一夜地坐在电脑前面:

母体是什么?就是一种控制。母体是一个由计算机产生的梦世界,它是用来使我们人类处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并最终把我们变成这个东西。

莫斐斯举起了一块 Duracell coppertop 电池。在早前的场景中,当尼奥进入凯迪拉克的后面“自杀之门”的时候,苏薇琪称尼奥是一个“红毛人。”

拼命工作的“红毛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劳动和他们所产生的资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与工作的现实“疏远”了。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被迫劳动,而是认为他们是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操作,他们可以自愿地出卖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实际上,马克思论辩说,他们是被剥削的,因为他们无法选择如何工作以及什么时候工作,他们必须接受他们的工作条件,而这些工作条件都是由资本的所有者规定的。

提到红毛人可能被解读为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困境的关心,这些工人像奴隶或者被征入伍的士兵们一样,为机器提供能量。在他著名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中,马克

思描述了19世纪的欧洲工厂中工人们被剥削的情况,这就是为那个时代和那些人而写的: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1]

对19世纪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工作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工人们不再被要求为当地的顾客亲自创造有意义的产品,创造他们引以为荣的产品。更确切地说,他们被要求从事正在日益从商品中抽象化,提炼出来的那些作业,而这些商品最终又会被卖回到他们手中。因而像现在这样,许多工作依然是“红毛人的”,这就导致了异化。

当人们倾向于把异化当作是一个个体和心理上的经历来谈论的时候,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形成方式的一个产物。换句话说,个体的异化是体制的产物。在电影中,“看门人”莫斐斯看起来也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他对尼奥说:

母体是一个系统,尼奥。那个系统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你向周围望去,你看到了什么?做生意的人,教师,律师,木匠。我们尽力挽救的正是这些人的精神。但是在我们挽救他们之前,那些人依然是那个系统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是以商品与商品(理解:系统)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的,而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的,工人们自己把他们的劳动力看作是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的商品。马克思还广泛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状况,尽管可能不是立即就会很

[1] Frederic L. Bender, e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Norton, 1988), pp. 61-62.

明显,工作还是《黑客帝国》的情节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他的文章“工资—劳动力和资本”中,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工作常常成了“红毛人”专属地位的原因:

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就像糖是一种商品一样。前者是按照时间来衡量的,后者是按照重量来称量的。^[1]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卖给他们工作的那个公司或工厂的这种“商品”只不过是他们的劳动力而已。在《黑客帝国》里,这种“现实”明显地被通过赤裸的,脆弱的,静静的漂浮在像棺材一样的小卧室组成的高楼大厦里的,被插入到发电厂里的人类这个场景被加以改编。也许,发电厂是一个回忆往事的公司大楼,它的所有工人都一个接一个的整齐地堆叠在小卧室里。这就把《黑客帝国》里的人类当作了工人阶级,而电脑人则是资本的保护者。发电厂的事例有助于说明莫斐斯的定义,即“红毛人”是“如此毫无希望地依赖于系统的人”,像莫斐斯所说的那样,他不能够从剥削中解放出来。

辩证的反思

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基础部分地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的“辩证”哲学中一些新颖的知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辩证法是关于进化或者说是关于进步的理论。它建立在黑格尔的思想的基础上,即人类历史前进和变化的动力是相反力量之间的斗争。辩证思考的人认为,世界处在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生命是永不停息的。此外,一个辩证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事物之间的对立,从个别的分子到复杂的思想都在努力达到一种新的意识和组织水平。在下面的这段话中,马克思主义者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把“辩证思维”和荧屏联系在一起:

[1]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第二版(New York: Norton, 1978), p. 204.

辩证思维与每天的思维产生联系的方式,与电影和一张静止的照片产生联系的方式是一样。电影并没有认为静止的照片是不合法的,而是按照运动的规律把它们结合在一起。^[1]

一个辩证的思想家认为一张照片也可以说出好多话来,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是同时为含义竞争的照片网络的一个反映。一个辩证的思想家从不会依据表面价值来看待事物,因为在每一张单一照片里面和周围,生命总是在进化的;没有什么事情曾经是“静止的”。

在《黑客帝国》里,一个“在这个画面中的电影”描绘了尼奥的精神状态的辩证演变过程。这部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是从一系列反思中发展而来的——带着太阳眼镜,汤匙,一面镜子,在某一点上,通向祭司的寓所的门把手。个别的反思或“静止的照片”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部在真实电影之上的“电影”。它描绘了尼奥辩证的成长过程,当他为克服他的红毛人生活而斗争的时候。

在影片的第一部分,“进入兔子洞”和“真实的世界”这两个场面反映了尼奥从一个非辩证的红毛人到一个辩证的有意识存在的战士的转变。在“进入兔子洞”里,我们在莫斐斯的太阳镜中可以看到尼奥的映像。然而尼奥还没有做出选择。蓝色药丸和红色药丸是在莫斐斯伸开的手上。它们似乎符合了莫斐斯的眼镜上的两个镜头。好像象征着他作为一个红毛人所过的那种非辩证的生活,尼奥同样的映像被反射在两个镜头上。像一幅静止的图片一样,从一个“框架”或镜头到另一个,尼奥是同一个人。在尼奥选择了红色药丸之后,他的映像就开始变化了。当他正在等待堪萨斯“再见”的时候,他右边的镜子反射出一个成碎片的尼奥,他辩证的旅行开始了。后来,在“真实的世界”里,在母体的梦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辩证分离终于完成了。尼奥的“双重映像”改变了。当莫斐斯举起了电池的时候,尼奥的映像从在“进入兔子洞”里蓝色药丸曾经被反射的那个镜头上消失了。现在,一个 coppertop 电池代替了它的位置。在另一个镜头里,“真实的”尼奥独自站立着。尼奥终于辩证地醒悟了。他的旅

[1] Trotsky, Leon. “The ABC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Trotsky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trotsky.net/works/1939-abc.htm>.

行也开始了。

随着影片的进展,尼奥的反思例证了他企图把他身份中这两个相反的方面协调在一起。他努力斗争着要克服他生命中的对立映像,即在母体里的一个,在“真实的世界”里的一个。遵循着这种思想线索,尼奥如同涅槃般转变成“救世主”可以被解释如下:尼奥已经达到了辩证意识的一个新水平,克服了在他疏远的和不疏远的生活之间的对立。尼奥是救世主,因为尼奥不再在两个世界之间分裂了。在《黑客帝国》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之间的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在永不结束的进化中,“救世主”只是第一个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换句话说,“兔子洞”是深不见底的。

塞佛和商品拜物主义

在这一情景的下半部分,也就是“为了幸福的交易”中,塞佛正坐在饭店的一张桌子旁边,正对着电脑人史密斯。塞佛正在忙碌地切着一块肉片。当他用刀子和叉子刮擦着精致的瓷器碟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刀叉摩擦的声音。他杯中的红酒在轻轻地晃动着。塞佛正打算要犯错误。他厌烦了做一名反抗斗士。在尼布加尼撒号船上呆了将近十年之后,他决定放弃了,他正打算出卖船上所有人的生命来换取第二次机会做一名红毛人,被重新插回到母体中去。电脑人史密斯问他的最后回答,但是,在塞佛答复他之前,塞佛说道:

我知道这块牛排并不存在。我知道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会告诉我的大脑,说牛排美味而且多汁。九年之后,你知道我明白了什么吗?无知是福。

当他咽下一片牛排的时候,塞佛最后的底线被传达了出来。当这个场景结束的时候,竖琴垂直的线代替了在尼布加尼撒号船上的电脑屏幕上流动下来的非个人的绿色编码的垂直的线。

塞佛充分意识到他正在吃的牛排毫无意义。他知道牛排并不是真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学中,牛排是一种商品,塞佛渴望的幸福也

是一种“商品拜物主义”。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在“对商品的拜物主义”这一章里，马克思写道：

一种商品……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只是因为在他里面，人的劳动力的社会特征似乎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一个附着在那个劳动力的产品上的客观特征，因为生产者和他们自己的劳动的总和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种关系不是存在于他们自身之间的，而是存在于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1〕}

在这一章里，马克思描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工人，与我们所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典型关系。马克思的某种术语学是很难理解的：“劳动产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当我们理解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就更容易去理解了。对马克思而言，世界上的每一种商品——汽车，电脑，软件，鞋子，家具，书籍——之所以存在着，是因为有人把他们的个人“劳动力”放到了它的生产里面。甚至是我们用来购买商品的钱也是某人的劳动的一部分。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工人，“盲目迷恋”我们所购买的商品。换句话说，我们经常对以下事实熟视无睹：我们所购买的商品是由像我们这样的人所生产的。我们用我们挣的钱购买的鞋子，是由工人制造的并且是为工人制造的。我们听到与我们一样的工人同事们在亚洲的血汗工厂（指工人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工场或工厂）里受苦的故事，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购买我们喜欢的那个牌子的运动鞋。我们在我们上班的路上开着车，车是由工人制造的，我们并不认可我们被包裹在其中的这种工作体制。无论我们是否自觉地、有目的地忽略这些关系，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实行“商品拜物主义的”。

再回过头来考虑一下驱使着尼欧的雄心壮志的那个问题，马克思可能已经扩大了莫斐斯的解释。的确，母体是一个梦世界，它的目的就是来控制我们人类。而且，母体还是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产生它的人类“劳动

〔1〕 参见马克思的论文，“对商品的拜物主义和秘密”，in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06), p. 83.

力”的总和。在母体内的每一次视觉和味觉都是人类劳动的一种产物。但是,由于“神秘的”原因,这种现实是“被盲目地加以迷恋”;或者,像塞佛所说的那样,被幸福地忽略掉了。像马克思在上面的引用中所说的那样,“生产者与他们自己的劳动的总和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种关系不是存在于他们自身之间的,而是存在于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换言之,全球的劳动力,工人总数所享有的那种关系作为一个阶级受到了我们更加直接地具有联系的商品的“梦世界”的阴影的笼罩。工人们不能够联合起来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全球的经验作为一个劳动者阶级被像糖一样的品味,声音和商品的观点遮没了。关于塞佛所吃的牛排没有什么神秘的。他充分地意识到了牛排的多汁和美味是由发电厂里的劳动力带给他的。但是,他厌烦了为了吃到“真实的”东西而反对甜蜜的母体世界,厌烦了像“真实的”乞丐那样活着。

从什么中觉醒

《黑客帝国》是“真实的”资本主义母体的一部分吗?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会回答说。在他们的文章,“文化业:启蒙作为大众欺骗”,他们论辩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媒体,包括广播、电视和电影为一种新水平的“商品拜物主义”做出了贡献。^[1] 好莱坞的价值和公司品牌的那个“全球外的世界”是真实的梦世界——它把我们包围在它像糖一样的甜蜜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想要我们从中“觉醒”的原因。荒谬的是,《黑客帝国》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抱怨的这种文化业的一部分。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十分清楚它是一部关于剥削和一般民众的反抗的影片。或者它真的是吗?

关于资本主义对它的劳动力的剥削程度,马克思最强有力的见识之一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想要发现资本家是如何创造利润,从哪里获得利润的。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所有不同方面进行了仔细的分

[1] 这篇短文载 Ma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由 John Cumming 翻译(New York: Continuum, 1995), pp. 120 - 167。

析之后,马克思得出了如下结论:资本家创造利润,或者说是剩余价值,是通过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少于他们所应得的工资来实现的。通常假定利润是供求规律中一个非常谨慎的运动:当某种产品的价格超过了它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资本家才会出卖这种商品。马克思认识到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以至于不能成为利润的基础。他还认识到进入生产过程的原材料的成本实质上是固定的。资本家唯一可以系统地加以剥削的只能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只是付给工人们仅仅够他们生活的工资,而把剩下的工资据为己有。如果一个劳动者是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基本上只是得到了五小时或是六小时的工资;剩下的两个或三个小时的工资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

《黑客帝国》是一部令人无法忘怀的电影,但是它还不足以让观众信服地“觉醒”来反抗这种让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真实世界里成为红毛人的剥削力量。它之所以不足以让人信服,部分地是因为它没有向我们表明当被插入到母体中的时候人类失去了什么。可以论证的是,两个物种——人类和机器人——具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塞佛想要返回去的那个梦世界也并不是真的就是那么不好。它看起来是相对熟悉和城市化的,有“真正好吃的面条”,有稳定的工作,有很酷的俱乐部。人类必须工作以产生热量,但是母体具有无限制的带宽和各种颜色!换句话说,人类工作,获得的恰好就是他们应得的。

如果《黑客帝国》真的想要做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声明,让我们从中觉醒的话,那么母体的梦境将会在黑白世界中毁灭,这象征着机器剥削劳动力的价值的程度。如果母体被在黑白世界中毁灭,尼布加尼撒号船上的真实世界在五颜六色中毁灭,也许人类为之奋斗的革命性的未来就会看起来是光明的,丰富多彩的,就像当真正的多洛希(Dorothy)对堪萨斯(Kansas)说“再见”的时候所做的那样。

19 《黑客帝国》的模拟和后现代时代

大卫·韦伯曼(David Weberman)

考虑一下下面的假设:在 1966 和 1974 年间的某个时间里,世界改变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改变了。彻底地改变了。虽然不是毫无争议的,但许多历史学家和学者们还是这样认为:在这些年间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超越了现在的时代的一个时代,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我们现在正处在被称为后现代时代或者后现代性的情形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多事情。限制工业化,市郊化,资本积累的灵活性的戏剧化增长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全球化。^[1]在艺术和建筑学上,纯洁和深刻的理想让路于讽刺剧和表面上的表演,而高雅和低俗或流行艺术之间的区分变得很奇怪,无辩护余地。让人想起了安迪·维奥(Andy Warhol)和圣母玛利亚。在哲学上,许多人被迫放弃了他们对认识论或民族基础的信心——像岩石般牢靠的,自明的基础来支持我们的知识和价值。而且很明显的,科技是这个故事中的很大一部分。固定地收看电视所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孩子在这一时间里成年了。在电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电报,录像,视频,传真机器,制药学上的提高,电脑,电话和

[1] “灵活积累”这种观点和“后现代性的环境”这种表达来自于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书籍之一,大卫·哈维的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0)。哈维的书也为后现代性的开始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资料。在第 39 页中,哈维引用了 Paul Jencks 的话说现代主义结束了,后现代时代于 1972 年 7 月 15 号美国中央时区下午 3:32,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随着现代主义者的普鲁易特·伊果(Pruitt-Igoe)旧建筑群的爆破开始了。

网络的广泛繁殖。

最后,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思想,愿望和感情产生了影响。它怎么能不产生影响呢?人类经验的本质已经遭受了而且还要继续遭受转变。我们的观念是,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住所的世界里,我们变成了精神上的流浪者。在一个没有严肃性的世界里,我们是愤世嫉俗者和不相信别人的人。在一个没有设计者药物的世界里,我们的人格具有可塑性,只是把真实性留下作为一种愚弄罢了。在一个彻底媒体化,成为平庸的世界里,我们是……哦,我们是什么呢?这把我们带到了《黑客帝国》和母体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到了导演沃卓斯基的电影中,以及一个本身就是偏离的映像的网络中,不可否认,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和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个程度上,我们都被卷入其中。认为它是真相,认为它是真实的,认为它是一个兔子洞。如果这部电影是关于所有这些事情,那么它真的是关于回顾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现在和不久就会变得甚至是更加如此。

《黑客帝国》这部电影是在1999年上映的,而不是1969年。由于这个原因,它很轻易地在观众中找到了共鸣。我们理解它;我们赏识它的能力——不但是作为一部未来派的科幻电影,而且还是对我们是什么的一个解释。它不是第一部检验水的深浅的电影或艺术品,但也许它是最持续不变的(含蓄的)表达后现代存在主义的一个中心特征的哲学影片:真实和模拟之间模糊的或正在消失的界线。

《黑客帝国》是关于这种正在消失的界线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影片的对话中充满了对这一点的提及。电影的制作者们在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的端倪。在需要数字化信息的黑客到尼欧的住处来取磁盘的那个场面中,尼欧伸手到一本挖空了的书里取东西,镜头中显示出来的是尚·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的一本书《模拟与拟像》(*Simulations and Simulacra*)^[1]——一本关于真实的腐蚀以及被模拟的想象所代替

[1] 最初,是法语的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Éditions Galilée, 1981)。英语版本是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在影片中莫斐斯后来所说的话,“这才是今天存在着的世界。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可能也是受到布希亚的启发,因为对他而言,后现代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荒漠,在那里“你被从各种深度上受到打击……一个辉煌的,易变的,表面的中立,对含义和深奥的挑战,对自然和文化的挑战,一种外部的超空间,没有由来,没有参照点。”参见他的 *America* (London: Verso, 1988), p. 124 and pp. 1-13, 66-71, 123-126, (转下页)

的后现代作品。然而，在影片关注这种消失的界线的同时，我们并不能立刻十分清楚地知道它所说的是什么或者它表明的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或作为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关于影片中的这个故事到底哪些是新的东西也是不清楚的。这篇短文试图着眼于哪条界限，让我们凝视兔子洞的周围，看一看我们变成了什么东西。

我的方法是，考虑一下四种命题，即在我们这个科技进步的时代，关于真实和模拟之间的区别，这部电影说了些什么，暗示了些什么或者表明了些什么的可能的解释。这些命题如下：

I. 说出真实和不真实之间的区别最终是不可能的。

II. 现实可以被模拟并加以改进。

III. 模拟或虚构的现实可以(并且可能会)比正常的现实更优越。

IV. 模拟的现实可以和非模拟的现实一样真实，如果不是比其更真实的话。

我们不应当从一开始就只是假设这些命题中的每一个或者任何一个都是正确的。这里的要点是，要思考影片对这些命题的接受程度或者是对这些命题的调戏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他们认为我们的后现代时代特征就是反对以前的历史。希望在于，最后，我们的兔子洞可能会被更好地加以理解。

说出真实和不真实之间的区别最终是不可能的

尼奥与莫斐斯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得知一直以来自己的感觉都是正确的，确实“这个世界有些事情很不对劲”并且是与母体有关系的。他选择了红色药丸，要亲自去见识一下“兔子洞到底有多深”，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很快他就知道了，他曾经所熟悉的，看到的和体验到的唯一的世界是一个幻觉，在电脑空间之外没有真实。就在他进入真实的旅程开始之前，莫斐斯感到尼奥迷惑不解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梦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

(接上页)也参见布希亚的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不同呢？”它所表达的信息非常清楚。尼奥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

现在，这当然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更加具体地说，是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可能我们会什么也不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所有信念都是错误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表明对于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完全被迷惑了的？有着 2400 年历史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讲述了一个关于洞穴的故事，居住在里面的人把墙上的纯粹的影子当作是真实的事物本身。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他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真实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对柏拉图而言，这是关于人类状况的一个寓言，这些人只知道物质世界，而不知道柏拉图认为站在他们身后并且使得他们成为可能的思想或形式。再晚一些时候，在 17 世纪里，笛卡尔接受了这种可能性，即我们的所有信念可能都是错误的。在他的《沉思录》里，笛卡尔旨在为知识找到一种可靠的基础，并且想要从头开始，在第一沉思录里表明我们的所有信念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他首先从我们的感觉的不可靠性开始，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于是他就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每一件事情可能都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上，没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能够表明我们不是在做梦。但是笛卡尔推论说，我们不可能总是在做梦，因为我们做梦的内容不可能单独从梦里产生，因此一定还来源于其他的来源。于是笛卡尔又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即一个恶毒的魔鬼系统地欺骗了我们，因此我们的每一个信念都是错误的。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以及证明这种可能性是错误的不可能性的存在，基本或全世界范围的怀疑论就由此而产生了（笛卡尔认为通过他后来在沉思录里解释的方法他可以克服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明白了，莫斐斯关于我们不可能真的确切地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是否是真实的这种意见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哲学上的断言（虽然可能会有某些充分的论点来反对它）。在这里，莫斐斯所说的话有什么新的含义吗？仅仅如此而已，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关于恶毒的魔鬼这种想法在 17 世纪和一直到最近都是一个偏僻而又古怪的想法。极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卑鄙的实体怎么可能把信念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去。现如今，随着电脑模拟和通过电的刺激大脑可以运转

这种知识的出现,所有这些事情看起来都是可能的,即便只是很渺茫的可能。因此《黑客帝国》和其他一些有关科幻小说的电影和书籍使哲学教师的工作更加轻松了。全球性的怀疑论并不是如此可笑地牵强附会的。随着计算机科学和大脑科学的快速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达到那种水平,逼真的模拟映像和经历可以被专横地灌输到我们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里去。也许我们已经到达了那个层次,也许你正躺在某处的一个粘粘的浴盆里想着别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其中的差别呢……?”

尽管如此,这里的要点是,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可以意识到真实和幻觉之间的差别这种主张在哲学上并不是一种新的主张。但是,对《黑客帝国》而言,却有更多新的东西包含在其中。

现实可以被模拟并加以改进

让我们首先从只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并且它就是它除此之外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种观点开始。那么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会被它愚弄呢?不真实的世界可能本能地会在梦里出现,似乎是当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愚弄了我们。不真实的世界也可能是产生于感官或认识上的错误,再一次是本能的,以至于导致了欺骗。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之下,由于精神的能力和脆弱,这个世界都是与别的东西共存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形,真实的世界开始与别的东西共存。人类可以用符号、语言和想象来表现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事物和对事物的表现的世界里。自从洞穴绘画和符号语言出现以来,表现就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论辩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上和图示上都彻底饱和了的世界里。字词,符号,尤其是想象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已经占据了物质世界的直观性,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所体验的这个世界最好被形容为是一种景象,而不是一个充满了自然物质的时空统一体。因此,盖伊·迪鲍德(Guy Debord),在他的《景象的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里写道:

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本身展示为许多景象

的高度聚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从生活各方面分离出来的诸多形象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其中,这一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重新确立。现实以其普遍的统一方式部分地展现为一个隔离的虚假世界,一个纯粹静观的对象……景象不是形象的聚积,而是以形象为中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1]

按照迪鲍德的观点,现在不但比以前有更多的表象和形象,而且它们还形成了一个网络(母体?)组成了一种景象,这种景象比非代表性的景象离我们更加接近,以至于非代表性的景象已经变成一种无法重建的空想。为了验证这一点,考虑一下你目前的环境以及通过着眼于最终消费的人类制造和生产所形成的现实的发展程度;或者考虑一下在现代生活中或机场的休闲室里电视或监视屏幕的地位。

下一步伴随着计算机的模拟。我们不但能够而且确实也生产出并消费这个世界的许多人造物品,而且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模拟这个世界。模拟是以一种逼真的方式来表现以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客观过程和主观经验的一种手段,有代表性的是借助于计算机的帮助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模拟车的碰撞,或炸洋葱的香味或失重状态的体验。在得克萨斯州和新泽西州的实验室里,在你当地的博物馆的IMAX剧院里,人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结果我们就生活在一个模拟的世界里,充满了这样的模拟的产物,我们称之为拟像。

现在,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计算机模拟明显是处在年幼阶段。但它正在飞速前进。计算机模拟最艰难的部分可能不是复制和修改事物和人看起来、感觉、听觉和行为的方式,而是把所有这些以某种绕过了周围的非模拟世界的任何意识的方式都灌输到大脑里去。但是想象一下,科学技术已经发展了这么久了。或者让《黑客帝国》为你想象一下。那就是影片所做的事情。模拟开始于在键盘上不断的敲打(在近来的好莱坞影片中的这种确定的标志告诉我们有趣的事情正要发生),通过这种方式,虚拟现实就被创造出来了。在《黑客帝国》里,在莫斐斯第一次向尼欧展

[1] 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1983), p. 5. 最初是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Paris: Éditions Buchet-Chastel, 1967)。

示只有两个红色带扶手的椅子和一台电视机(后现代之前的 20 世纪 50 年代生产的,引起了我们的怀旧之情,对界线模糊之前的那些日子的怀念)装饰的计算机程序的“内部”这个场面中,或者是在尼欧和崔妮蒂慷慨豪迈地准备武器装备要拯救莫斐斯这个场面中,通过没有墙壁,没有地板,或屋顶的白色空间,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电脑空间。接下来,你可以用你喜欢的东西,无论是枪支、摩天大楼还是一群商人,或者是红衣女郎来填满这个空间。把所有这些通过一个插入到大脑里的钢棒用电讯设备传出去连接到一个适当的接收器上,瞧(*voilà*),我们就看到了被充分模拟化的 1999 年的世界,并且它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世界。就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多么可怕啊!

一旦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承认,原则上,明白一个模拟的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我们对于真实的判断是如何可能屈服于它似乎是相当容易的。然而,还有一个方面是令人困惑的,或许甚至是影片的作者贫乏地彻底思考的一个问题:自我和它的精神力量。莫斐斯告诉尼欧,当一个人被放置在一个像母体这样的计算机程序的时候,他或她还保留着一个“残留的自我映像”并且变成了“你的数字自我的精神反射”。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任何事情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尼欧,一旦被拔去插头并载入到电脑空间里,就是他在真实世界里,也就是在尼布加尼撒船上的样子的一个残留。他具有同样的个性(同样的基努·李维斯 *il-ne-sait-quoi*),同样的记忆(附带形成的,足够奇怪的,不是在真实世界里,而是在虚拟世界里),同样的想要自由的愿望,同样的柔道知识(相比之下,这是上载的)等等。另一方面,在电脑空间里他的身体、容貌和能力也是他的精神投射能力的一个功能。因此,在与莫斐斯进行柔道比赛的时候,尼欧被告知,如果他要赢得比赛,那么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身体会做到这一点。他的精神强大到(如果不总是他的意愿或自信)足以挑战地心引力和折弯汤匙。当然,这种能力来自于何处我们并不是完全清楚。当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敲打键盘,但那并不是发生的事情。躺在椅子上的尼欧本身正在做着操纵他的身体和电脑空间里的物质世界的工作。是什么允许他这样做的呢?

起先,似乎模拟给予了操作键盘的人以无限制的权力,而根本没有给

予对他而言世界被模拟了的那个人(躺在椅子上的)一丁点儿的权力。或者这样说是对的吗?要是模拟不限于此又会如何呢?一个世界被输送到了你的大脑里,此外,你的大脑不但有能力从那个世界里接受这些信息,而且还能够按照这些信息去行动(像在一个录像游戏里一样),因为是在电脑空间里而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你的能力没有受到熟悉的科学规律的制约。或许,影片《黑客帝国》在这方面是正确的,毕竟:通过一个强大和有纪律的意志,只有十分熟练的模拟实际上才会允许一个既能设计出它的真实属性又能够超越它们的自我的出现。按照《黑客帝国》的观点,比计算机更加强大的是与之交战的精神。我们将不得不等待以发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不感到好奇又谈何容易。或者在两百年以后唤醒我,或者最好立刻就把我装载到这里。^[1]

因此,现实不但可以被模拟,而且还可以被改进。为什么用别的方式来模拟它呢?这意味着模拟现实不但是复制它的基本结构,而且还要使拧在一起的东西成为必要的,以便与我们的愿望相一致。《黑客帝国》里的虚拟实境不但复制了2199年那荒凉、阴沉的废墟,而且还复制了1999年存在的那个世界。与2199年的世界相比,1999年的世界里充满了明亮的颜色、蓝色的天空和美味的食物。即使是与1999年的“真实”世界相比,它在某些方面也得到了改善,比如说,关于增加了的红衣女郎或者大概是贫困的根除(因为我们大体上看到了商业类型,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机器人需要的是一种听话的人类,允许饥饿和剥夺是不明智的)。

是的,为了几乎是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模拟基本上是对现实的一种接受。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我们自己和社会里。我们还没有达到一种层次,虚拟的现实只是比真实的事物好一点点吗?人造香蕉的味道不可能是或者不可能被制造得比香蕉本身更加令人高兴吗?或者我们不能想象有这么一天,大峡谷的超级诈骗的IMAX的经历远远超越了大洞本身的经历吗?受到哲学启发的小说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曾经指

[1] 对于这部影片的专家们而言,这是个测验表演的问题:按照《黑客帝国》的观点,什么是最强有力的?不正确的回答是:精神或者是它的意志力。正确的回答是:爱情。回想一下,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他与电脑人的决斗中,尼欧的精神力量并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当他倒下或是死掉的时候,救了他并给了他力量从而战胜电脑人的是崔妮蒂的吻。

出,出乎意料地遇到大峡谷的感觉远远胜过了坐着旅游车到达那里的感觉。想象一下 IMAX 的经历把你固定在暂时根除了关于大峡谷存在的任何知识的电子刺激上,因此你可以骑着马上去并且被完全惊呆了。给定这样的一个情节,人们可能可以理解地说:“如果你只有三个小时,选一条路上峡谷并且前往 IMAX。它是可怕的。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参观真实的事物,那将会很不错,尽管要为一点点失望做好准备。”谁会责备他们呢?哪一个把我们带到了下一步呢?

模拟或虚构的现实可以(并且可能会)比正常的现实更优越

哪一个是可取的、更优越的,真实世界还是被提升了的虚拟世界?你会选择哪一种药丸——蓝色的还是红色的?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给定了适当的科技进步和一个胜任的并且仁慈的程序员,虚拟世界将会有代表性地看起来比真实的世界更加具有吸引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在塞佛的过失和为无法模仿的电脑人史密斯工作这个场面中被很好地加以例证了。塞佛在享受着多汁美味的牛排,品尝着精美的红酒的同时说道:“我知道这块牛排并不存在。我知道当我把它放到嘴里的时候,母体就会告诉我的大脑,说牛排多汁而且美味。九年了,你知道我明白了什么吗?无知是福。”

母体里有多汁的牛排,真实的人类世界里有乏味的稀粥。母体里有美妙好玩的夜总会,真实世界里则没有;母体里有性感的红衣女郎,真实的世界里……崔妮蒂(哦,总是有例外的)。但要点是,与真实的世界相比,母体是一个感官上愉悦的天堂。而塞佛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享乐主义者——一个寻求快乐的人,不愿忍受自己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不愿听其他理想主义者的废话。他想要返回到电脑的虚拟现实中去,并且愿意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去做任何事情,以便从另一个九年的吃稀粥的日子中解脱出来。尼布加尼撒船上的其他人却不是这么想的。对他们而言,还有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真相和自由。尤其对尼欧而言,早先他就暴露出对命运的厌烦和怀疑,因为“我不喜欢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因此,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看起来似乎虚拟世界只是对肤浅的享乐主义者而言才是更可取的、更优越的,他们对于自我欺骗的罪恶漠不关心,而真实世界对任何关心像真相、自由、自治和真实这些更加重要的事情的人而言,都是更可取、更优越的。在提出这些信息的同时,我们想起了一个古老的好莱坞关于道德的传说。十分不像是后现代的。当然,影片中的整个情节受到从机器人和他们邪恶的母体的专制中获得解放的高尚斗争的推动。但是,不考虑影片本身,电影以一种向我们表明塞佛是正确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两个世界。我认为唯一明智的道路就是选择模拟的世界而不是选择真实的那个世界。

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母体并不只是提供感官上的愉悦。它真的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实际上,它给予我们的正是从最浅到最深的满足上我们所能希望得到的每一件事情。假设机器人还没有使事物不必要地枯竭,虚拟世界给了我们参观博物馆、参加音乐会的机会,给了我们阅读莎士比亚和斯蒂芬·金的作品的机会,给了我们谈恋爱、做爱、养育孩子的机会,形成深厚友谊的机会等等。因为机器人具有每一个动机来创造和支撑一个没有人类痛苦、意外、疾病和战争的世界以便增加可以获得的能量供给,所以除了大概它会比我们的世界好以外,整个世界其实都在我们的脚下。另一方面,真实世界是一个废墟。图书馆和剧院已经被破坏了,天空也总是灰色的。实际上,你会不得不脱离你的精神或者至少是认真地脱离午餐来选择真实世界(那就是为什么基努·李维斯看起来是如此适合于这个角色吗?)。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谈论基础享乐主义,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话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更高的才能”以及来源于他们的深奥的,多种多样的满足的类型。这样的满足在母体里比在“真实的荒漠”里更容易找到。^[1]

[1] 因此,当尼欧选择红色药丸的时候,我,和塞佛一起,会选择蓝色药丸,虽然不仅仅是为了动物或人特有的舒适和愉快。然而,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况。在“你不知道区别因此你无法做出选择”(Philosophy Now (December 2000/January 2001), pp. 35-36), Robin Beck 论辩说,“做出这种选择没有合理的根据”。因为如果假定一旦吞下了哪一个药丸,每一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同等真实的”,那么“从认识论上而言,两个世界都是一样的”。贝克这样说是对的,即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我们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在那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如此被认为的那个世界很难取决于哪一个药丸被选择,蓝色药丸给了我们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真相和自由,自治和真实又如何呢?机器人大概并不介意你在虚拟世界里做些什么,只要它呆在这里。你可以绘画,你可以创造音乐,你可以支持政府或者是反对它。在每一个方面你都是自由的,你现在就是自由的,只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拔去插头或者是企图让其他人拔去插头或者是杀死那些正在尽力阻止人们拔去插头的电脑人。至于说真相,真正只有一个单一的重要的真相躲避着你:那就是,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所有的一切仅仅是虚拟的。但是感觉起来和真实的一模一样。并且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是不真实的,除非莫斐斯或者他的团队拜访过你。因此你应当介意吗?这要紧吗?最后它真的是不真实的吗?是什么使得它不真实?让我们继续探讨我们的最后一个命题。

模拟的现实可以和非模拟的现实一样真实,如果不是比其更真实的话

首先,是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尚·布希亚的一些线索:

真实的定义已变成:那种可以产生复制对等物的真实……在这个复制过程的限度内,真实不但是能够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是那种总已被复制的东西。超真实……超越了表现手法……只是因为它全部是模拟……技巧成为现实的关键所在。^[1]

当莫斐斯第一次带领尼奥进入计算机程序化了的电脑空间的时候,尼奥抓紧在明亮的白色背景下的一个皮质的有扶手的椅子问莫斐斯:“你在告诉我,这都不是真的吗?”莫斐斯回答他说:“什么是真实?你如何来定义‘真实’?”这并不只是一个丢弃的线索或者是一个纯粹的带修饰色彩的问题。在这部影片古怪的内容和我们曾经古怪的科技世界里,它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莫斐斯接下来的陈述只是确认了这一点。他说真实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闻得到的,感受到的和看到的東西”而且这存在于

[1]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pp. 146, 147, 151.

“你的大脑所解释的电子信号。”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虚拟现实里的经历也是由大脑所解释的电子信号的话,那么看起来遵循那个虚拟的现实就和遵循真实的现实是一样真实的。

在另外一个场景中,尼奥坐在车里去见祭司。他朝车窗外看去,突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并大声喊道,“天啊,我过去常常在这里吃饭……真的很好吃的面条”,但是当他想起“我从生活中获得了这些记忆……而它们没有一个曾经发生过”的时候,他也只有徒然地向后倚靠在座位上。但是它们真的没有发生过吗?他却记得它们。^[1] 与不真实的记忆(比方说令人质疑的精神疗法所产生的那种记忆)不同,尼奥的记忆是他曾经经历过的,就像是发生在眼前一样。他对于饭店的体验导致了更多的对饭店的调查,换句话说,他关于饭店的体验与他的其他经历和行为有一种连贯的联系。它甚至是与在一个虚拟的,主体间共同享有的世界里,尼奥带着一同到饭店里吃饭的其他人的经历和行为有一种连贯的联系。^[2]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记忆实际上确实是符合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原则上,一个人可以从躺在夹层中,插入到母体中的其他人的大脑里找到它的踪迹。

前面刚刚提到过的,现实和我们对于它的知识是植根于我们所具有的感官上的印象的(视觉,触觉等等)这种观点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种哲学,与在17世纪和18世纪它最初形成了它的现代形式相比,今天更有影响的一种哲学。按照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观点,只有我们看到,听到,闻到,品尝到和接触到的事情才能证明我们的知识,我们关于什么是真实的信念是正当的。现在,一个人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说尼奥和在母体内的其他人类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看到或者是听到任何事情。然而,他们和我们一样具有感官印象。而且,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的感官印象和我们的感官印象区分开来,没有可以利用的客观证据(就像我们也没有一样)向他们表明他们的感官印象只是想

[1] 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首歌“both sides now”里的歌词:“我想起的是生活的幻觉/我真的根本就不懂得生活。”

[2] 为什么是主体间的?在《黑客帝国》里,并不是好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私人的母体而不是全部的人类共有同一个母体。在这里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会被其他人亲眼目睹并且经历。

象,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对他们而言母体是真实的,就像我们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真实的一样,因为两个世界都是由同样的感官印象所支持的。^{〔1〕}

我们也看到尼欧早期的经历是关于真实的经历,因为他们与其他的经历和行为是一致的,不但是与尼欧自己的经历和行为一致,而且还与其他人类的相一致。这依赖于某种像是真相的一致概念的东西,按照那种东西,像“我过去经常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到那家饭店吃饭”这样的信念是正确的,如果它符合大多数我们其他的信念的话。他的经历与我们的行为一致而且是我们行为的一个可以依赖的基础(对尼欧早期的经历也适用),这是实用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

虽然如此,一个对所有这些都持怀疑态度的怀疑论者,一个对计算机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无论一个人对虚拟世界具有多少感官印象,也不论他们在个体内部和个体之间多么的一致,电脑世界毕竟不是真实的,因为它在空间上是不存在的。以与其他假想的事情(虚构的情人或圣诞老人)可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同样的方式,它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但是计算机的信徒们会回应说:电脑世界在空间上是确实存在的,它存在于赛博空间里。怀疑论者会说赛博空间不是真实的空间。信徒们于是就会说,哈罗——哦?,当然,它不是“真实的”空间,正因为如此才称它为赛博空间啊。但是怀疑论者又会回应说,不是真实空间的那些空间根本就不能算作空间。按照这种观点,“赛博空间”就仅仅是一个隐喻;严格地说,“赛博空间”是一种矛盾修辞法。

即便是承认“赛博空间”仅仅是一个隐喻,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计算机怀疑论者正在假定空间性是可以被算作真实的东西的一个必要特征。这种假定是,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空间—时间统一体,并且我们的一些信念和经历符合在那个统一体里的东西,而有些则不符合。如果信念(或经历)不符合,那么它们就是错误的(或不诚实的)。类似的,如果某事不能在那个统一体里被找到,那么它就不是真实的。对真实的空间性(和物质

〔1〕 这个要点取决于接受某种确认的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一种主张是有意义的并且是真实的,如果存在且只存在一种可能的方法来证明它的话。这个原则本身在哲学上就存在着争论。

性,在物质性是按照空间性来定义的范围内)的这种假设是一些哲学家们会抵制的一种假设。实际上,柏拉图就反对它。柏拉图认为数字,更一般地说,所有的形式或想法都是真实的,然而却不是空间性的。(康德认为,空间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属于由直觉知道世界的影晌的那种方式。)因此我们就会明白,计算机的信徒们不但是与经验主义者、连贯论者、实用主义者共享某种哲学上的基础,而且还与柏拉图学派的人(大概也有康德学派的人)共享这一基础。就像后现代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至少,是在许多情况下)。

柏拉图认为,形式或想法比位于空间里的具体的物体更加真实。他这样说的理由是十分复杂的,但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说,对柏拉图而言,形式或想法是更加真实的是因为它们是永恒的、不易改变的,并且使我们关于它的物质世界和我们的知识成为可能。现在,虚拟现实不是永恒的或不变的,它也不能够授予我们知道的那个非模拟的世界(至少,现在还没有)。可以说模拟的世界比非模拟的世界更加真实这种主张有任何意义吗?或许,也只有这种意义了。如果我们未来的经历表明,模拟的现实比非模拟的现实对我们度过的经历和实质的行为有更大的因果关系,那么,从实用主义的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会是更加真实的。这是否会被证明是事实并不是我们能够轻易预见的事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哦,大概要等上两百年吧。

20 母体：或者，颠倒的两个方面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当我在斯洛文尼亚当地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黑客帝国》的时候，我碰巧与这部电影的一个理想观众，即一个傻瓜坐得很近。这个人约二十八九岁，坐在我的右边，他是如此沉浸在电影的情节当中以至于他经常会打扰到别的观众观看影片，因为他总是不时地大声发出声响，比如说：“哇，我的天啊，这样看来真的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我肯定会选择喜欢这种天真质朴的沉浸，而不是那些把精确的哲学或心理分析方面的概念性区别设计进电影里的伪深奥的知性论者的表演。^[1]然而，我们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具有的这种智力上的吸引力：《黑客帝国》不正是那些具有罗夏墨迹测验[<http://Rorschach.test.at/>]效果的电影之一吗？罗夏墨迹测验开创了普遍化的认知方法，就像是众所周知的那幅上帝的画像一样，似乎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看，他总是在直视着你——事实上，从每一个方位上它都为自己提供了辨认的可能性。

[1] 把最初的底稿（可以在因特网上查到）和电影本身加以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沃卓斯基兄弟相当聪明，以至于他们去掉了许多关于对沉闷的伪智力的提及，比如：“看看他们，那些机器人，不要去考虑他们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是计算机告诉他们做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这样做了。”“邪恶的陈腐”这种自命不凡的话忽略了事实的关键所在：与大屠杀的刽子手相比，陷入母体的虚拟现实中的人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几乎截然相反的立场上。他们兄弟的另一个聪明举动就是，删去了所有对于东方技巧的太明显的提及，这种东方式的技巧就是把释放心灵作为逃离母体的控制的方法，比如：“你必须学会释放自己的愤怒。你必须看开一切事情。你必须倒空自己以释放自己的心灵。”

我的一些信奉拉康主义(Lacanian)的朋友告诉我说,这部电影的作者们一定读过拉康的作品;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在《黑客帝国》里看到了推断的文化产业的具体化,看到了异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物质,财富(资本)直接接管和殖民了我们的内心生活本身,把我们当作是能量的源泉;新世纪的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种思考的源泉,认为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在万维网上具体体现的一种全球化思维所产生的海市蜃楼。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黑客帝国》不正是重复了柏拉图关于洞穴的寓言(作为囚犯的普通人被紧紧地捆绑在自己的座位上,并且被迫观看[他们错误地认为是]真实的影子表演)吗?当然,《黑客帝国》和洞穴的寓言的重要区别在于,当其中的一些人从他们的洞穴困境里逃出来并且踏上地球表面的时候,在那里,他们看到的不再是阳光普照,万物生长的大地,至高至善的美,而是荒无人烟的“真实的荒漠”。

在这里,关键的对立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拉康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对立,即我们应该把《黑客帝国》历史化进入将文化和主观性殖民的资本的隐喻中呢,或者它是这样的象征性序列的具体化?然而,如果这种绝对的,特别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是错误的怎么办呢?如果象征性序列的虚拟人物“同样”也是确有其事的情况怎么办呢?

到达世界的尽头

主角生活在一个完全被操纵和控制了的虚假世界里这种想法并非原创:《黑客帝国》只不过是引入了虚拟实境(VR)因而更进了一步。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涉及打破旧习方面,虚拟实境基本上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虚拟实境标志着我们丰富的感官经验被彻底的缩减到——不仅仅是字母,甚至是——最小的0和1的数字序列,传送和未传送的电子信号。另一方面,这种数字化的机器又产生了关于现实的“模拟的”经验,这种经验往往会变得与“真实的”现实无法区分,结果便导致了对“真实的”现实这个概念的不断破坏。同时,虚拟实境也因此成为影像所具有的诱惑力的一个极端证明。

一个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城里,那里可是消

费者的天堂,可是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构的,只是一种表演的景象以便让他确信自己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与此同时,他周围的所有人只不过是在这场巨大的演出中的一些训练有素的演员和临时演员。这最终不是美国人类类似妄想狂的那种幻想吗?关于这一点,最近的例子是彼得·威尔(Peter Weir)导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在影片中金凯利(Jim Carrey)扮演一个小城里的办事员,他渐渐发现事情的真相:他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电视节目中的男主角;他的家乡搭建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里,摄像机一直不间断地跟踪拍摄他的一举一动。

斯劳特戴克(Sloterdijk)的“球体”理论(sphere)在这里得以实现,一个巨大的金属球体包围并隔绝了整个城市。《楚门的世界》的最后一场戏似乎是关于解放的体验的,冲破这个被包围的世界的意识形态的缝合,冲入了它的外部空间,这个外部空间从意识形态的内部是看不到的。然而,如果恰恰是这个影片的“幸福的”结局(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全世界数百万观众在观看这场电影的最后几秒钟时都不禁鼓掌叫好),即男主角冲了出来,就好像我们一直被牵引着所相信的那样,他很快就会和他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因而,我们又有了一个爱情结局的模式!),又是一种最纯粹的意识形态怎么办呢?如果意识形态恰恰也存在于这样的一种信念之中,即认为在这个有限的宇宙的包围之外,还有某种等待我们进入的“真正的现实”怎么办呢?^[1]

菲利浦·K·迪克(Phillip K. Dick)的小说《混乱的时间》(*Time Out of Joint*, 1959)就是早先持有这种观念的作品之一。他的这部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个男人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城镇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但是他却渐渐地发现他所居住的整个小城镇只不过是为了要让他感到满足而虚构的一个活动场所……《混乱的时间》和《楚门的世界》的潜在含意是,资本主义晚期作为消费者天堂的加利福尼亚在超越现实方面正以一种不真实的、非物质的方式被剥夺了物质惯性。因此,不但好莱坞上演了被剥夺了物质性的重要性的真实

[1] 使《楚门的世界》中的男主人公能够识破并脱离他所生活的那个被操纵的世界的事情是让人无法预料的他父亲的介入,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影片中有两个父亲式的人物,一个是他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亲,一个是类似妄想狂的“真实的”父亲,由埃德·哈里斯扮演的,作为电视节目的导演的那个父亲,这个父亲完全操纵了他的生活,在一种封闭的环境里保护着他。

生活的假象:在晚近的资本主义消费者至上的社会里,“真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也不知不觉地获得了虚假表演的某些特征,我们的邻居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表现就像那些舞台上的演员和临时演员一样……失去了精神意义的资本主义功利世界的最终真相是“真实生活”本身的消失,是它反向的怪异的表演。

在科幻小说领域里,我们也应当提及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的小说《星船》(Starship)。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某个部落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星船的管道中,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浓密的草木使得他们与星船的剩余部分隔绝,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的头顶上空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最后,几个孩子穿越灌木丛到达了外面的世界,并且与其他部落生活在一起。

在那些更年长,更“天真质朴”的先驱中,我们也应当提及乔治·西顿(George Seaton)的《36小时惊恐》(36 Hours),这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电影讲述的是詹姆斯·加纳(James Garner)扮演的一名美国军官,他知晓关于诺曼底登陆的所有计划,然而就在登陆前的几天,他被德国人抓获了。由于他被俘虏的时候受到爆炸气流的冲击而不省人事,德国人便快速地专门为他建造了一个冒充的小型美国军事医院,并试图使他相信他自己是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失去了最近6年以来的记忆——德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么一来他就会将入侵登陆的所有计划和盘托出了,那么自己便可以早做好了;然而,如此小心谨慎地建造的医院还是很快就露出了破绽。

在背景中潜藏着的当然是前现代主义的“到达世界的尽头”这种概念。在那些众所周知的雕版画中,感到惊奇的漫步者们接近了天堂的屏幕或台幕,即一个描画着点点繁星的平面,漫步者冲破了这一屏障,到达了另一边——这恰恰是在电影《楚门的世界》的结尾中所发生的事情。难怪在这部影片的最后一幕中,楚门缓缓地走上了梯子,来到了绘制着“蓝色天空”的地平线的那堵墙面前,推开了墙上的一扇门,这显然是马格利特式(Magrittean)的笔触:这不是在说如今这种相同的感觉又彻底重归了吗?像希伯尔伯格(Syberberg)的《柏士浮》(Parsifal)这样的作品,讲述的是无限扩展的视野同样被明显是“人工”制作的布景给阻断了,这不

是表明笛卡尔的无限透视的时代已经逝去,我们又回到了一种复兴了的中世纪非透视的世界中吗?

弗雷德·詹姆士(Fred Jameson)敏锐地注意到在钱德勒(Chandler)的一些小说和希区柯克(Hitchcock)的一些电影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再见吾爱》(*Farewell, My Lovely*)中的太平洋海岸被当作是“世界的某种尽头或者是界限”,在此之外有一个未知的深渊;而在影片《西北偏北》中,总统山前面的巨大开阔的山谷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在躲避追逐者的逃亡中,爱娃·玛丽·赛恩特(Eva Marie Saint)和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逃到了峰顶,在爱娃·玛丽几乎要掉下山谷之前,加里·格兰特紧紧地抓住了她。

有人可能会试图把《现代启示录》里面在越南和柬埔寨边境的一座桥上发生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场面也加入到这一系列中来,桥以外的空间被认为是“超越了我们已知的世界”。而且认为我们的地球并不是漂浮在无限空间中的一颗行星,而是一个圆形的开口或洞孔,里面永远装满了密密麻麻的冰块,太阳位于它的中心这种观点正是纳粹伪科学最喜欢的幻想之一——根据一些报道的说法,他们甚至考虑应该在叙尔特岛上安放一些望远镜以便可以观察美国。

“确实存在”的大他者

那么,母体又是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拉康主义所说的“大他者”,那个虚拟的象征序列,那个为我们构建了现实的网络。这个“大他者”的尺度就是在那个象征序列中主体被结构性异化的尺度:大他者拉动着牵制木偶的绳线,主体自己并不说话,他是通过符号结构来“说话的”。简而言之,这个“大他者”就是社会实体,社会物质的代名词,虽然如此,由于它的存在,主体从来都无法完全支配自己行为的效果,由于它的存在,主体行为的最后结果总不是他的目标或他所期待的。

然而,在他的主要著作《论文集十一》(*Seminar XI*)的关键章节里,拉康努力地想要勾勒出异化后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异化的对应物,即分离:在大他者中异化以后,接下来的就是从大他者中分离出来。当主体意识到大他者本身是如何前后矛盾,纯粹是虚拟的,“隔绝的,被禁

止的”,而且被剥夺了物质性的时候,从大他者中分离出来的行动就开始了——幻想的目的不是要填补主体的缺乏,而是要弥补他者的缺乏,以便建构(重新建构)大他者的连贯一致性。

由于那个原因,幻想和妄想狂就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妄想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信念,认为还存在着一个“他者的他者”,认为另一个他者隐藏在明晰的社会结构的那个他者的背后,安排着(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社会生活中无法预知的那些结果,从而保证了它的连贯性:在市场的混乱,在道德的颓废背后等等,有着犹太人的秘密计划(Jewish Plot)中有目的的策略……随着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的数字化发展,这种类似妄想狂的姿态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动。当我们的整个社会存在在电脑网络这个大他者中日益变得越来越具体化越来越物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轻易地想象出,一个邪恶的程序员消除了我们的数字化身份,从而也就剥夺了我们的社会存在,把我们的人变成不是人的东西。

遵循着同样的妄想狂式的手法,《黑客帝国》中的论题是,大他者被真正存在着的超大电脑具体化了。有一个——必须有一个——母体,因为“事情不对劲了,机会失去了,不知哪里一直出问题”。换句话说,这部电影关于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母体的存在的这种暗示模糊了一直在其身后的所有真正的现实。因而,这部电影的问题在于它还不是足够“疯狂的”,因为在由母体所支撑的我们的日常生活背后,它还假设了另一个“真实的”现实。

然而,为了避免这种致命的误解而提出的相反的主张,即“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由母体产生的”,不存在最终的现实,一切都只不过是彼此互相映照的无穷无尽的虚拟现实罢了,这些主张也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在《黑客帝国》的续集中,我们或许会认识到,那个“真实的荒漠”是由另一个母体产生出来的。比这种虚拟的世界的繁殖更具颠覆性的将是现实自身的繁殖——这重现了一些物理学家在最近的粒子加速器实验中已经看到过的一种悖论般的危险。

目前,科学家们正在设法建造一种接近光速的加速器,它能够使非常巨大的原子核发生裂变。科学家们的想法是,这样的一种碰撞不仅能够使原子核裂变成它们的组成部分中子和质子,而且还能够让中子和质子

本身变成粉末，留下一种“等离子体”(Plasma)，即一种由松散的夸克和胶子粒子组成的能量汁液，以前人们从来没有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研究过物质的构造，因为这种状态只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才短暂的存在过一段时间。然而，这种期望引起了一个噩梦般的想定，即如果实验成功了，创造出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机器，一个毁灭全世界的怪物，它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消灭在它周围的那些普通物质，因而也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会消灭我们的世界怎么办呢？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世界的末日，宇宙的瓦解，正是能够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最终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因为它会把一切物质都吸入到黑洞里，然后再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宇宙，从而完美地再造了宇宙大爆炸的场景。

如此一来的悖论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说法——(1)一个主体自由地从一个虚拟现实漂移到另一个虚拟现实，这虚拟现实是知道每一现实都是虚构的完全清醒的幽灵；(2)在母体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现实的偏执狂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它们都忽略了真实。《黑客帝国》坚持在虚拟现实的模拟背后还有一个真实，这并没有错——就像莫斐斯让尼欧看到芝加哥废墟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然而，这种真实并不是在虚构的模拟背后的“真正的现实”，而是让现实变得不完整或不连贯的那种空洞，而且每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母体的作用都是为了隐瞒这种不连贯。而完成这种隐瞒行为的办法之一正是宣称，在我们所知晓的不完整或不连贯的现实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现实，它由无止尽的不可能性构建而成。

“大他者并不存在”

“大他者”也代表了一个常识性的领域，一个人经过自由的深思后可以到达的那个领域；从哲学上而言，它最近的杰出版本便是哈贝马斯(Habermas)的带有协调一致理想的社会交往理论。如今日渐崩溃的正是这个“大他者”。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某种彻底的分裂物：一方面，专家和科学家们所使用的被客观化了的语言不再被转换成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普通语言，

而是以一种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的盲目迷恋的客套话、惯用语的方式出现在普通语言中,除此之外,它还塑造了我们关于宇宙的附庸风雅的印象(比如说黑洞,宇宙大爆炸,超弦理论,量子振动……)。不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里,专业行话都被看作是一种客观的见识,任何人都不能对此提出质疑,同时它也不能够转化成我们的共同经验。简而言之,在科学见识和一般常识之间的沟壑是难以跨越的,也正是这种沟壑使得科学家们成为“应当对事物有所认识的主体”中那些受欢迎的被崇拜的人士(比如斯蒂芬·霍金现象)。

另一方面,严格地说,这种客观性的对应面是一种方式,从文化方面而言,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无法互相转化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保护它们宽容的共存着的这种情形。今天主体的形象也许是一名印度的计算机程序员,白天的时间里,他在专业技能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到了晚上,他一回到家,就会为当地的印度神明点燃蜡烛,并敬拜着牛的圣洁。

赛博空间完美地展示了这种分裂。赛博空间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了一个地球村里。然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却是,我们被属于这个不一致的矛盾的世界中的大量信息轰炸着。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种族特别身份的“小他者”供我们选择,从而取代了地球村这个大他者。但是要避免这样一种误解:在这里拉康绝不是要将科学相对化使其成为一种武断的叙述,最终和政治上正确的神话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等等,这些神话包括:科学确实“触及了真实的东西”,科学上的知识确实是“在真实中的知识”。僵局仅仅存在于科学知识并不能成为象征性的“大他者”这个事实里。在现代科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常识哲学本体论之间的隔阂在这里是难以克服的。这种隔阂早在伽利略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在量子物理学方面被推向了一个极端。在量子物理学中,我们处理的是那些确实起作用的规律,虽然这些规律并不能被重译成我们对于可描述的现实的体验。

风险社会学说(Risk Society)及其对全球化的反省意识是正确的,因为它强调了今天我们怎么会处在与古典启蒙运动中普遍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端,这种意识形态预示说,最后,根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参考专家们的“客观知识”得到解决。当我们面对着关于某种新产品(比如

说,转基因蔬菜)可能导致的环境方面的后果而引起的那些冲突意见的时候,想要寻求最后的专家意见是徒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科学在财政上依赖于大公司和政府机构的支持而尽显腐败,并不只是真实的问题被模糊了。即便是它们本身,科学也不能够给出答案。

十五年前,生态学家们就预言地球上的森林将会荒芜,然而,我们现在得知的情况却是,如今的问题是森林的面积增加得太快了。这种风险社会学说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强调那些非理性的困境,并把我們这些普通大众推入到这些困境中来。虽然我们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没有什么立场来决定,而且我们的决定将会是错误的,但我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被迫做出了决定。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和他的追随者们便求助于对所有观点和形成的多数人意见的民主讨论。然而,这并不能解决这种不变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当在认知上大众依然是无知的时候,为什么由大众参与的民主讨论就会导致更好的结果呢?

因而,大众的政治挫败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被号召做出决定,但同时又要接收他们没有有力的立场来做出决定的那些信息,客观地衡量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求助于“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ies)是逃出这种僵局的孤注一掷的办法,是想要重新获得弗雷德·詹姆士称之为“认知地图”上最小的那一部分的一种企图。

朱迪·迪恩(Jodi Dean)^[1]注意到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在官方科学(即“严肃的”,学术上制度化了的)和所谓的“伪科学”的巨大领域之间的“无声对话”中,在相信有 UFO 的人和那些想要破译金字塔秘密的人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一个人不能不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打击,即官方的科学家们以一种教条主义的轻视的态度在进行研究,而“伪科学”家们却求助于不含有庸俗的偏见的事实和论证。答案当然是,地位确定的官方科学家用大他者的权威,用科学作为一种机构的权威来发言,但问题是,正是这种科学的大他者被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出只不过是公认的象征性的虚构罢了。因此,当我们面对着共谋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严格地同步阅读亨利·詹姆士的《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

[1] 以下是我写作时广泛参考的。见 Dean's *Aliens in America: Conspiracy Culture from Outerspace to Cyberspa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我们既不当把鬼魂的存在作为叙述现实的一部分,也不应当以一种伪弗洛伊德的方式把它们归纳为是女主人公歇斯底里的性受挫的“反映”。

共谋理论当然不能被接受为是“事实”。然而,一个人也不应当将它归纳为是现代群体歇斯底里症的一种现象。这种想法还是依赖于“大他者”,依赖于共享的社会现实的“正常的”感知模式,因此没有考虑到怎么会恰恰是关于现实的这一想法如今正在崩溃。问题并不在于不明飞行物的研究者们和共谋理论家们倒退到一种类似妄想狂的态度而不能接受(社会)现实,问题在于现实本身正变得愈加偏执。

当代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把这种情形推到了我们面前,即我们被迫意识到我们对于现实的感觉和正常态度是如此建立在一个象征性的虚构的基础之上——决定什么是正常的和公认的真相,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什么是意义的界线的“大他者”绝不是直接建立在由科学的“真实知识”所提供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

让我们到一个现代科学还未被提升到“主流话语地位”的传统社会中感受一下。在这个象征性的空间里,如果一个人鼓吹现代科学的命题,那么他会被当作“疯子”而受到驱逐。而问题的关键是,说他并不是“真的疯了”还不够,不过是个肤浅而又无知的社会迫使他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在某种程度上,真的被当作“疯子”对待,被社会这个“大他者”摈弃在外,实际上这个社会才等同于疯狂。“疯癫”不是建立在和“事实”直接对应的基础上的一个称谓(这是从一个疯子不能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感知事物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因为他的心被产生幻觉的投射所牢牢占据了),而只是涉及一个个体和“大他者”之间的关系。

拉康通常会强调这个悖论相反的那一方面:“疯子不但是把自己想象成国王的乞丐,而且还是把自己想象成国王的国王。”换言之,疯癫指明了象征性的事物和真实的事物之间的那种距离的崩塌,对象征性要求的一种立即识别;或者,我们采用他的另一种可作为例子的表述:当一个丈夫处于一种病态式的猜疑之中,脑子里全是他妻子和别的男人上床的念头的时候,即使是被证明他的怀疑是对的,他的妻子的确跟别的男人上过床,那么他的这种猜疑依然是具有病态特征的。

从这样的悖论中获得的教训是十分清楚的。病态的猜疑并不是与让

事实变成错误的有关,而是与这些事实是怎样被融入主体的性欲机体有关。然而,我们在这里应当断言的是,同样的悖论也可以发生在它相反的那一方面:社会(它的社会象征性的领域,大他者)是“健全的”和“正常的”,哪怕是事实上它被证明是错误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已故的拉康称自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从他不能将自己的谈话融入到大他者的领域中这个范围内而言,他的确是到了患精神病的程度了。

有人试图以康德哲学的模式宣称,共谋理论的错误不知何故是与“纯粹理性的谬论”相类似的,也与下面两者之间的混淆相类似:一是作为正式的方法论的怀疑(对已知的科学、社会等等方面的常识的怀疑),一是用另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全局性超理论来证实这种怀疑。

掩盖真实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母体也发挥了一种“屏障”作用,这种屏障将我们与真实隔绝开来并且使得“真实的荒漠”可以忍受。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拉康主义的真实的那种根本的歧义:它并不是被幻想的屏幕所遮盖的最终指示物。作为总是扭曲了我们对于指示物,对于现实的感知的一种障碍,真实也是而且首先是屏幕本身。

在哲学话语中,这一点存在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区别中:对康德而言,真实是我们通过先验范畴的屏幕“系统化的”感知到的本体领域;相反的,对于黑格尔而言,就像他在他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导言(*Introduction*)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康德哲学式的隔阂是错误的。当一种屏障介入到我们自身和真实之间的时候,它总是会超越屏幕(表象的屏幕)而产生一种关于什么是“否定自我”的概念,因此,表象和否定自我之间的隔阂总是已经“为我们”存在了。因此,如果我们从扭曲的屏幕中抽取出实体,那么我们也丧失了实体本身(在宗教术语中,基督的死亡也就是上帝本身的死亡,而不仅仅是他作为具体的人的肉身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在此点上追随了黑格尔的拉康而言,实体本身最终是一种凝视,而不是被感知的物体。因此,回到母体中来:母体本身就是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的那种真实。

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他的《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中对北美五大湖区部落氏族之一的温内巴戈人(Winnebago)在建筑上的空间布局的一个举例分析,也许在这里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这个部落分成两个亚群(半族),即“那些来自上层的人”和“那些来自下层的人”;当我们要求一个个体在纸上或沙土上描画一下他/她的村庄的平面图(村舍的空间排列)的时候,取决于他/她从属于哪个亚群,我们会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两种答案都是把村落看成是一个圆周;但对于其中一个亚群的人而言,在这个圆周之内还包含另一个中心有房屋的小圆周,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同心圆;而对于另外一个亚群的人而言,这个圆周则被一条分割线清楚地分成了两半。换句话说,第一个亚群里的成员(让我们称之为“保守的合作主义者”)把村庄的平面图看作是由或多或少对称地分布在中央庙宇周围的房屋所组成的一个环形物;而第二个亚群的成员(让我们称之为“革命的对抗主义者”)却把他/她的村庄看作是被一条无形的界线分开的两堆截然不同的房屋……〔1〕

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观点是,这个例子绝不会诱使我们进入文化相对论,按照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对于社会空间的感知取决于观察者的身份。分裂成两种“相对的”理解暗示着一种隐藏的提及,对一个不变的——不是客观的,“实际的”建筑的部署,而是创伤的核心的提及,一种根本的对抗,即村庄里的居民无法用符号来表现和解释社会关系中的不平衡,或使其“内在化”,或与其妥协,而这种不平衡使得社区无法将自身稳定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

对于平面图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只不过是互相排斥的努力而已,是为了要处理创伤的对抗状态,是为了通过对这种平衡的象征性结构的强迫接受来治愈创伤。有必要加以补充的是,两性间的区别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状况,“男性的”和“女性的”不也正像是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村庄里房屋的两种结构配置吗?要想驱除这种幻觉,即我们“进步了的”宇宙不受同样逻辑的支配,那么回想一下我们在政治领域中“左翼”和“右翼”

〔1〕 Claude Lévi-Strauss, “Do Dual Organizations Exist?”, 见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3), pp. 131-163. 见第133页和134页。

的分裂就足够了：一个左翼分子和一个右翼分子的表现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村庄里对应的两个亚群中的成员的表现是如出一辙的。他们不仅在政治领域占据着不同的位置，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也对政治领域的分割持有不同的见解——一个左翼分子认为这个领域生来就被某种根本对抗性所分割，而右翼分子则认为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只会被外来的人侵者所扰乱。

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更加至关重要的见解：尽管这两个亚群形成了同一个部落并且住在同一个村庄里，这种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被象征性地铭刻下来。但是，如果这个部落的整个象征性的表述，它的所有社会制度都不是中立的，而是被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对抗分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那么这又怎么可能呢？列维-斯特劳斯独创性的称谓“零制度”，乃是一种相对于著名的超自然神力(*mana*)而言的制度，没有确定含义的一种空洞的符号，因为它同样只是意味着含意的存在，反对含意的缺乏：一种特殊的制度，没有什么积极的，确定的作用——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同样纯粹消极地指出社会制度的存在及其现状，反对它的缺乏，也否定前社会的混乱。

正是对这样一种零制度的提及使得部落的所有成员都能同样地感受到他们自己是同一个部落的成员。那么，从最纯粹的意义而言，这种零制度不是意识形态吗？不正是提供一个中立的环绕空间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直接体现吗？在那个空间里，社会对抗被抹煞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认可自己。为反抗霸权而作的斗争不恰恰就是为反抗这种零制度怎么会被某种特殊的含义所武断的决定和歪曲所作的斗争吗？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伴随着原本建立在直系家庭或传统的象征性母体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系的分解而产生的这样一种零制度不正是现代的国家观念吗？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冲击，社会制度越来越少地建立在使人归化的传统之上，而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契约”被体验。^[1] 在这里，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是这个事实，即民族身份被认为至少在最低限度上

[1] 参见 Rastko Mocnik, “Das ‘Subjekt, dem unterstellt wird zu glauben’ und die National seine Null-Institution”, 见 H. Boke, ed.,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Hamburg: Argument Verlag, 1994)。

是“自然的”,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土壤”之上的附属品和从属于社会制度本身的“人造”身份(国家,职业……)是对立的。前现代的社会制度作为一个“使人归化”的象征性实体而运行(是建立在毫无疑问的传统上的制度),而当前的制度则被认为是社会的人工产物,是可以作为他们中立的共有基础的一种“使人归化”的零制度而引发的需要。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两性区别上来,我尝试着冒险建立这样一种假设,即也许和零制度相同的逻辑不仅应该适用于一个社会的整合上,而且还可以适用于社会的对抗分歧上:如果两性区别最终是一种人类社会分裂中的零制度,是使人归化的最低程度的零区别,是比任何一个明确的社会区别的信号都更重要的分裂,同样指明了这种区别该怎么办呢?于是,反抗霸权的斗争又一次成为反抗这种零区别怎么会被其他特别的社会区别所决定的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人应该阅读拉康的能指图式中的一个重要的,尽管通常被忽略的特征:拉康将标准的索绪尔(Saussurean)图式(在横线上方写着一个词“arbra”,横线下面画着一棵树)替换成:在横线上方是两个挨在一起的词,“男人”和“女人”,而在横线下方,画着两扇代表各自身份的门。

为了强调能指的这种区别性的特征,拉康首先用男人和女人的对立,用两性的区别把索绪尔的单一图式替换成了能指的一对图式,但存在于这个事实中的真正惊奇之处却是,在假象的所指层面上,两者并没有区别(我们没有获得关于两性区别的某种图解式的索引,比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简化图像,就像现如今我们在盥洗室里经常看到的那样,而是被复制了两次同一扇门)。那么,我们有可能用更加清晰的术语来表述说,两性区别并不标明建立在“真实的”特性上的任何生理上的对立,而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对立,此对立与指定的客观物体之间毫无相应之处——只是一些不确定的X的真实,这种真实永远不能被能指的图像所捕获。

让我们再回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村庄的那两幅描画的例子:在此例子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真实是在多么精确的意义上通过失真后的形象而介入的。首先,我们得到了“实际的”和“客观的”有关房屋的排列,然后又得到了它的两个不同的符号表示,这两个符号表示都以一种失真的方式扭曲了实际的房屋排列。然而,这里的“真实”并不是实际的排列,而

是社会对抗的创伤核心,这种创伤核心扭曲了部落成员对于实质对抗的看法。因而,真实就是被否认了的 X,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于真实的看法就被失真地扭曲了(顺便提一下,这种三层面的策略和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的三分法的策略是严格一致的:梦的真实核心并不是可以被置换成或翻译成梦的明确结构的那种梦的潜意识,而是无意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将潜意识转变成明确结构的扭曲过程中将自己记录下来)。

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如今的艺术场景。在艺术场景里,真实不会主要是利用对令人震惊的残忍的对排泄物、毁坏的尸体、粪便等的表现为幌子来回归。这些物体固然是在它们不该在的地方出现——但是,正是为了让它们在不该在的地方出现,这些(空无一物的)场所必须是早就已经在这里了,马列维奇开创的“极简艺术”里就提供了这种场所。在以下两个截然相反的高度现代主义的偶像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关联:一幅是卡兹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tch)的名画《白上之黑》(Black Square on White Surface),另一个是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把现成的物体作为艺术品展示的做法。

马列维奇把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体提升为艺术作品的潜在概念是,成为艺术品并不是物体的一种固有属性:是艺术家自己通过先占了这一个(或任何一个)物体并且将它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才使得它变成了艺术品。成为一个艺术品的关键并不在于“为什么”,而是“在哪里”才可以成为艺术品。那么,马列维奇的极简主义所做的事情也只不过就是实施——隔离——这个场所,这个空无一物的场所(或架构),通过把在艺术范围内发现的任何物体都转变成艺术品这种最不可思议的特性来隔离。

简而言之,没有马列维奇就没有杜尚。只有当艺术实践同样也隔离了架构或者是场所,倾空了它的所有内容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纵情地参与到现成的程序中去。在马列维奇之前,一个小便池仅仅是一个小便池而已,即便是它被放置在最著名的美术陈列室里也是一样。

因此,排泄用具在不适当场所的这种出现和一个空无一物的场所的出现,以及空洞的架构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当代艺术中的真实具有三种尺度,这在真实的范围之内重复了想象—象征—真实这种三元组。真实在这里首先是作为那个失真了的瑕疵,对真实的直接想象的一种变

形的扭曲——是作为一个扭曲了的想象,作为一个把客观现实“主观化了”的纯粹假象而存在的。然后,真实在这里又是作为一种空无一物的场所,作为一个结构,一个从未存在、从未被体验的构造,它只能在追溯中被建构,因此也同样不得不预先假定——真实是作为象征结构而存在的。

最后,真实是不在合适位置出现的污秽的排泄用具,是真实“本身”。这种最后的真实,如果被隔离了,就只是一种迷信,它奇幻的/诱人的存在掩盖了结构真实,以同样的方式,在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意识中,真实就是把犹太人看成排泄用具,并以此来掩盖无法忍受的社会对抗的“结构”真实。

真实的这三个尺度是由调整和“普通”现实之间的距离的三种方式产生的:一种方式是将现实屈从于失真了的变形;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引进一个其中没有场所的客体;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减去或消除现实的所有内容(客体),所以,剩下的就只是曾经充满了客体的那个空洞的场所。

弗洛伊德式的笔触

《黑客帝国》中指出尼欧就是“救世主”,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们最能直接分辨出它的虚假。谁是独一无二的人呢?在社会关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位置。首先,存在着一个主流能指中的独一无二的人,也就是象征的权威。即使是在社会生活中,以它最恐怖的形式,集中营幸存者们的回忆中总是提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永远不会被压垮的个体,在其他所有人都被迫为了一线生机而进行着自私自利的斗争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他却不可思议地维持并传播着一种“非理性的”慷慨和尊严。在拉康主义的术语中,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那里有一个人”(Y'a de l'Un)的功能:即便是在这里,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支撑了最低限度的团结,反对将社会关系本身仅仅看做是在纯粹的生存策略的框架之内的合作。

在这里,有两个特征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个个体总是被看成是一个人(从来没有一堆这样的人,好像是出于某种模糊的需要,那种难以言说的神奇团结的超越只能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其次,这个独一无二的

人为别人做了些什么并不重要,他存在于他们当中才是重要的(使得其他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是一种意识,即他们意识到即使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沦为生存机器,但还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维护了人类的尊严)。以一种与喝醉了的笑声相似的方式,在此我们也具有了像喝醉了的尊严的东西,在集中营里,他者(独一无二的人)在我的位置上为我保留了我的尊严,或者,更精确地说,我是通过他者保留了我的尊严。我也许会沦落到为了生存而悲惨挣扎的境地,但是意识到那里还有个人,他维护着他的尊严,这使得我和人类还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

通常情况下,当这个独一无二的人被击垮了,或者被揭露出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时候,其余的囚禁者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就会变成行尸走肉——荒谬的是,他们为了一线生机而挣扎的准备是通过他们中的一个例外,通过有一个人并没有沦为和他们一样的状态来维持的,所以,当这个例外消失的时候,挣扎求存的斗争本身就失去了力量。

这意味着那个独一无二的人不是因为他的“真实”性质而被视为是唯一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也许曾经有过更多像他那样的个体,或者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真的不可制服,而只不过是一个虚构,他只是在扮演那个角色罢了)。他那种例外的角色不过是一种转让:他占据了一个由其他人所构建(或预先假定)的位置。

在《黑客帝国》中,正相反,独一无二的人是可以看清我们每天的真实其实并不是真实而只不过是被编为密码的虚拟世界的那个人,因此这个人就能够从虚拟世界中脱离出来,就能够操纵和超越虚拟世界里的规则(比如在空中飞,能阻止子弹等等)。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的至关重要的功能是,他能将现实虚拟化。现实是一个人造结构,它的规则可以被中断,或者至少可以被重写——在那里就存在了一个完全类似妄想狂的概念,即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可以延缓真实的反抗(“我可以穿过一堵厚墙,如果我真的决定这么做……”——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能这么做被归结为是主体愿望的失败)。

在这一点上,《黑客帝国》再次表现得不够深入。在决定尼欧是不是救世主的女祭司的等候室里发生的那一幕是令人难忘的,一个只靠思想就可以将汤匙弄弯的小孩子告诉对此感到惊奇的尼欧,要想做到

让汤匙弯曲,办法并不是相信自己能弄弯它,而是要说服自己汤匙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我自己又如何呢?难道电影不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达到接受佛教命题的一种境界,即我,我自身,也就是主体也根本不存在吗?

为了能进一步详细说明《黑客帝国》里哪些东西是虚假的,我们应当区分简单的技术上的不可能性和幻想的虚假:时间穿梭是(大致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此的幻想场景却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场景解开了欲望的僵局。因此,《黑客帝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诀窍在科学上的天真。通过电话完成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穿越这种想法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缺口或一个突破口,使我们可以从中逃走。

也许,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是盥洗室。这个我们冲完马桶后所有排泄物都会消失的地方,不正是对物体消失在其中的原始的、前存在论的、混沌的、令人恐怖的、极端超越的一种有力的隐喻吗?虽然我们理性地知道那些排泄物后来成了什么,然而虚构的神话还是坚持认为——排泄物依然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它并不适合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拉康这么声称是正确的:当一个动物对如何处理它的排泄物产生了疑问的时候,当排泄物变成烦扰它的多余物的时候,我们也就从动物变成了人类。因此,真实根本不是从马桶的水槽里再度出现的令人极度恶心的物质,而是那个洞孔本身,是那个作为通向另一个本体序列的通道的缝隙——拓扑结构的洞口或“弯曲”了我们现实空间的转口,所以我们才会感觉/想象排泄物消失进入了另一个维度,而那个维度并不是我们日常现实的一部分。

《黑客帝国》的问题是一个更加根本的关于幻觉的矛盾,当莫斐斯(反抗组织的非裔美籍首领,相信尼欧就是救世主的那个人)试图向那个仍然是一头雾水的尼欧解释什么是母体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了。他十分想当然地将母体和宇宙结构中的一个故障联系在一起:

莫斐斯:这就是你一生中都有这种感觉。感觉这个世界很不对劲。你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但它确实存在,就像心头有根刺,会把你逼疯……母体无处不在,它就在我们周围,甚至在这里,在这个房

间里……它就是虚拟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真相。

尼奥：什么真相？

莫斐斯：真相就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你生来就要受奴役……生活在一个没有知觉、感觉和触觉的牢狱里。一个心灵的牢狱。

在这里，影片遭遇了它最终的矛盾：对缺乏/矛盾/障碍的体验被假设成是对以下事实的证明，即我们当作真实所经历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然而，在影片接近结束的时候，母体里的电脑人史密斯却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像是弗洛伊德式的解释：

你知道第一个母体是要被设计成一个完美的人类世界吗？在那里，没有人遭受痛苦，每个人都十分快乐吗？但不幸的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程序。整个成果（将人类变成电池）失败了。一些人认为我们缺乏程序性的语言来描述你们的完美世界。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完美的世界是一个梦想，你们那低等的大脑一直试图从中惊醒的一个梦想。这就是为什么母体被重新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文明的巅峰。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性因此同时也就成了它的虚拟和它的现实的象征。一个人可以很有力地声称，电脑人史密斯（我们不要忘记：他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是人类，而是母体——那个大他者——本身的直接虚拟的化身）在电影中的世界里是分析家身份的替身：他的经验教训是，对于无法超越的障碍的体验对我们人类而言是一种积极的条件，让我们把某些东西看成是现实——现实最终就成了对障碍的抵抗。

好莱坞的马勒伯朗士

另一个矛盾是关于死亡的：为什么当一个人只是在母体操纵的虚拟

现实中死去的时候，他就会“真的”死亡？《黑客帝国》这部影片提供了这样一个愚民主义的答案：“尼奥：如果你在母体内被杀死，那么在这里也会死掉吗（也就是说，不但是在虚拟现实中，而且在真实生活中也会死掉）？莫斐斯：精神死掉了，肉体也活不了。”这种回答办法的逻辑是，你的“真实”的肉体只能在和精神的连接中才能发挥作用，这种精神也就是指你沉浸在其中的思维世界。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并在那里被杀害，那么这种死亡也会影响到你的真实躯体……显而易见的相反的解答（你只有在现实中被杀死才是真正地死去）也是太浅薄的。

问题的蹊跷是：主体是不是完全陷入了母体控制的虚拟现实，或者他是否知道或至少是怀疑事情的真实情形？如果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主体完全陷入了母体控制的虚拟现实中），那么，单纯退回到人类堕落前的亚当的距离状态就会使我们在虚拟现实中变得不朽，因此，已经从对虚拟现实的完全沉浸中解放出来的尼奥，应该可以从发生在母体操纵的虚拟现实内部的与电脑人史密斯的对抗中存活下来（同样的，他也可以制止子弹的飞射，他也应该能够让那个伤害了他身体的枪伤变得不真实）。这让我们回到了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相比贝克莱（Berkeley）头脑中支撑着世界的那个上帝而言，终极母体更是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者的上帝。

毫无疑问，马勒伯朗士是提供了最好的概念上的机构来解释虚拟现实的哲学家。马勒伯朗士，笛卡尔的一个门徒，抛弃了笛卡尔为了解释在具体物质和精神物质之间，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协调而提出的那种荒谬的脑部松果体的想法。那么，如果这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一个灵魂并不能有原因地作用于一个肉体或者反之亦然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解释这两者间的协调一致呢？因为这两个有因果关系的网络（我头脑中的观念网络和肉体上互连的网络）是完全独立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有一个第三者，即真正的实体（上帝）在这两者间不断地协调，维持着表面上的连贯性。当我头脑里想着要举起我的手的时候，我的手就真的举起来了，我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地引起了我举手的动作，而只是“偶然的”引起的。一意识到我的思维指向了举起我的手这个念头上，上帝就开始了另一个物质的，有因果关系的链条式反应，从而导致了我的手被有效地举起来了。如

果我们把“上帝”置换成大他者，那个象征序列，我们就可以看到偶因论和拉康的立场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拉康在《电视》(Television)^{〔1〕}中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辩论法所指出的那样，肉体 and 灵魂的联系从来都不是直接的，因为大他者总是将自己内置在两者之间。

因此，偶因论实质上也就是“能指的专制性”的代名词，是把观念的网络和身体上的(真实的)的因果关系网络分离开的裂缝的代名词，也是以下这个事实的代名词，即是大他者解决了两个网络间的协调一致，所以，当我身体上的部位——嘴咬了一口苹果的时候，我的灵魂才会体验到快感。同样的裂缝也被古老的阿芝台克僧侣作为目标，他组织了人类的献祭活动以保证太阳的再次升起：在这里，人类的献祭活动就是一种对上帝的请求，即请求上帝来维护以下两者间的协调，一是必须有作牺牲的肉体，一是相互联系的象征事件。虽然阿芝台克僧侣的献祭活动也许看来是“非理性的”，但它潜在的前提却比我们关于肉体 and 灵魂之间的共同的直觉高明得多，按照这种直觉，肉体 and 灵魂之间的协调是直接的——对我而言，既然感觉是由苹果直接引起的，那么当我咬一口苹果的时候具有一种快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失去的是大他者在保证现实和我们对于现实的精神体验两者间的协调上的那种中间角色。

那么，我们陷入虚拟现实中不也是同样如此吗？在虚拟空间里，当我为了推动一个物体而举起手，而这个物体确实移动了的时候——我的错觉当然是，是我手的移动直接引起了物体的位移；在我的沉浸(于虚拟现实)中，我忽略了这种计算机化了的协调的复杂的机械装置，同样也忽略了偶因论中上帝在保证两者协调上所扮演的角色。^{〔2〕}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大多数电梯中的“关门”按钮是一个完全多余的安慰品，这个按钮被安置在那里纯粹是为了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电梯的运行，并对其运行速度做出了贡献——当我们推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电梯门就完全是同时地关上了，而那时我们刚按了去几层的按钮，还没有来得及按下“关门”按钮去“加快”

〔1〕 参见 Jacques Lacan, "Television," *October* 40 (1987)。

〔2〕 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的主要著作是 *Recherches de la Vérité* (1674-75; the most available edition is Paris: Vrin, 1975)。

这一进程。这个关于虚假参与的极端而又清晰的例子也是我们每个人参与“后现代”政治进程的一个恰当的隐喻。这就是偶因论最纯粹的意义:根据马勒伯朗士的观点,我们一直在按着这样的一些按钮,是上帝持续的行为让它们和随之而来的事件(电梯门关上了)间保持了协调一致,而我们却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按动了按钮……

由于那个原因,展现赛博空间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根本模糊性是至关重要的:这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它的社会命名方式。沉浸到赛博空间可以强化我们的肉体体验(新的感觉,由更多器官组成的新的身体,新的性经验……),但是它也为一个人开启了一种可能性,那个人操纵着使赛博空间得以运行的机器,照字面意思是偷走了我们自己的(虚拟的)身体,剥夺了我们对它的控制能力,所以一个人就不再把他的身体和“他自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在此面临的是附属物这个概念所构成的含糊性。^[1]最初,这个概念的指定含义是,一个主体被剥夺了直接迅速的做出决定的权利;政治吞并的大师是拿破仑,他征服了象征权力的君主,而那些君主不再占据能行使其权力的位置。在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一个人可以说,君主的这种“附属”就是君主立宪制的含义:在君主立宪制中,君主的权力被削弱到只能做一些纯粹形式上的象征性表示,比如签署文件,授予法令以行动效力等等,而这些法令的内容是由选举出来的统治主体所决定的。如今,虽已做必要的修正,但我们日常生活的不断电脑化不也是同样的情形吗?在此不断电脑化的过程中,主体也越来越“成了附属物”,在电脑化增加的错误伪装下,不知不觉地被剥夺了权力。当我们的身体成了附属物(被电子媒介的网络所捕获)的时候,它同时也暴露在一种彻底的“无产阶级化”的威胁之下:主体被潜在地缩减到只是纯粹的货币符号,因为即使是我自己的个人体验也能被机械的他者所偷走、操纵和控制。一个人可以再次看到,彻底虚拟化的前景是如何给予了电脑一种与上帝在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中的地位完全一致的地位。因为电脑协调了我的头脑和(我体验到的)我的四肢(在虚拟现实中的)运动间的关系,一个人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到,如果一台电脑失去了控制,行为就

[1] 关于这种模糊性,参见 Paul Virilio, *The Art of the Mo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像一个邪恶的上帝那样，扰乱了我的头脑和我的身体上的自我体验间的协调——当我头脑中要举起手的信号被延迟了或者甚至在（虚拟的）现实中被消除了，那么作为“我自己的”身体的最基本的体验就被侵蚀了。如此看来，赛博空间也因此有力地实现了德国法官舒勒伯（Schreber）所详细阐述的那种类似妄想狂的幻想，弗洛伊德分析了他的论文集。^{〔1〕}“电气化的宇宙”是有些精神错乱的，因为它似乎物化了舒勒伯关于神圣的光线的幻觉，他说通过这神圣的光线，上帝直接控制了人类的思想。

换言之，电脑中大他者的具体化不也说明了电气化宇宙的内在妄想尺度吗？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在赛博空间中，将意识下载到电脑中的这种能力最终让人们从他们的身体中解放出来——也将机器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这是老生常谈了。

上演基本幻想

最终的矛盾涉及在影片《黑客帝国》的最后一幕里尼奥宣布的人类解放的暧昧状态。作为尼奥介入的结果，母体中出现了“系统失灵”，同时，尼奥作为救世主向那些仍然陷身于母体中的人们致辞，他教他们怎么从母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他们将能够打破自然规律，可以弄弯金属，可以在空中飞行……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奇迹”只有在我们仍处在由母体控制的虚拟现实中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而且也仅仅是能够扭曲或改变它的规则：我们的“真实”状态仍然是母体中的奴隶，我们实际上也只不过仅仅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精神牢笼的规则罢了——因此，从母体中一起脱身，进入“真实现实”怎么样？在“真实现实”里，我们是生活在被摧毁的地球表面上的悲惨生物。

从阿多诺（Adornian）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应该声称，这些矛盾^{〔2〕}是电影的真实一刻：它们标识出了我们新近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对抗状

〔1〕 赛博空间和舒勒伯所说的精神病患者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是由普林斯顿的温迪·楚（Wendy Chun）告诉我的。

〔2〕 一个更进一步相关的矛盾也是涉及由母体操纵的世界中主体间的状态：所有的个体都共享着同一个虚拟现实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给每个人他自己所喜欢的那个虚拟现实呢？

态,标识了涉及基本的本体论的几对概念的对抗,比如现实与疼痛(现实扰乱了快乐原则的统治),自由与体制(自由只有在阻碍了它全面发展的体制中才是可能的)。然而,电影最后的力量却被放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许多年前,一系列由科幻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如《扎多斯》(*Zardoz*)、《洛根的逃亡》(*Logan's Run*)都预言了今天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困境:孤立的群体在与世隔绝的地区过着无菌的生活,渴望着对物质会腐烂的真实世界的体验。在后现代主义之前,乌托邦理想是脱离历史时间的真实,进入一个永恒的另类状态的一种尝试。在数字化的记忆里,随着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的尽头”和过去的充分有效性的交叠,在这个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不受时间影响的乌托邦里看作是日常的意识形态的体验,乌托邦便成为了对历史本身的真实性的渴望,成了对记忆、对真实的过去的痕迹的渴望,成了摆脱封闭的厄运,进入最初的真实里的气味和腐烂的尝试。《黑客帝国》最终扭转了这种颠倒,将理想化和非理想化的境地结合起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即母体为我们创造的不受时间影响的理想的完美境地,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因此,实际上我们被迫处于一种为母体提供能量的电池的被动状态。

因此,这部电影对我们的独特冲击并不存在于它的中心理论(即我们所体验的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只是由“母体”,那个直接连接到我们每个人头脑中的超级计算机而生成的虚拟现实),而是在于它的重要想象,即数百万人类正生活在充满水的摇篮里,过着一种会导致幽闭恐怖症的生活,努力保持一切正常以便给母体提供能量。所以当(一些)人从他们在母体控制的虚拟现实的沉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这种醒悟并不是领悟到要开放地进入外部现实的巨大空间,而是首先认识到这种封闭的可怕,在这种封闭中,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像胎儿一样的器官,沉浸在出生前的羊水中……这种绝对的被动性是一种预先处理的幻想,它维持了我们作为积极的、自我定位的主体的意识体验——它是最终的不正当的幻想,即我们是他者(母体的)享用的最终手段,母体从我们作为电池的生命存在中吸取能量。

这个命题中存在着真正的求生之谜:为什么母体需要人类的能量?纯粹的肯定的解决办法当然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母体完全可以很容易地

找到另外一种更可依靠的能量来源,这种能源并不需要对协调数百万人类的虚拟现实有极端复杂的安排。这里另一个问题也是可辨别的。为什么母体不将每个个体陷入他自己或她自己的惟我的虚拟世界中呢?为什么要通过协调程序而使得事情复杂化,以便整个人类都居住在同一个虚拟世界中呢?唯一一个一致的回答是,母体以人类的享受为能源而生存——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拉康主义的基本论题上来了,即和被当作一个无名者的机器不同的是,那个大他者本身需要持续的享用能源的不断流入。这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转向电影提供给我们的事物的状态。电影所描写的作为我们惊醒后领悟到我们的真实状态的那个场景,实际上正是它严格的对立面,正是支撑着我们人类的那个基本幻想。

性颠倒和赛博空间之间的亲密联系在今天而言恐怕是老生常谈了。根据标准的观点来看,性倒错的场景展示了“对阉割的否定”。性倒错可以被看成是对“性和死亡”主题的一种抵抗,也是对死亡率威胁以及可能发生的对两性区别的被迫接受的一种抵抗。反常行为所设定的是像卡通一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可以逃过任何灾难;成人的性行为变成了一个带有孩子气的游戏;一个人也不会被迫接受死亡或被迫在两性之间选择自己的性别。如此说来,性倒错的世界就是纯粹的象征序列的世界,是未受人类限制的现实所阻碍而正常发展的能指游戏的世界。

在上述提法中,看起来我们对赛博空间的体验完美地符合了性倒错的世界:赛博空间不也是一个不受真实的惯性所阻碍,而只是受自我强加的规则所约束的世界吗?在《黑客帝国》中的虚拟现实不也是同样如此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现实”失去了它无情的特性,变成了一个专断的规则(由母体强加的)的领地,一个人的意志只要足够强大就可以违反这些规则……然而,按照拉康的观点,这个标准的概念没有考虑到的是他者和享受之间的独特关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总结“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的一个片段《进步的代价》(Le prix du progrès)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引用了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朗(Pierre Flourens)的观点来反对用氯仿进行的医学上的麻醉。弗卢朗声称,可以证明麻醉只对我们的记忆神经中枢有效。简言之,当我们在手术台上活着被“割割”的时候,我

们完全能够感受到那种极度可怕的疼痛,但随后,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种疼痛……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这当然是对建立在自然本身的压抑之上的理性命运的一个完美隐喻:他的身体,主体的一部分,完全感受到了疼痛,只是由于压抑,主体才会不记得先前的疼痛。此中寓含了自然对于我们控制它的完美报复: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受害者,割剖着活着的自己……将此错误地当作是相互的被动性,当作是我们为主动介入世界而付出代价的他者场面的完美的幻想情节也是不可能的吗?如果没有这种幻想般的支撑,没有一个人完全被他者操纵的这种他者场面,那么就不会有一个积极的自由的代理人。^[1] 一个性虐待狂和受虐狂自愿地将此种痛苦假设为存在的必需途径。

也许,正是遵循着这些线索,一个人才能够解释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对于希特勒和他的侄女吉莉·罗贝尔(Geli Raubel)之间的关系的困扰,1931年,吉莉·罗贝尔被发现死在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里。好像所谓的希特勒的性颠倒会提供“隐藏的可变性”,隐秘的缺失的联系和幻想的支持来解释他的公开人格。这里是奥托·施特拉瑟(Otto Strasser)所告发的情节:

希特勒脱去了她的衣服[与此同时]他喜欢仰面躺在地板上。于是,她不得不坐在他脸部上方,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仔细地观察她,这让他感到异常兴奋。当这种兴奋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便命令她在她身上小便,这给了他快感。(Ron Rosenbaum, *Explaining Hitler* [New York: Harper, 1999], p. 134)

在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情节中希特勒扮演的是极端受虐的角色,作为幻想的支撑将他推进了狂热的毁灭性的公众政治活动中——毫

[1] 黑格尔所作的就是“穿越”这种幻想,通过证明它填补了关于自由的前本体论的深渊这种功能——重建了一个积极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主体被插入到一个积极的本体秩序中。换句话说,对黑格尔而言,康德的观点是毫无意义并且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背地里又提出了本体论上的完整建构的神圣整体性,一个只被当作物质感知的世界,而不是也被当作主体感知的世界。

无疑，吉莉对这些仪式是感到绝望和恶心的。

以下就是存在着《黑客帝国》里的正确洞见，即它将颠倒的两方面并列：一方面，将现实屈从于一个由可以中止的专断规则所控制的虚拟王国；另一方面，这种自由被隐瞒的真相，将主体屈从于一种绝对工具化了的被动状态。^{〔1〕}

〔1〕 这一章的一个更早的版本转交给了国际讨论会“《黑客帝国》内部”的艺术和媒介中心，Karlsruhe, Germany。

作者介绍

丹尼尔·巴威克(Daniel Barwick),阿尔弗雷德州立大学的哲学副教授。著有 *Intertional Implications*, 发表论文多篇。巴威克的演讲广泛涉及道德规范,形而上学,以及对普通教育的评估方面。他的学生对他的教学工作描述如下:“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就在那里,就像心头有根刺,会把你逼疯一样。”

格雷戈里·巴沙姆(Gregory Bassham),宾夕法尼亚州国王学院的哲学副教授。著有 *Original Intent and the Constitution*, 与人合著 *Critical Thinking: A Student's Introduction*。格雷戈里广泛发表了一些隐晦的定期刊物,内容涉及这样一些主题,比如法律哲学和新教认识论。他对于比尔·埃文(Bill Irwin)将他介绍给罗布·左比(Rob Zombie)表示感谢。

迈克尔·布兰尼根(Michael Brannigan),哲学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拉洛希大学(La Roche College)哲学系的主任。他也是大学里伦理研究中心的执行理事。除了许多关于亚洲哲学和道德规范的文章之外,他还写了 *The Pulse of Wisdom: The Philosophies of India, China, and Japan* 和 *Striking a Balance: A Primer on Traditional Asian Values*。由于近来参加了一个关于爱斯基摩人滑行的讨论课,他发现他仍然远远没有意识到真相所在,即没有爱斯基摩人用的皮船。

马丁·A·达纳黑(Martin A. Danahay),美国阿林顿市得克萨斯州大学的英语教授,在许多领域里发表了很多文章,内容涉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当代传记,以及关于压迫和反抗的诸多理论。他不理

解人工智能机器为什么没有把所有人都变成大学教授；这些机器如果要弄清楚尼欧吃了一顆小药丸之后学到了什么东西，或许需要无数的学术文章和书籍。

杰拉尔德·J·艾黎恩(Gerald J. Erion), Medaille 大学的助理哲学教授。他发表的作品包括心灵哲学和道德哲学方面的相关文章。他对权威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自己是特殊的，规则对他是不起作用的。显而易见，他是错误的。

辛西娅·弗里兰(Cynthia Freeland), 休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她是 *The Naked and the Undead: Evil and the Appeal of Horror* (Westview, 1999) 和 *But Is It Art?* (Oxford, 2001) 的作者，而且是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Aristotle* (Penn State, 1998) 的编者，和托马斯·沃特博格合编过 *Philosophy and Film* (Routledge, 1995)。她是愿意为了真相而付出任何代价的人。

乔治·J. E. 格雷西亚(Jorge J. E. Gracia), 拥有 Samuel P. Capen 的教授职位，是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他最近的著作包括：*How Can We Know What God Means?* (2001)；*Hispanic/Latino Identity* (2000)；*Metaphysics and Its Task* (1999)；*Texts* (1996)；还有 *A Theory of Textuality* (1995)。是问题在驱使着他，是问题把他带到了这里。

查尔斯·L·格里斯沃尔德(Charles L. Griswold, JR.), 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他写过 *Self-Knowledge in Plato's Phaedrus* (Yale, 1986; Penn State Press 于 1996 年重印)、*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1999), 他做过 *Platonic Writings/Platonic Readings* (Routledge, 1998; 2001 年由 Penn State Press 重印) 的编辑。当他看到一个电脑人的时候他一眼就能够认出来。

托马斯·S·希布斯(Thomas S. Hibbs), 波士顿大学哲学副教授。他的近作是 *Virtue's Splendor: Wisdom, Prudence and the Good Lif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1)。他还发表了 *Shows About Nothing: Nihilism in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Exorcist to Seinfeld*,

在 *Notre Dame Magazine* 2000 年的秋季论题“Evil Meets its Match”上发表了一篇短文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希布斯是不顾一切要拔去插头的人。

詹森·霍尔特(Jason Holt),在马尼托巴湖大学教授哲学课程。他在很多的哲学问题上发表过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文章。他的书包括即将出版的关于盲目的洞察和意识的本质方面的专论,小说 *Fragment of a Blues*(2001)和几首诗歌。他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名科幻小说迷。

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宾夕法尼亚州国王学院助理哲学教授。他是 *Intentionalist Interpretation: A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 and Defense*(1999)的作者,与人合著 *Critical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2001),曾编写过 *Seinfeld and Philosophy*(2000)和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Author?*(2002),与人合编过 *The Simpsons and Philosophy*(2001)。比尔的另一个身份是电脑黑客,在计算机里他的化名是“KooKeeMonzzzTer”,实际上,触犯了我们法律规定的每一项计算机犯罪条款。

德博拉奈特(Deborah Knight),加拿大金斯敦奎恩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和奎恩国家学者。她近来的作品范围涉及 *The Simpsons*, *Borges*, *Eco*, and *Calvino*。在业余时间里,她正在学着用直升飞机搞恶作剧。

卡罗林·科斯迈耶(Carolyn Korsmeyer),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她的文章涉及美学、艺术哲学、男女平等的哲学,以及情感理论等方面;目前她对厌恶尤其感兴趣。她的近作是 *Making Sense of Taste: Food and Philosoph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她认为尼欧和崔妮蒂是太饥饿以至于不会为功夫会损坏他们的黑色皮衣装备而担心。

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副教授。他是 *The Existentialist Marxism of Jean-Paul Sartre* 和 *IQ, Heritability, and Racism* 的作者,编写过 *Dialectics of the U. S. Constitu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Mitchell Franklin*,吉姆写了一些关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文章。在他以前的生活中他也教授真理。

乔治·麦克奈特(George Mcknight),渥太华卡利顿大学艺术与文化研究学院电影研究副教授。他最近编写了 *Agent of Challenge and Defiance: The Films of Ken Loach*, 与 Deborah Knight 合著“Suspense and its Master,” in *Hitchcock: Centenary Essays*。Oprah, Rosie, and Martha 都喜欢发表他的新食谱中的摘录, *From Tasty Wheat to Tasty Oats: Scottish Fusion Cuisine after The Matrix*。

珍妮弗·L·麦克马洪(Jennifer L. McMahon),中心学院的助理哲学教授。她发表过一些写萨特、东方哲学和美学的文章。尽管是一个忠诚的素食主义者,珍妮弗十分确信她应当享受吃虚拟牛排的快乐。

大卫·米特斯·尼克松(David Mitsuo Nixon),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生讲师,他在那里工作是为了完成他关于感知的认识论方面的论文。在2000年的冬季,大卫设计了一门课程,题目是“关于《黑客帝国》的哲学”,在这门课程里,学生们验证了影片所提出的许多哲学问题。由于光线出现了点问题,大卫意外地选择了蓝色药丸,因此他仍然在这里。

大卫·里德(David Rieder),在阿林顿德克萨斯州大学英语系讲课,正在写他的论文,题目是 *Weightless Writing: Rhetoric and Writing in an Age of Blur*。与人合编过 *A Journal of Rhetoric, Writing, and Culture*,他也是网络刊物 *The Writing Instructor* 的一名专栏作者。大卫知道汤匙根本不存在。

乔纳森·J·桑福德(Jonathan J. Sanford),斯托本维尔圣方济各会大学的助理哲学教授。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方面的文章,正在与人(Michael Gorman)合编 *Categories Old and New*,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forthcoming)。他有社会保障编号,他依法纳税,他还帮助房东太太倒垃圾。

小西奥多·希克(Theodore Schick, JR.),穆伦贝尔格大学的哲学教授,与人(Lewis Vaughn)合著 *How to Think About Weird Things* (McGraw - Hill),和 *Doing Philosophy* (McGraw - Hill)。他最近的一本书是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From Positivism to Postmodernism* (McGraw - Hill)。泰德徒手就可以折弯汤匙。

巴里·史密斯(Barry Smith),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编写过 *The Monist*。他近来的出版作品包括:“True Grid”,“The Metaphysics of Real Estate”,“The Chinese Rune Argument”,“The Cognitive Geometry of War”,“The Last Days of the Human Race”以及“*The Worst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History*”。在2001年,史密斯教授获得了德国洪堡基金提供的两百万美元的沃尔夫冈保罗奖金,这是曾经颁给哲学家的数额最大的单人奖。早些时候在饭店的一次谈话中,巴里回答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明白吗?”

大卫·韦伯曼(David Weberman),乔治亚州立大学亚特兰大分校的助理哲学教授。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位。他的著作关注的是20世纪的欧洲哲学和历史哲学。有人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华伯和雷克街的一个电话亭,他正在寻找出口。

萨拉·E·沃思(Sarah E. Worth),Greenville, SC, Furman 大学助理哲学教授。她的基本工作是在美学哲学方面,在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和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上发表过文章。当沃卓斯基兄弟要求用她来做影片人物崔妮蒂的原型的时候,萨拉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教授,曾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近来出版的作品包括 *On Belief* (2001), *The Fright of Real Tears* (2001),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2001),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2000), *The Fragile Absolute, Or Why the Christian Legacy is Worth Fighting For* (2000)。专辑名称是 pronounced Leh - nerd Skin - nerd^[1]。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男的。

[1] 美国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2002年11月底评选出摇滚乐历史上最为经典的500张专辑中的第401张专辑的名称。——译者注

译名对照

- Aaliyah, 阿里亚
Achilles, 阿基里斯
Addis, Laird, 阿迪斯, 莱尔德
电脑人 Agents (of the Matrix); Agent Smith 史密斯
A. I., 人工智能
Albert, Adam 艾伯特, 亚当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Alice in Wonderland, 《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en, 《外星人》
Allegory of the cave, 洞穴寓言
Anderson, Thomas, 安德森, 托马斯; symbolism of name 名字的象征意义
Angel Heart, 《天使之心》
Anna Karenina, 《安娜·卡列尼娜》
Anxiety, 忧虑; existentialism on 存在主义
Apollo, 阿波罗
Aquinas, St. Thomas 阿奎那, 圣·托马斯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nold, 阿诺德, Matthew, 马修
the arrogance principle, 自大原则
artificial minds, 虚拟精神
atoms, random behavior, 原子, 任意行为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authenticity: burden of, 真实性, 负担; and inauthenticity 不真实性, in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resistance to 反抗; and sanity 心智健全;

bad faith, 不好的信仰

Beck, Ulrich, 贝克, 乌尔里奇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Berkely, 柏克狄 George 乔治

Big Bang, 宇宙大爆炸

Big Brother, 老大哥/独裁者

the big Other, 大他者; in computers, 电脑; and *jouissance*; as the normal, 作为标准; and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Blackwelder, Rob, 布兰克维尔德, 罗布

Blade Runner, 《银翼杀手》

The Blair Witch Project, 《女巫计划》

Blues Brothers, 《布鲁斯兄弟》

Boys Don't Cry, 《男孩不哭》

Brainstorm, 《尖端大风暴》

brain-vat thought experiment, 装在桶里的大脑的思想体验; as self-refuting 自相矛盾

Brazil, 《巴西》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玛佐夫兄弟》

Buddha, 佛陀; on illusion, 幻觉; on reflection, 反映

Buddha of Compassion, 慈悲佛

Buddhism, 佛教; adaptability of, 适应性; Chinese, 中国; on dependent origination, 独立来源; on illusion, 幻觉; Indian, 印度; on interconnectedness, 互相连接; Mahayana, 大乘佛教; on mind, 精神; on nonviolence, 非暴力; on poisons, 毒害; on reflection, 反思; on the self, 自我; on sentient beings, 理性之人; on suffering, 苦难; Theravada; virtues in, 美德; Zen, 禅宗

Buddhist Three Signs, 佛教三大标志

cafeteria pluralism, 自助多元论

Calvin, 卡尔文 John, 约翰

Camus, 坎姆斯, Albert, 艾伯特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late, 已故; Marx on, 马克思

黑客帝国与哲学

- Carrey, 凯利 Jim 金
Carter, 卡特, Rubin “Hurricane”, 罗宾“飓风”
Chandler, 钱德勒 Raymond, 雷蒙德
Chernyshevsky, N. G. 车尔尼雪夫斯基; *What Is to Be Done?*, 《怎么办》
Choi, 乔伊
Christianity, 基督教; on reincarnation, 重生; on time, 时间
Churchland, 丘吉兰德 Paul, 保罗
coherence view, of truth, 真相
Coleridge, 科尔里齐 Samuel Taylor, 塞缪尔·泰勒
Comedy as genre, 喜剧作为流派
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主义
computers, 计算机, as creative, 创造力
Concept Holism, 概念整体论
consciousness, 意识; as immaterial, 非物质的; intentionality of, 有意; problem of, 问题; as transcendent, 先验的
consensus genres, 大众流派
conspiracy theories, 共谋理论
Croesus King, 克罗伊斯国王
Cronenberg, 柯能堡 David, 大卫
culture industry, 文化产业 (Kulturindustrie) 文明产业
cyberspace, 赛博空间
Cypher, 塞佛; death of, 死亡; denfense of, 保卫; on happiness, 关于幸福; mistake of, 错误; and sense experience, 感官经历; symbolism of, 象征主义
- Dafoe, 达弗 Willem, 威廉
Daniel (Biblical), 丹尼尔(圣经的)
Dark City, 《黑暗城市》
Davidson, 戴维森 Donald, 唐纳德
Dean, 迪安 Jodi, 朱迪
Debord, 迪鲍德, Guy, 盖伊;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景象的社会》
Deep Blue, 深蓝
Descartes, 笛卡尔; certain knowledge, 确切的知識; on dreaming, 做梦; malicious demon, 恶毒的魔鬼; *Meditations of First Philosophy*, 哲学沉思录; methodological

skepticism, 方法怀疑论; and mind-body problem, 精神与肉体问题; radical doubt/
skepticism, 基本的怀疑论

“the desert of the real,” 真实的荒漠

determinism, 决定论; and free will, 自由意志

dialectics, 辩证法

Dick, 迪克 Phillip K. 菲利普·K; *Time Out of Joint*, 《混乱的时间》

Die Hard, 《虎胆龙威》

Disclosure, 《叛逆性骚扰》

Dostoevsky, 陀思托耶夫斯基 Fyodor, 费奥多

Demons, 《魔鬼》157; *Notes from Underground*, 《地下室手记》

Douglass, 道格拉斯 Fredrick, 弗雷德里克

Dozer, 道瑟

Dualism, 二元论

Duchamp, 杜尚 Marcel, 马塞尔

Eastern religions on time, 关于时间的东方宗教

Eddington, 埃丁顿 Sir Arthur, 亚瑟爵士

Egotism, 自大

Eightfold Path, 八圣道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取消唯物论; objections to, 异议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Enlightenment, 启蒙; critique of, 批评; and freedom, 自由; and nihilism, 虚无主义

Epicurus, 伊壁鸠鲁

Epictetus, 埃皮克提图

Evil scientist scenarios, 邪恶科学家的假设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on anxiety, 忧虑; on authenticity/inauthenticity, 真实/
不真实

eXisten Z, 《X 接触——来自异世界》; the body in, 躯体; casting of, 角色分派;
eroticism in, 性欲; as fleshy, 肉体的; penetration in, 穿透; surprise ending of, 令人惊讶
的结尾; as undermining stereotypes, 潜在的老一套; virtual reality in, 虚拟实境

experience machine, 经验机器

expert knowledge, 专家知识 conflicting, 冲突

extreme pluralism, 极端多元论

黑客帝国与哲学

fallibilism, 不可靠性

false belief, 错误的信仰, amount of, 数量

Farewell, My Lovely, 《再见吾爱》

Fatalism, 宿命论

Fate, 命运

Feminist philosophers, 主张男女平等的哲学家, on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

Fiction, 小说; emotional response to, 情感上的回应; explanation for, 解释; paradox of, 悖论; and reality, 现实, blurring of, 模糊

Fictional genre film, 虚构的流派电影

Fight Club, 《斗战俱乐部》

Film technology, 电影技术, blurring fiction and reality, 模糊了虚构和现实

The Fly, 《变蝇人》

Forms (platonian), 形式(柏拉图哲学的)

Foster, 福斯特, Gloria, 格洛莉亚

Fourier, 傅立叶, Charles, 查理斯

Four Noble Truths, 四个高尚的真理

Frankenstein, 弗兰肯斯坦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l, 弗兰克, Viktor, 维克特

freedom, 自由

free will, 自由意志

Frost, 弗罗斯特, Robert, 罗伯特

Frye, 弗莱 Northrop, 诺斯诺普;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批判剖析》

fundamental teachings pluralism, 基础教学多元论

Gable 盖博, Clark, 克拉克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

Gardner, 加德纳, Martin, 马丁

Garner, 加纳, James, 詹姆斯

Genre categories, 流派种类

Genre characters, 流派特征

Genre films, 流派电影; characteristics of, 描述; demarcation of, 划分;

philosophical themes in, 哲学主题

Genre heroes, 流派英雄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Gnosticism, 诺斯替教

Grant, 格兰特, Cary, 卡里

Habermas, 哈贝马斯, Jürgen, 尤根

happiness, 幸福; and activity, 行动; and anxiety, 忧虑; basis for, 基础; and contentment, 满足; difference between, 区别; and desire, 愿望; long-term, 长期; and reality, 现实; and self-delusion, 自欺; and tranquility, 平静

Highest Good, 至善

Hinduism, 印度化

Hitler, 希特勒, Adolf, 阿道夫

Holism, 整体论

Homer, 荷马

Horkheimer, 霍克海默

Hume, 休谟, David, 大卫

Hyperconscious individual, 过于敏感的个体

idealism, 唯心论

ideology, 意识形态

illusion, 幻觉; theories of, 理论

immortality and morality, 不朽与道德

inauthenticity, 不真实; and freedom, 自由; prevalence of, 流行

intentionality, 有意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人体异形》

James, 詹姆斯, Henry 亨利: *The Turn of the Screw*, 《螺丝在拧紧》

Jameson, 詹姆逊, Fredric, 弗雷德里克

Jencks, 简科斯, Paul, 保罗

Jesus, 耶稣

Jones, 琼斯 Peter, 彼得; *Philosophy and the Novel*, 《哲学与小说》

Judas (Biblical), 犹大(圣经)

黑客帝国与哲学

Kant, 康德 Immanuel, 伊曼努尔;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纯粹理性批判》; on the highest good, 至善; on liberation, 解放; on morality, 道德; *Universal Natural History*, 《世界自然史》

knowing the future, 知道未来 paradox of, 悖论

knowledge, 知识; standards for, 标准; types of, 类型

Lacan, 拉康; on madness, 疯狂; as psychotic, 精神病的; on science, 科学

Laplace, Pierre Simon de, 拉普拉斯

Law, 洛, Jude, 裘德

Lawnmower Man, 《割草者》

Lévi - Strauss, 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结构人类学》

liberation, 解放, theories of, 理论; Christian, 基督徒; Kantian, 康德哲学; Platonic, 柏拉图哲学的

Logan's Run, 《洛根的逃亡》

Lucifer, 撒旦

MacLean, 麦克莱恩, Adrienne, 埃德里安

madness, 疯狂

Malebranche, 马勒伯朗士, Nicolas, 尼古拉斯

Malevitch, 马列维奇, Kazimir, 卡兹米尔

Mandela, 曼德拉, Nelson, 尼尔森

Martin, 马丁, Steve, 史蒂夫

Marx, 马克思 Karl H., 卡尔; on alienation, 疏远; Capital, 资本; on commodities, 商品; on exploitation, 剥削;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宣言》; on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materialis 唯物主义; eliminative, 根除的; reductive, 还原的; critique of, 批评

matrix, 母体; definition of, 定义

as control, 控制; as fallen world, 堕落的世界; knowledge of, 知识; learning to manipulate, 学会操纵; liberation from, 解放; as the real, 真实; as reality, 现实; as a system, 系统; using human energy, 使用人类能量; question of, 问题; as utopian scheme, 乌托邦体制; as virt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The Matrix《黑客帝国》; and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洞穴的寓言; and artificial

mind, 虚拟精神; and authenticity/inauthenticity, 真实/不真实; the body in, 身体; and Buddhism, 佛教; categories of the world of, 世界的分类; Christian themes in, 基督教主题; and college biology, 大学生物学; color in, 颜色; death in, 死亡; and dreaming, 做梦; dualism of, 二元论; and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排除唯物主义; and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as escapist, 逃避现实者; falsity of, 虚假; fate in, 命运; fear in, 恐惧; film ending of, 电影结尾; food in, 食物; and freedom, 自由; and happiness, 幸福; and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metaphysics of, 形而上学; mirror/reflection imagery in, 镜子/反射镜像; and morality, 道德; and nihilism, 虚无主义; non-Christian themes in, 非基督教主题; the One, 救世主; function of, 作用; pastiche in, 模仿画; penetration in, 穿透; and perversion, 颠倒; philosophical question/themes in, 哲学问题/主题; and postmodern experience, 后现代体验; and prediction, 预言; religious pluralism of, 宗教多元论; as Romance genre, 冒险故事流派; as Rorschach test, 罗夏墨迹测验; as science fiction, 科幻小说; seeing/sight in, 见识/洞见; and sense perception, 感觉; as sexist, 男性至上主义者; simulation in, 模拟; and skepticism, 怀疑论; smell in, 嗅觉; sound in, 声音; spoon in, 汤匙; taste in, 味觉; theories of liberation in, 解放的理论; time in, 时间; touch in, 触觉; two classes of humans in, 人类的两个层次; and utopia/dystopia, 理想/非理想的社会; violence in, 暴力; virtual reality in, 虚拟现实; visual style, 视觉风格

the Matrix Possibility, 母体存在的可能性; and conceptual coherence, 概念性一致; and false belief, 错误的信仰

Meaning Holism, 意义整体论

mediatization, 附属

Memento, 《纪念品》

mental states, 精神状态; as brain states, 大脑状态; critique of, 批评; ownership of, 所有权; as physical states, 物质状态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Middlemarch, 《米德镇的春天》

Mill, 密尔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

mind, 精神, as category, 种类

mind-body problem, 精神与肉体问题

mirror, 镜子 as metaphor, 隐喻

Miyamoto Musashi, 宫本武藏

monism, 一元论

黑客帝国与哲学

morality, 道德; choice of, 选择; and egotism, 自大; and freedom, 自由; and God, 上帝; and immortality, 不朽; Kantian postulates of, 康德哲学的基本条件

Morpheus (Greek mythology), 莫斐斯(希腊神话)

Morpheus (*Matrix*), 莫斐斯(母体); on fate, 命运; on freedom, 自由; on the Matrix, 母体; on the Oracle, 祭司; on reality, 现实; as reductive materialism, 还原唯物主义; as rescuer, 拯救者; on sense experience, 感官体验

Moss, 摩丝 Carrie-Anne, 凯莉-安妮

Mouse, 茂斯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narrative, 叙述; role of, 角色

Nebuchadnezzar (Biblical), 尼布加尼撒(圣经)

Nebuchadnezzar (Matrix), 尼布加尼撒(母体)

Neo, 尼奥; and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洞穴的寓言; and authenticity, 真实性; body of, 身体; Christian symbolism of, 基督教的象征主义; death of, 死亡; dialectical evolution of, 辩证演变; and experience, 体验 as basis for belief, 信仰的基础; on fate, 命运; and the Forms, 形式; fulfilling of prophecy, 预言的实现; as hacker, 黑客; and importance of mind, 精神的重要性; and knowledge of the Matrix, 母体的知识; and mirror imagery, 镜像; mission of, 使命; and Morpheus, 莫斐斯; first meeting, 初次见面;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s of, 叙述转变; and non-Christian themes, 非基督教主题; as the One, 救世主; and the Oracle, 祭司; overcoming fear, 克服恐惧; penetration of, 穿透; and the red pill, 红色药丸; as reincarnation, 重生; rescue of, 营救; resurrection of, 复苏; and the spoon, 汤匙; as super-hero, 超级英雄; and truth, 真相

Neo-pluralis 尼欧多元论

nihilism, 虚无主义

Nozick, 诺齐克, Robert, 罗伯特;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occasionalism, 偶因论

O'Connor, 奥康纳, Timothy, 蒂莫西

Oedipus, 俄狄浦斯

O'Hehir, 奥海尔; Andrew, 安德鲁

omnipotence, 全能

omniscience, 全知; and free will, 自由意志; conflict between, 冲突; and knowing the future, 知道未来; and omnipotence, 全能; conflict between, 冲突; and possibility, 可能性

the One, 救世主; social function of, 社会功能

the Oracle (at Delphi), 祭司(特尔斐)

the Oracle (*Matrix*), 祭司(母体); and knowing the future, 知道未来; and omniscience, 全知; and postulates of morality, 道德的基本条件; prophecy of, 预言; and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自我实现的预言; as stereotype, 陈词滥调

Othello, 奥赛罗

paranoia, 妄想狂

Percy, 柏西, Walker, 沃克

perversion, 颠倒

philosophy, 哲学; as road less traveled, 人迹罕至

Plato, 柏拉图; allegory of the cave, 洞穴的寓言; on Forms, 形式; and importance of intellect, 智力的重要性; *Republic*, 《理想国》

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and human experience, 人类体验; and technology, 科技

Presley, 普雷斯利, Elvis, 埃尔维斯

Putnam, 普特南, Hilary 希拉里;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理性, 真理与历史》

Pythia 皮提亚

Quine, W. V., 奎因 · W. V. 2

Radical split in culture, 文化的根本分裂

Rahula, 罗侯罗

the Real, 真实; in art, 艺术

the real/reality, 真实/现实; categories of, 种类; simulation of, 模拟; and spatiality, 空间性

reality/unreality, 真实/非真实差别; distinction; problem of, 问题

Real World, 真实的世界

Reeves, 李维斯; Keanu, 基努

reincarnation, 重生; Christianity on, 基督教

黑客帝国与哲学

religious exclusivism, 宗教排外主义; hard, 艰苦的; objections to, 异议; soft, 温柔的

religious pluralism, 宗教多元论; problems of, 问题; types of, 类型

Romance, 冒险故事; as genre, 流派

Roquentin (character in *Nausea*), 罗昆庭(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

Saint, 圣 Eva Marie, 伊娃·玛丽

Sartre, 萨特; Jean-Paul, 让·保罗; *Being and Nothingness*, 《存在与虚无》; on consciousness, 意识; *Nausea*, 《恶心》

Scanners, 《夺命凶灵》

science and common sense, 科学和常识; gap between, 隔阂

science-fiction as film genre, 作为流派的科幻小说

Searle, 瑟尔; John, 约翰

Seaton, 西顿; George 乔治; *Hours*, 《36 小时惊恐》

self-defeating belief, 自相矛盾的信仰

self-delusion, 自欺

sense perception, 感觉; hierarchy of, 层次; in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哲学和心理学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William, 威廉

Shantideva, 佛教上师寂天

Simulacra, 模拟物

simulation/simulated reality, 模拟/模拟的现实; as improvement on reality, 对现实的改进; and mental power, 精神力量

skepticism, 怀疑论; refutation of, 驳斥

Skinner, B. F., 斯金纳 B. F.

Skywalker, 天行者 Luke, 卢克

Sloterdijk, 斯劳特戴克; Peter, 彼得

Sobchack, 索柏查克; Thomas, 托马斯

Socrates, 苏格拉底; and the oracle, 祭司; questions of, 问题; and self-knowledge, 自知

Socratic method, 苏格拉底问答法

Speed, 《生死时速》

Spielberg, 斯皮尔博格 Stephen, 斯蒂芬

“splinter in the mind”, 心头之刺

Star Trek, 《星际迷航》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星际迷航: 银河飞龙》

Story-telling, 讲故事; importance of, 重要性

Strasser, 施特拉瑟, Otto, 奥托

Sudden Unexplained Nocturnal Death Syndrome, 突发性不明原因夜间死亡综

合征

Survivor, 《幸存者》

Sutton, 萨顿 Willie, 威利

Switch, 斯维齐

Syberberg, 希伯尔伯格, Hans-Jürgen, 汉斯-尤尔根; *Parsifal*, 《柏士浮》

Takuan, Soho, 沢庵宗彭

Tank, 坦克

Taylor, 泰勒, Richard, 理查德

The Terminator, 《终结者》

theology, 神学

The Thirteenth Floor, 《十三度凶间》

Total Recall, 《全面回忆》

Tragedy as genre, 悲剧作为流派

tranquility, 平静

transcendental pluralism, 先验多元论

Trinity, 崔妮蒂; female role of, 女性角色; love of Neo, 尼奥的爱; questions of, 问

题 55; symbolism of, 象征主义

Truman Show, 《楚门的世界》

truth, 真相 coherence view of, 一致的观点

Tye, 泰伊 Michael, 迈克尔

Unger, 昂格, Peter 彼得; *Ignorance*, 《无知》

the unreal, 不真实; categories of, 种类

utopianism, 乌托邦的理想主义

underground man, 生活在地下之人; and self-knowledge, 自知

黑客帝国与哲学

Vaughn, 沃恩 Lewis, 刘易斯

Videodrome, 《录像带谋杀案》

virtual reality (VR), 虚拟现实; and iconoclasm, 打破旧习; as real, 真实的

Wachowski, 沃卓斯基, Andy, 安迪

Wachowski, 沃卓斯基, Larry, 拉里

Wallace, 华莱士, Anthony, 安东尼

Walton, 沃尔顿, Kendall, 肯德尔

War Games, 《战争游戏》

Warhol, 沃霍尔, Andy, 安迪

Wayne, 韦恩, John, 约翰

Weir, 威尔, Peter, 彼得

the Western as film genre, 作为流派的西部片

Williams, 威廉斯, Bernard, 伯纳德

Williams, 威廉斯, Linda, 琳达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 Ludwig, 路德维希

Woo, 伍 John, 约翰

The X-Files, 《X档案》

Yagyu Munenori, 柳生宗矩

Zardoz, 《扎多斯》

Zeus, 宙斯

Žižek, 齐泽克, Slavoj, 斯拉沃热

Zion (Biblical), 锡安(圣经)

Zion (*Matrix*), 锡安(母体)

Zombie, 佐姆比, Rob, 罗布